

十月革命的準備與實行

列寧著



時代社

В. Ленин

Подготовка 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十月革命的準備與實行

著 者 列 寧 發 行 者 姜 椿 芳

總 經 售 時 代 出 版 社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一二四三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〇— ЕРОСНПУВСО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初 版 (4000 冊)



十月革命的準備與實行

列寧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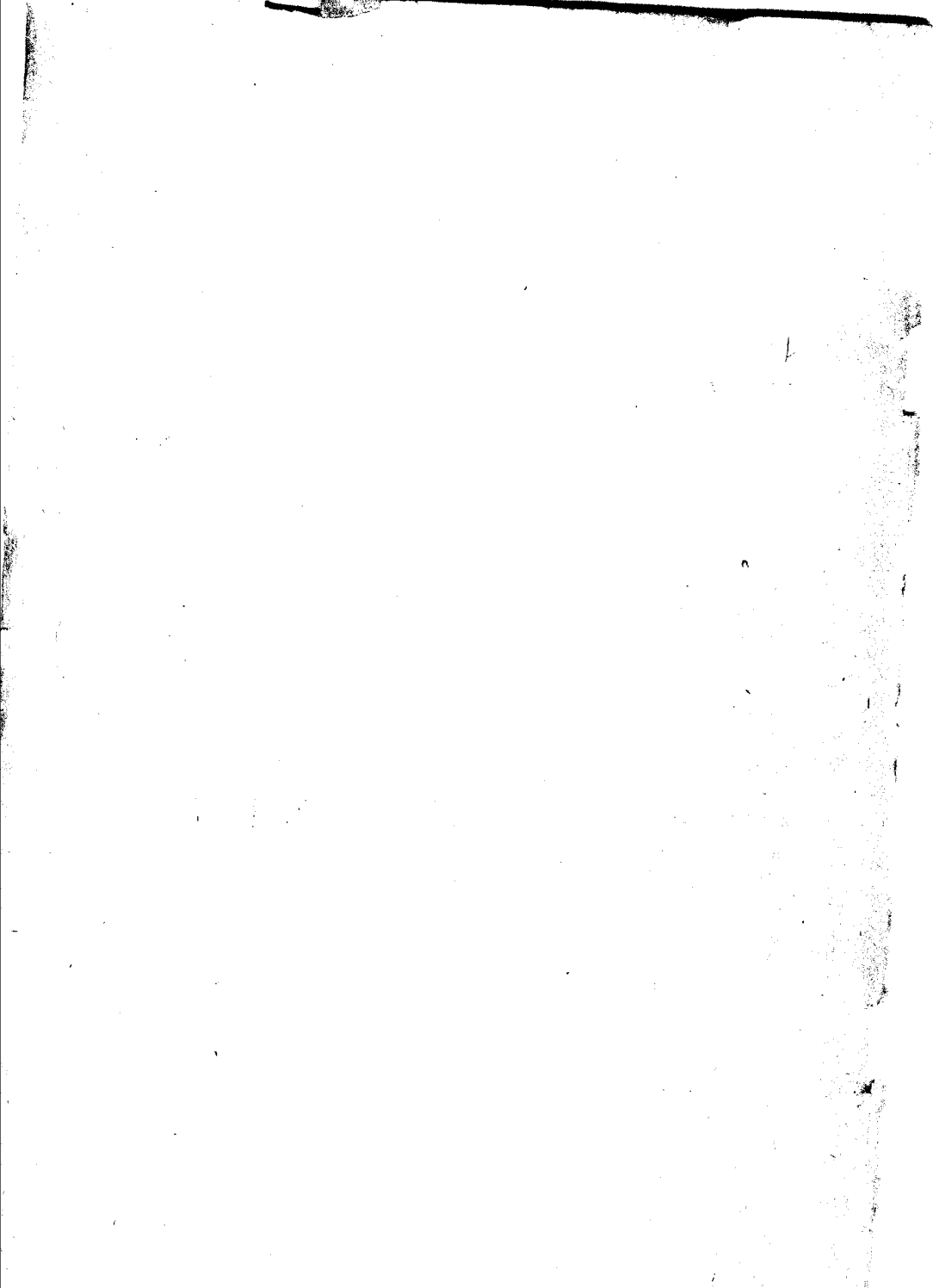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GJ013754

Rw6/38x/0/

時代出版社



目次

準備與實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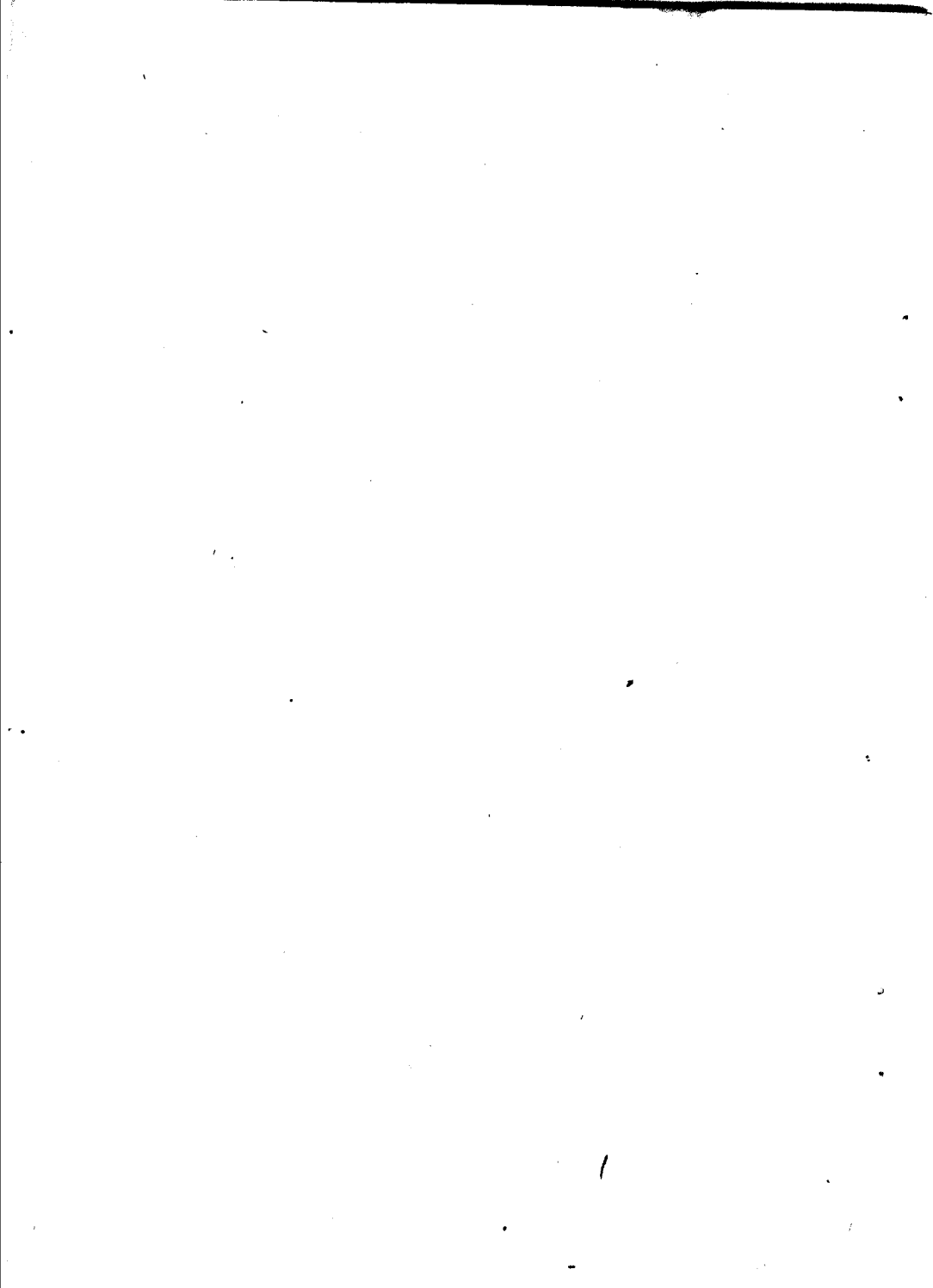
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	9
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15
我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底任務（無產階級政黨底行動綱領草案）.....	19
這次革命底階級性.....	19
新政府底對外政策.....	20
兩個政權並存的特殊局面及其階級意義.....	21
從上述情形中產生的特殊策略.....	24
革命護國主義及其階級意義.....	26
怎樣才能結束戰爭？.....	28
在我國革命中生長起來的新式國家.....	29
土地綱領與民族綱領.....	38
把各銀行與資本家底新迪加收歸國有.....	35
社會主義國際內的狀況.....	36
齊美爾瓦爾得國際破產了——必須建立第三國際.....	43
我們黨究竟應有何種在科學上正確、在政治上能幫助啓發無產階級意識的 名稱呢？.....	47
四月代表會議關於土地問題決議案.....	52
四月代表會議關於民族問題決議案.....	56

第一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土地問題決議草案)	58
第一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論對臨時政府態度的演說)	61
論口號	74
革命底教訓	82
災禍臨頭和防止之法	97
飢荒迫近	97
政府之毫無作為	99
監督辦法是衆所共知和輕而易舉的亦	101
銀行國有	103
新迪加國有	109
取消營業祕密	112
強迫合併於組合中	116
調節消費	119
政府破壞民主組織底工作	123
財政破產和挽救之法	127
害怕走向社會主義，能否前進呢？	131
消除經濟破壞與戰爭問題	134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無產階級	138
馬克思主義與武裝起義(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書)	141
革命底任務	148
與資本案妥協政策底危害作用	150
政權歸蘇維埃	151
給各國人民以和平	151
土地歸勞動者	153
防止飢荒及經濟破壞	154
與地主資本案反革命勢力作鬥爭	155
革命和平發展	156
旁觀者底意見	158
關於武裝起義的決議	161

告布爾什維克黨員書	162
致中央委員書	166
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	169
初版序言	169
再版序言	170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171
(一)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171
(二)特別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174
(三)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177
(四)國家「消亡」和強力革命	181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187
(一)革命底前夜	187
(二)革命底總結	191
(三)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對本問題的提法	197
第三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馬克思底分析	200
(一)公社社員這次嘗試底英勇精神何在?	200
(二)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已被打碎了的國家機器呢?	204
(三)國會制底消滅	209
(四)民族統一底組織	215
(五)寄生蟲式的國家之消滅	218
第四章 續上。恩格斯底補充解釋	220
(一)「住宅問題」	220
(二)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223
(三)給伯伯爾的信	227
(四)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評	230
(五)一八九一年爲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一書所作的序言	237
(六)恩格斯論民主制底消除	243
第五章 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	246
(一)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246
(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249

(三) 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	254
(四) 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258
第六章 馬克思主義之被機會主義者所庸俗化.....	265
(一) 普列漢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266
(二)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267
(三) 考茨基與派業枯克的論戰.....	274
初版書後.....	284
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	285
(一) 傳工人、兵士和農民的宣言.....	285
(二) 關於和平問題的報告(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287
(三) 關於和平問題報告的結論(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292
(四) 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296
關於工人監督條例草案.....	302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宣言(告全體黨員及俄國一切勞動階級).....	304
工人與被剝削勞動農民底聯盟(致真理報編輯部的信).....	309
關於立憲會議問題的提綱.....	312
關於國民經濟社會化的法令草案.....	317
關於遣散軍隊專向第一次全軍隊代表大會代表們提出的問題	320
怎樣組織競賽.....	322
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草案.....	333
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草案.....	334
關於立刻單獨媾和並簽訂割地和約問題的提綱.....	339
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	348
奇談與怪論.....	350
腳踏實地.....	359
嚴重的教訓與嚴重的責任.....	361

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報告(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在俄國共產黨(布) 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	368
現時主要任務.....	393
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	399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底國際狀況與社會主義革命底基本任務.....	399
現時的總口號.....	403
與資產階級鬥爭的新階段.....	404
爲全民統計和監督而鬥爭的意義.....	413
提高勞動生產率.....	416
組織競賽.....	419
「嚴整的組織」與專政.....	422
蘇維埃組織底發展.....	432
結論.....	435



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

四月三號夜裏，我才到達彼得格勒，所以在四月四日舉行的會議上來作關於革命無產階級任務的報告時，自然只能用個人名義，並只好聲明沒有充分準備。

爲了使我自己和誠意的反對論者便於工作起見，我所能唯一做到的辦法，便是準備了書面提綱。我宣讀過這個提綱，並把原文交給了策烈鐵里同志。當時我讀得非常之慢，並讀了兩遍；起初是在波爾什維克會議上，隨後又在波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底聯席會議上。

我把我個人的這個提綱交去付印時，祇加上了一些最簡短的註釋，而在報告裏面，這些註釋是發揮得更爲詳細的。

提 綱

(一) 這次戰爭從俄國方面說來，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下，無條件地仍是掠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因爲這個政府是資本主義性的；所以我們在戰爭問題上，決不能對「革命護國主義」作絲毫的讓步。

覺悟的無產階級祇有在下列條件之下，才能同意進行那種真

正證明革命護國主義是正確的革命戰爭：（一）政權轉歸無產階級和跟隨無產階級的貧苦農民掌握；（二）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事實上放棄一切兼併；（三）真正與一切資本利益完全斷絕關係。

因為贊成革命護國主義的大眾份子底廣大階層，無疑是誠意的，他們承認戰爭，只是由於不得已，而不是爲着侵略；因爲他們是受了資產階級底欺騙，所以我們必須特別周詳地、堅毅地、耐心地向他們解釋他們的錯誤，解釋資本與帝國主義戰爭之間有不可分離的聯繫，證明如果想以真正民主的和平，而不是以強力的和平來結束戰爭，就非推翻資本統治不可。

要在作戰軍隊中最普遍地宣傳這種觀點。

交戰兵士間實行聯歡。

（二）俄國現今時局底特點，就在於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由於無產階級底覺悟性和組織性不夠，而使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歸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掌握。

這個過渡時期底特點就在於：一方面有最高限度公開活動的可能（俄國目前是世界各交戰國中最自由的國家）；他方面又沒有用強力壓迫羣衆的現象；最後，羣衆對於資本家政府，對這個是和平與社會主義底死敵的政府，持着不覺悟的輕信態度。

這種特點，使我們在剛醒覺過來參加政治生活的極廣大無產階級羣衆中進行黨的工作時，必須善於適應這種特殊條件。

（三）不給臨時政府以任何贊助；說明它的一切約許，特別是關於放棄兼併的約許，全係謊話。要揭穿這個政府，揭穿這個資本家政府，而不去「要求」它停止其爲帝國主義的政府，因爲這是一種不可容許的散佈幻想的行爲。

(四) 必須承認，我們黨在大多數工人代表蘇維埃中，較之那染受資產階級影響而把這影響傳達到無產階級中來的一切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份子的聯盟——即從人民社會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起，直到組委¹（齊赫芝、策烈鐵里等人），斯節克洛夫等等止的聯盟——只佔少數，暫時還只佔微弱的少數。

要向羣衆解釋：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當這個政府還染受資產階級底影響時，我們的任務只能是耐心地、有系統地、堅毅地、特別是適應着羣衆底實際需求來解釋他們策略底錯誤。

當我們還佔少數時，我們要實行批評與揭示他們的錯誤，同時宣傳必須使全部國家政權轉歸工人代表蘇維埃，使羣衆從經驗中免除自己的錯誤。

(五) 不是要有國會制的共和國，因為從工人代表蘇維埃回到國會制的共和國，就是倒退一步，而是要有自下至上由全國各地工人、雇農、農民代表蘇維埃組成的共和國。

廢除警察、軍隊和官吏²。

一切官吏必經選舉，並可隨時撤換，其薪俸不得超過熟練工人底平均工資。

(六) 在土地綱領上，應把重心移到雇農代表蘇維埃。

沒收一切地主土地。

國內一切土地都收歸國有，而由當地雇農和農民代表蘇維埃處置之。組織單獨的貧農代表蘇維埃。把每個大田莊（其面積約從一百俄畝至三百俄畝，依地方及其他條件為轉移，與依地方機關底決定）組成爲模範農莊，由雇農代表蘇維埃負責監督，並由

² 即以全民武裝來代替常備軍。

公費經營之。

(七) 國內一切銀行立刻合併為一個國家銀行，並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之。

(八) 我們的直接任務並不是「施行」社會主義，而只是立刻實行由工人代表蘇維埃來監督產品底社會生產和分配。

(九) 黨的任務：

(甲) 立刻召集黨底代表大會；

(乙) 改變黨綱，主要是：

(一) 關於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

(二) 對國家的態度以及我們關於「公社式國家」的要求；

(三) 修改陳舊了的最低限度綱領；

(丙) 改變黨底名稱^②：

(一〇) 革新國際。

發起建立革命國際，建立反對社會沙文主義者和反對「中派」^③的國際。

為使讀者明瞭我為什麼要將誠意的反對論者這種「偶然現象」，當作是罕有的例外而把它特別着重指出起見，我就請讀者

① 即類似巴黎公社的那種國家。

② 全世界上社會民主黨底正式領袖（「護國派」與動搖的「考茨基派」）背叛了社會主義，投降了資產階級，所以我們應改名為共產黨，以代替「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

③ 所謂「中派」就是國際社會民主黨中搖擺於沙文主義者（等於「護國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之間的那個派別，即德國的考茨基之流、法國的龍格之流、俄國的齊赫芝之流、意大利的格拉赫之流、英國的麥克唐納爾之流等等。

拿哥里登伯爾格先生下面這種反駁與這個提綱比較一下，他說：列寧『在革命民主派隊伍中舉起了國內戰爭的旗幟』（摘自普列漢諾夫先生底統一報²第五期）。

這不是奇談麼？

我寫着、讀着、咀嚼着的是：『因為贊成革命護國主義的大眾份子底廣大階層無疑是誠意的…因為他們是受了資產階級底欺騙，所以我們必須特別周詳地、堅毅地、耐心地向他們解釋他們的錯誤…』

而資產階級中自稱為社會民主黨人的先生們，既不屬於護國主義底大眾份子，也不屬於其廣大階層，公然把我的見解轉述成爲『在革命民主派隊伍中（!!）舉起了（!）國內戰爭的旗幟（!）』（關於國內戰爭，無論在提綱上或報告中都一字沒有提過！）…

這是什麼？這和鼓吹摧殘行爲的煽動有什麼區別？這和俄國意志報³有什麼區別呢？

我寫着、讀着、咀嚼着的是：『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我們的任務只能是耐心地、有系統地、堅毅地、特別是適應着羣衆底實際需要來解釋他們策略底錯誤』…

某些反對論者却把我的見解轉述爲：號召『在革命民主派隊伍中進行國內戰爭』^{!!}

我所以攻擊臨時政府，是因爲它沒有指定迅速召集立憲會議的日期，甚至沒有指定任何日期，而只以約許來敷衍了事。我證明過，如果沒有工兵代表蘇維埃，則立憲會議底召集是沒有保障的，它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他們却捏造我的見解，好像我反對最迅速地召集立憲會議^{!!!}

若不是數十年來的政治鬥爭教訓了我，要把反對論者的誠意看作是罕有的例外，那我也許要稱這些話爲「夢話」了。

普列漢諾夫先生在他的報紙上稱我的演說爲「夢話」。好得很，普列漢諾夫先生！但是且看你們的爭辯伎倆，是何等蠢笨、愚鈍和不敏呵。假使我講了兩點鐘的「夢話」，爲什麼數百聽衆竟容忍這種「夢話」？其次，爲什麼你們的報紙竟以整欄篇幅來論述「夢話」？那你們真是完全不能自圓其說。

呼喊、辱罵、叫囂，當然比企圖敘述、解釋、回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七一、一八七二、一八七五各年中，如何議論巴黎公社底經驗及無產階級需要何種國家的問題，容易得多。

以前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先生大概是已不願回憶馬克思主義了吧。

我摘引了盧森堡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稱德國社會民主黨爲「臭屍」的話。而普列漢諾夫、哥里登伯爾格這班先生們就「生氣來了」… 爲誰生氣呢？就是爲那些被人稱之爲沙文主義者的德國沙文主義者呵！

可憐的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事實上的沙文主義者已經頭昏腦亂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舊曆七日）

刊載於真理報第二十六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一卷，第一〇三至一〇七頁

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一切革命底根本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不認清這個問題，便談不到什麼自覺地參加革命，更不要說領導革命了。

我國革命中非常出色的特點，就在於它造成了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這件事實是要首先認清的；因為不了解它，就不能前進。對於舊的公式，例如對於波爾什維主義底舊「公式」，要善於加以補充和修改，因為這些公式，一般說來，原是正確的，可是到了具體實現時，却竟另一樣了。關於兩個政權並存局面的問題，以前誰都沒有想到，並且也不能想到。

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除臨時政府，即資產階級政府外，同時又形成了另一個政府，即工兵代表蘇維埃；這個政府現在還是薄弱的，處在萌芽狀態的，但它終究無疑地是在實際生活中存在着和成長着。

這另一個政府底階級成份怎樣呢？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穿軍服的農民）。這個政府底政治性質怎樣呢？就是革命的專政，即直接憑靠革命的奪取手段，憑靠民衆自下直接倡首的政權，而不是憑靠集中的國家政權所頒布的法律的政權。這完全不是迄今在歐美各先進國佔統治地位的那種通常國會制的資產階級民主其

和國中所一般存在着的政權。人們時常忘記這種情形，常不思索這種情形，可是全部實質却正在這裏。這個政權是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同一式樣的政權。這個政權式樣底基本標誌，就是：（一）政權底本源，不是預先由國會討論和通過的法律，而是民衆在當地自下的直接發動，用句很流行的話來說，就是直接的「奪取」；（二）以全民直接武裝來代替那離開民衆而和民衆對立的警察和軍隊；在這種政權之下，國家秩序是由武裝工農自己，即武裝人民自己來保衛的；（三）官吏，即官僚，或又是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權來代替，或至少要受人民特別監督，把他們變成爲不僅要由人民選舉，並且一經人民要求就可撤換的簡單代表；他們應從盤據高位而領取資產階級式高俸的特權階層，變爲使用特種「武器」的工人，其薪俸不得超過熟練工人底普通工資。

巴黎公社這種特別式樣的國家，其實質就在於此，而且僅在於此。普列漢諾夫輩（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公開沙文主義者），考茨基輩（「中派」，即搖擺於沙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老爺們，以及所有一般現在居統治地位的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等等，都把這種實質遺忘了和曲解了。

他們用空話來敷衍，他們裝聾作啞，支吾搪塞，他們千番百次地相互慶賀革命，但不願去想一想，工兵代表蘇維埃究竟是什麼。他們不願看到顯明的真理：既然有這類蘇維埃存在，既然它們多少是一種政權，那末也就是說，在俄國存在着巴黎公社式樣的國家。

我特別着重「多少」這兩個字。因爲這祇是處在萌芽狀態的政權。它自己既與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直接妥協，又作許多事實上

的讓步，就是已經而且正在把自己的陣地讓給資產階級。

爲什麼呢？是不是因爲齊赫芝、策烈鐵里、斯節克洛夫之流作了「錯誤」呢？這種想法乃是無稽之談。祇有庸人，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才能這樣設想。原因是無產者和農民底覺悟性和組織性不夠。上述領袖們底「錯誤」，就在於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就在於他們不去啓發工人底意識，反而加以蒙蔽；他們不去推翻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反而加以鼓勵；他們不去使羣衆脫離資產階級的影響，反而使這種影響鞏固起來。

由此可見，爲什麼我們自己的同志，也作了這樣多的錯誤，而竟「簡單地」提出問題：是否要立刻推翻臨時政府？

我的回答是：（一）這個政府應該推翻，因爲它是資產階級的寡頭政府，而不是全民政府；它不能給予和平、麵包和完全的自由；（二）這個政府此刻不能推翻，因爲它有與工人代表蘇維埃，首先是與主要的蘇維埃，即彼得格拉蘇維埃所作之直接和間接的，形式上和實際上的妥協維護着；（三）這個政府決不能以尋常的方法去「推翻」，因爲它憑靠於第二個政府，即工人代表蘇維埃對資產階級的「贊助」，而這第二個政府，却是直接表示大多數工農意識和意志的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比工人、雇農、農民、兵士代表蘇維埃式樣更高更好的政府，人類還沒有創造出來，我們至今也還不知道。

覺悟的工人要獲得政權，一定要把大多數羣衆爭取到自己方面來：現時既無採用暴力手段對付羣衆的事實，也就再沒有別的獲取政權的道路了。我們並不是布朗基主義者⁴，並不是主張由少數人奪取政權的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是主張以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來反對小資產階級的烏煙瘴氣，反對沙文主義的

護國派思想，反對空話，反對依賴於資產階級。

我們要建立無產階級的共產黨；波爾什維主義底優秀信徒已經造成了這個黨底各種因素；我們要團結起來進行無產階級的階級工作；無產者和貧農將日益增多地轉到我們方面來。因為實際生活，每時每刻都將打破「社會民主黨人」，齊赫芝、策烈鐵里、斯節克洛夫之流，「社會革命黨人」，更「純粹的」小資產者等等底小資產階級幻想。

資產階級主張資產階級底單一政權。

覺悟的工人主張工人、雇農、農民、兵士代表蘇維埃底單一政權，——主張這個單一政權是應以啓發無產階級意識，使其解脫資產階級影響的工作準備起來，而不是以冒險政策準備起來的。

小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等等——却搖擺不定，妨礙着這種啓發和解脫的事業。

這就是決定我們任務的實際階級力量底對比。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舊曆九日）刊

載於真理報第二十八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

版，第一卷，第一一五至一一五頁

我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底任務

無產階級政黨底行動綱領草案

俄國現時所處的歷史關頭，有下列各種基本特徵：

這次革命底階級性

(一) 僅僅代表那指揮全部國家機器(軍隊、警察、官吏)的一小羣農奴制地主的舊沙皇政權，已被摧毀和廢除了；但沒有摧毀到底。帝制沒有正式剷除。羅曼諾夫輩的狗黨，仍在繼續進行帝制陰謀。農奴制地主底大土地所有制，還沒有消滅。

(二) 俄國的國家政權已轉入新階級手裏，即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手裏。在這個範圍內，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了。

業已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已與那些在一九〇六至一九一四年之間萬分忠順地擁護過「血腥的」尼古拉⁵和「絞手」斯托雷平⁶的明顯帝制派份子(如古契科夫及其他比立憲民主黨人更右的政治家)締結了同盟。李沃夫之流的資產階級新政府，已企圖而且已開始和羅曼諾夫輩談判關於恢復俄國帝制的問題了。這個政府，在高叫革命辭句的喧聲中，任命舊制度底擁護者分掌國家要職。這個政府把國家機器底全部機關(軍隊、警察、官吏)交給

資產階級，總想使它改良得越少越好。羣衆之革命發動和民衆自下奪取政權的舉動，是革命真正勝利底唯一保障，但新政府已開始竭力加以阻礙。

直到現在，這個政府甚至還沒有指定召集立憲會議的日期。地主土地所有制，是農奴主沙皇制度底物質基礎，新政府並未去觸動它。這個政府對於壟斷性的財政機關、大銀行、資本家組成的新迪加和卡德爾等等底行動，根本也不想加以調查、公佈和監督。

新政府中最主要的，左右全局的總長位置（內務部、陸軍部，即指揮軍警官吏，指揮壓迫羣衆之一切機關的司令所），均爲明顯的帝制派和擁護地主大土地所有制者所盤踞。立憲民主黨人，即昨天才變成了的共和派，違背心願的共和派，僅獲得對於支配人民的機關和對於國家政權機關沒有直接關係的次要位置。勞動派底代表和『也是社會主義者』的克倫斯基，除了以響亮的詞句來麻醉民衆的警惕心和注意力外，是不起絲毫別的作用的。

由於這一切原因，所以即在內政方面說，資產階級新政府也不配享有無產階級方面絲毫的信任，而無產階級也就不應予以絲毫的贊助。

新政府底對外政策

（三）現在由於客觀條件的關係，對外政策提到了首要地位；新政府在對外政策上，是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是爲了瓜分資本主義贓物，爲了滅亡弱小民族而繼續和英法等帝國主義列強聯合進行戰爭的政府。

新政府服從俄國資本及其強有力的保護者和主人，亦即全世

世界上最富裕的英法帝國主義資本底利益，違反工兵代表蘇維埃之代表俄國各族人民真正大多數所極端肯定表示出的願望，而不採取任何切實步驟去停止爲資本家利益而使各國人民互相屠殺的戰爭。它甚至沒有把那些明明是包含掠奪內容（瓜分波斯、搶劫中國、搶劫土耳其、瓜分奧地利、奪取東普魯士、奪取德國殖民地等等），明明是俄國和英法帝國主義強盜資本聯結一起的密約公佈出來。這些條約都是由沙皇政府締結的；數百年來，沙皇政府之掠奪和壓迫其他民族，要甚於其他諸主和暴君，它非但壓迫，並且污辱和腐化大俄人民，把他們變爲屠殺他國人民的劊子手，而新政府竟追認了沙皇政府所締結的這些條約。

新政府追認這些強盜式的可恥條約以後，違反工兵蘇維埃代表俄國各族人民大多數明白表示的要求，而不向各交戰國人民作立刻休戰的提議。它用許多冠冕堂皇、有聲有色、但毫無內容的宣言和辭句來敷衍了事，這樣的宣言和辭句在資產階級的外交家口裏，總是用來欺騙被壓迫人民中那些輕信的和幼稚的羣衆。

（四）所以在對外政策方面，新政府非但不配享有絲毫信任，而且就是向這個政府繼續提出要求，要它表明俄國各族人民趨向和平的意志，要它放棄兼併等等，這實際上祇是欺騙民衆，使民衆懷着不能實現的希望，阻滯民衆意識底啓發，間接使民衆容忍戰爭之繼續；而這個戰爭底真實的社會性質，並不是由善良的願望來決定，而是要由進行戰爭的政府底階級性質，由這個政府所代表的階級與俄英法等國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聯繫，以及這個階級所採取的實際政策等等來決定的。

兩個政權並存的特殊局面及其階級意義

(五)我國革命最主要的特徵，最須要加以深思熟慮的特徵，便是在革命勝利後最初幾天內就形成了的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這種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表現於有兩個政府存在：一個是主要的、真正的、實際的資產階級政府，即李沃夫之流的「臨時政府」，它掌握有全部政權機關，另一個是補充的、輔助的、「監督的」政府，即彼得格拉工兵代表蘇維埃，它沒有掌握國家政權機關，可是直接憑靠着顯然無疑的大多數民衆，憑靠着武裝的工人和士兵。

兩個政權並存局面底階級根源及其階級意義，就是一九一七年三月的俄國革命，不但掃除了整個沙皇帝制，不但把全部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並且已接近到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跟前。彼得格拉及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蘇維埃，正是上述這些階級底這種專政（即不憑靠法律而憑靠武裝民衆底直接強力的政權）。

(六)俄國革命第二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就是顯然為大多數地方蘇維埃所信任的彼得格拉工兵代表蘇維埃，竟自願把國家政權轉交資產階級及其臨時政府，同臨時政府訂立關於贊助它的協定，自願把首位讓給它，而祇以監視和監督立憲會議底召集（其召集日期，臨時政府甚至至今還沒有宣佈）為己任。

這種在歷史上從未見過如此形式的非常特殊的情況，使兩個專政錯綜結合起來：一個是資產階級專政（因為李沃夫之流的政府，是一種專政，就是說既不憑靠法律、也不憑靠預先有所表示的民意，而是憑靠強力奪取的一種政權，並且實現這種奪取的，是一定的階級，即資產階級）；另一個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底專政（工兵代表蘇維埃）。

毫無疑義，這種「錯綜」情形，是不能長久維持下去的。一國之內決不能有兩個政權。其中有一個是定要化為烏有的；俄國整個資產階級已在各處竭力用各種方法排除和削弱工兵代表蘇維埃，使其化為烏有，來造成資產階級底單一政權。

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祇是表現革命發展中的過渡時期，此時革命已超出普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範圍，但還沒有進到「純粹的」工農專政。

這個不穩定的過渡情勢之階級意義（和階級原因）如下：我國革命，也和其他一切革命一樣，曾要求羣衆表現莫大的英勇氣概和自我犧牲精神來與沙皇制度作鬥爭，並且一下子就把空前衆多的平常人，捲入了運動漩渦。

一切真正革命之科學的和實際政治上的主要標誌之一，就是在「平常人」中間，進而積極地、獨立地、活躍地參加政治生活，參加國家建設的人數，非常迅速而急轉地劇增起來。

俄國也是如此。俄國現時正在沸騰着。十年來在政治上沉眠不醒，因受沙皇制度的殘酷壓迫，因替地主和廠主作苦工而在政治上頹廢不振的千百萬羣衆，已經醒覺起來並趨向於政治活動了。這千百萬人是誰呢？大部份是小業主、小資產者，即站在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之間的那些人。在歐洲各國中，俄國是小資產階級成份最多的國家。

洶湧的小資產階級的浪潮浸沒了一切，它非但在數量上，並且在思想上也壓倒了覺悟的無產階級，就是說，用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觀薰染了和籠罩了很廣大的工人階層。

小資產階級所過的生活，是業主式的，而不是無產階級式的（指它在社會生產中所佔的地位而言），所以它在生活上是依賴

資產階級，在思想方式上也是跟着資產階級走的。

● 對資本家，即對和平與社會主義底這死敵抱着不覺悟的輕信態度——這就是俄國羣衆現時政治底特點，這就是在歐洲一個小資產階級成份最多的國家底社會經濟基地上以革命速度長成的現象。這就是臨時政府和工兵代表蘇維埃間「妥協」底階級基礎（我要着重指出：我所指的，與其說是形式上的妥協，不如說是事實上的贊助，默認的妥協，以不覺悟的輕信態度讓出政權）；這種妥協給了古契可夫輩一塊肥肉，給了他們真正的政權，而蘇維埃所獲得的却只是克倫斯基輩底約許、尊敬（暫時的）、籠絡、空話、担保和假客氣。

俄國無產階級人數不夠，其覺悟性和組織力不夠，——就是這種情況底另一原因。

一切民粹主義的政黨，直至社會革命黨，都始終是小資產階級性的；組委黨（齊赫芝、策烈鐵里等等）也是一樣；非黨的革命者（斯節克洛夫等）也同樣隨波逐流，或則沒有抵擋住，沒有來得及抵擋住這種浪潮。

從上述情形中產生的特殊策略

（七）馬克思主義者所應顧到的是客觀事實，是羣衆和階級，而不是某些個人等等，因此上述實際情形底特點，就使馬克思主義者必然得出現時的特殊策略。

這種特點提出了一個首要的任務：『把酸醋和胆汁灌入革命民主辭句的甜水中去』（如像我黨中央委員會中一位同志特奧多羅維奇昨天在彼得格拉舉行的全俄鐵路職工代表大會上所講的那樣，——這句話是說得非常中肯的）。進行批評的工作，解釋社

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黨這些小資產階級政黨底錯誤，準備和團結自覺的無產階級共產黨底成份，把無產階級從「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烏煙瘴氣中解脫出來。

這似乎「祇是」一種宣傳的工作。其實這是最實際的革命工作，因為革命其所以停頓，其所以為空話所阻塞，其所以「裹足不前」，並不是由於外來的阻礙，並不是由於資產階級方面使用暴力（古契可夫暫時還祇以採用暴力反對兵士羣衆相威脅），而是由於羣衆不覺悟的輕信態度，因此不作這種工作，就不能推動革命前進。

祇有和這種不覺悟的輕信態度作鬥爭（而與之鬥爭的方法，可以並且應該祇是在思想上，用同志態度去說服，指出實際生活底經驗等），我們才能從猖獗一時的革命辭句中解脫出來，而真正推進無產階級底意識，推進羣衆底意識，推進羣衆在當地的奮勇堅決的首創精神，推進他們去自動實現、發展並鞏固自由、民主以及全部土地歸全民所有的這一原則。

（八）全世界上資產階級和地主政府從經驗中造成了兩種壓迫人民的方法。第一種就是使用暴力。尼古拉第一（刑棍的尼古拉）和尼古拉第二（血腥的尼古拉）把這種劊子手的應有盡有的方法都已最高限度地表演給俄國民衆看了。但此外還有另一種方法，英法資產階級受到多次偉大革命和羣衆革命運動底「懲戒」後，已把這種方法修琢得最巧妙了。這種方法就是欺騙、籠絡、講空話、無數的約許，小恩小惠、讓出不重要的，而保持重要的東西。

俄國現時底特點，就是由第一種方法極迅速地轉到第二種方法，由用暴力對村民衆轉到籠絡民衆，轉到以空洞的諾言欺騙民

衆。正像貓聽着優廚子演說而大啖其肉的故事一樣⁷。米留可夫和古契可夫把持政權，保衛資本底利潤，爲着俄國資本和英法資本底利益來進行帝國主義戰爭，以空言約許、鄭重宣言、動人聲明來搪塞齊赫芝、策烈鐵里、斯節克洛夫這般「廚子」底演說；儘管這些「廚子」在那裏威脅、忠告、央求、懇請、要求、正式宣言……貓還是聽着廚子演說而大啖其肉。

民衆底輕信的不覺悟性，和不覺悟的輕信態度，將日益消失，尤其是在無產者和貧農方面，因爲實際生活（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教導他們不要相信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底領袖，「應該」教導民衆去信任資產階級；無產者應該教導民衆去不信任資產階級。

革命護國主義及其階級意義

（九）『差不多把一切』都浸沒了的小資產階級浪潮，其最大和最鮮明的表現，要算是革命護國主義。它真是俄國革命往前發展和勝利途中的死敵。

誰在這一點上受了誘惑而無能解脫出來，那他對於革命便毫不中用了。但羣衆之受誘惑，却與領袖不同，而他們之解脫，也是另一樣的，是經過另一種發展進程，經過另一種方法的。

革命護國主義，一方面是資產階級欺騙羣衆的結果，是農民和一部份工人不覺悟的輕信態度所產生的結果；他方面是小業主利益和觀點底表現，因爲兼併和銀行利潤對於小業主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益於的，所以他們就「神聖地」保守着那用屠殺他國人民的政策去腐化大俄羅斯人的沙皇制度底傳統。

資產階級欺騙民衆，利用對革命的高尙自驕心，來把事情加

以曲解；似乎因爲革命底這一階段，因爲由古契可夫、米留可夫的所謂共和國代替了沙皇的帝制，於是戰爭的社會政治性質，在俄國方面就發生了變更。民衆也就相信了——暫時相信了——這種謊言，這大部份是由於那使民衆除大俄羅斯人以外，把俄國其他各族人民都看作大俄羅斯人底財產或領地的舊來成見，還在發生作用。沙皇制度腐化大俄羅斯人的卑鄙行爲，使大俄羅斯人慣於把其他各族人民都看作下等東西，「照理」應屬於大俄羅斯的東西，這種腐化作用，是不能一下子就消滅掉的。

我們要善於向羣衆說明，戰爭底社會政治性質，不是由個人，團體以至某國人民底「好意」來決定的；而是由進行戰爭的那個階級底地位，那個階級底政策，即戰爭所繼續的政策，由現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那個經濟勢力，即資本底連繫，由國際資本底帝國主義性質，由俄國在財政上、銀行事業上、外交上對英法等國之依賴等等來決定的。要用羣衆所能瞭解的話來好好解釋這一點，這不是容易的事，在我們中間，沒有一個能一下子絲毫不犯誤錯地做到這點。

但我們宣傳底方向，或是正確些說，我們宣傳底內容，却應該如此，也祇能如此。如果對於革命護國主義作絲毫讓步，那就不管用怎樣漂亮的辭句，用怎樣「實踐的」理由來作辯護，都是叛賣社會主義，都是完全背棄國際主義。

『打倒戰爭』這個口號，當然是正確的；但它沒有估計到目前任務底特點，沒有估計到目前必需用別種方法去接近廣大羣衆。這個口號，據我的意見，好似『打倒沙皇』這口號一樣，『過去美滿時代』的笨拙鼓動家，就是簡單直接地帶着這個口號，走到鄉村裏去，結果是挨了一頓打。革命護國主義底大衆份

子，是誠意的，——這不是指個人，而是指階級說的，就是說，他們所屬的階級（工人和貧農），從兼併和壓迫外族人民的事情上，實在是得不到便宜的。他們並不像資產者和「智識份子」先生們那樣，這些先生們明知不排除資本統治，就不能排除兼併政策，却用漂亮的詞句，無限量的約許，不可勝數的允諾來無恥地欺騙民衆。

護國主義底大眾份子，是以平常人態度簡單觀察問題：「我不願兼併，但德國人却來「擠壓」我，因此我所擁護的是正義的事情，而不是什麼帝國主義的利益。」對於這種人，我們應該向他再三解釋，說明問題不在於他個人的願望，而在於羣衆的，階級的和政治的關係及條件，在於戰爭與資本利益及國際銀行網的聯繫等等。祇有這樣反對護國主義，才算認真，才可預期勝利；這種勝利之獲得，也許不會很快，但是可靠而穩固的。

怎樣才能結束戰爭？

（一〇）戰爭不能『依照願望』來結束。單方面底決定是不能結束戰爭的。借用一個護國派兵士的話來說，『鎗尖插地』是不能結束戰爭的。

在護國派、半護國派、半國際主義派報紙上的論文中，在不可勝數的決議與宣言中，以及工兵代表蘇維埃底各種決議中所充滿着的種種辭句：如像各國社會主義者底「協定」，全世界無產階級底「發動」，各國人民底「意志」等等，也是不能結束戰爭的，——所有這些辭句無非是小資產者空洞的、幼稚的、好意的願望而已。又如所謂『「表明」各國人民趨向和平的（意志）」，『無產階級輪流作革命發動』（在俄國無產階級以後，就「輪

到「德國無產階級」等等的辭句，是最有害不過的了。所有這一切都是路易、布蘭主義⁸，都是甜蜜的幻想，都是以「政治運動」爲兒戲，實際上重演「貓吃肉」的故事。

雖然戰爭無疑是祇有利於資本家強盜，祇是使他們發財，但戰爭並不是由於資本家強盜底惡意所產生的。產生戰爭的，是半世紀來全世界資本底發展，全世界資本底無數綫索和聯繫。若不推翻資本底政權，不使國家政權轉入另一階級，即無產階級手中，那就不能跳出帝國主義戰爭，不能達到民主的，非強力的和平。

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三月的俄國革命，是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國內戰爭的開始。這次革命作了停止戰爭的第一步。但祇有第二步，才能保證戰爭的停止，這第二步就是：國家政權轉入無產階級手中。這將是全世界範圍內『衝破戰綫』的開始——衝破資本利益戰綫的開始，祇有衝破這條戰綫之後，無產階級才能使人類脫離戰爭慘禍，給人類以穩固的和平幸福。

俄國革命既創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就已經把俄國無產階級引到這樣來『衝破資本戰綫』的陣地跟前了。

在我國革命中生長起來的新式國家

(一一) 工兵農等代表蘇維埃尙未被人們所瞭解，這不僅是說大多數人不明白這些蘇維埃底階級意義及其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而且是說它們之爲新形式的國家，正確些說，新式樣的國家，也是人們所不瞭解的。

資產階級國家中最完善最先進的式樣，便是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政權屬於國會；國家機器和管理機關跟普通國家一樣，即常備軍、警察、官吏等；官吏實際上是不更換的，擁有特權地

位，高踞人民之上。

但是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的革命時代，提出了一種更高式樣的民主國家；據恩格斯底說法，這種國家，在某些方面已經不成其為國家，『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這就是巴黎公社式的國家；它以人民自身的直接武裝，代替脫離人民的軍隊和警察。巴黎公社底實質，就在於此。資產階級的作家曾謾罵並誹謗巴黎公社，就中還誣譏它打算立刻「施行」社會主義。

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所開始建立的，正是這種式樣的國家。由全俄人民代表立憲會議或蘇維埃總委員會聯合起來的工兵農等等代表蘇維埃共和國——這就是現時我國已開始實現着的新式國家；它的實現，是由於千百萬人民底主動，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動創立民主制，既不等待立憲民主黨人的教授先生們寫成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底法律草案，也不等待小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中的老學究和老頑固們，如普列漢諾夫或考茨基先生之流，放棄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曲解。

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不同的地方，就在於馬克思主義承認一般地在革命時期中，特別是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必需有國家和國家政權。

馬克思主義和普列漢諾夫、考茨基一流先生們之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不同的地方，就在於馬克思主義承認在上述時期中所必需的，不是什麼尋常的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而是巴黎公社那樣的國家。

後一式樣的國家和舊式國家間的主要區別如下：

由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回轉到帝制，是非常容易的（歷史已

經把這點證明了)，因為全部壓迫機器：軍隊、警察和官吏，依舊完整無恙。而公社及工兵農等等蘇維埃則打碎並廢除這架機器。

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限制並壓迫羣衆底獨立政治生活，不讓羣衆直接參加自下至上的全部國家生活之民主建設事業。工兵代表蘇維埃則與此相反。

工兵代表蘇維埃重新造出巴黎公社所創造的那一式樣的國家，馬克思稱這種式樣爲「終究發現了的，可以使勞苦羣衆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人們通常反駁說：俄國人民還沒有發展到「施行」公社制的程度。這是農奴主底論調，農奴主曾說：農民還沒有發展到享受自由的程度。凡是在經濟實況中和大多數人民意識中沒有絕對成熟的改革，則公社，即工農代表蘇維埃，決不會「施行」，決不設想「施行」，而且也是不應該施行的。經濟上的破產和戰爭所產生的危機愈是厲害，就愈加需要有便於醫治戰爭所加諸人類之可怕創傷的最完善的政治形式。俄國人民底組織經驗愈少，就應愈加堅決地着手由人民自己來進行組織建設的工作，而不只是由資產階級政客和那些享有「肥缺」的官僚去做。

☞ 我們把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一流先生們所曲解而成的冒牌馬克思主義底舊偏見拋棄得愈快，我們對於幫助人民立刻在各處建設工農代表蘇維埃並使它們掌握全部生活的事業愈加熱心，而李沃夫先生之流又把立憲會議底召集推延得愈久，則人民就會愈加容易從中選擇（經過立憲會議，假如李沃夫很久都不召集立憲會議時，那就不經過它），而擁護工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人民自己進行新的組織建設工作時，起初是不免會犯某些錯誤的；但是，犯着錯誤而向前進，總比等待李沃夫先生召集法律學教授們

來起草關於召集立憲會議，永遠奠定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基業而消滅工農代表蘇維埃等的法律，要好一些。

假使我們能夠組織起來，並且把自己的宣傳進行得很好，那末不僅無產者，就是十分之九的農民，也會起來反對恢復警察，反對永不更換的擁有特權的官吏，反對脫離人民的軍隊。而新式國家底實質也僅在於此。

(一二)以民警代替警察，——這種改革是從全部革命進程中產生出來的，並且現時在俄國大多數地方已實施起來了。我們應該向羣衆說明，在大多數通常形式的資產階級革命中，這種改革的生命總是非常短促的；就連最民主最共和的資產階級，也總是恢復帝制時代的舊式警察，這種警察是和人民隔絕，而受資產者指揮，憎於多方壓迫民衆的。

要不讓警察恢復，祇有一種方法：就是建立全民的民警，把它和軍隊融合起來（以全民武裝代替常備軍）。全體男女公民以至青年和老人，都應一律參加這種民警，其年齡標準，大概可以定為從十五歲起至六十五歲為止。僱傭工人和僕役等等在民警中服公務的時日，應由資本家付給他們工資。必須吸收婦女來獨立參加一般政治生活，並且不僅參加政治生活，而且要吸收她們參加人人應當擔任的經常公務，若不這樣，那末不要說社會主義，就連完備而堅固的民主制度也是談不上的。而如照顧病人、照料無家孤孩、注意飲食衛生等等一類的「警察」職務，除非有婦女在實際上——而不祇是在紙面上——獲得平等的參加權，是根本不會執行得滿意的。

不讓警察恢復，吸引全體民衆的組織力量來建設人人充當的民警，——這就是無產階級為保護、鞏固和發展革命起見所應該

灌輸於羣衆中去的任務。

土地綱領與民族綱領

(一三)現在我們還不能確切知道，俄國農村中是否會在最近將來爆發強烈的土地革命。農民中的階級分化，——一方面是雇農、僱工和貧農（「半無產者」），另一方面是富農和中農（資本家和小資本家），——近來無疑地是加深了的；但我們不能知道，這種階級分化究竟已加深到何種程度。祇有經驗，才會解決而且才能解決這樣的問題。

可是，爲着俄國農民土地革命利益計，我們無產階級政黨，不但絕對應該立刻提出土地綱領，並且還應該宣傳立刻可以實現的實踐辦法。

我們應該要求一切土地國有，就是說，把國內一切土地都轉爲國家中央政權底財產。這個政權，應該規定移民土地之大小等等，規定保護森林，改良土壤等等的法律，絕對禁止土地所有者和土地租佃者之間，即國家和農戶之間有任何的中介行爲（絕對禁止土地轉租）。但土地底全部處置權，以及一切關於土地享有及使用的地方條件之規定權，都應完全而唯一地操在各省和各地方的農民代表蘇維埃手裏，而不應操在官僚手裏。

爲提高糧食生產技術和增加生產範圍起見，爲發展合理化的大規模農莊和實行對於它們的社會監督起見，我們應努力使農民委員會把沒收來的每個地主田莊都改組爲巨大的模範農莊，由雇農代表蘇維埃負責監督之。

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反對社會革命黨人中所流行的那些小資產階級辭句和政策，特別是什麼「消費」標準額或「勞動」標準額

以及「土地社會化」等等的空談，而說明出，在商品生產下的小經濟制度，決不能使人類免除羣衆生活貧困與遭受壓迫的狀況。

無產階級政黨並不立刻，並不一定要分裂農民代表蘇維埃，但它應該解釋，必須組織特別的僱農代表蘇維埃和特別的貧農（半無產者）代表蘇維埃，或至少要去組織具有這種階級地位的代表們所舉行的特別的經常會議，成爲一般農民代表蘇維埃裏面單獨的黨派。不這樣，則民粹派籠統說一般農民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甜蜜辭句，都會成爲富農欺騙貧苦羣衆的護符；而富農無非是各種資本家中的一種而已。

許多社會革命黨人和工兵代表蘇維埃，進行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或純粹官僚式的宣傳，勸導農民在立憲會議未召集以前，不要奪取地主土地，不要開始土地改革；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反對這種宣傳，應當號召農民立刻自動實行土地改革，並根據各地農民代表蘇維埃底決定，立刻沒收地主土地。

同時特別重要的，就是堅持必須增加食品底生產，以供給前綫兵士和城市，絕對不許有任何損壞牲畜、工具、機器和建築物等等的行爲。

（一四）在民族問題上，無產階級政黨所應首先主張宣佈並立刻實行的，就是使所有一切爲沙皇制度所壓迫、所強力合併或強迫拮制在國界內的大小民族，即被兼併的民族，都享有與俄國分立的完全自由。

假使不去真正實現分立的自由，那末一切放棄兼併政策的聲明和宣言，都終歸是資產階級對民衆的欺騙，或小資產階級的幼稚願望而已。

無產階級政黨力求建設儘可能巨大的國家，因爲這對於勞苦

羣衆是有利的；它力求使各民族彼此接，以至融合，但它想用以達到這個目的方法，不是強力，而純粹是各民族工人和勞苦羣衆之間的自由和友誼的聯合。

俄羅斯共和國愈是民主化，它之組成爲工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愈有成效，則吸引一切民族勞苦羣衆自願趨向於此種共和國的力量，也就會愈加強大。

分立的完全自由，最廣泛的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詳細規定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辦法——這就是革命無產階級底綱領。

把各銀行與資本家底新迪加收歸國有

（一五）無產階級政黨，在小農國內，當極大多數人民還沒有覺悟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之必要時，決不能抱定「施行」社會主義之目的。

可是，只有以「幾乎是馬克思主義的」辭句爲掩飾的資產階級詭辯家，才能藉口這個真理，來辯護那種把實際上已經完全成熟的緊急革命辦法延不執行的政策，這些辦法，在戰時往往已爲許多資產階級國家所實行，而且爲着預防日益逼近的全盤經濟破壞及飢荒起見，乃是絕對必要的。

如實行土地國有，將一切銀行和資本家新迪加收歸國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蘇維埃來立刻加以監督等等辦法，決不是「施行」社會主義，這是應當絕對堅持，並儘可能用革命方法來實現的。這些辦法，只是走向社會主義去的步驟，且在經濟上完全可以實現；如不採用這些辦法，那末要醫治戰爭所造成的創傷，防止快要臨頭的破產，便是不可能的；資本家和銀行家正是「靠戰爭」大發橫財，而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是永遠不會害怕侵犯這些

資本家和銀行家之空前高額利潤的。

社會主義國際內的狀況

(一六) 俄國工人階級底國際義務，正是在現時特別厲害地提到首要地位。

現在只有懶漢，才不宣誓相信國際主義；就連沙文主義的護國派，就連普列漢諾夫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就連克倫斯基也自稱為國際主義者了。所以無產階級政黨尤其應該十分明顯地、確切地、肯定地用真正的國際主義去和口頭上的國際主義對立。

向全世界工人發表空洞宣言，說自己矢忠於國際主義的空口担保，企圖直接或間接規定各交戰國革命無產階級實行發動底「次序」，妄圖在各交戰國社會黨人中間訂立關於革命鬥爭的「協定」，忙碌於召集社會黨代表大會以便從事和平運動，諸如此類等等，——所有這些主張、企圖和計劃，無論其作者如何誠摯，但從其客觀意義上看來，都只是一些空話，最多也不過是一種幼稚的善良願望，只能作為沙文主義者欺騙羣衆的掩飾而已。法國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在幹國會主義欺詐勾當的手段方面是最狡猾而最老練的了，他們一方面高呼空前響亮動聽的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的辭句，同時又實行空前可恥的對於社會主義或國際的叛變，加入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內閣，投票贊成軍用預算或軍事公債（如像齊赫芝、斯科別列夫、策烈鐵里、斯節克洛夫等近來在俄國所幹的那樣），反對本國的革命鬥爭等等，他們在玩弄這種把戲方面，真是早已打破記錄了。

善人君子常常忘記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底殘暴兇惡環境。這種環境，不容許空談，這種環境在嘲笑那些幼稚的甜蜜願望。

真正的國際主義，只有一種：這就是竭誠工作來發展本國的革命運動和革命鬥爭，毫不例外地幫助（以宣傳、同情和物質來幫助）所有各國中同樣的鬥爭，同樣的路綫，而且只幫助這種鬥爭，這種路綫。

除此以外，其餘一切都是欺人之談和馬尼洛夫精神。

在兩年以上的戰爭時期中，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在所有各國都造成了三種派別；誰要是離開了實在的基地，不承認這三種派別之存在，不去分析它們，不去爲真正的國際主義派作澈底鬥爭，那他就是自陷於軟弱無力，束手無策和錯誤之中。

三種派別如下：

（一）社會沙文主義派，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沙文主義者；這些人是承認在帝國主義戰爭中（首先是在這次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護祖國」的。

這些人是我們的階級敵人。他們已經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

各國正式社會民主黨底正式領袖們，大多數都是如此。這就是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先生之流，德國的謝德曼輩，法國的倫諾德爾、黑得、桑巴等，意大利的比沙拉底之流，英國的漢德曼、費邊派和「工黨份子」（指「工黨」領袖），瑞典的布蘭亭之流，荷蘭的土魯里斯特拉和他的黨，丹麥的斯道寧格和他的黨，美國的伯格爾及其他「保護祖國派」等等。

（二）第二派，即所謂「中派」，這些人搖擺於社會沙文主義者和真正國際主義者之間。

「中派」全體都賭咒發誓，說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說他們贊成和平，贊成多方「逼迫」政府，贊成多方「要

求」本國政府『表明人民趨向和平的意志』，贊成各種各樣的和平運動，贊成不兼併的和平等等，等等——同時也贊成和社會沙文主義者講和平。「中派」贊成「統一」，中派反對分裂。

「中派」是專講小資產階級善良空話，口頭上高談國際主義，實際上是胆怯的機會主義和對社會沙文主義者逢迎討好的派別。

問題底關鍵就在於「中派」不相信必須以革命來反對本國政府，不宣傳革命，不進行忠誠的革命鬥爭，而臆造出最卑鄙的——聽起來好像是絕頂「馬克思主義」的——拒絕革命的各種遁辭。

社會沙文主義者，是我們的階級敵人，是工人運動中的資產者。他們代表那些客觀上為資產階級所收買（優厚的工資，尊貴的位置等等），而幫助本國資產階級掠奪和壓制弱小民族，幫助他們為瓜分資本主義贓物而鬥爭的工人階層和集團。

「中派」是為腐敗的合法性所腐化了的，為國會制度等等環境所弄壞了的老頑固派，是惜於肥美位置和「平安」工作的官僚。在歷史上和經濟上講來，他們並不是什麼特殊階層，而不過是工人運動從已往階段，即從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的階段轉到新階段的過渡現象；已往階段，給了無產階級許多寶貴的東西，特別是教給了無產階級一種必須的藝術，就是緩慢地、堅毅地、有系統地進行最廣泛的組織工作的藝術；而自從那開闢了社會革命紀元的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發生以來，新階段已成為客觀上必然到來的了。

「中派」底主要領袖和代表是考茨基，他是第二國際（一八九九至一九一四年）中最有威望的人物，是把馬克思主義曲解到

完全破產的標本人物，是絕頂無氣節的標本人物，是一九一四年八月以來最可鄙的搖動和叛變底標本人物。「中派」在德國有考茨基、哈阿茲、萊得布爾和國會內所謂「工人或勞動友誼社」；在法國有龍格、普列斯曼和一般的所謂「少數派」；在英國有斯騰頓、麥克唐納爾及其他許多「獨立工黨」首領和一部份英國社會黨首領；在美國有黑爾克維特及其他許多人；在意大利有屠拉梯、特列維斯、莫其良尼等；在瑞士有格里姆等；在奧地利有阿得列爾之流；在俄國有組委黨、阿克雪里羅得、馬爾托夫、齊赫芝及策烈鐵里等等。

自然，單個的人物，有時不知不覺地從社會沙文主義底立場轉到「中派」底立場，或是相反，從後者轉變到前者。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不管有個別人物從一個階級自由轉到別個階級，但各個階級是各不相同的；同樣，在政治生活上，不管有個別人物從這一派別自由轉到那一派別，不管那些想融合各派的企圖和努力，但各個派別是各不相同的。

(三) 第三派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齊美爾瓦爾得左派」¹⁰最能切近表現他們的主張（我們把他們在一九一五年九月所發表的宣言轉載到附錄內，以便讀者能夠按真實文件來認清這派底產生）。

主要的特點，就在於他們與社會沙文主義派及「中派」完全破裂。他們進行竭誠的革命鬥爭來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政府和本國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他們的原則是：『主要敵人在本國』無情地反對社會和平主義者的甜蜜辭句（社會和平主義者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事實上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夢想不必推翻資本底壓迫和統治而獲得永久的和平），反

對那些利用種種遁辭來對於因這次戰爭而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可能性、適當性、適時性，加以否認的言論。

這派最有名的代表：在德國是「斯巴達克團」或「國際社」，李卜克內西即其中一員。李卜克內西是這派和新國際，即真正無產階級國際底最有名的代表。

李卜克內西曾號召德國底工人和兵士倒戈反對本國政府。李卜克內西曾在國會講台上公開地作這種號召。隨後，他又跑到柏林最大廣場之一的波次但廣場上，向示威羣衆散發秘密印刷的宣言，號召「打倒政府」。他因之被捕，被判處苦工徒刑。他現時坐在德國的苦工監獄裏，在德國有幾百，甚至幾千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都因進行反戰鬥爭而被監禁了。

李卜克內西在演說與信札上，不但與本國的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之流（即謝德曼、列金、達維德之流），並且還與本國的中派，即與本國的齊赫芝、策烈鐵里輩（即考茨基、哈阿茲、萊得布爾之流）作過無情的鬥爭。

在一百一十個國會議員中，只有李卜克內西和他的朋友奧多·柳勒打破紀律，打毀與「中派」及沙文主義者的「統一」，而反對全體。只有李卜克內西一人代表社會主義，代表無產階級事業，代表無產階級革命。其餘一切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正如盧森堡（她也是「斯巴達克團」底團員和領袖之一）所正確形容的那樣，已成爲臭屍了。

德國另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的團體，就是布勒門城的工人政治報。

在法國，最接近於真正國際主義者的，有羅里歐和他的朋友

(而布德龍和麥爾黑姆已墮入社會和平主義)，以及在日內瓦發行明天雜誌的法國人基爾波；在英國，有工聯會員報和不列顛社會黨及獨立工黨底一部份黨員(如略賽爾曾公開號召與叛賣了社會主義的領袖們分裂)，有蘇格蘭的國民教員，社會主義者馬克林，他因為進行反戰革命鬥爭，而被英國資產階級政府判處苦工徒刑，英國有好幾百社會主義者，都因這種罪名而坐牢。他們，而且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在美國，有「社會主義工黨」以及在機會主義的「社會黨」內那些從一九一七年一月開始發行國際主義者報的份子；在荷蘭，有發行論壇報的「論壇派」(潘業枯克、郭泰、文可伯、羅蘭霍利斯特)，在齊美爾瓦爾得會議上他們曾是中派，現在投到我們方面來了；在瑞典，有少年黨或左派黨，以林特哈根、納爾曼、卡爾遜、司得立姆、赫龍特等為領袖，赫龍特曾在齊美爾瓦爾得會議上親自參加建立「齊美爾瓦爾得左派」的工作，現因進行反戰革命鬥爭，被捕入獄；在丹麥，有特禮兒及其朋友，他們退出了斯道寧格總長所領導的完全變成了資產階級政黨的丹麥「社會民主黨」；在保加利亞，有「契斯紐克派」；在意大利，最接近於國際主義的有黨底書記拉撒里和中央機關報前進底編輯塞拉底；在波蘭，有拉克，甘業茨基及其他統一於「全國管理委員會」內的社會民主黨底領袖；此外還有盧森堡、梯什科及其他團結於「總管理委員會」中的社會民主黨底領袖；在瑞士，有一些左派，他們草就了「全體表決」底理由書(一九一七年一月)來和本國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及「中派」作鬥爭，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一日，他們在台賽舉行的蘇黎文區社會黨大會上，提出了原則上的革命的反戰決議；在奧地利，有阿得列爾底左派青年朋友，他們也常在維也納

「馬克思俱樂部」內活動，該俱樂部現時已爲最反動的奧地利政府所封閉；奧地利政府因阿得列爾英勇地——雖然思慮不周——槍擊總長，正在殘害他；以及其他等等。

問題並不在色彩底濃淡上，這種色彩底濃淡，就在左派中間也是有的。問題是在派別上。在可怕的帝國主義戰爭時代，要作真正國際主義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這就是問題底全部實質，這樣的人很少，但是只有他們才負荷着社會主義底整個將來，只有他們才是羣衆底領袖，而不是惡化羣衆的人。

在帝國主義戰爭環境下，社會民主黨人中以及一般社會主義者中的改良派與革命派底區別，客觀上必然要起變化。誰要是僅拘限於向資產階級政府「要求」締結和約或「表明各國人民趨向和平的意志」等等，那他在實際上就墮落到改良派的立場。因爲戰爭問題，客觀上祇是革命問題。

要從戰爭過渡到民主的非強力的和平，過渡到使各國人民從那「靠戰爭」發財的資本家老爺們底無數萬萬利息盤剝之下解放出來，——要做到這點，除無產階級革命外，再沒有其他的出路了。

對資產階級政府，可以而且應該要求各種各樣的改良；但要不陷於馬尼洛夫精神和改良主義，便不能要求那些被帝國主義資本底千百條繩索所綑縛着的人們和階級去斬斷這些繩索；而不斬斷這些繩索，則所謂用戰爭來反對戰爭的一切議論，都是空洞的騙人辭句。

「考茨基派」，即「中派」，是口頭上的革命家，實際上的改良主義者，是口頭上的國際主義者，實際上的社會沙文主義派底幫手。

齊美爾瓦爾得國際破產了一必須建立第三國際

(一七) 齊美爾瓦爾得國際，一開始就站在動搖的、「考茨基派」的、「中派」的立場上，這就使齊美爾瓦爾得左派不得不立刻劃清界限，獨樹一幟，而發表自己的宣言（在瑞士用俄文、德文、法文刊印）。

齊美爾瓦爾得國際底主要缺點，其破產（因為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經破產了）底原因，就是在實踐上足以決定一切的最主要的問題上，即與社會沙文主義以及與王德威爾得、鳩思曼等爲首的海牙（荷蘭）社會沙文主義的舊國際完全分裂的問題上猶疑不決。

在我國還不知道，齊美爾瓦爾得國際的多數正是考茨基派。但這是不能不估計到的主要事實，並且這個事實在西歐已爲人所共知了。就連沙文主義者，連德國極端沙文主義者，超等沙文主義的黑姆尼次報兼超等沙文主義的巴烏斯的鐘聲報撰稿人查立曼（自然是個「社會民主黨人」，並且是激烈主張社會民主黨「統一」的），也不得不在報紙上承認說，中派或「考茨基派」和齊美爾瓦爾得的多數是一個東西。

一九一六年末和一九一七年初的情形，已把這個事實完全確定了。不管昆塔爾宣言¹¹怎樣斥責社會和平主義，但整個齊美爾瓦爾得右派，整個齊美爾瓦爾得的多數，都墮落到社會和平主義的立場了：如考茨基之流在一九一七年一二兩月的許多演說；法國的布德龍和麥黑爾姆與社會沙文主義者一致投票贊成社會黨代表大會（一九一六年十二月舉行的）及「勞動總同盟」代表大會（勞動總同盟是法國工會全國的組織，這次代表大會也是於一九

一六年十二月舉行的)所通過的和平主義的決議；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也是如此，那裏全黨都站在社會和平主義的立場上，而屠拉梯本人，則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演說中，甚至『滑到了』(自然不是偶然的)掩飾帝國主義戰爭，鼓吹民族主義論調的地步。

齊美爾瓦爾得會議和昆塔爾會議底主席格里姆，在一九一七年一月，與他本黨內的社會沙文主義者(格雷里哈、普斐留格、繆勒爾等)聯合起來反對真正的國際主義者。

在各國齊美爾瓦爾得派於一九一七年一月和二月舉行的兩次會議上，有幾個國家底左派國際主義者，如少年國際組織底書記和極好的國際主義報紙少年國際底主筆苗春別爾格，我黨中央代表季諾維也夫，波蘭社會民主黨(「全國管理委員會」)代表狄克，參加「斯巴達克團」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哈爾施坦等，會正式痛罵齊美爾瓦爾得多數底這種陽奉陰違首鼠兩端的行動。

俄國無產階級具有很大的能力；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地方的工人階級，像俄國工人階級這樣展開了如許的革命毅力。但能者是多勞的。

再不能容忍齊美爾瓦爾得的泥坑了。再不能爲了遷就齊美爾瓦爾得的「考茨基派」而和普列漢諾夫輩、謝德曼輩的沙文主義國際仍舊保持半推半就的關係。應該立刻和這個國際斷絕關係。留在齊美爾瓦爾得國際裏，只應是爲着傳達消息。

正是我們，正是現在，應該刻不容緩地建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新國際；更正確些說，我們應該毫不畏怯地高聲承認，這個國際已經建立起來，並且已在活動了。

這就是我在上面所確切列舉了的那些「真正國際主義者」底

國際。他們，只有他們，才是革命國際主義羣衆底代表，而不是惡化羣衆的人。

如果以爲這樣的社會主義者數量太少，那末就請每個俄國工人自問一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月革命前夜，俄國覺悟的革命者是否很多呢？

問題不在於數量，而在於正確表現真正革命無產階級底思想和政策。問題底實質，不在於「宣佈」國際主義，而是要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會做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

我們不要以指望什麼協定和國際大會來欺騙自己。當帝國主義戰爭尚在繼續下去的時候，則國際間的交際關係也就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軍事專政底鐵棒所壓住。甚至不得不容忍工人代表蘇維埃這個輔助政府存在的「共和派」米留可夫先生，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時也不放瑞士社會主義者，瑞士社會黨書記，國際主義者，即參加過齊美爾瓦爾得會議和昆塔爾會議的柏拉登進入俄境，雖然他的妻子是俄國女子，他要到妻子親戚那裏去，雖然他在里加參加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因而坐過俄國的監獄，在出獄時向沙皇政府繳納過保證金，而現在想取回這筆保證金；雖然如此，但米留可夫還是不放他進入俄境。既然「共和派」米留可夫能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俄國幹出這種事情，那末資產階級關於實現不兼併的和平的種種允諾和約許，空話和宣言等等，究有什麼價值，自可不言而喻了。

英國政府逮捕托洛茨基的事實如何呢？不放馬爾托夫出瑞士，而希望把馬爾托夫誘到英國，使之和托洛茨基受同樣的命運，這些事實又是如何呢？

我們不要自作幻想。不要自欺。

既然事實證明了，甚至於不放忠於國際主義的社會黨人從斯托哥爾摩到我們這裏來，甚至於不准把他們的信寄給我們，雖然當局完全可以用最嚴密的軍事檢查手續來審察這些信件；因此，「等待」國際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就無異是做國際主義底叛徒。

我們黨不應「等待」，而應立刻建立第三國際，——那時坐在德國和英國監獄中的千百社會主義者將可輕快地長吁一口氣了；成千成萬的德國工人，現時正在舉行罷工和示威而使德皇威廉這個惡徒和強盜害怕起來；他們會在秘密的傳單上，看到我們的決議，看到我們對李卜克內西——並只是對於他——表示兄弟般的信任，看到我們現在也和「革命護國主義」作鬥爭的決議；他們看到這樣的傳單時，便會更加堅信自己的革命國際主義。

能者是多勞的。全世界上現在沒有一國有俄國這樣的自由。我們利用這種自由，並不是去宣傳贊助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革命護國主義」，而是要勇敢地、忠實地本着李卜克內西的無產階級精神去建立第三國際；這個國際，無論對社會沙文主義者叛徒們，或對「中派」動搖份子，都是絕對勢不兩立的。

（一八）既然如此，那末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統一之絕對沒有可能，也就不必多費口舌了。

寧可只剩兩人，如李卜克內西一樣——這就是說和革命的無產階級留在一起，——而不可片刻保存與組委黨，齊赫芝及策列鐵里等統一的念頭；這些人在工人報¹²中與波特列索夫實行聯盟，他們在工人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裏面贊成發行公債¹³，他們已墮落到「護國主義」立場了。

讓死人去殮葬自家的死屍吧！

誰想幫助動搖者，自己就應該首先不動搖。

我們黨究竟應有何種在科學上正確，在政治上能幫助啓發無產階級意識的名稱呢？

(一九)現在我要講到最後一個問題，即我們黨底名稱問題。我們應該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自稱的一樣，命名為共產黨。

我們應該重複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把共產黨宣言當作基礎的。這個宣言被社會民主黨所曲解所叛賣的，有以下主要兩點：(一)工人無祖國，所以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護祖國」就是叛賣社會主義；(二)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已被第二國際曲解了。

「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馬克思曾經屢次——例如在一八七五年的哥達綱領批評上——說到這點，而且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又更通俗地重複說過這點。人類離開資本主義所能直接過渡到的，只是社會主義，即公共佔有生產資料，並按各人的工作來分配生產品。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要漸漸成長到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底旗幟上所寫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這就是我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我黨名稱(社會民主)底後半部，在科學上也是不正確的。民主制是一種國家形式。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却是反對任何國家的。

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底首領，即普列漢諾

夫、考茨基等類先生們，把馬克思主義俗化和曲解了。

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不同的地方，就在於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爲過渡到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但（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與考茨基一流人的不同之處）這國家並不是尋常資產階級國會制民主共和國那樣的國家，而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及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工人代表蘇維埃這樣的國家。

我的第三個理由，就是在我們這裏，實際生活、革命，事實上已經在我國創立了這個——雖然現時還處於幼弱萌芽狀態的——新式「國家」，而這種國家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這已經是羣衆底實踐問題，而不只是領袖們底理論。

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是由那些與民衆隔離的武裝隊伍來控制羣衆。

我們這裏現在產生着的新式國家，也是一種國家，因為我們需要有武裝隊伍，需要有最嚴格的秩序，需要用強力來無情地鎮壓帝制派和古契可夫資產階級的一切反革命企圖。

但是，我們這裏現在產生着的新式國家，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因為在俄國許多地方，這種武裝隊伍就是羣衆自己，就是全體民衆，而並不是駕於羣衆之上，與羣衆隔離，擁有特權，實際上永不更換的人。

不要往後望，而要向前看，不要往後去望通常的資產階級式的民主，這種民主是用舊的帝制的管理機關、警察、軍隊和官吏來鞏固資產階級統治的。

要向前去看現在產生着的新的民主，這種民主已經不成其爲民主了，因為民主就是由民衆統治，而武裝的民衆是不能自己統治自己的。

把民主這個名詞，應用於共產黨，那就不僅是在科學上不正確，並且它在現時，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以後，已是罩在革命民衆眼睛上的一種眼罩，妨礙着他們自由地、大胆地、自動地去建設這新制度，即作爲「國家」唯一政權，作爲任何國家「消亡」之先聲的工農等等代表蘇維埃。

我的第四個理由，就是說要顧到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客觀情勢。

現在的情形已經不像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那樣了，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自覺地容忍了「社會民主」這個不正確的，機會主義的名稱。因爲那時，當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歷史提在日程上的任務是要慢慢進行組織和教育工作。其他的工作是沒有的。無政府主義者當時（現在還是）不但在理論上，並且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根本錯誤的。無政府主義者不正確地估計了時局，沒有瞭解當時的世界形勢：英國工人被帝國主義利潤所腐化，巴黎公社遭到了失敗，德國資產階級民族運動剛剛獲得勝利（一八七一年），半農奴制的俄國還處在年代悠久的沉眠狀態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正確地估計了時局，瞭解了當時國際形勢，瞭解了要慢慢進到開始社會革命的任務。

我們也要瞭解新時代底任務和特點。我們決不要效法冒牌的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這些人，馬克思曾說過：『我散播的是龍種，但所收穫的，却是些跳蚤。』

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依其客觀的必然性，產生了帝國主義戰爭。戰爭已使全人類瀕於深淵，已使全部文化瀕於毀滅，已使新的數百萬人以至無數萬人瀕於野蠻化和滅亡的境地。

除無產階級革命外，沒有別的出路。

當這個革命正在開始的時候，當這個革命尙是畏畏縮縮，尙不堅決，尙不自覺，尙用過分信任資產階級的態度來開始進行的時候，而大多數（這是真情，這是實事）「社會民主黨」首領，「社會民主黨」議員，「社會民主黨」報紙，——而這也就是人們用來響影羣衆的工具哩，——却背叛了社會主義，叛賣了社會主義，轉到「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方面去了。

羣衆被這些領袖弄得惶惑莫定，被他們弄得心中無主，被他們所欺騙了。

難道我們還要沿用那已如第二國際一樣腐朽了的老舊名稱來鼓勵這種欺騙，助長這種欺騙麼？

就讓還有「許多」工人是誠懇相信社會民主黨的罷。現在已經是學習怎樣區別主觀和客觀的時候了。

主觀上，這些工人社會民主黨人，是無產階級羣衆最忠實的領袖。

但全世界客觀形勢，却是這樣，即我們黨底舊名稱便於人們去欺騙羣衆，妨礙運動前進，因為羣衆在每一步驟上，在每種報紙上，在每個國會黨團內所看見的都是那些領袖，他們就是言論最響亮，行動最刺目的人，而且他們都『也是社會民主黨人』，都是「主張」和社會主義叛徒、社會沙文主義者講「統一」的，都是拿出「社會民主黨」所發給的舊支票來要求兌現的…

反對的理由是什麼呢？…『那會把我們與無政府共產主義者混淆起來的』呵…

我們爲什麼不怕和社會民主黨人及社會自由黨人混淆起來，不怕和法蘭西共和國內用資產階級手段欺騙羣衆要算是最先進最

狡猾的那個資產階級政黨，即急進社會黨人混淆起來呢？·據說：『羣衆已經習慣了，工人們已經「愛上了」自己的社會民主黨了…

這就是唯一的理由，但這個理由是把馬克思主義科學，把革命底最近任務，把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客觀情形，把第二國際已遭可恥破產的事實，把包圍着無產者的那些『也算是社會民主黨人』的狐羣狗黨破壞實際事業的事實，都置之不顧了。

這是因循慣例的理由，沉眠不醒的理由，頑固守舊的理由。

而我們則要改造世界。我們要結束世界帝國主義戰爭，要結束這個有數萬萬人民捲入漩渦，有數千萬萬資本利益糾纏在內的戰爭，要結束這個若沒有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便不能以真正民主的和平來結束的戰爭。

而我們却自己害怕自己。我們却不想脫掉已經「穿慣了的」、
「可愛的」、齷齪的襯衫。

現在已經是拋棄齷齪襯衫的時候了，已經是穿起清潔襯衣的時候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日，彼得格拉

一九一七年九月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一卷，第一二八至一五五頁

四月代表會議關於土地問題決議案¹⁴

俄國地主土地所有制之存在，是農奴地主權力底物質支柱和能使帝制復辟的保證。這種土地所有制，必然使俄國絕大多數居民，即農民陷於貧困、遭到盤剝和備受抑壓，必然使全國各方面的生活都陷於落後的地步。

俄國農民土地所有制，無論份地（村社的和農戶的）或私有土地（租佃的和購買的）都從下至上，縱橫錯綜地為半農奴制的舊關係，為農奴制時代所遺傳下來而把農民劃分成各種類別以致地塊零碎散亂等等的關係所束縛。必須打破所有這些陳舊了的有害的界限，必須『剷除阡陌』，從新改造一切土地所有制關係和農業經營關係，以求適應於全俄與全世界經濟底新條件，——這就是農民力求把國內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的物質基礎。

不管一切民粹主義的政黨和派別怎樣慣於給農民羣衆反對農奴制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鬥爭，以及一般地反對俄國全部土地佔有關係和使用關係上一切農奴制桎梏的鬥爭，披上各種各樣的小資產階級幻想的外衣，其實這個鬥爭本身所表現的，完全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絕對進步的以及經濟上必須澈底打破這一切桎梏的趨向。

土地國有雖是資產階級性的設施，但它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使階級鬥爭最能自由進行，使土地使用關係上最能擺脫一切非資產階級附屬物的設施。除此而外，土地國有是廢除土地私有制，那在實際上就會是給一般生產資料私有制一個極強大的打擊，所以無產階級黨應當極力贊助這種改造。

另一方面，俄國富裕農民早已造成農民資產階級的成份，而斯托雷平的土地改良辦法無疑是加強了，加增了和鞏固了這些成份。在鄉村的另一極端上也同樣地加強了和加增了農業僱傭工人，即無產者，以及接近於他們的半無產農民羣衆。

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破壞與剷除愈堅決、愈澈底，俄國一般土地關係上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造愈堅決、愈澈底，則農業無產階級反對富裕農民（農民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就會發展得愈加有力而愈迅速。

俄國革命底命運和結局，如果正在開始的歐洲無產階級革命不會給我國以直接的強大影響的話，那末就要全看城市無產階級能否領導農村無產階級並使鄉村半無產階級大衆與之聯合，或者是這個大衆將跟隨着趨向於與古契可夫輩、米留可夫輩聯合，與資本家和地主聯合，並一般地係趨向於反革命的那個農民資產階級走去——這樣一點來決定。

代表會議根據這樣的階級狀況和階級力量對比，決議如下：

（一）無產階級黨竭力爲立刻完全沒收俄國一切地主土地（以及皇室、教堂、閣部等等所有的土地）而鬥爭。

（二）黨堅決主張立刻把一切土地轉交給那些組織在農民代表蘇維埃中，或組織在其他真正是完全由民主選舉產生而絕對不受地主和官吏支配的地方自治機關中的農民。

(三) 無產階級黨要求把全國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土地國有就是將一切土地所有權交歸國家，而把土地處置權交給地方民主機關。

(四) 黨應當堅決反對臨時政府，因為它以盛加略夫為代表所發表的言論及其共同聲明，都是強迫農民來『與地主訂立自願協定』，實際上就是強迫他們接受地主性的改良，並威脅農民，說要懲罰他們的『擅自行動』，這也就是居民中的少數（地主和資本家）轉到採用暴力手段反對大多數；同時黨應當堅決反對那些勸說農民在立憲會議召集以前不要奪取全部土地的大多數民粹派人以及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底小資產階級動搖態度。

(五) 黨忠告農民奪取土地要採取有組織的方式，而不容許有絲毫損壞財產的行為，並要關心增加生產。

(六) 所有一切土地關係的改造，只有在全部國家機構完全民主化的條件下，即是一方面廢除警察、常備軍和實際上享有特權的官吏，另一方面實行完全不受上級機關底監視和監護之極廣泛的地方自治制的條件下，才能順利實現，才能穩固。

(七) 必須立刻到處着手建立單獨和獨立的農業無產階級組織，一方面組織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以及單獨的半無產階級農民代表蘇維埃），另一方面在共同的農民代表蘇維埃中以及一切城鄉管理機關等等中組織無產階級團體。

(八) 俄國有許多地方農民委員會將地主底耕畜農具交給組織在這些委員會中的農民，以便在公共調劑的基礎上來耕種一切土地，黨應當贊助這些農民委員會底創舉。

(九) 無產階級黨應當忠告農村無產者和半無產者，要他們力求爭得把每個地主田莊組成爲規模夠大的模範農莊，而由農業

工人代表蘇維埃在農藝家領導下，採用最好的耕種技術，用公費經營之。

一九一七年五月十六日（舊曆三日）

刊載於兵士真理報第十三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一卷，第三三四至三五六頁

四月代表會議關於民族問題決議案

民族壓迫政策是專制制度與君主制度底遺產，而地主、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則支持着這種政策，目的是要保護其階級特權並分散各民族的工人。現代帝國主義加強着征服弱小民族的趨向，因而成爲加深民族壓迫的新因素。

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可能達到剷除民族壓迫，那就只有在保證一切民族和語言完全平權的澈底民主共和的國家制度和管理制度之下，才能實現。

必須承認俄國境內一切民族皆有自由分立和組織獨立國家的權利。否認這種權利和不設法保障這種權利能具體實現，就等於贊助侵略或兼併政策。只有由無產階級承認民族分立權，才能保證各民族工人底完全團結，並促進各民族間真正民主的接近。

現時芬蘭和俄國臨時政府間發生的衝突，特別顯著地表明，否認自由分立權的結果，便是公然繼續沙皇政府底政策。

決不可把民族自由分立權的問題和某個民族在某個時機中實行分立是否適當的問題，混爲一談。對於後一問題，無產階級黨在每一場合下都應當根據整個社會發展底利益以及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階級鬥爭底利益，完全獨立地加以解決。

黨要求廣泛的區域自治，取消自上的監督，取消強迫施行的國語，並要求根據當地居民自己對於經濟條件和生活習慣條件及居民民族成份等等的估計，來劃定自管區以及自治區底疆界。

無產階級黨堅決排斥所謂「民族文化自治」，即把學校等等事宜劃出國家管轄範圍而交給某種民族議會處理的辦法；民族文化自治制是用人工方法把那些在同一地方居住和甚至在同一企業作工的人，按其所屬的「民族文化」彼此分開，就是說，使工人和本民族底資產階級文化間的聯繫加強起來；而社會民主黨底任務，却在於加強全世界無產階級底國際文化。

黨要求在憲法中加入一條基本法律，將某一民族所享有的任何特權以及對於少數民族各種權利的任何侵犯，都宣佈為無效。

工人階級底利益，要求把俄國境內所有各民族工人溶合為統一的無產階級的組織：政治的、職工會的、合作社的、教育的組織等等。只有這樣把各民族工人溶合為統一的組織，才使無產階級有可能來進行反國際資本和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勝利鬥爭。

一九一七年五月十六日（舊曆三日）

刊載於兵士真理報第十三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

年版，第一卷，第三五二至三五三頁

第一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

一九一七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八日

土地問題決議草案

(一) 一切地主土地和私有土地，以及皇室、教堂等等所有土地，概應立刻毫無報償地轉歸人民所有。

(二) 農民應當有組織地經過農民代表蘇維埃，立刻奪取各地全部土地，以便實行經濟上的處置，但絕對不以此預決立憲會議或全俄蘇維埃委員會——如果人民把國家中央政權交給這樣的蘇維埃委員會的話——關於土地制度的最終規定。

(三) 土地私有制概應廢除，即是全部土地所有權應專屬於全體人民；而處置土地之權則應屬於地方民主機關。

(四) 農民應當拒絕資本家、地主及其臨時政府關於就地與地主「協定」來規定立刻處置土地辦法的建議；對於全部土地的處置，應由各地大多數農民有組織的決議決定之，而不應由大多數與少數並且是寥寥無幾的少數間的協定，即農民與地主間的協定來決定。

(五) 不僅地主，而且資本家也在竭力進行鬥爭，並將以全力進行鬥爭來反對把一切地主土地無報償地轉歸農民，資本家不只擁有很大的金錢力量，而且擁有經過報紙，經過許多慣於資本統治的官吏和職員等等來影響那些還是愚昧無知羣衆的力量。所

以不打破農民羣衆中對資本家的信任，不建立農民和城市工人間的密切聯盟，不把全部國家政權完全轉歸工兵農等代表蘇維埃，則將一切地主土地無報償地轉歸農民的事業便無法貫徹到底，無法鞏固起來。只有歸這種蘇維埃掌握的政權，只有不是用警察，不是用官吏，不是用與人民脫離的常備軍來管理國家，而是經過全民普遍武裝的工農民警來管理國家的這個政權，才能保證上述各種爲全體農民所要求的土地改革。

(六) 農業僱傭工人和貧農，即因沒有足夠的土地、牲畜、工具而部份地要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農民，應當以全力去建立獨立組織，組成爲特殊的蘇維埃，或在共同的農民蘇維埃中組成爲特殊的團體，以便捍衛自己的利益，反對那些必然力圖與資本家和地主聯合的富農。

(七) 由於戰爭的結果，俄國也如其他一切交戰國以及許多中立國（非交戰國）一樣，因勞動力不夠，因煤鐵等等缺乏，而感受經濟破壞、災禍、飢荒的威脅。只有實行由工農代表去監視並領導全部產品之生產和分配事宜，才能挽救國家。所以必須立刻準備使農民代表蘇維埃與工人代表蘇維埃成立協定，用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來交換工具和衣履等等，而不要資本家作中介，並排除他們對工廠的管理。爲了同一目的，必須鼓勵把地主底耕畜農具轉歸農民委員會，而使這些耕畜農具歸公共使用。同樣應當鼓勵把每個規模巨大的地主田莊建成模範農莊，根據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底決議，在農藝家領導下，用最好的工具來共同耕種土地。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
年版，第二卷，第八九至九〇頁。

第一次全俄工兵代表蘇 維埃代表大會

一九一七年六月三日至二十三日

論對臨時政府態度的演說

一九一七年六月四日

同志們，在規定給我的知時時間中，我只能說一說執委報告人和隨後發言人所提出的幾個基本原則問題，而且我想這是比較適當些的。

擺在我們面前的第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我們現在出席的是什麼會議，此刻舉行全俄代表大會的蘇維埃是什麼，什麼是革命民主制，人們在這裏千番百次地重複說到革命民主制這個名詞，只是爲了掩蓋對這民主制全不瞭解和完全背棄的事實罷了。因爲在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說到革命民主制，而模糊蘇維埃組織底性質，它的階級成份，它在革命中的作用，關於這些，一句話也不說，同時却覬覦民主派的稱號，這是很可怪的。人們在我們面前描寫在全西歐都有過的那種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底綱領，描寫現在一切資產階級政府，——我國政府也在內，——都承認的改良綱領，同時却又向我們說什麼革命民主制。他們是在什麼人面前說話呢？是在蘇維埃面前呵。那我就來問問你們，在歐洲是否有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的共和國中，存在有與這蘇維埃多少相似的機關呢？你們必得回答說：沒有。任何地方都沒有這樣的

機關，而且也不能有這樣的機關，因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資產階級政府，連同那種剛才向我們描畫過的，而在一切國家中提議過幾十次，却始終是紙上空文的改良「計劃」，或者是人們現在向之投訴的這樣的機關，這樣的新式「政府」，即為革命所創造的，是僅在歷史上革命巨大高漲，例如在法國一七九二年以及一八七一年時，在俄國一九〇五年時才有過先例的政府。蘇維埃，——這是在任何一個通常資產階級國會制的國家中所沒有的機關，而且決不能與資產階級政府同時存在的。這就是我們在我黨決議案中叫做工農民主共和國的那種更民主的新式國家，在這種國家中，惟一的政權定會屬於工兵代表蘇維埃。如果以為這是個理論問題，那便是無益的想法，如果以為可以把這個問題避開不談，那便是無益的企圖，如果想用現在還有某種機關與工兵蘇維埃同時存在的事實來支吾搪塞，那便是無益的遁辭。不錯，它們是同時並存的。但正是由於這種情形才產生了極多的誤會、衝突和磨擦。正是由於這種情形才使俄國革命在第一次高漲，第一次前進之後發生停滯，發生現時在我國聯合政府中，在一切對內對外政策中，因準備帝國主義的進攻而表現的那種退步現象。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通常的資產階級政府，那時農民、工人、兵士等等的蘇維埃就不需要，那時蘇維埃若不被那些把持兵柄而絲毫不顧克倫斯基總長之滔滔雄辯的反革命將軍們所驅散，便會無聲無臭地死滅。這樣的機關是沒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既不能後退，也不能停在原地，而只有前進才能生存。這就是並非俄國人空想出來，而是由革命創造出來的那種新式國家，因為沒有它，革命就不能勝利。在全俄蘇維埃內部必不可免地要發生各政黨爭奪政權的磨擦和鬥爭。但這將是由羣衆根據自身政治經驗來

消除各種可能的錯誤和幻想（喧聲），而總長們所作的報告，援引什麼他們昨天已經說過，明天還要寫出，後天還會約許等等，對於消滅錯誤和幻想是不會有幫助的。同志們，這從俄國革命所創立而現在處在存亡關頭的機關看來，是很可笑的。蘇維埃照現時這樣繼續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並非小孩的工人和農民竟要來開會通過那不能經受任何文據檢驗的決議，聽那不能經受任何文據檢驗的報告！這樣的機關是過渡到一種新式共和國，該共和國將建立不是口頭上，而是事實上沒有警察，沒有常備軍的堅強政權，此種政權現時在西歐還是不能存在的，而俄國革命沒有這種政權便不能勝利，便不能戰勝地主，便不能戰勝帝國主義。

沒有這樣的政權，就談不到我們自己會獲得這樣的勝利，並且我們愈加留心考察人們在這裏向我們建議的綱領以及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則兩者之間的基本矛盾就愈加觸目地顯露出來。人們說，——如像報告人和其他發言人就是這樣說的，——第一屆臨時政府真是不好！而以前當波爾什維克，時乖命舛的波爾什維克說「不給這個政府以任何贊助和任何信任」時，人們却是如何紛紛責罵我們為「無政府主義者」呵！現在大家都說以前的政府是不好的了，試問這幾乎是社會主義者充任開員的聯合政府怎樣呢，它與前屆政府有什麼區別呢？關於什麼綱領、計劃的空談不是說得夠多了麼，這些東西不是說得足夠了麼，不是到了實行的時候了麼？從五月六日建立聯合政府起到現在已過了一個月了。請看看事實，看看那在俄國以及一切被捲入帝國主義戰爭的國家中所有的經濟破壞情形吧。為什麼發生經濟破壞？就是由於資本家掠奪無厭。這才是真正的無政府狀態。這是報紙上公開承認了的事實，而且並不是我們的報紙，當然不是什麼波爾什維克報

紙，而是內閣機關刊物工人報上發表的；煤炭供給的定價由「革命」政府提高了！而聯合政府也竟沒有把這種情形改變絲毫。有人說，俄國可否立刻施行社會主義，可否立刻一般地實行根本改造，——同志們，這全是空洞的遁辭。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學理，正像他們自己所常常說明的那樣：『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底指南。』過渡到純粹社會主義的純粹資本主義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的，且在戰時是決不能有的，而只有某種中間的、新的、前所未有的東西，因為有幾萬萬被捲入各國資本家間所進行的罪惡戰爭中的人們處在死亡危險之內。現在的問題不在於約許改良，——這是空話。現在的問題是在於要進行我們此刻所需要的步驟。

如果你們想援引「革命」民主制這個名詞，那你們就要把這個概念與在資本家內閣下面的改良民主制區別清楚，因為現在該是拋棄所謂「革命民主制」的空談，拋棄那種用「革命民主制」這一名詞來互相恭賀的行爲，而按馬克思主義和一般科學社會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那樣，來作階級的品評的時候了。人們向我們提議的東西，乃是過渡到資本家內閣下面的改良主義民主制。也許從西歐普通標本的觀點來看，這是好極了的。可是現在有許多國家處在滅亡的前夜，而我們所說的那些實際辦法，看來似乎是非常複雜而難於進行，還必須加以特別研究，好像前一個發言人，郵電總長公民所說的那樣，——其實這些辦法是十分明顯的。他說，在俄國沒有一個政黨會表示決意擔負握取全部政權的責任。我回答說：有的！任何一個政黨都不能拒絕這個責任，我們黨也就不拒絕這個責任：它隨時隨刻都準備握取全部政權，（鼓掌，笑聲）。

你們儘可任意嘻笑，可是如果總長公民在這個問題上把我們和右派相提併論的話，那他會得到應有的回答的。任何一個黨都不能拒絕這個責任。並且當着還存在有自由的時候，當着所謂實行逮捕和充軍到西伯利亞的威脅——這種威脅是出自反革命派方面，而與反革命派同事的，却有我們幾乎是社會主義者的總長們，——還只是一種威脅的時候，任何一個政黨都會說：向我們表示信任吧，我們就會把我們的綱領拿給你們看的。

我們在四月二十九日舉行的代表會議上就已製定了這樣的綱領。可惜人們不尊重這個綱領，不遵行這個綱領。顯然要把這個綱領作一通俗的解釋。我且勉力來把我們的決議，我們的綱領，向郵電總長公民作一通俗的解釋吧。我們綱領中關於挽救經濟危機的辦法，就是立刻——爲此是不需要有任何攔延的，——要求公佈所有那些高達百分之五百至八百的駭人聽聞的利潤，而資本家之獲得這種利潤，並不是像「純粹」資本主義下的資本家在自由市場上獲得的，而是藉供給軍需品獲得的。請看，這就是真正必須而且可能實行工人監督的地方。這就是你們如果自稱爲「革命」民主派時所應當代表蘇維埃實行的，而且是可以立刻實行的辦法。這不是社會主義。這是使人民看清真正的無政府狀態，看清真正玩弄帝國主義的把戲，玩弄民衆財產，玩弄幾十萬人生命的行爲，這些生命是明天就會因我國繼續窒息希臘而死亡的。請你們把資本家老爺們底利潤公佈出來，逮捕五十個或一百個最大的百萬富翁吧。只要把他們拘留幾星期就行了，那怕是用軟禁尼古拉·羅曼諾夫那樣的優待條件來對待他們也能，都可達到一個簡單的目的：強迫他們說出各種綫索，欺詐手段，貪慾無厭的齷齪行爲，由於這些貪慾詐行的結果，使我國甚至在新政府下每天

損失的數目都以百萬計。這就是造成無政府狀態和經濟破壞的基本原因，所以我們說：我國一切都如舊觀，聯合政府沒有改變絲毫東西，它只加上了一大堆宣言和好聽的聲明書。不管人們多麼誠懇，不管他們多麼誠意希望勞動者都好，但實況是沒有改變的——掌握政權的仍舊是原來那個階級。其所執行的政策，並不是民主政策。

人們說什麼使『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民主化』。難道你們真不知道，這句話只對於俄國才是新穎的麼？在其他國家不是已有幾十個幾乎是社會主義者的閣員向國人這樣約許過麼？既然我們面前擺着活生生的具體事實：地方居民選舉政權機關，而中央却硬要指定或批准地方政權機關人選來破壞起碼的民主原則，試問這些約許究竟有什麼意義呢。資本家掠奪人民財產的現象繼續着。帝國主義戰爭繼續着。而人們却答應我們改良、改良、又改良，可是這些改良在現存的範圍內是根本不能實現的，因為戰爭壓倒一切，決定一切。有人說戰爭並不是爲着資本家利潤而進行的，爲什麼你們不同意這種說法呢？標準何在呢？首先就在於是哪一個階級當權，哪一個階級繼續主政，哪一個階級繼續利用銀行和財政業務而榨取幾千萬萬利潤？幹這一切的，仍然是那個資本家階級，所以戰爭也就仍然是帝國主義的戰爭。無論第一屆臨時政府也好，無論那幾乎是社會主義者充當閣員的政府也好，都沒有改變絲毫東西。祕密條約仍然是祕密條約。俄國仍然是爲海峽而戰，爲繼續略霍夫對波斯的政策¹⁵等等而戰。

我知道，你們不願意這樣，你們當中大多數人不願意這樣，閣員們也不願意這樣，因爲這是不能願意的事情，因爲這是殺害幾萬萬人民生命的事情。可是且拿現在米留可夫和馬克拉可夫輩

大說特說的那種進攻來看吧。他們完全懂得這是一回什麼事情；他們知道，這是與政權問題，與革命問題相關連的。人們說，應當把政治問題與戰略問題區分開來。連提出這樣的問題都是好笑的。立憲民主黨人明明瞭解，現在擺着的問題是政治問題。

至於說從下層發動的爭取和平的革命鬥爭可能引起單獨媾和的結局，——這是誣蔑。我們如果握得政權的話，那我們所要實行的第一個步驟，就是逮捕那些資本巨頭，斬斷他們玩弄陰謀手段的一切綫索。否則，所有關於不兼併，不賠款的和平等詞句，都是空話。我們所要實行的第二個步驟，就會是把各國人民同政府分開，而單獨向人民宣佈：我們認為一切資本家都是強盜，無論特勒青科也好，——他絲毫也不比米留可夫好些，不過較蠢一些罷了，——法國的資本家也好，英國的資本家也好，任何其他國家的資本家也好，都是一樣。

你們自己的新聞報弄糊塗了，不說不兼併不賠款的和平，而提議恢復原狀。不對，我們不是這樣來瞭解「不兼併」的和平的，連農民代表大會所說的，都比較近於真理些，它說，要建立「聯邦」共和國，其意思就是，俄羅斯共和國無論對哪一個民族，都不願用新的或舊的方式去壓迫它們，無論對哪一個民族，不管對芬蘭也好，對烏克蘭也好，都不願用強力手段強迫它們和它同居共處；而現時陸軍總長却向芬蘭和烏克蘭百般挑釁，造成不可容許的衝突。我們希望有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具有堅強政權的俄羅斯共和國，可是這個堅強政權只有由各族人民自願同意才可建立起來。「革命民主」是個莊嚴的名詞，可是，人們却以之稱呼那個用卑鄙挑釁手段來增加對烏克蘭和芬蘭問題上的困難的政府，而烏克蘭和芬蘭甚至沒有表示出要分立，而只說：「請不要

把起碼的民主設施攔延到立憲會議吧！』

當你們還沒有放棄自己的兼併時，便無法締結不兼併不賠款的和平。須知這是很可笑的，這是一種把戲，歐洲每個工人都對此嘲笑說：『他們口頭上說得很漂亮，號召各族人民推翻銀行家，自己却把本國銀行家送到內閣裏去當總長。』逮捕他們，揭露他們的欺詐把戲，查明各種線索吧，——你們却不這樣做，雖然你們擁有不容抗拒的權力機關。你們經過了一九〇五和一九一七年的事變，你們知道，革命是不能按主觀願望來幹的，其他各國的革命都是經過流血起義的艱苦道路才幹成功的，而在俄國却沒有一個團體，一個階級能抵抗蘇維埃政權。在俄國這種革命可能是例外地成為和平革命。這個革命如果立刻與一切資本家階級斷絕關係，立刻向各國人民提議和平，那末在極短期間內，就會也從法國人民方面，也從德國人民方面得到同意的表示，因為這些國家快要陷於滅亡，因為德國狀況毫無希望，因為它沒有出路，因為法國也…

（主席說：『你的發言時間完了。』）

再有半分鐘我就講完…（喧聲，會場上有人請繼續說下去，有人抗議，有人鼓掌）。

（主席說：『報告大會，主席團提議延長發言人底說話時間。誰反對？大多數贊成延長發言時間。』）

我說過，假使俄國革命民主派，不是口頭上的民主派，而是真正的民主派，那它就會推動革命前進，而不會與資本家妥協，不會空談什麼不兼併不賠款的和平，而會消滅俄國自己方面的兼併，並直接宣佈，它認為任何兼併都是犯罪的強盜行為。那時就會可以避免爲了瓜分波斯和巴爾幹而使千百萬人瀕於死亡的帝國

主義的進攻。那時就可以開闢達到和平的道路，這條道路不是簡單的，——我們並不這樣說，——在這條道路上也許會發生真正革命戰爭。

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並不像巴查羅夫今天在新生活報上提出的那樣；我們只說，俄國所處的條件，使它在帝國主義戰爭結束時所需執行的任務，比原來想像的要容易些。它所處的地理條件，使那些憑靠資本及其掠奪利益的列強，如果冒險來反對俄國工人階級及與之聯合的半無產階級即貧農的話，那末這對於它們，就會是極端困難的任務。德國已瀕於覆滅的境地，而在美國——它想吞併墨西哥，並且大概很快就要同日本作鬥爭——參戰以後，德國狀況已是無可挽救的了，德國定會被消滅掉的。法國所處的地理條件，使它遭受的痛苦最多，它疲困到了極點，這個國家遭受飢餓的程度比德國少些，可是人力底損失却比德國多得無可測量。所以假使你們第一步就從約制俄國資本家底利潤開始，而剝奪他們榨取幾萬萬利潤的任何可能；假使你們向各國人民提議和平，反對所有一切國家底資本家，並逕直聲明說，你們決不同德國資本家以及凡是直接間接贊助他們或與之勾結者作任何談判、任何交際，並說，你們拒絕與英法資本家發生關係，——那時你們就會是在工人面前控訴他們。那你們就不會把發給麥克唐納爾出國護照³⁶的事情當作勝利，麥克唐納爾從來沒有作過反資本的革命鬥爭，其所以放他出國，是因為他沒有表示過反對英國資本家的革命鬥爭思想、原則、實踐和經驗，而我們的馬克林同志和幾百個英國社會主義者却因進行這種鬥爭而坐牢，我們的李卜克內西同志也因此而坐牢，他之所以被拘禁在苦工牢裏，只是因為他說過：『德國兵士們，開槍打你們自己的盟

撒吧。」

大多數臨時政府委員在特別召集的第三屆杜馬會議中——我不知道，照算起來，這屆杜馬究竟是第幾屆，是第三屆，還是第四屆，——每天揚言威嚇，製造空氣，要把我們拘禁到苦工牢裏去，並且已在起草司法部關於此事的新法令，其實把帝國主義者資本家拘禁到這樣的苦工牢裏去，難道不是還要正確一些麼？馬克林和李卜克內西，這才真是把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思想見諸實行的社會主義者。要向各國政府說的，也就是這樣的話。爲了爭取和平，必須在各國人民面前控訴各國政府。那時你們就能使一切帝國主義政府都陷於窘境。現在却是你們自己陷於窘境了，既然在三月十四日爲和平事業告人民的宣言上說，『推翻你們的皇帝，你們的國王，你們的銀行家吧，』而我們自己雖握有如像工兵代表蘇維埃這樣一種空前未有的，按數量、經驗、物質力量來說都極豐富的組織，却同我們的銀行家訂立聯盟，建立幾乎是社會主義者的聯合政府，並寫着那在歐洲已寫了好幾十年的改良草案。歐洲那裏的人在嘲笑我們這種爲和平鬥爭的方法。只有當蘇維埃握取政權，並用革命手段行動時，歐洲人才會瞭解這種鬥爭。

現在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在階級規模上反對資本家，作出停止帝國主義戰爭的步驟而不經過流血的革命。真的只有一個國家，而這個國家就是俄國。當工兵代表蘇維埃還存在的時候，俄國始終會是這樣的國家。蘇維埃與普通式樣的臨時政府長期並存是不可能的。只有當舉行進攻不會實現時，蘇維埃才能照舊存在。舉行進攻是俄國革命中全部政局的轉變，即是從期待和平與準備由下層舉行革命起義來獲得和平的局面轉變到重新進行戰爭。

的局面。從一條戰綫上的兵士聯歡，進到一切戰綫上的兵士聯歡，從人們甘冒坐苦工監牢危險而用麵包穀同飢餓的德國無產者交換削筆小刀這種自發的聯歡，進到自覺的聯歡，——這就是已經顯現出來了的道路。

當我們把政權握到自己手裏時，我們就會制裁資本家，那時，就不是現在進行的這種戰爭了，因為戰爭底性質，要看進行戰爭的是哪一個階級來決定，而不是看紙上寫的什麼東西來決定。在紙上是隨便什麼都可以寫的。但是當資本家階級還在政府裏佔多數，那就不管寫的什麼東西，不管寫的如何漂亮，不管當總長的有多少幾乎是社會主義者的人，戰爭仍舊是帝國主義戰爭。這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看見的。阿爾巴尼亞的例子，希臘和波斯的例子，已是明顯不過地表明了這點，我就很奇怪，為什麼大家都攻擊我們的書面聲明（關於進攻問題的聲明書），却沒有人說出一個具體的例子來！很容易就答應了擬定計劃，而對具體辦法却總是攔延下去。很容易就寫了不兼併的和平的宣言，但阿爾巴尼亞、希臘、波斯的例子却是在聯合政府成立以後發生的事例。關於這些事件，在那並非我黨機關刊物，而是政府機關刊物，關員機關刊物的人民事業報上寫着：望殺希臘，這是對俄國民主制的侮辱。米留可夫，即你們把他當作什麼大人物看待，其實他不過是他們黨裏一個普通黨員，與特勒青科沒有任何區別的人，而他也寫道，逼迫希臘的是協約國的外交。戰爭仍舊是帝國主義的，却不管你們多麼願意和平，你們對勞動者的同情多麼誠意，不管你們對和平的願望是多麼誠懇，——我完全相信，在羣衆中對和平的願望不能不是誠懇的，——你們還是無能為力的，因為除了繼續發展革命而外，決沒有其他方法能夠結束戰爭。

俄國革命一開始，下層爭取和平的革命鬥爭也隨着開始。如果你們握取了政權，如果政權轉到了革命機關掌握中來進行反對俄國資本家的鬥爭，那時別國的勞動者就會相信你們，那時你們就會能夠提議和平。那時我們的和平，至少從兩方面，從兩個精疲力竭，大勢已去的國家方面，就是說從德國和法國方面，可以有保障了。假令那時客觀情勢使我們必得進行革命鬥爭，——這是誰也不知道的，我們也不担保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那我們會說：『我們不是和平主義者，如果革命階級握得政權，如果它真正排除了資本家對於施政方針的任何影響，使他們無法擴大那藉以獲得幾萬萬利潤的經濟破壞現象時，那我們是不會拒絕進行戰爭的。』革命政權會向所有一切國家底人民宣佈說，各國人民都應當是自由的，德國人民不得為保有亞爾薩斯和羅來因而戰，法國人民也不得為保持其殖民地而戰。因為法國如果為其殖民地而戰，那末俄國也有基發和布哈拉，這也是類似殖民地的區域，那時就會開始來瓜分殖民地了。怎樣去瓜分它們呢，按照什麼標準呢？按照力量。而力量已經是改變了的，資本家的狀況是除了戰爭外，則別無出路。當你們握得革命政權時，那你們就可以經過革命的道路來達到和平：向各國人民作革命的號召，拿你們的例子來解釋策略。那時，在你們面前就會展開用革命手段奪得和平的道路，就會大有可能使幾十萬人免於死亡。那時，你們就可以堅信德國和法國人民會擁護你們。那時，即令英美日底資本家想用戰爭來反對革命工人階級，但由於工人階級已把資本家制裁住、排除掉，並握得了監督權而已使自己的力量增加十倍，——即令英美日資本家想進行戰爭，百分之九十九證明他們是無法進行的。只須你們聲明說，你們不是和平主義者，你們將要保衛自

己的共和國，保衛工人的、無產階級的民主制，而抵抗德法及其他國家資本家的侵犯，——只這一點，就足以保障和平了。

正是因此，所以我們認為我們關於進攻問題的聲明書有莫大的根本意義。俄國革命全部歷史中的轉變關頭來到了。俄國革命開始時，英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幫助了它，英國資產階級以為俄國是像中國和印度一類的國家。結果相反，除了現時由地主和資本家佔大多數的政府外，還出現了蘇維埃這個按其力量說是全世界空前未有的代表機關，而你們現在却以參加資產階級底聯合內閣來殘害它。結果相反，俄國革命使下層羣衆進行反資本家政府的革命鬥爭在一切國家中到處都獲得三倍的同情。目前擺着的問題是：不前進，便後退。在革命時期停在原地不動是不可能的。正是因此，所以進攻是全部俄國革命底轉變點，不是按這進攻在戰略的意義上說。而是按它在政治、經濟的意義上說。現在舉行進攻，便是繼續帝國主義的大屠殺，使幾十萬、幾百萬人為宰殺波斯及其他弱小民族——不管某個總長底意志與意識如何，客觀上是如此的——而死亡。使政權在貧農擁護之下轉歸革命無產階級，便是過渡到以最有保障的，人類歷史上最無痛楚的形式來進行爭取和平的革命鬥爭，過渡到使革命工人在俄國和在全世界上都獲得政權和勝利（會場中一部份人鼓掌）。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舊曆十五和十六日）刊載於真理報第八十二和八十三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庫，一九三七年版，第二卷，第一七七至一八八頁

論 口 號

在歷史的急劇轉變關頭，往往連先進的黨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能理解新局勢而重複着舊的口號，這種口號在昨天是正確的，可是到今天已失掉任何意義，歷史之急劇轉變來得如此「突然」，舊口號也就這樣「突然」地喪失它的意義。

看來，全部國家政權轉歸蘇維埃的口號也可以重演着類似這樣的情形。這個口號在我國革命這一去不返的時期中，即大約從二月二十七日起至七月四日止的這個時期中曾是正確的。到現在，這個口號顯然已不正確了。不懂得這一點，便絲毫也不能瞭解現時各種迫切問題。每個口號都應當從一定政治局勢之一切特點底總和中得出來。而現時在七月四日以後的俄國政局，是與二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四日這一時期中的局面根本不同的。

當時，在過去這一革命期間，國內有所謂『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無論在物質上或形式上都表現出國家政權不穩定的過渡狀態。不要忘記，政權問題是一切革命底根本問題。

當時政權處在動搖狀態中，臨時政府與蘇維埃根據自願協定分掌着政權。蘇維埃是由不受外部任何強力壓制的自由羣衆和武裝工人兵士底代表團所構成的。武器在人民手中，沒有外部的強

力壓制人民，問題底實質就在這裏。這就展開了並保證了整個革命有按和平道路發展的可能。『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就是在這和平發展道路上之最近步驟，即可以直接實現的步驟底口號。這是革命和平發展的口號，而這種和平發展在二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四日的時期是可能的，並且當然是最符心願的，可是到現在，這種發展已是絕對不可能的了。

顯然，並不是所有一切贊成『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口號的人都充分思考過這是革命和平發展的口號。所謂和平發展不僅在於當時（二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四日）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階級，沒有一個嚴重的力量能夠反抗和妨礙政權轉歸蘇維埃。不僅如此而已。當時和平發展之所以可能，還因為蘇維埃內部各階級間和各政黨間的鬥爭，在全部國家政權及時轉入蘇維埃掌握的條件下，是可以最和平而最無傷害地進行着。

人們對於後面這一點，也還沒有充分加以注意。蘇維埃按其當時的階級成份說來，是工農運動底機關，是工農專政底現成形態。如果蘇維埃握有全部政權，那末小資產階級階層底主要缺點，主要毛病，即對資本家的輕信態度，便會在實踐中消滅掉，便會為他們自己在設施中的經驗所糾正。執掌政權的各階級和各政黨之彼此更替，在蘇維埃獨掌政權和掌握全權的基礎上，是可能在蘇維埃內部和平進行的；一切參加蘇維埃的政黨與羣衆的聯繫，可能始終是堅固而不致削弱的。必須時刻注意到，只有參加蘇維埃的各政黨與羣衆間這種最密切，而且可以自由擴展與加深的聯繫，才能促進着和平地消除這種與資產階級妥協的小資產階級幻想。政權轉歸蘇維埃的這一事實本身，還不會改變，而且也不能改變各階級的相互關係；它絲毫也不會改變農民底小資產階

級性。但它會及時地大大促進農民脫離資產階級而接近工人，以至與工人聯合起來的事業。

如果政權及時轉歸了蘇維埃，這本來是很可能的。這就會對於人民最容易，最有利益。這樣的道路是最無傷害的，所以當時應當以最大的努力來爭取這一道路。可是現在這個鬥爭，這個爲要使政權及時轉歸蘇維埃的鬥爭已經完結了。和平發展的道路已成爲不可能的了。開始了不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

七月四日轉變底意思，就是說，在這次轉變以後，客觀形勢急劇改變了。政權底動搖狀態停止了，政權在有決定意義的地方，已轉到了反革命手裏。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小資產階級政黨與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妥協基礎上，諸政黨關係的發展，使這兩個小資產階級黨成了實際上參加並幫助反革命屠殺的兇幫了。小資產者對資本家所抱的不自覺輕信態度，已使他們被各黨鬥爭進程推落到自覺擁護反革命者的地步。各黨關係發展底一個週期告終了。二月二十七日，各階級一同反對帝制。七月四日後，反革命資產階級與帝制派及黑幫份子攜手，把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拉到自己方面，部分地用恐嚇手段嚇住他們，而將國家實際政權交給了卡芬雅克輩¹⁷，交給了在前綫槍殺抗命兵士，在彼得城摧殘波爾什維克的那些軍人匪黨底手裏。

政權轉歸蘇維埃的口號現在聽起來會是一種癡入夢想，或者是故意嘲弄。這個口號客觀上會是欺騙人民，叫人民去幻想，似乎現在也是只要蘇維埃願意取得政權，或作出這樣的決議，就可獲得政權，似乎在蘇維埃裏還有某個政黨沒有因其幫助劊子手的行爲所玷污，似乎可以把已有過的事實抹煞掉。

如果以為革命無產階級竟會因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贊助過摧殘波爾什維克，贊助過在前綫上槍殺兵士和解除工人武裝的行為，遂實行什麼「報復」，而「拒絕」幫助他們去反對反革命勢力，那就是極端錯誤的想法。這樣提出問題，第一，便是把市僧的道德觀念加之於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只要有益於事業，不僅總是贊助動搖的小資產階級，而且也贊助大資產階級）；第二，便是——這是主要的，——企圖用「道德觀念」來模糊問題底政治實質的市僧手段。

問題底實質就在於，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權，現在已經是不能夠的了。只有進行堅決的鬥爭，戰勝現時真正擁有政權的人們，即是戰勝那些依靠調入彼得城的反動軍隊，依靠立憲民主黨人和帝制派的軍人匪黨卡芬雅克之流，才能取得政權。

問題底實質就在於，能夠戰勝這些新掌握國家政權者的，只有革命民衆，而發展民衆運動的條件，則不僅要使民衆受無產階級的領導，而且要使他們離棄那背叛革命事業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

誰把市僧道德觀念混入到政治問題中，那他便會議論說，就算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擁護了解除無產階級和革命軍隊武裝的卡芬雅克是作了「錯誤」；可是應當給他們以改正「錯誤」的機會，而「不阻難」他們去改正「錯誤」；使小資產階級較易於動搖到工人方面來。這樣的議論，如果不是對工人的新欺騙，也是孩童的幼稚見解，或簡單的蠢笨想法。因為小資產階級羣衆之動搖到工人方面來，正會表現於，而且只會表現於這些羣衆離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事實上。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現在只有宣佈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唐恩和拉啓特尼科夫為劊子

手們的幫兇，才能算是改正「錯誤」。我們完全無條件地贊成這種「改正」「錯誤」的辦法……

我們說過，革命底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現在應當補充一句，恰恰是歷次革命隨時隨刻都使真正政權何在的問題模糊起來，使形式上的政權與實際上的政權分離開來。一切革命時期底主要特點之一，也就在這裏。在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間，人們不知道實際政權究竟在政府手裏，還是在蘇維埃手裏。

現在特別重要的，是使覺悟工人清醒地觀察觀察革命底根本問題：目前國家政權是在誰的手裏。你試去想想政權底物質表現是什麼，且不把空話當作事實，那你不難答覆這個問題。

恩格斯寫過，國家首先就是武裝隊伍連同一些如像監獄之類的物質附屬物。在現時，這就是士官生和特別調入彼得城的反動哥薩克；這就是那些把加米涅夫等拘禁在牢獄裏的人；就是那些封閉真理報館的人；就是那些解除工人和一定部份兵士武裝的人；就是那些槍殺同樣一定部份兵士的人，就是那些在軍隊中槍殺同樣一定部份的人。這些劊子手，就是政權的實際掌握者。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輩是沒有政權的總長，是木偶總長，是幫助屠殺的政黨底領袖。這是事實。而這個事實並不因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個人大概都「不贊同」屠殺，並不因他們的報紙怯懦地用遁辭推卸屠殺責任，而有所改變；這樣改換政治外裝的把戲，是不會改變問題實質的。

封禁彼得格拉十五萬選民底機關刊物，士官生因工人沃義諾夫從印刷局裏取出真理報，便把他殺害（七月六日）的事實——難道這不是劊子手的行爲麼？難道這不是卡芬雅克輩底舉動麼？人們會說：無論政府也好，蘇維埃也好，對這事件「都是沒

有罪過的』。

我們回答說：那這對於彼得和蘇維埃就更壞了，因為這就是說，它們是零，它們是傀儡，實際政權不在它們手裏。

人民首先而且主要是應當知道真情，知道國家政權實際上是在誰的手裏。應當把全部真情告訴人民：政權是在一羣卡芬雅克之流的軍人（克倫斯基，某些將軍和軍官等等）手裏，而以立憲民主黨為首的資產階級之整個階級以及經過一切黑幫報紙，經過新時代、活言論等等報紙活動的帝制派都是擁護他們的。

應當推翻這個政權。否則，與反革命作鬥爭的一切詞句都是空話，都是『既欺騙自己，又欺騙人民』。

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之流的總長們及其政黨，現在也是擁護這個政權的；必須向人民說明他們充當劊子手的作用，說明他們的黨在犯了四月二十一日，五月五日，六月九日，七月四日這些「錯誤」以後，在他們贊同進攻政策——這個政策已十分之九預決了卡芬雅克輩在七月的勝利——以後，就必不可免地弄成這樣的「結局」。

要把對人民的全部鼓動工作都加以改造，使鼓動工作估計到此次革命底具體經驗，特別是七月事變底具體經驗，就是說，要使鼓動工作明確指出軍人匪幫，立憲民主黨人和黑幫份子是真的人民公敵，要使鼓動工作肯定地揭露小資產階級政黨，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充當過並且還在充當着劊子手兇幫的作用。

要把對人民的全部鼓動工作都加以改造，務必說明，不推翻軍人匪幫底政權，不徹底揭破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不把這兩黨在人民中的信任剝奪掉，則農民獲得土地的事業便全無希望。這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常態」條件下會是很長期，很困難的

過程，但戰爭和經濟破壞將大大地推進這種過程。這樣的「推進機」，可以使一個月，甚至一星期，就能等於一年。

反對上述言論的，大概會有兩種意見：第一種是說，現在談堅決鬥爭，便是鼓勵零星發動，而零星發動就正會幫助反革命勢力；第二種是說，推翻反革命勢力，便仍然是使政權轉歸蘇維埃掌握。

我們對第一種反駁意見回答說：俄國工人已有充分的覺悟，不會在顯然不利的時機受人挑撥的。如果他們在現時實行發動和抵抗，便會是幫助反革命勢力，這是無可爭論的。進行堅決鬥爭，只有在廣大羣衆中湧起革命新高潮時才有可能，這也是無可爭論的。但只是一般地說革命高潮，革命高漲，西方工人底幫助等等這還不夠，必須從我國已往事實中作出一定的結論來，要估計到的正是我國的教訓。而從這種估計中所將得出的口號，正是進行堅決鬥爭去反對奪得了政權的反革命派。

第二種反駁意見，也是以極其廣泛的議論來代替具體的真理。除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外，沒有任何力量能推翻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正是革命無產階級，在有了一九一七年七月經驗以後，應當獨立地奪取國家政權，——不這樣，便決不能有革命底勝利。無產階級掌握政權，而獲得貧農或半無產階級底擁護，——這就是唯一的出路，而且我們已經解答過，有些什麼情況能夠大大加速這一出路的到來。

蘇維埃可能而且一定會在這一新革命中出現，但不會是現在的蘇維埃，不會是同資產階級妥協的機關，而會是同資產階級作革命鬥爭的機關。到那時，我們也將主張照蘇維埃模型建設全部國家，這是一定不移的。這不是關於一般蘇維埃的問題，而是與

現時反革命勢力，與現時蘇維埃底叛賣行為作鬥爭的問題。

用抽象的概念來代替具體的東西是革命中最主要的過失之一，最危險的過失之一。現時的蘇維埃塌台了，因為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佔據蘇維埃中的統治地位而使蘇維埃完全破產了。在目前，這些蘇維埃活像被牽去屠宰的馴羊一樣，站在屠刀下咩咩地哀訴着。現在蘇維埃在已獲勝利並繼續勝利的反革命勢力之前軟弱無力，一籌莫展。政權轉歸蘇維埃的口號可以瞭解為「簡單地」號召把政權轉交現時的蘇維埃，而如果這樣說，如果號召這樣做，那在現時便是欺騙人民。欺騙是最危險不過的東西。

俄國階級鬥爭和政黨鬥爭之發展，從二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四日的這一週期已經告終了。開始了新的週期，在這新週期中參加活動的，不會是舊的階級，不會是舊的政黨，不會是舊的蘇維埃，而會是由鬥爭火焰鍛鍊過、革新過，由鬥爭進程教練過，改造過的一切了。不要向後望，而要向前看。要運用七月事變後新的階級範疇和政黨範疇，而不要運用舊的範疇。要在新的週期開始時，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已經勝利了的事實作為出發點，它之所以獲得勝利，是全賴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同它妥協的政策，而只有革命無產階級才能把它打敗。在這新的週期中，無論達到反革命勢力的澈底勝利，或達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澈底失敗（不戰而敗），或達到新革命底新高漲，當然都會要經過許多不同的階段。可是，關於這點，只有以後，當這些階段分別顯現出時，才能具體來說……

一九一七年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
年版，第二卷，第三三五至三四一頁

革命底教訓

一切革命都是廣大民衆生活中的急劇轉變。如果這樣的轉變沒有成熟，那末，便不能發生真正的革命。每個人生活上的任何轉變，都會使他學得很多東西，使他增加閱歷，體驗人生，而革命也是一樣，它使全體人民在短時期中得到最豐富最寶貴的教訓。

在革命時期中，幾百萬，幾千萬人在每星期中所學得的東西，要比平常夢昧生活的一年還多些。因為在整個人民生活急劇轉變的關頭，可以特別明顯地看見，人民中各個階級所追求的目的怎樣，它們擁有何種力量，它們用何種手段動作。

每個覺悟的工人、兵士、農民、都應該仔細地思考俄國革命底教訓，特別是現在七月末，當這顯見我國革命第一個階段業已挫折而終結的時候。

試來看看，究其實，工農羣衆進行革命時所力求獲得的是什麼？他們所期待於革命的是什麼？大家知道，他們所期待的是自由、和平、麵包和土地。

現在我們所看見的情形又怎樣呢？

不僅沒有自由，而且已開始恢復先前那些橫暴制度。對前綫士兵施行死刑，把自動奪取地主土地的農民提交法庭懲辦，搗毀工人報紙的印刷所。不經法庭手續而肆行封禁工人報紙，往往不提出任何罪名，或者提出顯係誣讞的罪名而任意逮捕波爾什維克。

也許會有人反駁說，懲辦波爾什維克並不是破壞自由，因為這只是按一定的罪狀懲辦一定的人。可是這種反駁顯然是故意撒謊。因為無論怎樣也不可以因某個人犯罪便搗毀印刷所和封禁報紙，就即令這種罪狀已經證實，已為法庭所確認了的話。假使政府認定整個波爾什維克黨，他們的方針，他們的觀點根本是違法犯罪的，那就是另一回事。可是誰也知道，自由俄國的政府決不能這樣作，而且也沒有這樣作。

地主和資本家底報紙因波爾什維克進行反對戰爭、反對地主、反對資本家的鬥爭而加以瘋狂謾罵，並且當還沒有想出任何一個罪名來反對任何一個波爾什維克的時候，就已公然要求逮捕和懲辦波爾什維克，這便是揭破那些反對波爾什維克的罪名純係誣讞的主要證據。人民渴望和平，而自由俄國的革命政府，却根據從前沙皇尼古拉第二為着俄羅斯資本家掠奪他族人民的利益而與英法資本家訂立的那些秘密條約，又去進行侵略戰爭。這些秘密條約始終沒有公佈。自由俄國政府只是托詞推諉，至今沒有向各國人民提議締結正義的和平。

糧食沒有。飢荒又逼近起來。大家都看見，資本家和富人藉供給軍需品，來無恥地詐騙國庫（戰爭現在使人民每天花費五千萬盧布），高抬物價，賺得空前未有的利潤，對於認真統計產品

底生產和把產品分配給工人的事情，却一點也沒有作。資本家之強橫無理日益厲害起來，任意把工人拋出工廠，而且這還是當人民深感貨物缺乏的時候幹出的事。最大多數農民在多次代表大會上極明確地大聲聲明說，他們宣佈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不公道的、是搶劫。而以革命民主自居的政府，却一連數月欺騙農民，用約許和攔延來愚弄他們。資本家一連數月不讓切爾諾夫總長頒佈禁止土地買賣的法令。可是當這個法令終於頒佈了之後，資本家們便對切爾諾夫造謠誣蔑，橫施攻擊，這種攻擊直到現時還在繼續。政府竟這樣無恥地保護地主，甚至把農民提交法庭，懲辦他們「擅自」奪取的行爲。

欺騙農民，勸他們等待立憲會議。而資本家却又將這個會議底召集日期，再四遷延下去。現在因受波爾什維克要求的逼迫，只好把這個召集期指定在九月三十日，資本家又公然大叫大喊，說這是「辦不到的」短促期限。而要求延期召集立憲會議……資本家和地主政黨，「立憲民主」黨，即所謂「人民自由」黨中最有威信的黨員，如像帕寧娜，公然鼓吹把立憲會議底召集期推延到戰爭結束之後。

解決土地問題等到立憲會議，召集立憲會議等到戰爭結束，結束戰爭等到完全勝利。結論就是如此。資本家和地主既在政府中佔有多數，就公然欺侮農民。

二

試問在推翻了沙皇政權的自由國家裏，怎樣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在不自由的國家中管理人民的，是未經任何人選舉的皇帝和

一小羣地主、資本家與官吏。

在自由國家中管理人民的，只是那些由人民自己選舉出來担任管理的人，在選舉時，人民分爲各個政黨，通常居民中每個階級都組成自己單獨的政黨，例如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各自組成單獨的政黨。所以在自由國家裏，人民底管理都是經過各政黨底公開鬥爭及它們之間自由協定進行的。

自從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推翻沙皇政權以後，俄國已成爲自由國家，在將近四個月中，管理正是經過各自由組成的政黨間之公開鬥爭，以及它們之間自由協定來實現的。因此，爲了瞭解俄國革命底發展，首先就要研究哪些黨是主要政黨，這些政黨所擁護的是哪些階級底利益，所有這些政黨相互間的關係又怎樣。

三

在推翻沙皇政權以後，國家政權轉到了第一屆臨時政府手中。這個政府是由資產階級代表，即資本家所組成，而與他們聯合的還有地主。「立憲民主」黨，即資本家底主要政黨，佔着首位，成爲資產階級底當權黨或執政黨。

政權落到這個政黨手裏，不是偶然的，雖然當時與沙皇軍隊作鬥爭，爲自由而流血的人，當然不是資本家，而是工人和農民，陸軍兵士和水兵。政權之所以落到了資本家政黨手裏，是因爲這個階級擁有財力、組織力和知識力。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特別是在大戰時期中，俄國資本家階級及與之聯合的地主在組織自己的事業上所獲得的成效最多。

立憲民主黨向來就是帝制黨，在一九〇五年是這樣，從一九

○五至一九一七年的時期中也是這樣。自人民戰勝沙皇暴政以後，這個政黨宣佈自己為主張共和的黨了。歷史經驗表明，資本家底政黨，每當人民戰勝了帝制的時候，總是同意作一個贊成共和的黨，只要能保住資本家底特權及其對人民的無上權力。

立憲民主黨口頭上擁護「人民自由」，實際上是擁護資本家的，於是地主，一切帝制餘孽、一切黑幫份子，馬上就站到它這方面了。證明這一點的，有報紙刊物，有選舉中的事實。一切資產階級的報紙以及所有黑幫派的刊物，在革命以後，都與立憲民主黨人採取同一論調，一切帝制黨不敢公開活動，在選舉時便擁護立憲民主黨，例如在彼得格拉便是這樣。

立憲民主黨人獲得政權後，使用一切力量去繼續進行強盜侵略戰爭，這個戰爭是那與英法資本家訂立了秘密強盜條約的沙皇尼古拉第二開始的。按這些條約的規定，答應俄國資本家在勝利時可以佔領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亞和阿爾明尼亞等等。而對於人民，立憲民主黨人政府則用空洞的遁詞和約許來敷衍了事，把工農所必需的一切重要事情，概行推到立憲民主會議去解決，却又不指定這個會議底召集日期。

人民利用自由，開始自動組織起來。佔俄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羣衆之主要組織便是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這些蘇維埃在二月革命時已開始組織起來，而在二月革命幾星期後，在俄國多數大城市中以及許多縣份中，工人階級和農民中間的一切覺悟先進份子，都團結在蘇維埃中了。

蘇維埃底選舉是完全自由的。蘇維埃是真正的民衆組織，即工農組織。蘇維埃是真正大多數民衆的組織。工人和穿軍服的農民都是武裝起來了的。

不言而喻，那時蘇維埃能夠而且應當把全部國家政權握到自己手裏。直到召集立憲會議時止，國內除了蘇維埃政權外，決不應有任何其他政權存在。只有這樣，我國革命才會成爲真正人民的，真正民主的革命。只有這樣，真正力求和平，真正不願意進行侵略戰爭的勞動羣衆，才能開始堅決不移地執行那定可結束侵略戰爭而奠定和平的政策，只有這樣，工人和農民才能制裁那些「藉戰爭」大發橫財，而把國家弄到經濟破壞和飢餓境地的資本家。但是，在蘇維埃中，贊成革命工人政黨的，即贊成要求把國家政權轉交蘇維埃的社會民主波爾什維克黨的代表，僅佔少數。蘇維埃中的多數代表都是贊成那反對把政權轉交蘇維埃的社會民主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的。這兩個政黨不但不主張推翻資產階級政府和代之以蘇維埃政府，而且主張擁護資產階級政府和與之妥協，同它一塊組織共同的政府。大多數人民所信任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這一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就是革命從開始以來，在整整五個月中的全部發展進程底主要內容。

四

我們先來考查一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與資產階級實行這種妥協的經過情形，然後來探討大多數民衆信任他們的原因。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俄國革命所有各個時期中，都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與資本家實行妥協的。

還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末，當沙皇政府一被推翻，人民剛剛獲得勝利時，資本家底臨時政府就把克倫斯基當作「社會主義者」拉入政府組織中。其實克倫斯基從來也不是社會主義者，而只是

勞動派底一份子，直到一九一七年三月才開始列名於「社會革命黨人」中，這在當時已經是沒有危險，而且是不無利益的了。克倫斯基當時是彼得格拉蘇維埃底副主席，資本家底臨時政府馬上就設法經過他來懷柔並馴服蘇維埃。蘇維埃，亦即在它裏面佔大多數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竟自甘馴服，當資本家底臨時政府一成立後，就立刻同意「擁護它」，「只要」它履行自己的諾言。

蘇維埃自認為是檢查和監督政府行動的機關。蘇維埃底領袖建立了所謂「聯絡委員會」，即是與政府聯絡，與政府接洽的委員會。身居蘇維埃領袖地位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這個委員中經常和資本家政府進行談判，老實說，就是充當不管部的關員或非正式的關員。

在整個三月以及幾乎整個四月裏的情況，都是這樣，資本家運用推延支吾的手段，以圖贏得時間。資本家政府在這個時期中，沒有進行一個發展革命的多少嚴重的步驟。甚至對於自己的直接任務，即召集立憲會議一舉，都半點也沒有作，沒有把問題提交各地，甚至還沒有成立負責籌備此事的中央委員會。政府所關心的只是一件事，就是暗中復活那些由沙皇與英法資本家訂立的搶劫分贓的國際條約，儘可能小心謹慎來暗地阻礙革命，什麼都答應，半點也不執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聯絡委員會」裏當傻瓜，甘受甜言蜜語、約許和「明天」的款待。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好像一篇有名寓言中所說的那隻烏鴉，甘受虛榮奉承的誘惑，而高興地聽信資本家底花言巧語，說什麼他們非常尊重蘇維埃，非經蘇維埃同意，決不採取任何步驟。

實際上呢，時間一天天過去了，而資本家底政府沒有為幫助

革命作半點事情。而爲了反對革命，它在這個時期內却已恢復了祕密的強盜條約，正確地說，批准了這些條約，並與英法帝國主義外交家作同樣祕密的補充談判，使這些條約「活躍」起來。爲了反對革命，它在這個時期中，却已給作戰軍隊中將軍和軍官的反革命組織奠定了基礎（至少是使他們互相接近了）。爲了反對革命，它在這時期中却已開始把工業家，工廠主組織起來，這些人原是在工人逼迫之下不得已才再三讓步，但同時又開始對生產怠工（損壞生產），並準備一到適當的時機，便停止生產。

但組織先進農工於蘇維埃中的事業在不斷地前進着。各被壓迫階級中的優秀份子感覺到了，不管政府與彼得格拉蘇維埃怎樣訂有協定，不管克倫斯基如何花言巧語，不管建立有「聯絡委員會」，但這個政府始終是人民底敵人、革命底敵人。羣衆感覺到了，如果不打破資本家底抵抗，那末和平事業、自由事業、革命事業是必然遭受失敗的。羣衆中的義憤和急不可耐的情緒，日益增長起來了。

五

這種義憤在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便爆發出來。運動是自發掀起的，誰也不會去準備它。運動非常激烈地反對政府，有一團人甚至武裝出動，走到瑪麗姬宮去逮捕內閣閣員。大家都已顯然明白，政府是不能支持下去了。蘇維埃當時能夠（而且應當）握取政權而不遇到任何方面的絲毫抵抗。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維持了正在倒台的資本家政府，實行與政府妥協，而使自已更加陷入圈套，作出更加危害革命的無可挽救的步驟。

革命之教育各個階級是非常迅速、非常澈底的，決非通常和平時候所可比擬。資本家組織得最好，在階級鬥爭和政治方面最有經驗，所以學會得最快。他們看見政府狀況已無法維持，就採用其他各國資本家在一八四八年後幾十年中所採用過的手段來愚弄、分裂和削弱工人。這種手段就是建立所謂「聯合政府」，即是由資產階級底代表和社會主義者中間的倒戈份子來組織共同的聯合內閣。

在自由及民主制與革命工人運動並存得最久的國家裏，如英兩國，資本家曾多次運用這種手段，並獲得很大的成功。「社會主義的」首領加入資產階級底內閣後，總是成爲傀儡和木偶，成爲掩護資本家的屏障和欺騙工人的工具。俄國「民主共和主義」的資本家所運用的正是這種手段。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馬上就甘受愚弄，於是五月六日有切爾諾夫和策烈鐵里之流參加的「聯合」內閣，就成爲事實了。

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中的傻瓜們歡天喜地，自鳴得意，沉溺於他們領袖入閣的榮耀光芒中。資本家高興得手舞足蹈，他們得到了「蘇維埃領袖」來作反人民的幫手，得到了這些人答應贊助「前綫進攻動作」，即是繼續進行原已停頓了的帝國主義強盜戰爭的諾言。資本家知道這些首領是外強中乾，軟弱無能，知道資產階級方面關於監督以至組織生產，關於和平政策等等的諾言，是永遠也不會執行的。

果然如此，革命發展中的第二階段，從五月六日起至六月九日或十八日止，完全證實了資本家關於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易受愚弄的打算。

當維舍浩諾夫和斯科別列夫以花言巧語既騙自己，又騙人

民，說什麼將要把資本家底利潤百分之百都奪來，說『資本家底抵抗已經打破了』等等的時候，資本家却在繼續鞏固自己的勢力。在這一時期中，並沒有，也真是沒有採取任何辦法來制裁資本家。那些由社會主義者中的倒戈份子擔任的閣員，只是轉移被壓迫階級視線的留聲機，而全部國家管理機關實際上仍保留在官僚（官吏）和資產階級手裏。大名鼎鼎的工業部長帕里琴斯基是這個機關底標本代表，對任何一個反對資本家的辦法都加以阻礙。總長們徒事空談，一切仍如舊觀。

策烈鐵里總長更是資產階級時常用來反對革命的工具。當喀琅施塔得那裏的革命者竟敢於擅自撤換政府所委派的政治專員時，策烈鐵里就被派去「安撫」喀琅施塔得。資產階級在自己的報紙上大肆造謠誣蔑，舉行惡意瘋狂的攻擊來反對喀琅施塔得，加它以希圖「脫離俄國而獨立」的罪名，用各種各樣的論調重複此種此類的荒謬無稽之談，來恐嚇小資產階級和庸夫俗子。被嚇倒了的愚鈍庸人中最標本的代表策烈鐵里，最「誠意」地陷入資產階級攻擊手段的圈套，最熱心地「剿撫」喀琅施塔得，而不瞭解自己是充當反革命資產階級底奴僕。結果他成了執行與革命的喀琅施塔得作如下「妥協」的工具，就是喀琅施塔得的政治專員不應簡單由政府任命，而要由當地選出之後，經政府批准。從社會主義方面倒戈到了資產階級方面的閣員們，竟耗費時間來作這種可憐的妥協勾當。

凡是資本家閣員不能出面去辯護政府的地方，如在革命工人面前或蘇維埃中，那裏便有「社會主義的」閣員斯科別列夫、策烈鐵里、切爾諾夫等等出現（正確些說，是被資產階級派到那裏去的），而他們也就誠心執行資產階級的事務，拚命祖護內閣：

替資本家解釋，用再三再四的諾言和一再等待的勸告來愚弄人民。

切爾諾夫總長特別奔忙地與其資產階級的同僚講交易，直到七月間，直到七月三四兩日運動後發生了新的「政權危機」時，直到立憲民主黨人退出內閣時，切爾諾夫總長始終都在忙於多益有趣和深孚民望的事情，即忙於「勸告」自己的資產階級同僚，忠告他們至少要同意禁止土地買賣。這禁止土地買賣一舉，在彼得城舉行的全俄農民代表大會（蘇維埃）上就已鄭重約許農民了。可是約許始終只是約許。切爾諾夫無論在五月或六月都不能實行這個約許，直到七月三四兩日革命浪潮自發掀起，而同時又有立憲民主黨人退出內閣的事件之後，才使他有可能實行這個辦法。但就在那時，這個辦法也還是單弱無力，而不能使農民之爭取土地反對地主的鬥爭有嚴重的改進。

這時，對於在前綫上重新開始帝國主義強盜戰爭這一反革命帝國主義的任務，原來是遭人民痛恨的古契可夫所無法執行的，而新掛名的社會革命黨黨員，號稱「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克倫斯基却有聲有色、頗具成效地執行起來了。克倫斯基為自己的華麗詞句所沈醉，而那些把他當作小卒玩弄的帝國主義者又用甜言蜜語去恭維他、阿諛他、讚美他——所有這一切都是由於他誠心誠意向資本家服務，勸導「革命軍隊」來同意重新進行戰爭，以履行沙皇尼古拉第二與英法資本家訂立的條約，好使俄國資本家獲得君士坦丁堡和里沃夫，埃爾斯倫和達拉布松。

俄國革命從五月六日起至六月九日止的第二階段，就是這樣經過的。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勢力加強了、鞏固了，而在「社會主義的」閣員們掩護和擁護之下準備進攻，既反對外部敵人，又反

對內部敵人，即是反對革命工人。

六

六月九日，革命工人黨，即波爾什維克黨準備在彼得城舉行示威，使羣衆中繼長增高與無可阻遏的不滿和義憤能有組織地表現出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首領們既爲與資產階級的妥協所糾纏，又爲帝國主義的進攻政策所束縛，覺到自己在羣衆中喪失影響而大起恐慌。於是羣起狂吠，反對示威，這次狂吠已經是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連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一塊幹的事情了。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領導之下，並由於他們與資本家妥協政策的結果，小資產階級羣衆轉向於與反革命資產階級聯盟的形勢已完全確定，已萬分明顯。六月九日危機底歷史意義和階級意義就在這裏。

波爾什維克取消了舉行示威的決定，因爲他們絕不願意在這時引導工人進行拚命的鬥爭去反對立憲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聯合勢力。可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爲了多少保持一點在羣衆中的信任，不得不定於六月十八日舉行總示威。資產階級氣忿若狂，它正確地看清了，這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動搖到無產階級方面的表現，於是決定用前綫上的進攻來麻痺民主派底行動。

的確，六月十八日使革命無產階級底口號，波爾什維主義底口號在彼得堡羣衆中獲得了燦爛驚人的勝利，而在六月十九日，資產階級和拿破崙主義者 克倫斯基就鄭重宣佈了正是於六月十八日開始的前綫進攻。

這次進攻實際上就是爲了資本家利益，反對絕大多數勞動羣

衆底意志，而重新進行強盜戰爭。所以進攻就必然引起一方面大大加強沙文主義，並使軍權（因而也使政權）轉入拿破崙主義者的軍人匪黨手中，另一方面就轉到實行以暴力對待羣衆，壓迫國際主義者，取消鼓動自由、逮捕和鎗斃那些反對戰爭的人。

如果說，五月六日是用麻繩把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綁到了資產階級底勝利戰車上，那末，六月十九日便是用鐵鍊把他們當作資本家底奴僕鎖住了。

七

羣衆底憤怒，由於重新進行強盜戰爭的結果，自然愈加迅速，愈加厲害地增長了。七月三四兩日，羣衆義憤爆發起來，波爾什維克曾企圖加以阻遏，他們對於這種爆發自然應當努力賦予以最有組織的形式。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正如替資產階級服役而已被主人鎖住了的奴隸一樣，什麼都同意幹：同意把反動軍隊調進彼得城，同意恢復死刑律，同意解除工人和革命軍隊底武裝，同意不經法庭手續就實行逮捕、通緝、並封禁報紙。於是執政的資產階級所不能完全握取，而蘇維埃又不願握取的政權，就落到了一小羣拿破崙主義者的軍人手裏，而立憲民主黨人和黑幫份子，地主和資本家自然是完全擁護這一小羣人的。

一級一級地往下滾去。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既踏到了與

◎ 拿破崙主義（因法國兩個拿破崙皇帝而得名）是用以稱呼這樣一種政府的，這種政府利用資本家政黨與工人政黨彼此間極端尖銳的鬥爭，而努力裝作是非黨政府的政府。其實這種政府是服務於資本家而最能用空言約許和小恩小惠來欺騙工人的。

資產階級妥協的斜坡上，也就自然無可阻遏地一直往下滾到底。二月二十八日，他們在彼得格拉蘇維埃中答應有條件地擁護資產階級政府。五月六日，他們把資產階級政府從破產中拯救了出來，並同意舉行進攻，而甘願變作它的僕役和衛士。六月九日，他們與反革命資產階級聯合舉行造謠誣蔑和瘋狂忿恨的攻擊來反對革命無產階級。六月十九日，他們贊同重新開始了的強盜戰爭。七月三日，他們同意調來反動軍隊；這就是把政權徹底交給拿破崙主義者的開端。一級一級地往下滾去。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弄到這樣可恥的結局不是偶然的，而是歐洲經驗多次證明過的小業主，即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所造成的結果。

八

當然誰都看見過，小業主怎樣拚命掙扎，力圖「出頭」，做個真正的主人，掙到「大」老板的地位，即資產階級的地位。當資本主義還在統治的時候，小業主是沒有別的出路的：或者自己進到資本家地位（這是至多只有百分之—的小業主所能達到的），或者變為破產的業主、半無產者、隨後成為無產者。在政治上也是一樣：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特別是它的首領們，都趨向於資產階級。這些首領總是用可能與大資產階級妥協的約許和担保來安慰自己的羣衆，結果最多也不過是在很短期內得到資本家對勞動羣衆中一小部份上層份子作微末的讓步；在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在一切重要問題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總是跟着資產階級的尾巴跑，成為資產階級之軟弱無力的附屬物，成為財政大王手裏的馴服工具。英法底經驗多次證明了這一點。

俄國革命的經驗，當事變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戰爭及其所造成的深刻危機影響下而以非常速度發展着的時候，亦即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七月止這時期中的經驗，極鮮明地證實了馬克思主義所說小資產階級不穩定的老真理。

俄國革命底教訓表明，勞動羣衆要想擺脫戰爭，飢荒和地主資本家奴役的鐵鉗，便只有與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完全斷絕關係，明白瞭解它們的叛賣作用，拒絕和資產階級作任何的妥協，堅決站到革命工人方面來。只有革命工人——如果他們獲得貧農擁護的話——能夠打破資本家底反抗，引導人民去實行無代價地奪取土地，達到完全自由，消除飢荒，打破戰爭，達到正義的堅固的和平。

尾 聲

這篇文章從內容上就可以看出是在七月底寫的。

八月間的革命事變完全證實了本文所述各節。隨後八月終發生的科爾尼洛夫暴動¹⁹，造成了革命底新轉變，而向全體人民顯著地表明了，立憲民主黨人與反革命將軍聯合一起，力圖驅散蘇維埃和恢復帝制，這個革命新轉變底力量如何，它能否消除那與資產階級妥協的危害政策，這是不遠將來的事實就會表明出來的…

一九一七年九月六日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二日和十三日（舊曆八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刊載於工人報第八第九兩期上。一九一七年十月初，印成單行本出版。附有九月十九日（舊曆六日）所寫的尾聲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二卷，第二七二至三八八頁

災禍臨頭和防止之法

饑荒逼近

必至的災禍逼臨到俄國頭上。鐵路運輸紊亂不堪，而且日益加劇，勢將完全停頓。供給工廠的原料和煤炭的運輸行將停止。糧食運輸快要中斷。資本家故意加緊對生產怠工（損壞、停閉、搗毀和阻礙生產），指望以空前的災禍來使共和國和民主制度，蘇維埃和一般工農團體陷於破產，來促進帝制復辟和恢復資產階級地主的專政。

空前大規模的災禍和饑荒勢所不等地逼臨到頭上了。這在所有一切報紙上都已千番百次地說過。各政黨、各工兵農蘇維埃所通過的不可勝數的決議案也都承認，災禍難免，並已逼近眼前，必須拚命設法防止，人民必須「英勇努力」來挽救滅亡等等。

這一點是大家都談論的。這一點是大家都承認的。這一點是大家都決定了的。

可是絲毫的辦法也沒有採取。

革命已有半年，災禍逼臨得更近。大批工人失業。只要想想：國內百貨俱空，國家在有充裕糧食和豐裕原料的情形下，竟

因食品缺乏和工力缺乏而感受着滅亡危險，——可是在這樣的國家中，在這樣危急的時候，竟造成了大批失業現象！這個事實顯然證明在革命（有些人稱之為大革命，可是暫時也許稱之為腐朽的革命要比較公正些）半年中，既有民主共和制度，又有許許多多傲然自稱為「革命民主」團體、組織和機關的情形下，實際上真是沒有採取絲毫認真防止災禍、防止饑荒的辦法。我們之臨近破產，愈來愈速，因為戰爭是不等待的，而它所造成之民衆生活各方面的紊亂狀態也就日益加劇起來。

其實只要稍微加以注意，稍微思索一下，便足可相信，防止災禍和饑荒的辦法是有的，這種辦法是十分明顯簡單，是完全可以實現，是民衆力量完全能夠做到的；其所以不採取這些辦法，只是因為，唯一是因為實行這些辦法，就會觸犯一小羣地主資本家底駭人利潤。

真的，可以担保說，在任何一個演說中，任何一個派別的報紙上任何一篇文章中，任何一個會議或機關底任何一個決議案中，沒有不十分明白肯定地承認那防止災禍與饑荒的基本主要辦法。這個辦法就是：由國家實行監督、監察、統計和調節，規定生產中勞動力的正確分配和食品的正確分配，愛惜民力，消除對民力的任何浪費，——加以節省。監督、監察、統計——這就是防止災禍和饑荒的首要辦法。這是不容爭辯而為衆所公認的。這也正是人們所不作的，其所以不作，是因為害怕觸犯地主和資本家底專政，觸犯他們用抬高物價和供給軍需品（而現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直接或間接為戰爭「工作」）所獲得的空前巨大、駭人聽聞的利潤，這種利潤是衆所共知、衆所共見、衆所驚駭喟嘆的。

而國家方面竟沒有採取絲毫辦法來實行多少認真的監督、統計和監察。

政府之毫無作為

全國各處對國家施行的任何監督、監察、統計，以及調整這些辦法的任何嘗試，都實行經常一貫的怠工。只有幼稚到了極點的人才不懂得，只有雙倍虛偽的人才能假裝不懂：這種怠工是從何處發端，並用何種手段進行的。因為這種由銀行家和資本家實行的怠工，他們這種破壞任何監督、監察、統計的舉動，都適應着民主共和政體，適應着「革命民主」機關底存在。資本家老爺們完全明白領會了一個真理，這個真理本是一切贊成科學社會主義者都在口頭上承認的，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當其友人一攀上總長次長等等高位之後，就立刻把它忘掉了。這個真理就是用民主共和政體來代替君主政體是分毫也不觸犯資本主義剝削制底經濟本質的，因而反過來說，只須把那保護資本主義利潤之神聖不可侵犯權的鬥爭方式加以改變，就可以如同在君主專制政體下一樣，來在民主共和政體下順利保持這種權利。

在民主共和政體下對任何監督、統計、監察實行怠工的現代的最新手段，就是資本家在口頭上「熱烈」承認監督「原則」及其必要（所有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當然也是一樣），不過主張這種監督的施行應是「逐漸的」，按步就班的，「由國家調節的」。其實這種好聽的詞句祇是用來掩蓋對監督的破壞，把它化爲烏有，變爲空中樓閣，掩蓋那以監督爲兒戲而把任何切實認真的步驟擱延不行，建立各種非常複雜龐大，毫無生氣的官僚監督機關，這些機關全以資本家底意志爲轉移，絲毫無所作為，而且

不能有所作為。

爲了免遭空口無憑之譏，我們且從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中找出幾個證人來，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正是在革命頭半年內在蘇維埃中佔有多數，參加過「聯合政府」，因此他們對於庇護資本家的政策，對於資本家破壞任何監督的行爲，都要在政治上對俄國工農負責的。

在「革命」民主派所謂「全權」（莫開玩笑！）機關中的最高機關之正式機關刊物中央執委（即全俄工兵農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新聞報，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七日發行的第一百六十四期上，登載有關於監督問題的專門機關底決議，這個專門機關也是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建立，並在他們把持之下。這個專門機關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經濟部」。在它的決議上正式承認，『政府所設調節經濟生活的中央機關毫無作爲』，全係事實。

難道證明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政策破產的證據，有比他們親手簽字的這個文件更好的麼？

還在沙皇制度時代，就已承認有調節經濟生活之必要，並已建立了一些負此責任的機關。可是在沙皇制度下，經濟破壞狀況繼續增高，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革命共和政府底任務，本是要一開始就採取嚴重堅決辦法來消除這種破壞現象。當有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參加的「聯合」政府組成時，在五月六日發表的昭告國人的鄭重宣言中，曾約許負責施行國家監督和調節辦法。那時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輩以及一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首領們賭咒發誓，說他們不只對政府行動負責，而且他們所掌握的「革命民主全權機關」也在切實監視並檢查政府底工作。

從五月六日以後已經過去四個月了，在這長漫漫的四個月中，俄國因舉行帝國主義的荒謬「進攻」而葬送了幾十萬兵士，經濟破壞和災禍飛速地逼近起來，況且夏季時無論在水運方面，農業方面以及調查礦藏等等事業方面，都有作出許多成績的極大可能，——而過了四個月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竟不得不正式承認說：政府所設監督機關「毫無作爲」！

這班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儼然以國家要人的態度，在現時（我作此論文時，恰當九月十二日民主會議²⁰的前夜）高談什麼只要與工商業界的啓特·啓對奇羅²¹即梁布申斯基、布伯力科夫、特登青科之流成立聯合政府來代替那與立憲民主黨人的聯合政府，便可挽救時局呀！

試問何以解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種可驚的盲目病呢？難道他們是些因極端愚鈍幼稚而不知道所作何事，自甘迷誤的政治嬰孩麼？或者是他們佔據總長、次長、督撫、政治專員等高等位過多的事實，才必然產生一種特殊的「政治上」的盲目病麼？

監督辦法是衆所共知和輕而易舉的事

可能發生一個問題，也許監督方法和辦法是一種極端複雜、困難、未經試驗、甚至是人所不知的事情吧？其所以久延未行，也許是因為立憲民主黨中，工商業者階級中以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中的國家要人雖已汗流浹背，勞累半載來探求、研究、發現實行監督的辦法和方法，但是這個任務過於困難，所以仍未解決吧？

真可嘆惜！竟有人把事情說成這樣，來努力蒙混不識字和不

開通的愚昧農夫以及那些輕信人言而毫不留心考查的庸夫俗子。其實甚至沙皇政府，甚至「舊制度」，在建立軍事工業委員會時就已知道實行監督的基本辦法，主要方法和手段：使居民按各種職業，工作目的，勞動部門等等聯合起來。可是沙皇政府害怕居民聯合，所以極力設法限制，故意排斥這種衆所共知，輕而易舉，全可施行的監督方法與手段。

一切交戰國家受到戰爭所造成的極端嚴重的困苦災難時，或多或少地受到經濟破壞和飢荒時，早已擬定、決定、採用，並已再三實驗過許許多多的監督辦法，所有這些辦法，幾乎總是歸結於把居民聯合起來，歸結於在有國家代表參加之下，在國家監察之下等等來建立或獎勵建立各種各類的團體。所有這些監督辦法都是衆所共知，千番百次地說過寫過了的，各先進的交戰國所頒佈的關於監督的法律也已經譯成俄文，或在俄國報章雜誌上詳細記載過了。

假使我們的國家真想切實認真實行監督，假使它的機關不是因獻媚資本家而自陷於「毫無作爲」的地步，那末國家只須一舉手之勞就可以從現有的無數監督辦法中找到已經知道，已經施行過的辦法。這裏的唯一障礙，即爲立憲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向民衆隱瞞了的障礙，始終是因爲實行監督就會暴露資本家底駭人利潤，就會損害這些利潤。

爲了把這一最重要的問題（實質上就是關於任何一個願意挽救俄國，使其擺脫戰爭和飢荒的真正革命政府底改組問題）解釋得更加明顯起見，且把這些最主要的監督辦法列舉出來，而逐一加以考查。

我們曾看見，政府如果不只是以革命民主的稱號來引人發

笑，那它只須在其成立的最初一星期中，頒佈實施最主要監督辦法的法令，規定認真而嚴重的懲罰辦法來處分那些用欺騙手段迴避監督的資本家，並號召人民自己來監視資本家，監視他們是否誠實執行關於監督的法令，——這就是能使監督制早已在俄國實現了。

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監督辦法：

(一) 把一切銀行合併爲一，由國家監督它的營業，或實行銀行國有。

(二) 把各個新迪加，即資本家底最大壟斷公司（糖業、煤油業、煤業、冶金業等等的新迪加）收歸國有。

(三) 取消營業祕密。

(四) 強迫工業主、商人以及一般企業主新迪加化（即是強迫他們合併爲各種組合）。

(五) 強迫人民聯合於各種消費協社中，或獎勵這種聯合並監督之。

且來把這些辦法逐一加以考查，看看在用革命民主手段來實行的條件下究有何種意義。

銀行國有

大家知道，銀行是現代經濟生活底中心，全部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系統底神經中樞。談『調節經濟生活』而避開銀行國有的問題，這就無異是暴露自己已經而愚昧無知，或者就是以華麗詞句和漂亮的約許來欺騙「老百姓」，而預先立意不執行這種約許。

監督並調節糧食底運載，或者監督並調節一般產品底生產和分配，若是不監督和不調節銀行營業，便是荒謬可笑。這好像是提

取偶然賺得的「幾個哥比」，而不理會那成百萬盧布的橫財。現代銀行已與商業（糧食及其他一切商業）和工業密切結合而不可分離，所以不「干預」銀行，便絕對不能作出絲毫認真，絲毫「革命民主」的事情。

然而，也許這種由國家「操縱」銀行的事情是一種非常困難複雜的手續吧？人們通常都是努力以這種情景來恐嚇庸夫俗子，而努力這樣作的，當然是資本家及其衛士，因為這是對於他們有利的。

其實，銀行國有絕對不剝奪任何一個「私有者」底一個哥比，絕對沒有任何技術上和組織上的困難，而僅僅是被極少一些富人底卑污貪慾底利益所阻撓。銀行國有其所以常常被人與沒收私人財產混為一談，是由於那些利於欺騙民衆的資產階級報紙故意散佈這種混淆概念所造成的結果。

銀行所操縱的那些集中於銀行裏的資本所有權，是有印刷的和書面的字據為之證明的，這些字據就叫做股票、債券、期票、收條等等。在實行銀行國有時，即是把所有的一切銀行合併為一個國家銀行時，這些字據一個也不會作廢，一個也不會改變。誰按儲蓄券擁有十五個盧布，在銀行國有後，他仍舊是十五盧布的所有者，誰擁有一千五百萬盧布，在銀行國有後也仍然享有由股票、債券、期票、貨物證等等所表現的一千五百萬盧布。

那末銀行國有的意義究竟何在呢？

就在於對各單個銀行及其營業，是任何真正監督（即令取消了營業祕密等等）都無法實行的，因為無法察覺在編製決算時，在建立空牌企業和分行時，在使用冒名人等等時所採取的一切極複雜、極紛繁、極狡猾的手段。只有把一切銀行合併為一，——

這種合併的本身絲毫也不改變私有財產關係，重說一遍，不剝奪任何一個私有者底任何一個哥比，——才有可能實行真正的監督，當然要在施行上述其他各種辦法的條件之下。只有實行銀行國有，才可以使國家知道幾百萬以至幾十萬萬盧布往來流通的處所，以及這種流通是怎樣發生和在什麼時候發生的。只有監督銀行，監督這個資本主義流過程底中樞及其主要軸心和基本機構，才可以不僅口說，而且真正辦好監督全部經濟生活，監督重要產品生產和分配事宜，才可以辦好『調節經濟生活』的事情，否則，這種事情必然始終會是閹部欺騙老百姓的空話。只有在把各個銀行合併為一個國家銀行的條件下，實行監督銀行營業，加上施行往後那些容易實現的辦法，才可以辦好真正徵收所得稅，不致有隱瞞財產和收入的事情，至於現在的所謂所得稅，則大半是空中樓閣而已。

實行銀行國有，只要下道命令，就可以使銀行經理和職員自己來執行。並不需要由國家方面設立任何特殊機關，採取任何特殊準備步驟，這個辦法正是用一道命令，「一舉手」就可以實現的。因為既然資本主義發展到了通用期票、股票、債券等等的程度，那它就恰巧造成了實行這種辦法的經濟上的可能性。這裏剩下的事情只有統一簿記而已；如果革命民主國家決議立刻用電報通知，在每個城市中召集銀行經理職員的會議，在每省和全國範圍內召集他們的代表大會，以便立刻把各銀行合併為一個國家銀行，那末這一改良在幾星期內就可以辦好。自然正是那些經理和高級職員將要設法抵抗，極力欺騙國家，故意攔延等等，因為這班老爺們會喪失他們收入特別優裕的位置，會喪失其獲利特別豐厚的欺詐營業的可能；全部實質就在於此。可是合併銀行的事

情，並不會有絲毫技術上的困難；如果國家政權不只在口頭上是革命的（即是不害怕打破一切因循慣習），不只在口頭上是民主的（即是保護大多數人民底利益，而不是一小羣富人底利益），那末只須發佈一道命令，以沒收財產和監禁來懲治那些稍敢延擱和企圖隱瞞文據、賬目的銀行經理，董事和大股東；只須——舉例說——把貧窮職員單獨組織起來，並對於凡是揭發富人方面底欺騙和攔延行爲者均給以獎金，就可以極順利極迅速地把銀行國有事業實行起來。

銀行國有對於全體人民，特別是對於農民和小工業者大衆，而不是特別對於工人（因為工人很少與銀行有來往），是會有非常巨大的利益。勞動力方面的節省會是不可計算的，假定國家保存銀行原有職員數量，那末，這就會是向普遍利用銀行方面，向廣泛增加分行數目，擴大銀行營業大衆化方面等的莫大進步。正是對於小業主，對於農民說來，信貸之大衆化及簡易化，將大大增長起來。而國家方面就第一次有可能起初考察一切主要的金融營業，而不會有任何隱匿，其次就監督這種營業，然後就調節經濟生活，最後就獲得幾百萬以至幾十萬萬的巨款來進行巨大的國家設施，並不要因所謂「中介」而付給資本家老爺們巨大的「酬勞」金。正是，而且只是因為如此，所以一切資本家，一切資產階級教授，整個資產階級，以及所有替它服務的普列漢諾夫輩，波特列索夫之流，都涎沫直噴地拚命力爭，反對銀行國有，臆造出無數道詞來反對這個最容易而最迫切的辦法，其實甚至從「國防」觀點，即是從軍事觀點來看，這個辦法也有莫大的優點，它可以大大提高國家底「軍事實力」。

這裏也許會有人反駁說：那末，何以如像德美這樣先進國家

實行了極好的『調節經濟生活』辦法，而沒有想實行銀行國有呢？

我們回答說：這是因為這些國家雖有君主民主之別，可是兩者都不僅是資本主義的，而且是帝國主義的。它們既然是這樣的國家，所以在實行其所必須的改革時，就採用反動官僚的方法，而我們在這裏說的，則是革命民主的方法。

這個『小小的差別』確有極重大的意義。關於這個差別常常是『照例不想』的。「革命民主」這個名詞在我國（特別是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那裏），幾乎成了一句通常套話，如像『謝謝上帝』一語，就是那些並非愚昧無知得相信上帝的人也常說的，又如像『可敬的公民』一語，有時甚至用來稱呼那些在畫報或統一報上的撰稿人，雖然幾乎所有的人都可猜到這些報紙是由資本家爲了資本家本身利益而創辦而維持的，因而所謂社會主義者之參加這些報紙，本來是少有「可敬」的地方。

若是不把「革命民主」這個名詞當作鋪張的詞句，當作流行套語來用，而思考它的意義，那末要做一個民主主義者，就要真正顧及大多數民衆底利益，而不是少數人底利益；要做一個革命者，就要最堅決最無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過時的東西。

據我們所聽見的，無論在美國或德國，無論是政府或統治階級，都不覬覦「革命民主」這個稱號，而我國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却覬覦這個稱號（其實是侮辱這個稱號）。在德國一共只有四個有全國意義的私人大銀行，在美國只有兩個：這些銀行中的財政大王覺得在實行聯合方面較爲容易、較爲方便、較爲有利的，是用私下、祕密、反動手段，而不是用革命手段，是用官僚手段，而不是用民主手段，這樣就可以收買官吏（這無論在

美國或德國都成了通例)，保存銀行底私有性質，而這正是爲了保持營業祕密，正是爲了從國家方面榨取千百萬「額外利潤」，正是爲了保障能在財政方面來幹種種欺詐把戲。

無論美國或德國，其『調節經濟生活』的方式都是給工人（和一部份農民）造成軍事苦工營，給銀行主和資本家造成天堂。這些國家的調節辦法就在於使工人「緊張」到挨餓地步，而（用祕密，反動官僚手段）保障資本家獲得比戰前還高的利潤。

這樣的方式，在共和制帝國主義的俄國也完全可能；而這一方式也就不僅由米留可夫和盛加路夫實現着，並且也由克倫斯基協同特勒青科、涅克拉索夫、伯爾納茨基、普羅科波維奇之流實行着，後面這班人也是用反動官僚手段來掩蓋銀行之「不可侵犯性」，及其獲得駭人利潤的神聖權利。不如說句真話吧：人們是想在共和制度的俄國用反動官僚的方式來調節經濟生活，可是由於有「蘇維埃」存在，「常常」難於實行，第一個科爾尼洛夫曾想驅散蘇維埃而沒有成功，可是第二個科爾尼洛夫又會努力設法驅散它的…

這才是真話。這個雖很苦辣，却是簡單的真話，對於啓迪民衆方面，要比說什麼「我們的」、「偉大的」、「革命的」民主等等好聽的騙語有益得多…



銀行國有，就會大大促進同時實現保險事業的國有，即是把一切保險公司合併爲一，集中它們的活動，由國家加以監督。在這裏，保險公司職員代表大會，也可以把這種合併立刻實施而不會有何種困難，只要革命民主國家下令這樣辦，並嚴令各保險公

司底各個經理和大股東務須負責毫不遲延地實行這種合併就行了。資本家投在保險事業方面的資金有幾萬萬，全部工作都是由職員進行的。把這一事業合併起來，就可以減低保險費，使一切保險者獲得極大的便利，並減輕他們的負擔，可以在原有人力和資金的條件下擴大這種業務底範圍。除了極少一些收入豐裕者的因循慣習和私利目的以外，決沒有任何其他的情況阻礙這種改良，加之這種改良又能提高「國防力」，節省國民勞動，展開許多有極嚴重意義的真正『調節經濟生活』的可能，而不僅是口頭上說說而已。

新迪加國有

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以前的舊國民經濟體系的區別，就在於它造成了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密切聯繫與相互依賴。要是沒有這一點的話，則任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都會是在技術上不能實現的。由銀行統治生產的現代資本主義，把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這種互相依賴性引伸到了極點。銀行和各巨大工商業部門已緊密結合而不可分離了。這在一方面就是說，不實行由國家壟斷工商業新迪加（糖業、煤業、鐵業、煤油業等等新迪加）的步驟，不把這些新迪加收歸國有，而單把銀行收歸國有是不行的。另一方面，這就是說，要認真實行調節經濟生活，就須同時把銀行和新迪加一概收歸國有。

且拿糖業新迪加來作例證吧。這個新迪加還在沙皇時代即建立起來，那時就已將許多設備極好的工廠合併為一個極大的資本主義組合，這種合併自然全是按照最反動的官僚方式實行的，它保障資本家獲取駭人聽聞的利潤，而使工人和職員處於絕對無

權、卑賤、萎靡、奴隸的地位。那時國家就已實行監督並調節生產，以便使財閥和富豪獲得利益。

這裏要做的事情，只是預備一個召集職員、工程師、經理、股東底代表大會，實行統一會計，由工會實行監督等等的簡單命令，來把反動官僚的調節變爲革命民主的調節而已。這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情，然而正是這件事情至今還沒有實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事實上仍保留着按反動官僚方式對製糖工業的調節，一切都仍舊：濫費國民勞動，因循守舊，讓波布林斯基和特勒青科輩大發其財。要號召民主派表現自動創造精神，而不是號召官僚，要號召工人和職員表現自動創造精神，而不是號召「糖業大王」，這就是能夠而且應當在幾天內一舉而成的事實，——假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不用恰恰是與這些糖業大王實行「聯合」的計劃來蒙蔽人民意識的話，並且恰恰是由於這樣與富人聯合，其結果就使政府在調節經濟生活方面「毫無作爲」的現象，成爲絕對不可避免的了。

再拿煤油業來看吧。先前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已把煤油業大規模「社會化」了。兩三個煤油大王——這就是操縱幾百萬以至幾萬萬資金，專剪息票爲生，而從那在實際上、技術上、社會意義上，都已經是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起來並已經是由幾千幾百職員和工程師經營的「業務」中獲取驚人利潤的人。煤油工業國有可能是可能一舉而成的，而且是革命民主國家所應該做的事情，特別是當國家遭受着極大的危機，無論如何都要節省國民勞動，增加

◎ 在我寫到這裏時，我在報紙上看見克倫斯基政府的宣佈實行糖業壟斷，自然是按反動官僚的方式來實行，而不在召集職員和工人代表大會，不昭告大眾，不制裁資本家！

燃料生產的時候。當然，官僚式的監督在這裏不會有絲毫結果，不會絲毫改變情況，因為「煤油大王」無論對付特勒青科輩也好、克倫斯基輩也好、亞甫克森鐵夫輩也好、斯科別列夫輩也好，都如同對付沙皇總長一樣的容易，而對付的方法就是推延、支吾、約許，以至直接和間接收買資產階級報紙（這就是所謂「社會輿論」，而克倫斯基和亞甫克森鐵夫之流正是「重視」這種「輿論」），收買官吏（即由克倫斯基和亞甫克森鐵夫輩留在不可侵犯的舊國家機關中舊位置上的官吏）。

要想作點認真的事情，就必須從官僚制過渡到民主制，而且要用真正革命的手段來實行這種過渡，就是說，要向煤油大王和股東們宣戰，發佈命令：如果他們阻延煤油業國有事業，隱瞞收入和賬目，對生產怠工，不採取辦法提高生產的時候，即沒收他們的財產並處以徒刑。應當喚起工人和職員底首創精神，立刻召集他們來舉行會議和代表大會，當他們建立了周到完備的監督制並增加了生產時，便把一部分利潤撥給他們所有。如果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立刻實行了這種革命民主的步驟，那末世界上燃液蘊藏最豐富國家之一的俄國，就可能於夏季中利用水運，在供給人民以必需數量燃料的事業上作出很多成績。

無論資產階級的政府，或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的聯合政府，都是什麼事情也沒有作，僅僅玩了一套官僚主義的改良把戲而已。一個革命民主的步驟也不敢採取。煤油大王如故，因循停滯如故，工人和職員對剝削者怨恨如故，在這基礎上產生的場台現象如故，濫費國民勞動如故，一切都如在沙皇時代一樣，所改變了的，只是「共和國」秘書廳收發文件上的印信而已。

煤炭工業所具有之技術上、組織上實現國有的「現成」條件並不薄弱些，那班掠奪人民的強盜，即煤炭大王在管理上的無恥程度也並不輕微些；在這裏，我們看見有工業主公然怠工、公然損壞設備、公然停止生產等許多最明顯不過的事實。連孟什維克的內閣機關刊物工人報都承認這些事實。結果怎樣呢？也是連什麼也沒有作，僅僅舉行了幾次由工人和煤業新迪加中強盜們各派「半數」代表參加的舊的反動官僚式的會議而已！沒有採取任何革命民主步驟，沒有絲毫企圖建立唯一切實的監督制，即從下面由職員工會、由工人，用恐怖手段對待那班危害國家、停止生產的煤炭工業主的辦法來實行的監督制！怎麼可以這樣作啊，我們「大家」不都是主張建立如果不是與立憲民主黨人聯合，便是與工商業界聯合的「聯合政府」嗎，而聯合政府的意義也就是把政權留在資本家手裏，讓他們橫行無忌，讓他們阻礙事業，把一切都壓到工人頭上，加緊經濟破壞，這樣來準備新的科爾尼洛夫的叛亂！

取消營業秘密

若不取消營業秘密，則監督生產和分配的辦法，不是仍舊成為只供立憲民主黨人用來愚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又用來愚弄勞動階級的空洞約許，便是這種監督只有用反動官僚的方法和手段才可實現。不管這一點對於凡屬沒有成見的人都是如何明顯，不管真理報主張取消營業秘密如何堅決（替資本服役的克倫斯基政府之封禁真理報，大半就是因為這件事情），但我們的共和政府以及「革命民主全權機關」還是絲毫也沒有去想想這一實行真正監督的首要步驟。

這裏正是實行任何監督的關鍵。這裏正是那搶劫人民並對生產怠工的資本底致命處。正因為如此，所以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也就害怕觸及這個地方。

資本案所通常提出，而為小資產階級不加思考地重複着的理由，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經濟一般地絕對不容許取消營業祕密，因為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個別企業對市場的依賴，使得必須保持商業簿計和商業週轉——當然銀行週轉也在內——之『神聖不可侵犯權』。

凡是這樣或那樣重複這種理由或類似這種理由的人，都是自甘受欺，又以之欺騙人民，都是閉眼不看現代經濟生活中兩個衆所共知的極重大的基本事實：第一個事實就是大資本主義，即銀行、新迪加、大工廠等等經濟底特點。第二個事實就是戰爭。

到處都成為壟斷資本主義的現代大資本主義，恰恰根本排除那保持營業祕密的合理性，使它成為虛偽，成為只是掩蓋財政欺詐行為和使大資本獲得駭人利潤的工具。大資本主義經濟，單按其固有的技術本性來說，就已是社會化的經濟，即是它為千百萬人而工作，並以其營業來直接間接地聯合着幾百、幾千以至若干萬的家庭。這並不是那種小手工業經濟或中農經濟；這兩種經濟完全無所謂商業簿記，所以取消營業祕密也與它們無關！

在大經濟中，其營業情形反正有幾百以至更多的人知道。保持營業祕密的法律在這裏並不是為了滿足生產或交換上的需要，而是用來掩蓋投機和極不正當的謀利方式，掩蓋公然欺詐的行為，大家知道，在股份公司中，這種欺詐行為是特別流行，是足以欺騙大眾的偽造賬目和決算書辦法來特別巧妙地掩蓋着的。

在那些生產本身沒有社會化，還是零碎分散的小商品經濟

中，即在小農和手工業者中，還可說保持營業秘密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大資本主義經濟中保持這種秘密，便是保持極小一羣人底特權和利潤而反對全體人民的利益。既然規定了股份公司必須公佈賬目的制度，那就是說，法律也承認了上述這個事實，不過這種監督——這是在一切先進國家以及在俄國都已在實現着的——正是反動官僚式的監督，這種監督並不讓人民看清真象，不讓人民知道股份公司營業底全部真情。

在這裏，若按革命民主方式來作，就應立刻頒佈另一種法令，取消營業秘密，着令大企業和富人公佈最完備的賬目，讓任何一部份在民主意義上說來有充分數量（譬如一千或一萬選民）的公民，都有權審查任何一個大企業底一切文據。這樣的辦法只須頒佈一道命令就完全可能而容易實行起來；只有這個辦法才會開展民衆監督的首創精神，經過職員工會，經過工人工會，經過一切政黨來實行；只有這個辦法才會使監督成爲認真的和民主的事業。

此外還要加上戰爭這點。絕大多數工商企業現在不是爲「自由市場」工作，而是爲的供給國庫，供給戰爭。所以我在真理報上說，那些用什麼不能施行社會主義的理由來反對我們的人是撒謊，是加倍的撒謊，因爲這裏所說的，不是要現在立刻直接施行社會主義，而是要揭發盜竊國款的事實。

「供給戰爭」的資本主義經濟（即直接間接與供給軍需品有關的經濟）在這裏賺得了空前的利潤，立憲民主黨人老爺們連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也藉此發財，他們反對取消營業秘密，而表明自己不過是盜竊國款的幫辦和庇護者。

戰爭使俄國現在每天耗費五十萬盧布。這個每天五十萬的數

日，大部分都是付給軍需品供給者。在這五千萬中至少每天有五百萬，也許有一百萬以至更多的數目成了資本家和多少與之勾結的官吏們底「正當收入」。特別是那些貸款去經營軍需品供給事業的大公司和銀行，在這裏賺得了空前未聞的利潤，這正是用盜竊國款的方法來發財，因為對於這種乘戰爭災難的「機會」，乘幾十萬、幾百萬人死亡的「機會」來欺詐人民和掠奪人民的行為，決不能給以另一種稱呼。

關於這種從軍需品供給事業中獲得駭人聽聞的利潤的情形，關於爲銀行所隱匿了的各種「保證信件」，關於利用百物騰貴發財的是些什麼人等等，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這是「社會人士」都用嘲笑態度談論着的，甚至那些照例把「不快樂的」事實隱瞞不說，把「礙難」的問題迴避不談的資產階級報紙都對這點也有不少的個別的確切指陳。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說，大家都忍受，大家都容忍那專說「監督」「調節」漂亮話的政府！！

革命民主派，如果他們真是革命和民主主義者，那他們就會立刻頒佈法令，取消營業祕密，責成軍需品供給者和商人公佈賬目，禁止他們任意行動，非得政府允許，不能放棄其所經營的業務，用沒收財產和槍斃^①的辦法來懲治那些隱瞞與欺騙民衆的人，組織自下的檢查和監督，即由人民自身，由職員和工人底工會以及消費者團體等等用民主方式從下面來實行檢查和監督。

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蓋什維克足配稱爲嚇慌了的民主主義者，因為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完全重複着所有那些嚇慌了的市儈們

① 我有一次已在波爾什維克刊物上指出過，只有當剝削者用死刑來對付勞動羣衆藉以維持剝削制時，才能承認反對死刑的理由正當。不用死刑來對付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恐怕是任何一種革命政府都行不通的。

的話，說什麼採用「過嚴」辦法時，資本家會「逃走一空」的，說沒有資本家，「我們」就會幹不好，說也許英法百萬富翁會因之「見怪」，而他們是「贊助」我們的咧，諸如此類等等。竟令人覺得，似乎波爾什維克所提出的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見的辦法，從來沒有試行過的「烏托邦」，其實早在一百二十五年以前，在法國就有那些真是「革命民主主義者」，真相信他們所進行的戰爭是正義的防衛性的戰爭，真是依靠誠意相信這些辦法的民衆的人們，已善於建立對富人的革命監督，並達到舉世傾服的結果。而在這一百二十五年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已造成了銀行、新迪加、鐵路等等等等，就使工農對剝削者，對地主資本家實行真正民主監督的辦法容易百倍，簡單百倍了。

按實質上說，關於監督制底全部問題都歸結於誰監督誰，即哪一階級是監督階級，哪一階級是被監督階級。直到現在，在我們共和制的俄國，在所謂革命民主「全權機關」參加之下，仍舊承認地主和資本家為監督者，並讓他們為監督者。結果就必然造成了激起民衆公憤的資本家盜劫行爲，以及資本家用人為方法支持着的經濟破壞現象。應當不怕打破舊的、不怕大胆建設新的，而堅決澈底地實行由工農對地主資本家的監督。而這却正是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害怕得要死的事情。

強迫合併於組合中

強迫實行新迪加化，例如，強迫把工業主合併於組合中，是在德國早已實行了的。這裏絲毫新東西也沒有。這裏，由於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罪過，又使其共和制的俄國完全停滯不振，這些不名譽的政黨竟在此時和立憲民主黨人，或者和布伯力科夫

輩，或者和特勒青科及克倫斯基跳起雙人舞來「款待」俄國。

強迫新迪加化，一方面是一種由國家推進資本主義發展的辦法，這種發展到處都使階級鬥爭組織起來，使組合數目增加，式樣紛繁，意義增長。另一方面，強迫「組合化」是任何一種多少認真的監督辦法和任何一種節省國民勞動辦法之必要的先決條件。

例如德國法律責成同一地方或全國的皮業工廠主合併為一個組合，而且由國家派代表參加這個組合的董事會，以實行監督。這種法令絲毫也不直接——即就法令本身而言——觸動私有制關係，不剝奪任何私有者的一個哥比，並且還沒有預決到，究竟這種監督會用反動官僚的方式、方向和精神來實現，還是用革命民主的方式、方向和精神來實現。

這種法律可以而且應當在我國立刻頒佈，決不要荒費一個星期的寶貴時間，而要讓社會環境本身去解決實行法令的更具體的方式、速度、及監察方法等等。爲了頒佈這樣的法律，國家並不需要什麼特設機關，什麼特別研究，以及任何預先調查，只須有決心與那些「不慣受」這種干預，不願意喪失額外利潤——保障這種額外利潤的，除了毫無監督狀態外，還有照舊法擅自經營的情形——的資本家底某些私人利益斷絕關係而已。

爲了頒佈這樣的法令，並不需要任何機關，任何「統計」（切爾諾夫想用它來代替農民底革命首創精神），因爲這種法令的實行，應當責成工廠主或工業主自身，責成現有的社會力量來作，並由這些現有的社會（即不是政府的，不是官僚的）力量來加以監督，不過這種社會力量一定要是屬於所謂「下層等級」，即屬於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這些階級按其能作英勇舉動，能

作自我犧牲。能遵守同志紀律方面來說，在歷史上總是表現得比剝削者高得無可比擬。

假定說我國有真正革命民主政府，假定它決議要每個生產部門中凡是僱用有——舉例說——兩個工人以上的工廠主和工業主都必須聯合於縣組合和省組合之中。切實執行法律的責任，首先加之於工廠主、經理、董事、大股東（因為所有這些人都是現代工業底真正首領，真正主人）身上。如果他們規避立刻執行法律的工作，便認作是逃避軍役而以軍法治罪，實行連環保，各自以其全部財產為担保，一人有罪，大家負責，大家有罪，各人分擔。其次，要一切職員也擔負執行這個法律的責任，務使他們也組織為一個團體，再就是一切工人及其工會也要擔負這個責任。「組合化」底目的，就是要樹立最完備、最嚴格和最詳細的賬目報告制，而主要是在購買原料，推銷產品，節省國民資金和勞力方面實行聯合營業。這種節省，在把各自分立的企業聯合為一個新迪加時，就會達到極大的規模，經濟學上是這樣指示，而一切新迪加、卡德爾、托拉斯的例子也是這樣說明的。我再重述一遍，這種合併為一個新迪加的辦法，其本身是一點也不會改變私有制關係，不會剝奪任何一個私有者底一個哥比。這一情況其所以必得再三着重指出，是因為資產階級報紙經常「恐嚇」中小業主，說什麼一般社會主義者，特別是波爾什維克想「剝奪」他們的財產；這種說法關係撒謊，因為社會主義者甚至在完全社會主義革命時也不想，也不能並且也不會剝奪小農財產的。而我們所常說的，始終只是那些要立刻實行的最迫切的辦法，這些辦法已在西歐實現了，凡是多少徹底的民主派都應當立刻在我國實現起來，以便防止已逼近眼前的勢所不免的災禍。

如果要把極小業主和小業主合併爲各種組合，那就無論在技術上或組織上都會遇到嚴重困難，因爲他們的企業極爲零散，技術極爲簡陋，業主本人又不識字，或不開通。然而正是這些企業可以不包括在此項法律之內（在我們上面假設的例證中已經指出這點了），縱令不把他們合併，更不用說合併較遲，也不會造成什麼嚴重妨礙，因爲數量極大的小企業在生產總量中的作用，在對於整個國民經濟的意義上說都是微小不足道的，除此而外，它們常是或多或少依賴於大企業的。

有決定意義的只是大企業，在這裏已具備有實行「組合化」之技術上組織上的資料與人力，其所缺乏的，只是革命政權爲了發動和運用這些人力和資料，而嚴厲無情地對待反革命勢力的這種堅決首創精神。

國家愈缺乏通曉技術的人材以及一般智識幹部，就愈加迫切需要儘可能迅速，儘可能堅決地下令實行強迫合併，而且首先要從大企業和最大企業開始，因爲正是合併才可以節省智識幹部，才有可能完全利用並更正確地分配這些幹部，如果甚至在沙皇政府之下，俄國農民在其窮鄉僻壤，也能於一九〇五年後，戰勝沙皇政府所造成的千百障礙，而在建立各種組合事業上大進了一步，那末大工商業和中等工商業的合併，當然可以在幾個月內實現，或者還要實現得更快些，只要真正革命民主政府憑靠着「下層」民衆，民主勢力，即職員工人之擁護、參加、同情及其利益所歸，強迫這樣做，並號召他們起來實行監督就行了。

調節消費

戰爭迫使所有交戰國以及許多中立國都實行了調節消費的辦

法。麵包證出世了，而且成了通常的現象，接着又有其他各種購物證出現。俄國亦非例外，也施行了麵包證制。

然而，正是利用這個例子，我們也許可以最明顯地來把防止災禍的反動官僚辦法與革命民主辦法作一比較，前者力求以最低限度的改造為限，而後者爲了不喪瀆自己的稱號，就應當認定自己的直接任務，是用強力與一切老舊過時的東西斷絕關係和儘快地促進運動前進。

麵包證制是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調節消費的主要標本辦法，其目的，其所實現的事情，只有一點（至多也只是實現這一點）：就是分配現存食糧，使之夠大家吃。規定了最高消費額的，遠不是所有一切東西，而只是主要的「民衆」食品。不過如此而已。再不關心別的事情了。用官僚方式計算現有的存糧，把它按人口分配一下，規定每日糧額，把它實行起來就完事。奢侈品是毫不涉及的，因爲「橫豎」這些東西貴得很，「民衆」是買不起的。所以毫無例外地在所有交戰國中，甚至在德國，在這個可以說無疑是最準確、最精密、最嚴格調節消費的模範國家裏，我們都看見富人經常規避任何消費「額」的法律。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大家」都帶譏笑態度說着，並且在德國社會主義的報紙上，有時甚至在資產階級的報紙上，不管德國那嚴似軍紀的檢查機關如何橫暴，還是經常登載有評述富人「菜單」，富人在某個療養地方（凡是……有錢的人都可以冒稱病人到那裏去療養）可以任意領得多少白麵包，富人用山珍海味的奢侈食物代替平民食品等類的消息和短評。

反動的資本主義國家害怕損壞資本主義底基石，僱傭奴隸制底基石，富人在經濟上的統治基石，害怕發展工人以及一般勞動

羣衆底自動性，害怕「煽起」他們的嚴正要求；這樣的國家除了麵包證外是什麼也不需要的。這樣的國家隨時隨地都不會忽略自己反動的目的：鞏固資本主義，不使它受人損害，在一般地「調節經濟生活」，尤其是調節消費方面，僅限於採用那些爲贍養人民所絕對必需的辦法，並不圖謀這樣真正調節消費，就是說，監督富人，把更多的戰時負擔加到那些在平時享有特權，養尊處優，既醉且飽的富人身上。

用反動官僚方式來解決戰爭向人民提出的任務，就是祇限於施行麵包證，平均分配那些爲營養所絕對必需的「民衆」食品，一點也不放棄官僚主義和反動政策，即是說，一點也不放棄原來的目的：不發動窮人、無產階級、民衆（「平民」）底自動性，不容許他們監督富人，而把那使富人可以享受奢侈品的漏洞留得更多一些。在所有一切國家中，重複一句，甚至在德國，——更不消說俄國了，——這樣的漏洞是留得極多的，「老百姓」忍飢受餓，富人却常到療養所去，用另外的各種「附加物」來補充國家規定的低微的消費額，並且不讓別人監督自己。

剛在自由平等的旗幟下作過反沙皇制度革命的俄國，按其實際政治制度說來，一下子就成了民主共和國的俄國，這裏，這種衆所共見的富人容易規避「麵包證」制的現象，是特別使人民刺目，特別引起民衆不滿、憤慨、怨恨和義憤的。這種容易規避的程度特別的大。暗裏的價格特別之高，尤其是依靠「交情」（而這只有富人才有），什麼都可以得到，而且得到的很多。人民却忍飢受餓。調節消費的辦法僅僅以極狹窄的官僚反動的範圍爲限。政府方面一點也不想到，一點也不關心到用真正革命民主的原則來實行這種調節。

「大家」都感受站隊購物的痛苦，可是……可是富人却派自己的僕人去站隊，甚至僱傭專僕來做這件事情！這也叫做「民主制度」！

當國家空前貧困的時候，革命民主政策爲了防止臨頭災禍，不會僅僅限於實行麵包證制，而會加上以下的辦法：第一，強迫全體居民聯合爲消費協社，因爲沒有這樣的聯合，就無法實行完備的消費監督；第二，要富人執行勞動義務，使他們無報酬地在這些消費協社中作書記等類的勞動；第三，真正把所有一切消費品平均分配給居民，使戰爭的困苦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實行真正由居民中貧苦階級去監督富人消費的監督制。

在這一方面建立真正民主制度，在組織正是由人民中貧苦階級來實行的監督制方面表現真正的革命精神，就是使每個現有的智識幹部都奮發起來，使全體人民底真正革命毅力都發展起來的莫大推動力。而此刻呢，共和制的革命民主俄國中的閣員們，也如他們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同僚們一樣，專說什麼『全體都爲造福人民而勞動』，什麼『振奮一切力量』的漂亮話，可是人民却看見，却感觸到這些話全是虛偽。

結果是踏步不前，而經濟破壞的程度却不可阻遏地增長着，災禍日益逼近，因爲仿照科爾尼洛夫的榜樣，仿照奧登堡的榜樣，仿照一般帝國主義的榜樣來對工人施行軍事苦役制，是我國政府所不能做的，因爲革命底傳統、記憶、痕跡、習慣和組織，還是活生生地存在於人民衆中；而沿着革命民主的道路作些真正嚴重的步驟，又是我國政府所不願意的，因爲它全身從頭到腳，都爲依賴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聯合」的關係，以及害怕觸犯資產階級實際特權的心理所貫注所束縛住了。

政府破壞民主組織底工作

我們考察了防止災禍飢荒的各種方法和辦法。我們到處都看見民主派方面和政府及擁護政府的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聯盟方面兩者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爲了證明，這些矛盾不僅在我們的敘述中寫着，而是實際上存在着，這些矛盾之不可調和是爲有全民意義的實際衝突所證實了的，——爲了證明這點，只須從我國革命半年來的歷史中，指出兩個特別標本的「總結」和教訓也就夠了。

帕里琴斯基「統治」的歷史，就是第一個教訓。壁舍浩諾夫之「統治」及其倒台，就是第二個教訓。

其實，上面所述各種防止災荒的辦法都歸結於從各方面鼓勵（直到強迫）居民「組合化」，首先是鼓勵民主派，即大多數居民，——就是說，首先是被壓迫階級、工人、農民，特別是貧苦的農民「組合化」。而居民自己爲了克服戰爭所造成的空前困難、苦痛和災禍，已自發地走上這條道路了。

沙皇政府曾極力阻撓居民自動地和自由地「組合化」。可是沙皇帝制崩潰後，民主組織就已在全俄各地開始發生並迅速發展起來。自動成立的民主組織，各種供給委員會、糧食委員會、燃料會議以及諸如此類的組織，都來進行防止災禍的鬥爭了。

在我國革命半年來的全部歷史中，關於本問題最可注意的事實，就是自稱爲革命共和的政府，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革命民主全權機關」名義所擁護的政府，竟進行了反對民主組織的鬥爭，並打敗了這些組織！！

帕里琴斯基因進行這個鬥爭而獲得了傳遍全俄的臭名。他歲

在政府後台活動，而不在人民面前公開講話（正與一般立憲民主黨人所愛用的活動方法一樣，他們樂意推出策烈鐵里來「對付人民」，自己却暗地包辦一切重要事情）。帕里琴斯基阻礙並破壞了自動成立之民主組織所進行的一切嚴重辦法，因為任何一個嚴重辦法都不能不損害到啓特·啓對奇底無限利潤和專橫氣焰。而帕里琴斯基正是啓特·啓對奇最忠實的衛士和奴僕。結果竟弄到這樣的地步——這是在報紙上公佈過的事實，——帕里琴斯基竟公然下令取消過各自動成立的民主組織底指令！！

帕里琴斯基「統治」的全部歷史，——而他「統治過」數月之久，並恰恰是在策烈鐵里、斯科別列夫、切爾諾夫當「閣員」的時候，——始終都是爲了迎合資本家及其醜惡私利而破壞民意和破壞民主派決議之醜不堪聞的歷史。自然報紙上所能發表的僅是帕里琴斯基「功業」的極小一部分，至於要把他阻難防止飢荒的罪惡澈底查明，這是只有當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後所成立的真正民主政府才可辦到，那時無產階級會把帕里琴斯基及同類人物底案件，毫不隱匿地提交人民裁判的。

也許會有人反駁說，帕里琴斯基只是一種例外而已，你看，他不是被趕走了麼……可是問題正在於帕里琴斯基不是例外，而是通例，把帕里琴斯基趕走後，情形絲毫也沒有改善，代替他的只是一些另具姓名，同樣的帕里琴斯基罷了，資本家底全部「影響」，爲迎合資本家底利益而破壞防止飢荒辦法的全部政策，是絲毫也沒有被觸犯。因爲克倫斯基一流人只是保衛資本家利益的屏障而已。

這種情形之最明顯的證據，便是糧食總長璧舍浩諾夫退出內閣的事實。大家知道，璧舍浩諾夫是個極端溫和的民粹派份子。

可是他在組織糧食事業方面很想誠意作事，想與民主組織發生聯繫並依靠這些組織來作。壁舍浩諾夫工作底經驗及其退出內閣的事件，其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為這個最溫和的民粹派份子，這個「人民社會」黨黨員，雖決意儘量與資產階級妥協，畢竟還是不得不退出內閣！其原因是由於克倫斯基政府爲迎合資本家、地主和富農農利益，竟提高了糧食定價！

請看斯米特在九月二日出版的自由生活報第一期上對這個「步驟」及其意義的描寫吧：

『在政府決定提高定價的幾天以前，全國糧食委員會裏發生了如下的情景：右派代表羅洛維奇是個頑強擁護私商利益，無情反對糧食壟斷和國家干涉經濟生活的人，他帶着自滿自足的笑容當衆聲明說，據他所知道的消息，糧食定價很快就要提高了。

工兵蘇維埃代表回答說，他絲毫也不知道這樣的事實，當俄國革命尚在繼續下去的時候，決不能有這樣的舉動，不管怎樣，政府非與民主派全權機關——經濟委員會和全國糧食委員會商議，是決不能有這種舉動的。農民蘇維埃代表也同意這個聲明。

可是，不幸得很！事實給了這個反聲明一個非常殘酷的修正：說對了的，原來不是民主派底代表，而是富豪份子底代表。原來他對於預備侵犯民主派權利一事，消息極爲靈通，雖然民主派底代表曾以憤激態度，否認了發生這種侵犯事件的任何可能性。』

總之，無論工人代表或農民代表都以絕大多數人民名義肯定地聲明了自己的意見，而克倫斯基政府却爲資本家利益，幹着恰

恰與此相反的勾當！

資本家底代表羅洛維奇原來是個對於那些隱瞞了民主派的消息極為靈通的人，——正如我們所始終看到的資產階級刊物言論報和交易所公報²³對克倫斯基政府中消息最為靈通的情形，完全一樣。

這種消息極為靈通的事實說明什麼呢？顯然是說明資本家有自己的「門徑」，而把實際政權握在自己手裏。克倫斯基是個傀儡人物。當他們需要他的時候，就把他使用起來，要怎樣使用，便怎樣使用。千百萬工農底利益竟為了一小羣富人底利潤而被犧牲了。

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怎樣回答這種令人憤恨的欺侮人民的舉動呢？也許他們向工農發表了宣言，說克倫斯基及其同僚幹了這種事情後，只有把他們逮捕下獄吧？

當然不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僅僅用他們所把持的「經濟部」的名義通過了一個我們已在上邊提到過的嚇人決議案而已！在這決議案中，他們聲明說，克倫斯基政府提高糧食價格是一種「誤國辦法，使糧食事業以及全國經濟生活遭受莫大的打擊」，並指出這些誤國辦法之實施是公然「違」法的！！

這就是妥協政策所造成的結果，就是與克倫斯基勾結並想「寬宥」他的政策所造成的結果。

政府違法，爲了富人、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採取這種危害全部監督事業，糧食事業以及整理那極度恐慌的財政事業的辦法，——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却繼續說什麼與工商業界妥協，繼續去同特勒青科輩開會商議，寬宥克倫斯基，而僅限於通過一紙使政府可以安然置之高閣的決議！！

這裏就特別明顯地表明了下面這個真理，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叛賣了人民和革命，而波爾什維克則成爲羣衆底真正領袖，甚至原來擁護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羣衆也在內。

因爲只有波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奪得政權，才能肅清克倫斯基之流所幹的那些豈有此理的勾當，並恢復那被克倫斯基及其政府所破壞着的管理糧食、供給等事宜的民主組織底工作。

波爾什維克底行動——這是從上述例證中可以極明顯地看出的——是代表着全體人民底利益，代表着保證糧食和供給事業底利益，代表着滿足工人和農民最迫切需要的利益，而反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那種動搖、不堅決、真正叛賣性的政策，這個政策已把國家弄到作出提高糧食價格這類可恥事情的地步！

財政破產和挽救之法

提高糧食定價問題還有另一方面的影響。這就是使濫發紙幣的現象更加擴大，使物價更加抬高，使財政更加紊亂，使財政破產更加逼近起來。大家都承認，濫發紙幣是最壞的一種強迫公債，它正使工人和貧民底生活狀況最爲惡化，它是財政混亂的主要罪因。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擁護的克倫斯基政府，却正是採用這種辦法。

爲要認真消除財政紊亂和防止勢不可避免的財政破產，除了用革命手段去與資本利益斷絕關係，並實行真正民主監督，即是由工人和貧農「從下面」對資本家實行監督的道路，亦即上文中始終論述的那條道路而外，別無他途。

無限制的濫發紙幣就是鼓勵投機勾當，使資本家可以用投機手段賺得億萬橫財，並對於急需進行的擴大生產事業造成莫大困難。因為原料、機器等等的價格因此愈益昂貴，而且急劇飛漲。當富人把藉投機獲得的財富隱瞞起來時，要採取什麼辦法才有濟於事呢？

可以徵收所得稅，對巨額收入和最大收入規定很高的累進稅率。我國政府繼其他帝國主義政府之後實行了這個辦法。可是這個辦法大半仍是空中樓閣和死的條文，因為第一，紙幣價格愈跌愈快，第二，投機獲利的來源愈多，營業祕密的保持愈加可靠，遂使隱瞞收入的現象愈益厲害起來。

要使累進稅成為實在的，而不是空中樓閣，就必須厲行實在的，而不是紙上虛文的監督。如果監督仍然是官僚主義的，那末，對資本家的監督便無法實行，因為官僚有千百條綫索與資產階級聯系着和糾纏着。所以在西歐各帝國主義國家，不管是君主國也好，共和國也好，整理財政都是由實行那種使工人作軍事苦役，或成為軍事奴隸的「勞動義務制」才達到的。

反動官僚式的監督，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包括民主共和制的法國和美國在內——把戰爭重担卸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身上的唯一手段。

我國政府政策底基本矛盾。就在於不得不採用反動官僚式的監督，以免和資產階級爭鬧，以免破壞同資產階級的「聯合」，同時爲了可以隨時欺騙人民，又把它叫做「革命民主式的」監督，因而就激起剛把沙皇制度推翻的民衆底憤怒。

其實，只有施行革命民主的辦法，只有把被壓迫階級、工人和農民，把羣衆聯合爲各種團體，才有可能來實行對富人的真正

監督和極順利地打破隱瞞收入的現象。

現時正在努力獎勵用支票流通的辦法來防止濫發紙幣。這種辦法對於貧民是毫無意思的，因為貧民橫豎是朝不保夕，橫豎他們的「經濟週轉」是每星期完成一次，而把他們所賺得的很少幾文錢交還給資本家。對於富人，用支票流通則能有莫大意義，特別是在同時實行如像銀行國有和取消營業祕密等類辦法的時候，因為這使國家可以真正監督資本家底收入，真正向他們抽稅，真正把財政體系「民主化」（同時就加以整理）。

可是阻礙實行這種辦法的，正是害怕損害資產階級特權，害怕和它破裂「聯合」的心理。因為若不實行真正的革命辦法，不實行極認真的強迫手段，那資本家是不會服從任何監督，不會公開自己的賬目，不會將他們所儲藏的紙幣交給民主國家「存記」的。

已聯合為各種團體的工農，若把銀行收歸國有，施行一切富人所必須依法執行的支票流通制，取消營業祕密，規定以沒收財產來懲治隱瞞收入的罪行等等，就能極易使監督成為普遍化的實在監督，正是對富人的監督，而實行這樣的監督時，就能使凡是握有國庫所發行的紙幣的人，凡是隱藏這種紙幣的人都把紙幣交還給國庫。

爲了這，就必須有革命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民主派底革命專政，就是說，爲了這，民主制必須成為真正革命的民主制。這就是問題全部的中心所在。這正是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不願意做的事，他們用「革命民主」的幌子來欺騙人民，實際上則擁護資產階級底反動官僚政策，而資產階級却總是以下列規則爲其行動方針：《après nous le déluge》——只要我們安全，那

怕是洪水滔天！

我們通常甚至不覺得，對於資產階級私有制之「神聖不可侵犯性」的反民主的習慣和成見，如何深刻地侵蝕了我們的心靈。當某個工程師或銀行主公佈工人收支賬目，公佈關於工人工資及其勞動生產率的統計時，一般人認為這是極正當而公道的事情。誰也不想把這認作是侵犯工人「私人生活」，認作是工程師底「偵探或告密」行爲。資產階級社會把僱傭工人底勞動與工錢看作是自己的公開賬簿，任何一個資產者都有權隨時拿來察看，隨時揭曉，說這樁是工人過於「奢侈」，那樁似乎是工人「偷懶」等等。

可是反過來的監督呢？如果職員、辦事員、僕役等底團體被民主國家邀請來檢查資本家底收支，公佈這種材料，幫助政府來反對隱瞞收入的現象，那又會是怎樣呢？

那資產階級該會如何狂吠起來反對「偵探」，反對「告密」呵！當「老爺」監督僕役，資本家監督工人時，一般人就認為這是理所當然，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私人生活並不認為是不可侵犯的，資產階級有權要求每個「僱傭奴隸」作報告，隨時把他的收支公佈出來。而被壓迫者企圖監督壓迫者，把他的收支清算明白，揭露他的奢侈生活，那怕是在戰爭期間，當這種奢侈生活會使前綫軍隊簡直遭受飢荒死亡的時候，都是不行的，資產階級是不容許有「偵探」和「告密」行爲的！

問題又是歸結於這一點：資產階級底統治是與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制度不可調和的。在二十世紀的時代，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如果害怕走向社會主義，便不能做一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

害怕走向社會主義，能否前進呢？

以上所述，很易於引起那些受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之流行機會主義思想浸潤的讀者的反駁，說這裏所論述的辦法，其實大多數不是民主主義的，而已經是社會主義的辦法！

這種在資產階級報紙，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報紙上常見的（用這樣或那樣形式）流行駁議，是用司徒盧威式的武裝來保衛落後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他們說，我國還沒有成熟到實行社會主義的地步，「施行」社會主義還太早，我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所以該做資產階級底奴僕（雖然法國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在一百二十五年以前由於採用了恐怖手段去反對一切壓迫者，也反對地主，也反對資本家，而使自己的革命成了偉大的革命！）。

那些替資產階級服役的冒牌馬克思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也轉到了他們行列中，——其所以這樣主張，是由於不懂得（照他們這種意見底理論基礎來看）什麼是帝國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壟斷？什麼是國家？什麼是革命民主制？因為懂得了這些東西的人，就不能不承認，不走向社會主義便無法前進。

大家都談論着帝國主義。可是帝國主義祇不過是壟斷的資本主義而已。

俄國資本主義也成了壟斷的資本主義，這是有「煤炭銷售公司」、「五金銷售公司」²⁴、糖業新迪加等等充分證明了的。這個糖業新迪加又顯然表明了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

什麼是國家呢？這就是統治階級底組織，——例如在德國便

是容克地主和資本家底組織。所以德國的普列漢諾夫輩（謝德曼、連奇等人）稱之爲「軍事社會主義」的東西，實際上就是軍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或者說得簡明些，就是使工人作軍事苦役，而對資本家利潤實行軍事保衛。

你試試用革命民主的國家，即是用那採取革命手段來破壞一切特權，不害怕以革命手段實現最完備民主制度的國家去代替容克資本家的國家，代替地主資本家的國家，那又會怎樣呢？那你就會看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真正革命民主國家中，就會必然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以至一些步驟！

因爲資本主義的最大企業既然成了壟斷的，那就是說，它供應着全體人民的需要。既然它成了國家的壟斷，那就是說，由國家（國家在實現了革命民主制度的條件下，就是人民底武裝組織，首先是工農底武裝組織）來指導全部企業，究竟爲着誰的利益呢？

——或者是爲着地主和資本家底利益；那末就不是革命民主制的國家，而是反動官僚制的國家，帝國主義的共和國；

——或者是爲着革命民主派底利益；那末這也就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

因爲社會主義不過是由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制前進的最近一步而已。或者換句話說，社會主義不過是把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制轉過來服務於全體人民底利益，於是也就不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了。

在這裏，中間道路是沒有的。客觀的發展進程表明：不走向社會主義，就不能從壟斷組織（戰爭更把這種組織底數目，作用和意義增加十倍）前進。

或者是成爲真正的革命民主主義者，那末就不能害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

或者是害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而照普列漢諾夫、唐恩、切爾諾夫之流的理由來非難這種步驟，說什麼我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不能「施行」社會主義等等，那末就必然墮落到克倫斯基、米留可夫、科爾尼洛夫等的立場上，即是用反動官僚手段來鎮壓工農羣衆底「革命民主」趨向。

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我國革命底基本矛盾也就在於此。

站着不動是不行的——在一般歷史上是這樣，特別在戰時是這樣。必須走着，不前進，便後退。在二十世紀的俄國，在用革命手段奪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俄國，不走向社會主義，不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由技術和文化水準所制約，所決定的步驟：在農民所經營的農業中是不能「施行」大機器經濟，而在糖業生產中則不能把大機器經濟取消），是不能前進的。

害怕前進，便是後退，而克倫斯基輩在米留可夫和普列漢諾夫之流的欣然嘆賞下，在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之流的愚蠢贊助下所作的事情，正是這樣。

戰爭既非常加速了使壟斷資本主義變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因此也就使人類非常接近於社會主義了，這就是歷史底辯證律。

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這不祇是因爲戰爭所造成的慘痛產生出無產階級的起義，——如果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尙未成熟，那末任何起義也不會創造出社會主義，——而是因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滿的物質準備，是進到社會主

義的門階，是歷史梯子上這樣的一級，即從這一級到稱爲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是沒有任何中間級段的。



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對於社會主義這問題是以學理主義的態度，即是根據他們讀得爛熟却不很瞭解的學理來觀察的。他們把社會主義想像爲一種遙遠而不可知的模糊的將來。

其實，社會主義現已出現於現代資本主義底一切窗牖內，在這最新資本主義基礎上每前進一步的巨大設施中，社會主義都實際地顯現出來了。

什麼是普遍勞動義務制呢？

這就是在最新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一個前進的步驟，進到按照一定的總計劃來調節全部經濟生活的步驟，進到節省國民勞動，防止資本主義濫費國民勞動的步驟。

在德國，是由容克（地主）和資本家施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所以它就必然成爲使工人作軍事苦役的制度。

可是，你試想想，這一制度由革命民主國家來實行的時候，會有怎樣的意義吧。

由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所施行、所調整、所指導的普遍勞動義務制，這還不是社會主義，但這已經不是資本主義了。這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巨大步驟，在完全民主制存在的條件下，除非對羣衆施行空前殘忍的暴力手段，決不能從這樣的步驟退回到資本主義來。

消除經濟破壞與戰爭問題

既說到防止臨頭災禍的辦法問題，我們就要把另一個極重要

的問題說明一下：這就是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的聯繫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與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爭間，即萬惡強盜戰爭與正義民主戰爭的相互關係問題。

我們已經指出過，我們所闡明的一切防止災禍的辦法，是會大大加強國防能力，換言之，即加強國家軍事實力，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若不把掠奪戰爭變為正義戰爭，把資本家爲了自己利益所進行的戰爭變為無產階級爲了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利益而進行的戰爭，則這些辦法是不能實行的。

的確，把銀行和新迪加收歸國有，同時取消營業祕密和實行工人對資本家的監督，不僅會使國民勞動大大節省，不僅可能節省人力和經費，而且也會使勞動大衆，即大多數居民底生活狀況改善。大家知道，在現代戰爭中，經濟組織是有決定意義的。在俄國，糧食、煤炭、煤油、鐵都很充分，——在這一方面，我國底狀況比歐洲任何一個交戰國都要好些。當用上述辦法消除經濟破壞，鼓勵羣衆來自動參加這個鬥爭，改善羣衆生活狀況，實行銀行國有和新迪加國有，俄國便能利用自己的革命和民主制度來把全國在經濟組織方面提到更加高得無比的程度。

假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不與那阻礙一切監督辦法，對生產怠工的資產階級成立「聯合政府」，而在四月間就使政權轉歸了蘇維埃，並且不把自己的力量用去作「倒閣組閣」的把戲，不把自己的力量用去爭得與立憲民主黨人並列盤踞一些總長次長等等的高位來過官僚生活，而是把力量用去領導工農實行對資本家的監督，領導工農進行反資本家的戰爭，那末，俄國現時就會已是在經濟上完全改造的國家，就會實現了土地農民所有，銀行家所有，即是說，在這些方面（而這是現代生活極重要的經濟

基礎) 就會比所有其餘的資本主義國家都要發展得高些。

實現了銀行國有的國家，其國防能力，其軍事實力定比銀行留在私人手中的國家高些。土地已歸農民委員會所有的農民國家，其軍事實力定比土地仍歸地主所有的國家高些。

人們常常援引法國人在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時的英勇愛國精神和軍事義勇奇蹟。可是他們常常忘記當時惟一可能造成這種奇蹟的物質的，歷史經濟的條件。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毀那過時的封建制度，使全國過渡到更高的生產方式，過渡到自由的農民土地所有制，並且是用真正革命民主主義的速度，堅決手段，毅力和忠誠精神來實現這種過渡，——這就是那些以「神奇」速度挽救了法國，而把它的經濟基礎改造革新了的物質經濟條件。

法國底例子告訴我們一件事，唯一的一件事，這就是要使俄國成爲具有國防能力的國家，要使在俄國也達到羣衆英勇的「奇蹟」，那就必須用「雅可賓式的」無情手段掃除一切舊的東西，而在經濟上革新俄國，改造俄國。這在二十世紀時代是不能單用推翻專制制度（法國在一百二十五年前已不僅限於此）來達到的。這甚至不是單用革命手段消滅地主土地所有制（我們連這一點也沒有做到，因爲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叛變了農民！），單是把土地轉交農民所能做到的。因爲我們處在二十世紀的時代；單有對土地的統制，而沒有對銀行的統制，是不能使人民生活改造和革新的。

在十八世紀末，法國在物質方面，即生產方面的革新是與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連繫着，是與革命者主派和革命無產階級底專政（當時民主派還沒有和無產階級分開，而無產階級還幾乎是和民主派溶合在一塊）連繫着，是與向一切反動勢力作無情的戰

爭連繫着。全體人民，特別是羣衆，即被壓迫階級，都充滿着無限的革命熱情；大家都認爲當時的戰爭是正義的、防衛的戰爭，而且事實上也真是這樣的戰爭。革命的法國防禦了反動君主歐洲的侵犯。並不是在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而是在多年以後，當國內反動勢力獲勝以後，拿破崙的反革命專政才把法國所進行的戰爭由防衛的戰爭變成了侵略的戰爭。

在俄國怎樣呢？我們繼續進行着帝國主義的戰爭，這戰爭是爲着資本案利益，與其他帝國主義者結成聯盟，遵照沙皇與英國等等資本案所訂祕密條約來進行的，在這些條約上答應俄國資本案劫掠他國，佔領君士坦丁堡、里沃夫、阿爾明尼亞等等。

當俄國還沒有提議締結正義和平並與帝國主義斷絕關係的時候，則俄國所進行的戰爭，仍舊是非正義的、反動的、侵略的戰爭。戰爭底社會性質，它的真正意義，並不是由敵軍駐在什麼地方來決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就是這樣想法，而墮落到了無知村夫底庸俗見解之中）。戰爭底性質是由戰爭所繼續的是什麼政策（『戰爭是政策底繼續』），是由哪一階級爲了什麼目的才進行戰爭的事實來決定的。

引導羣衆去作履行祕密條約的強盜戰爭而指望羣衆表現熱情，是不可能的。革命俄國底先進階級，即無產階級，日益明白覺悟到戰爭底罪惡性質，資產階級不僅不能打破羣衆底這種信念，恰恰相反，他們對戰爭罪惡性質的悟解力正在增長着。俄國兩都（彼得堡及莫斯科）無產階級已澈底成爲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了！

這裏怎麼還談得到擁護戰爭的羣衆熱情咧！

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是彼此緊結而不可分離的。沒有人民在

大加堅決實行偉大經濟改造時所表現的莫大英勇精神，便不能使國家成爲有國防能力的國家。而不與帝國主義斷絕關係，不向各國人民提議締結民主和平，不以此來把侵略、強盜、犯罪的戰爭變爲正義、防衛、革命的戰爭，便不能喚起羣衆底英勇精神。

只有對內對外政策上都忠誠澈依地與資本家斷絕關係，才能挽救我國的革命，才能挽救我們被帝國主義鐵磨壓榨着的國家。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無產階級

現代俄國底民主派要想成爲真正革命的，就應該與無產階級最密切地聯合前進，擁護它這個唯一革命到底的階級所進行的鬥爭。

對於防止勢所不免的空前災禍的方法加以分析之後，所得出的結論，就是如此。

戰爭既造成了莫大的危機，使人民的物質和精神力量都緊張到極限，使全部現代社會組織受到莫大的打擊，於是就使人類只能二中擇一：或是死亡，或是把自己的命運付託給最革命的階級，好來最迅速、最急進地過渡到更高的生產方式。

由於許多歷史原因——俄國比其他國家更爲落後，俄國所遭受的戰爭困難特別之大，存在着最腐朽的沙皇制度，一九〇五年革命傳統之生氣勃勃，——就使俄國比其他國家先爆發革命。革命所已做到了的，是俄國按其政治制度說來，在幾個月以內便趕上先進國家了。

可是這還不夠。戰爭是鐵面無情的，它用毫不容情的嚴厲方式提出問題：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超過先進國家。

這是可能的，因為在我們面前擺着有許多先進國家底現成經驗，有它們在技術和文化方面的現成結果。有在歐洲高漲着的反戰抗議，有日益發展着的全世界工人革命環境給我們以精神上的幫助。有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極少見到的革命民主自由督促着我們，驅策着我們。

或是滅亡，或是開足馬力向前猛進。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在這樣的時機，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關係證實着——在形式上有相當的改變——波爾什維克的老原則：要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奪取過來。只有這才是挽救革命的保證。

而農民在全部小資產階級羣衆中是人數最多的。

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負起了反動的作用：把農民阻留在資產階級影響下，引導農民去與資產階級聯合，而不去與無產階級聯合。

革命經驗迅速教導着羣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反動政策已在破產：他們已在兩都蘇維埃中被打敗了。在這兩個小資產階級民主黨中都有「左」的反對派增長着。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日在彼得城舉行的社會革命黨市代表會議上，趨向於與無產階級聯盟，而拒絕與資產階級聯盟（建立聯合政府）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獲得了三分之二的大多數。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重複着資產階級最愛說的把資產階級與民主派對立起來的論調。可是這種對立其實是毫無意識的，正好像尺與斗之不能對比一樣。

有民主派的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只有絲毫不懂歷史和政治經濟學的十足蠢才，才能否認這點。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之所以需要這種荒謬的對立，是爲掩蓋一件無可爭論的事實：即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站着有小資產階級的事實。小資產階級由於它在經濟上的階級地位，是必然要動搖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把小資產階級拉去與資產階級聯盟。他們的全部「聯合政策」底實質，整個聯合內閣，標本的半立憲民主黨人克倫斯基底全部政策底實質就在這裏。在這半年的革命中，這個政策已遭到完全破產了。

立憲民主黨人幸災樂禍地說：革命遭受了破產，革命既沒能消除戰爭，也沒能消除經濟破壞。

這是謊話。遭受破產的乃是立憲民主黨人與社會革命黨人加上孟什維克，因爲這個聯盟統治了俄國半年，在這半年中，使經濟破壞狀態加強了，使戰爭局面弄得混亂、更困難了。

資產階級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孟什維克的聯盟破產得愈充分，則人民也就學會得愈迅速。人民也就會更易於找到正確的出路：這出路就是貧農，即大多數農民與無產階級的聯盟。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日至十四日

一九一七年十月末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
年版，第二卷，第四七一至五一四頁

馬克思主義與武裝起義

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書

現時佔統治地位的各「社會主義」黨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最惡毒的，而且也許是最流行的曲解之一，就是這樣一種機會主義的謊語，說準備起義以及一般地把起義當做藝術看待，都是「布朗基主義」。

機會主義派首領伯恩施坦，是因譏諷馬克思主義為「布朗基主義」而臭名昭著的，現時的機會主義高喊什麼「布朗基主義」，其實並沒有給伯恩施坦底貧乏「思想」添上絲毫新的內容，一點也沒有把它「豐富」起來。

人們竟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把起義當做藝術看待而譏諷他們為布朗基主義者！難道有比這樣曲解真理更令人憤懣的事麼。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否認，正是馬克思把這一點說得最肯定、最準確、最無可爭論，他正是把起義稱為藝術，他說，我們必須把起義當作藝術看待，我們必須爭得第一次勝利，乘敵人張惶失措之際，片刻不停地向敵人進攻，以求達到接連不斷的勝利等等，等等。

起義要獲得勝利，應當不是依靠陰謀，不是依靠着黨，而是依靠先進階級。這是第一。起義應當依靠人民底革命高潮。這是

第二。起義應當依靠革命發展進程上這樣的轉變關頭，即當民衆先進隊伍中表現的積極性最高，敵人隊伍中以及軟弱的、中途徘徊的、不堅決的革命朋友隊伍中動搖得最厲害的時候。這是第三。把這三點當作起義的條件，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與布朗基主義區別的所在。

但是，當這些條件既已具備時，還不把武裝起義當作藝術看待，那便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革命了。

爲什麼正是現今這個關頭應當認爲是我們黨必須把起義看成客觀事變進程所提出的當前任務，必須把起義當作藝術看待的時機呢，——爲要證明這點，也許最好是運用一種比較的方法，把七月三四兩日的情形拿來與九月間的情形比較一下。

在七月三四兩日的時候，可以不違反真理，而這樣提出問題：奪取政權也許是要正確些，因爲敵人反正是會誣指我們暴動，而以懲治暴動者的辦法來懲治我們的。但是，決不能由此得出當時必須奪取政權的結論，因爲起義勝利底客觀條件，當時還沒有具備。

(一) 當時革命先鋒隊的階級還沒有擁護我們。

當時我們在兩個首都的工人和兵士中間還沒有獲得多數。而現時我們在兩都蘇維埃中間已經有了這樣的多數。這種多數，只是由七八兩月的事變，「懲治」波爾什維克的經驗和科爾尼洛夫叛亂的經驗所造成的。

(二) 當時還沒有全民革命高潮。現時在科爾尼洛夫叛亂後，這個高潮已經有了。外省的情形和許多地方蘇維埃奪得政權的事實，都證實了這點。

(三) 當時在我們的敵人中間以及在中途徘徊的小資產階級

中間，還沒有發生嚴重的全部政治上的動搖。現在這種動搖已經是極厲害的了：我們的主要敵人，即協約國和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因為「協約國」是全世界帝國主義底首腦，——在那究竟是戰到最終勝利，還是單獨媾和來反對俄國的問題上已經動搖不定。我們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因顯然喪失了他們在民衆中的多數，於是極厲害地動搖起來，拒絕了與立憲民主黨人的聯盟，即是拒絕同他們建立聯合政府。

(四) 所以，如果在七月三四兩日舉行起義，那便是錯誤的：因為當時我們無論在實力上或政治上都不能保持政權。在實力方面之所以不能保持政權，是因為雖然彼得城有時也會落在我們手中，可是那時我們的工人和兵士，還不會去為佔領彼得城而拚命鬥爭；當時他們還沒有這樣「兇猛」，他們無論對克倫斯基輩或對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輩都還沒有這樣切齒痛恨，當時我們的人還沒有因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參加摧殘波爾什維克的事實而受到這種經驗上的鍛鍊。

在政治方面，我們在七月三四兩日那個時候之所以不能保持政權，是因為在科爾尼洛夫叛亂之前，軍隊和外省有可能而且一定會向彼得城進攻。

現在的形勢，就完全不同了。

現在擁護我們的，已有本階級底大多數，即能夠引導羣衆前進的這個革命先鋒隊，人民先鋒隊底大多數。

現在擁護我們的，已有人民底大多數，因為切爾諾夫之退出內閣：就是表明農民從社會革命黨人所實行的聯盟（而且從社會革命黨人自身）方面得不到土地的最顯明最清楚的標誌，並且遠非唯一的標誌。可是革命帶有全民性的中心關鍵却正在這裏。

現在我們有本黨所處的優勢地位，因為全部帝國主義以及整個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底聯盟都發生了空前的動搖，而我們的黨却切實知道自己所應走的道路。

現在我們有一定勝利的保證，因為民衆已瀕於絕望的境地，而我們却給全體民衆指示了正確出路，既在『科爾尼洛夫事變時』給全體人民表明了我們領導底意義，以後我們又向聯盟派提出過妥協的建議，並在他們毫不停止動搖的情形下遭到了他們的拒絕。

如果現在還以為我們實行妥協的提議，尙未遭到拒絕，以為「民主會議」還可以接受這個提議，那便是莫大的錯誤。妥協是由一個政黨向其他政黨提出的，不然，便沒有可能提出它來。但是這些其他政黨拒絕了這個提議。民主會議，只是一種會議而已。千萬不要忘記一點，即在民主會議裏面，並沒有大多數革命民衆底代表，並沒有義憤填胸的貧苦農民底代表。它是人民少數底會議，——決不能忘記這個明顯的真理。如果我們把民主會議當作國會看待，那我們便犯了莫大的錯誤，我們便陷於不可救藥的國會迷裏了；即令民主會議宣佈自己為國會，宣佈自己為代表革命的全權國會，它還是絲毫不能解決問題的，問題只能在民主會議以外，只能在彼得城和莫斯科底工人區域內解決。

現在我們具備有獲得起義勝利的一切客觀前提。我們所處的地位是非常優越的，因為只有我們在起義中的勝利，才能結束苦惱人民的各種動搖，才能結束世界上這種最令人苦惱的現象；因為只有我們在起義中的勝利，才會打破用單獨媾和手段來反對革命的把戲，——而且公開揚言要完滿地、更迅速的和平。即有對於革命的預備來打破這套把戲。

最後，只有我們黨在起義中獲得了勝利，才能挽救彼得城，因為如果我們的和平提議竟被拒絕，如果我們連休戰協定都不能得到，那我們就要做「護國派」，我們就要做各主戰黨底首領，我們就要做最「主戰」的政黨，我們就會用真正革命手段來進行戰爭。我們將奪取資本家所有的一切麵包和靴鞋。我們只留給他們一些麵包殼，我們要叫他們穿草鞋。我們將把所有的麵包和靴鞋都送到前綫上去。

那時我們就能捍衛住彼得城了。

進行真正革命戰爭的資源，不管是物質資源或精神資源，在俄國還是大得無可限量的；我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可以指望德國人至少會同意與我們休戰。而在現時得到休戰，就無異是戰勝了全世界。



我們既意識到絕對需要有彼得城和莫斯科工人的起義來挽救革命，來擺脫雙方聯盟國帝國主義者「單獨媾和」實行瓜分俄國的危險。那末，第一、我們就應該把我們在民主會議的全部政治策略適應於日益增長的起義條件；第二、我們應該證明我們接受馬克思所說必須把武裝起義當作藝術看待的思想，並不僅僅是在口頭上而已。

我們應該在民主會議中即刻鞏固波爾什維克黨團，而不要專求數量，不要害怕使動搖份子留在動搖份子營壘中：他們留在那邊，要比蹬在堅決忠誠的戰士營壘裏，較為有利於革命。

我們應該發表一篇簡短的波爾什維克宣言，用最鋒利的語句指出說：冗長的演說以及一般「演說」都是不合時機的，而認為

必須即刻動作起來挽救革命，絕對必須與資產階級完全斷絕關係，必須完全撤換現政府中的全部人員，必須與準備用「單獨媾和」來瓜分俄國的英法帝國主義者完全破裂，必須使全部政權立刻轉歸革命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民主派掌握。

我們在宣言內應當用極簡短極鋒利的語句來說明這個結論，把它聯繫到我們的政綱草案：給各國人民以和平，給農民以上地，沒收資本家駭人聽聞的利潤，制裁資本家駭人聽聞的破壞生產行爲。

這個宣言愈簡短愈好，愈鋒利愈妙。在這宣言中，還必須明顯指出兩個極重要之點：民衆已因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動搖不定，而受盡了痛苦和折磨；我們必須和這兩個政黨澈底破裂，因為它們背叛了革命。

另一點是：我們要立刻提議締結不兼併的和平，立刻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及其他一切帝國主義者斷絕關係，我們這樣來作，就可以達到或是立刻休戰，或是全體革命的無產階級就會轉到防衛戰方面，而革命民主派就會在革命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真正正義的，真正革命的戰爭。

我們既宣讀這篇宣言，既號召解決問題而不是說空話，號召動作而不是寫決議案，那就應當把我們整個黨團都派到工廠和營房裏去，因為那裏才是我們黨團工作的地方，那裏才是生活底神經中樞，那裏才是挽救革命的力量泉源，那裏才是民主會議的推動力之所在。

在那些地方，我們應該用熱烈激昂的演講來說明我們的政綱，並指出或者是民主會議完全接收這個政綱，或者就是武裝起義。折衷辦法是沒有的。等待是不行的。革命垂危了。

我們這樣提出問題，把我們的整個黨團都集中到工廠和營房中去，那我們就會能正確估計開始起義的時機。

爲要用馬克思主義態度來看待起義，即是把起義當作一種藝術，我們同時就要不放過一分鐘，而立刻組織起義隊伍底司令部，分配力量，把可靠的部隊派遣到最重要的地方去，包圍亞歷山大戲院，佔領彼得巴夫洛堡²⁵，逮捕總參謀部和政府人員，要把那些寧可戰死而不讓敵人向城市中心進展的隊伍派去抵禦士官生和野蠻師²⁶；我們應當動員武裝了的工人，號召他們進行最後的拚命戰鬥，一下子佔領電報局和電話局，把我們的起義司令部設在中央電話局近旁，使它與一切工廠、一切部隊、一切武裝鬥爭的地點等等，都用電話聯絡起來。

這當然都不過是舉其大概，不過是爲了說明在現今這個時機不把起義當作藝術看待，就是不忠於馬克思主義，不忠於革命。

寫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
(舊曆十三至十四日)

一九二一年刊載於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二期上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一〇八至一一二頁

革命底任務

俄國是小資產階級性的國家。大多數居民都是屬於這個階級。這個階級之動搖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當這個階級與無產階級聯合的時候，才能保證容易而和平地、迅速而安穩地達到革命事業底勝利，和平與自由事業底勝利，勞動羣衆獲得土地事業底勝利。

俄國革命底進程向我們指明了這種動搖在實踐上的表現。我們不要對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抱着幻想，而要堅決立定在自己無產階級的階級道路上。貧農底窮困，戰爭底浩劫，飢荒底慘禍——所有這一切，都日益顯著地向羣衆表明無產階級道路底正確和擁護無產階級革命之必要。

所有一切指望與資產階級「聯合」，指望與資產階級妥協，指望可以「安穩」等到立憲會議「迅速」召集等等的小資產階級「和平」妄想，都被革命過程殘酷無情，毫不寬容地打破了。科爾尼洛夫叛亂是最後一次殘酷的教訓，是一次大規模的教訓，作爲對資本家和地主各在當地欺騙工農，軍官欺騙兵士等等千千萬萬小教訓的補充。

在軍隊、農民、工人中醞釀着的不滿、義憤和忿怒情緒正在

增長。社會革命黨人及孟什維克與資產階級底「聯合」之無所不允，却毫不履行的政策，正使羣衆憤慨，使他們看清真象，把他們推上起義的道路。

社會革命黨人中的左翼反對派（斯皮里多諾娃等）和孟什維克中的左翼反對派（馬爾托夫等）在發展着，其人數在這兩個黨底「委員會」中和「代表大會」上已佔百分之四十。而在下層，在無產階級和農民，特別是貧農中，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大多數都是「左派」。

科爾尼洛夫叛亂教導着羣衆。科爾尼洛夫叛亂使人們學會了許多東西。

還無從知道，究竟現在蘇維埃會能比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領袖們走得更遠，因而使革命和平發展有所保證呢，或是仍然踏步不前，因而使無產階級起義成爲不可避免呢。

這是無從知道的。

我們的任務是幫助羣衆儘量作到一切，以保障實現革命和平發展的「最後」一個機會，幫助的辦法就是解釋我們的綱領，闡明它所具有的全民性質，闡明它之絕對適合絕大多數居民底利益和要求。

下面所述各節，也就是解釋這個綱領的嘗試。

我們帶着這個綱領多多走往「下層」，到羣衆中去、到職員、到工人、到農民中去，不僅要到受我們影響的農民中去，而且特別要到受社會革命黨人影響的農民，無黨農民，愚昧無知的農民中去。努力提高羣衆的認識力，使他們能獨立判斷問題，通過自己的決議，派遣自己的代表團參加會議，參加蘇維埃，參加政府，那時不管會議底結局如何，我們的工作也不會是白費的。

那時這種工作，無論對於會議，或對於立憲會議的選舉，或一般地對於任何政治活動都是有用處的。

生活教導着羣衆理解波爾什維克綱領和策略底正確性。從四月二十日起，到科爾尼洛夫叛亂止——時間多麼少，閱歷多麼多。

羣衆底經驗，被壓迫階級底經驗，在這個時期中教給他們的東西真多得很，於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首領完全與羣衆分離了。若是能做到把最具體的綱領交給羣衆去討論，那末正在這裏，這一點就會表現得最明顯不過的。

與資本家妥協政策底危害作用

(一) 讓資產階級代表繼續留在政府中，那怕其人數不多，讓阿列克塞也夫、克列姆博夫斯基、巴格拉基昂、賈卡林等等將軍這種顯然的科爾尼洛夫派，或讓克倫斯基這種已表明其在資產階級面前軟弱無能，而又慣於玩弄拿破崙主義手腕的人，繼續握有政權，——這就無異是洞開門戶，一方面招致資本家所故意加速和加深的飢荒和勢所不免的經濟崩潰，另一方面招致軍事上的潰滅，因為軍隊痛恨大本營，而不能提起熱情去參加帝國主義的戰爭。除此以外，若是科爾尼洛夫派的將軍和軍官們繼續握有政權，一定會故意向德國人開放戰綫，如像他們在加里西亞和里加所作過的一樣。只有根據下述新原則來建立新政府，才能防止這點。經過四月二十日以來的教訓後，繼續和資產階級作任何的妥協，便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公然背叛人民，背叛革命，而不僅是作了錯誤而已。

政權歸蘇維埃

(二) 全部國家政權應根據一定綱領完全轉歸工兵農蘇維埃所選出底代表，並且政權應完全對蘇維埃負責。各蘇維埃應立刻改選，一方面是用以估計內容特別豐富的最近幾星期革命中全部人民經驗，另一方面是用以剷除有些地方仍未糾正的那種極不公道的情形（選舉方面的不均衡、不平等及其他等等）。

在還沒有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機關的地方和軍隊中，全部政權都應完全轉歸地方蘇維埃及其所選出的政治專員，以及其他只是由選舉產生的機關。

全國各地都應在國家全力贊助之下無條件地實行武裝工人和武裝革命軍隊，即已在事實上證明能夠鎮壓科爾尼洛夫派的軍隊。

給各國人民以和平

(三) 蘇維埃政府應立刻向一切交戰國人民（即同時既向該國政府，也向該國工農羣衆）提議馬上根據民主條件訂立總的和約，並立刻訂立休戰協定（那怕只是三個也好）。

民主和約底主要條件是放棄兼併（掠奪），——這並不是說歸還各列強所喪失了的領土，這樣的瞭解是不正確的；而是說，每個民族，無論在歐洲或在殖民地中，毫無例外地都有可能由自己自由決定，究竟是組織獨立的國家，或是加入任何一個其他的國家，這才是對於放棄兼併的唯一正確的瞭解。

蘇維埃政府既提出媾和條件，它自己就應立刻在實際上着手執行這些條件，即公佈並廢除那些束縛我國的秘密條約，就是原

來由沙皇訂立，答應俄羅斯資本家有可能掠奪土耳其、奧地利等等的祕密條約。其次，我們必須立刻滿足烏克蘭和芬蘭人人底要求，保障他們以及一切住居在俄國的他族人民享有完全自由，直到自由分立為止，同時對全部阿爾明尼亞也採取這樣的原則，必須把駐在阿爾明尼亞境內以及我國所佔領的土耳其領土上的軍隊概行撤退等等。

這樣的媾和條件是不會得到資本家的歡迎的，可是在所有各國人民中却會獲得莫大的同情，會引起他們的熱忱和一致痛恨遷延強盜戰爭這一義憤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大爆發，這就很有可能使我們一下子得到休戰和同意開始媾和談判的回答。因為工人的反戰革命，到處都無可遏制地高漲起來，要推動這個革命前進，決不是和平空談（一切帝國主義政府早已用這種空談來欺騙工農，我國的克倫斯基政府也是一樣），而只有與資本家斷絕關係並提議和平，才能做到。

要說所有一切交戰國連休戰提議都不接受，那是很少可能的。假若這種情形真的實現，那末戰爭在我們方面便成了真正不得已的，真正是正義的和防衛的戰爭。單是無產階級和貧農覺悟到這一點，就足使俄國在軍事方面也加強多倍，特別是在與那些搶劫人民的資本家完全斷絕關係以後；更不用說，那時我們方面所進行的戰爭，將不僅口頭上，而且實際上會是與所有各國被壓迫階級聯合進行的戰爭，是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進行的戰爭了。

在這裏要警告民衆，叫他們不要相信資本家底謊言：說什麼英國及其他各國資本家，當我們現在與他們締結的搶劫聯盟破裂時，就會使俄國革命遭受嚴重的危害，這種謊言有時是使那些最胆怯

的人和庸俗市儈們受到欺騙。這種謊言游頭澈尾都是虛假的，因為『聯盟國底財政支持』不過使銀行家發財，而對於俄國工農的「支持」，只是像一根絞索支持着絞死了的人一樣。俄國有足夠的糧食、煤炭、煤油、鐵，要正確分配這些產品，只須剷除那些劫掠人民的地主和資本家就行了。至於說到俄國人民可能受到現時聯盟國方面對它宣戰的威脅問題，那末以為法國人和意大利人能把自已軍隊與德國軍隊聯合起來進攻那提議正義和平的俄國的想法，顯然荒謬可笑；說到英美日等國，那就即令它們向俄國宣戰（這是它們極難做到的，一方面由於這樣的戰爭為羣衆所極不歡迎，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國家資本家之間有因瓜分亞洲，特別是因掠奪中國而發生的物質利益的分歧），也不能使俄國受到它在與德奧士戰爭時所受到的那種損害和災難的百分之一。

土地歸勞動者

（四）蘇維埃政府應當立刻宣佈無報償地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並把這些土地交給農民委員會管理，直至立憲會議解決時為止。地主所有的農具，也應交給這些農民委員會支配，使這些農具無條件地首先交給貧農無報酬地享用。

這種辦法早已為絕大多數農民所要求，無論在他們代表大會底決議上或各地寫來的幾百份代表委託書上都是這樣說（這在農民代表蘇維埃新聞報上所登載的二百四十二個委託書底綱要上可以看見），所以這是絕對必須立刻施行的辦法。農民在「聯合」內閣時已飽受了故意遷延的痛苦，現在再也不能容許遷延了。

凡是把這種辦法延不執行的政府，都應認為是反人民的政府，這樣的政府應為工農起義所推翻、所打倒。反之，只有實

行了這些辦法的政府，才會是全民政府。

防止飢荒及經濟破壞

(五) 蘇維埃政府應立刻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由工人監督生產和消費的辦法。五月六日以來的經驗證明，不實行這種辦法，則一切實行改良的約許和企圖都是無能為力的，而威脅全國的飢荒和空前災禍也就會一星期比一星期逼近起來。

必須立刻把銀行和保險事業以及各重要工業部門（煤油、煤炭、冶鐵、製糖業等等）收歸國有，同時要無條件地取消營業秘密和實行由工農來對極少數資本家嚴格監察，這些資本家利用供給國家需要品發財，並拒絕報告賬目，拒絕繳納加於他們利潤和財產上的公道稅額。

這種辦法並不剝奪中農，哥薩克和小手工業者私有財產中的一個哥比，而對於平均負擔戰爭重担，是絕對公道的，對於防止飢荒是刻不容緩的。只有制裁資本家的搶掠行爲，並制止他們故意停止生產的行爲，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實行糧食與工業品的正常交換，使富人將其所隱藏的數十萬萬紙幣歸還國庫。

不實行這種辦法，也就不能辦到無償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因為地主土地大部份是抵押在銀行裏，地主利益和資本家利益是彼此不可分離地糾纏在一起的。

工兵代表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經濟部最近通過的決議（見工人報第一百五十二期）不僅承認政府所施行的辦法（如像提高糧食價格使地主富農發財）是極端「有害」，不僅承認「政府所設調節經濟生活的各中央機關完全無所作爲的事實」，並且

甚至承認是這個政府「違法」。執政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底這種承認，就是再一次表明，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是完全犯罪的政策。

與地主資本家反革命勢力作鬥爭

(六) 科爾尼洛夫叛亂和卡列金叛亂²⁷是得到了以立憲民主黨（「人民自由黨」）爲首的整個地主資本家階級的擁護。這是已被中央執委新聞報上公佈的事實所完全證實了的。

可是，並沒有採取任何辦法來完全鎮壓這次反革命叛亂，甚至沒有採取任何辦法來加以調查，而且在政權尚未轉歸蘇維埃以前，也決不能實行任何嚴重辦法。不管什麼委員會，如果不擁有國家政權，便不能實行完滿的緝查和逮捕罪犯等等。只有蘇維埃政府才能夠而且應當實行這種辦法。只有蘇維埃政府才能逮捕科爾尼洛夫派的將軍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底罪魁（古契可夫、米留可夫、梁布申斯基、馬克拉可夫一流人），解散反革命的組織（國家杜馬、軍官聯合會等等），把參加這些組織的人交給地方蘇維埃監視，解散反革命軍隊，以保障俄國免遭勢所不免的「科爾尼洛夫」叛亂企圖的重演。

只有蘇維埃政府才能成立委員會來對於科爾尼洛夫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案件，那怕是由資產階級起訴的案件，作完滿公開的審查，只有這樣的委員會，波爾什維克黨才會號召工人來完全服從它和贊助它。

只有蘇維埃政府才能有成效地打破資本家利用從民衆身上搶劫來的千百萬鉅款，霸佔各巨大印刷所和大多數報紙這種極不公道的事實。必須封禁資產階級反革命報紙（言論報、俄國言論報

等等），沒收它們的印刷所，宣佈私人在報上登載廣告的事歸國家壟斷，把這些廣告一概改登到蘇維埃所創辦的和向農民說明真情的政府報上去。只有這樣才可以把資產階級手上的那種任意造謠譏諷、欺騙民衆，使農民陷入迷途，準備反革命發動的有力工具剝奪掉，而且這是應該剝奪掉的。

革命和平發展

（七）現時在俄國民主派前面、在蘇維埃前面、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前面展開了革命歷史上非常罕見的機會，來保證立憲會議如期召集不再遷延，來使國家免遭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大災禍，來保證革命底和平發展。

如果蘇維埃現在把國家政權完全地、單獨地握到自己手裏來執行上述綱領，那末蘇維埃不但會能獲得俄國十分之九的居民，即工人階級和絕大多數農民的擁護，而且會能獲得軍隊和大多數人民偉大革命熱情的贊助，若沒有這種熱情，便無法克服飢荒和戰爭。

現在決不會有任何抵抗蘇維埃的行爲，只要蘇維埃自己不動搖就行了。沒有一個階級會敢於掀起暴動來反對蘇維埃，而地主和資本家在科爾尼洛夫叛亂時受到了教訓，當蘇維埃一提出決絕要求，他們就會和平地讓出政權。爲了打破資本家對蘇維埃綱領底抵抗，只要實行由工農來監視剝削者，並用沒收全部財產和短期監禁來懲治那些抗命不從者的辦法也就夠了。

蘇維埃奪得全部政權後，就在現時也還能——大概這是最後的一次機會了，——保證革命和平發展，由人民和平選舉自己的代表，各政黨在蘇維埃內部作和平鬥爭，由實踐來考驗各政黨底

綱領，使政權和平地由一個黨轉到另一個黨手裏。

若是放過這個機會，那末革命發展底全部進程，從四月二十日的運動起至科爾尼洛夫的叛亂止，已指明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必然會發生最尖銳的國內戰爭。必至的災禍會使這個內戰接近起來。凡是人底智慧所能思考到的事實和理由，都表明這次戰爭底結局，必定是工人階級在貧農擁護之下得到完全勝利來實行上述綱領；但這個戰爭也許會是非常嚴酷的、流血的、使地主資本家和同情他們的軍官犧牲幾萬性命的戰爭。無產階級爲了挽救革命，會不惜任何犧牲，而要挽救革命，除了實行上述綱領外，決不可能。但是，假使蘇維埃能實現其保證革命和平發展的最後一個機會，那無產階級是會儘量擁護蘇維埃的。

一九一七年十月九日和十日（舊曆九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刊載於工人之路報第二十和二十一期上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一三一至一三九頁

旁觀者底意見

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是在十月八號，要在九號就送達彼得城的同志們手中，恐怕是很少有希望的。也許這幾行字會到達得太遲，因為北方蘇維埃代表大會定於十月十日舉行。雖然如此，我還是想來提出我的「旁觀者底意見」，希望在彼得城及其「四周」的工人和兵士所準備的發動，雖是很快就會舉行，但還沒有實行時，仍可供同志們採納。

全部政權應轉歸蘇維埃，這是很明顯的。同樣，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權（或者說波爾什維克的政權——現在這兩個概念是二而一的），定能獲得世界各國，尤其是各交戰國所有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特別是俄國農民之極大的同情和竭誠的援助，這也是任何一個波爾什維克應該認為不容置辯的。這是人所共知和早已證明了的真理，無庸贅述。

要加以說明的，是未必全體同志都已充分明白的問題，即政權轉歸蘇維埃，現時在實踐上就是武裝起義。看來，這似乎是很明顯的，但並非所有的人都細心思索着這點。現在拒絕武裝起義，就等於拒絕波爾什維克主義底主要口號（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就等於根本拒絕革命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但武裝起義乃是受特別法則支配的一種特別的政治鬥爭形式，這些法則必須細心加以思索。關於這個真理，馬克思說得非常明顯，他說，武裝『起義如同戰爭一樣，是一種藝術』。

馬克思認為這種藝術底主要法則如下：

(一)無論何時都不要把武裝起義當作兒戲，而是要在開始起義時就切實知道必須進行到底。

(二)必須在決定勝負的關頭，在決定勝負的地點，集合大大超過敵人的力量，否則那更有準備和更有組織的敵人就會把武裝起義者消滅下去。

(三)武裝起義既已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來幹，並且一定和絕對要實行進攻。『防守是武裝起義底死路』。

(四)必須努力抓得良好時機，趁着敵人軍隊還是分散時，突然出其不意地向敵人猛擊。

(五)每一天(如果是說一個城市，就可說每一小時)都必須力謀獲得卽令是小小的勝利，以便無論如何都維持『精神上的優勢』。

『歷史上最大的革命策略匠師唐通說過：勇敢、勇敢、再勇敢』，——馬克思用這幾句話總結了一切革命中關於武裝起義的教訓。

如果把這點應用到俄國，應用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那就是說：一定要同時既從外邊，又從內面，又從工人區，又從芬蘭方面，又從列維里，又從喀琅施塔得，儘可能迅速而出其不意地進攻彼得城，要用全部艦隊舉行進攻，要集中大大超過那擁有一萬五千至兩萬(也許更多)的我國[資產階級近衛軍](士官生)，我國[凡台軍隊](一部分哥薩克)等等的力量。

要把我們的三個主要力量——海軍，工人和軍隊這樣配合起來動作，使能一定佔領並不顧任何損失都要保持住：（一）電話局、（二）電報局、（三）各火車站、（四）尤其是各橋樑。

要挑選最堅決的份子（我們的「突擊隊員」和青年工人以及優秀水兵）來組成一些不大的隊伍，派他們去佔領一切最重要的地點，並參加各處所有一切重要的動作，例如：

包圍彼得城並截斷其與外部的交通，用海軍、工人和陸軍的配合攻擊把它佔領起來，——這就是要用藝術技巧和三倍勇敢精神來執行的任務。

要把最好的工人編成攜帶鎗枝炸彈的隊伍，派他們去進攻和包圍敵人底「中心機關」（各士官學校、電報局、電話局及其他等等），口號是：寧可全體犧牲，決不放走敵人。

我們希望當已決定實行起義時，各領導者定會卓著成效地運用唐通和馬克思底偉大遺訓。

俄國革命和全世界革命底成敗，都取決於這兩三天的鬥爭。

寫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舊曆八月）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二百五十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二四四至二四六頁

關於武裝起義的決議

中央委員會認為：俄國革命底國際環境（德國海軍中的起義，這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正在全歐洲增長底極端表現；其次，帝國主義世界以撲滅俄國革命為目的的威脅），軍事狀況（俄國資產階級和克倫斯基及其同流已經毫無疑義地決定把彼得城讓給德軍），無產階級黨已在蘇維埃中獲得多數的事實，——此外，更加上農民起義以及人民轉而信任我們黨（莫斯科的選舉），最後，第二次科爾尼洛夫叛亂顯然已在準備着（原有軍隊之調出彼得城，哥薩克軍隊之調入彼得城，哥薩克軍隊之包圍明斯克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把武裝起義提到日程上來了。

所以，中央委員會認為：武裝起義已經不可避免，而且起義時機業已完全成熟，茲特號召全黨一切組織以此為準繩，並根據這個觀點去討論和解決一切實際問題（北方特區蘇維埃代表大會，軍隊之調出彼得城、莫斯科人與明斯克人之發動等等）。

寫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刊載於
探照燈雜誌第二十（四十二）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
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二五五頁

告波爾什維克黨員書

同志們！我還沒有可能收到星期三，即十月十八日彼得城的報紙。當我從電話中聽到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非黨的新生活報上發表的聲明書全文時，我真不肯相信有這回事。可是，懷疑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得利用機會使這封信能在星期四晚上或星期五早上交給黨內同志，因為對於這樣空前未聞的工賊行為默視不言，便是犯罪。

實踐問題愈是嚴重，甘犯工賊行為的人愈是負責和「著名」，則這種行為就愈加危險，就應當愈加堅決地把這些工賊驅逐出去，則因這些工賊過去有什麼「功勞」而表現猶豫不決，就愈加不可饒恕。

你們只想想看！黨內知道，黨從九月起就討論着起義問題。誰也沒有聽說這兩個人中有誰寫過一封信或一張聲明書！現在，可以說是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前夜的時候，兩個著名的波爾什維克忽然發表言論反對大多數，並且當然是反對中央。這一點雖沒有公開說出，可是這對於事業的危害更大，因為用暗示口吻說出是更加危險的。

從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聲明書原文中可以十分明顯看出，

他們是反對中央，否則他們的聲明書便是沒有意思的，可是他們所反對的究竟是中央哪一個決議，却沒有說明。

爲什麼？

當然是因爲中央沒有把這個決議公佈。

由此得出什麼結論呢？

對於最重要的戰鬥問題，在十月二十日這個危急日子的前夜，兩個「著名的布爾什維克」竟在非黨的報紙上，而且正是在那關於本問題與資產階級攜手反對工人政黨的報紙上，攻擊黨中央沒有公佈的決議。

這豈不是比之普列漢諾夫於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所有在非黨刊物上發表的那些被黨極端嚴厲斥責過的言論更卑鄙幾千倍，更有害幾百萬倍嗎！那時所說的只是關於選舉的問題，而現在所說的，却是關於奪取政權的起義問題呵！

關於這樣的問題，在中央已經通過決議之後，竟在羅將科和克倫斯基輩面前，在非黨的報紙上來反對這個沒有公佈的決議案，——還能想到比這種行動更下賤的叛賣，更可恥的工賊行爲嗎？

我如果因過去曾和這兩個從前的同志接近而對責斥他們一事表現動搖，那我會認爲這是自己的恥辱。我直接說，我再不認爲他們兩個是同志了，我將以全力在中央面前，在代表大會面前力爭把他們兩人開除出黨。

因爲如果尚未公佈的中央決議，在其通過之後，竟容許在非黨的報紙上來反對，因而在戰士隊伍中造成動搖和混亂，那末，工人政黨便無力解決那實際生活所愈益頻繁向它提出的舉行起義這個困難任務。

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先生們去和幾十個張惶失措的人，或立憲會議的候選人組織自己的黨吧。工人是不會加入這樣的黨的，因為這個黨底第一個口號便會是：

『關於決戰問題在中央會議上遭了失敗的中央委員，儘可到非黨的報紙上去攻擊黨沒有公佈的決議。』

讓他們去給自己建立這樣的黨吧；我們布爾什維克工人黨只會因此獲益不淺的。

當將來把一切文件都公佈出來了的時候，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底工賊行爲就會暴露得更加明顯得多。暫時且讓工人去把下面這個問題思考一番：

『假設全俄職工會中央經過一個月的討論之後，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多數決定，要準備舉行罷工，可是關於罷工時間及其他任何消息暫不公佈。假設有兩個委員竟以顯係欺騙的所謂「特殊意見」爲藉口，在通過決議之後不僅寫信給各地方組織說要重新審查決議，而且竟擅自在非黨的報紙上發表自己的信。最後，假設他們自己又在非黨的報紙上攻擊這個決議——雖然這個決議還沒有公佈出來，——因而，把罷工事情在資本家面前告密。

試問工人對於把這樣的工賊開除出自己隊伍的事情是否會表現動搖呢？』



至於說到起義問題的情形，現在離十月二十日這樣近，我在這方無法判斷工賊們在非黨報紙上發表聲明書的行爲把事情損害到了何種程度。但毫無疑義，在實踐上的危害是非常之大的。要補救這件事情，首先就必須以開除工賊來恢復布爾什維克陣線

底一致。

我們愈是把反對起義的思想論據揭露出來，則這些論據的薄弱性就愈加顯明。我在日前寫了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送到工人之路報²⁸，如果編輯部不認為可能把它發表時，那末，想必黨內同志可以閱看這封信的原稿。

這些所謂「思想」論據可以歸結為兩點：第一，「等待」立憲會議。等等再說，也許等得到的，——這就是全部論據。管它飢荒、管它經濟破壞、管它兵士底耐心會消耗殆盡、管它羅將科把彼得城讓給德國人的步驟、管它關廠抵制，也許會等得到的。

也許、也許，這就是全部論據底力量。

第二，大喊大叫的悲觀主義。在資產階級和克倫斯基那裏一切都好，我們這裏一切都不好。資本家那裏一切都準備得好極了，工人這裏一切都不好。軍事方面的「悲觀主義者」喊破喉嚨，「樂觀主義者」却只好默不作聲。因為在羅將科和克倫斯基面前說出一些什麼來，恐怕除了工賊外，未必會有人覺得愜意的。



困難的時刻，嚴重的任務。嚴重的叛變。

但任務還是會得到解決的，工人會團結起來的，農民起義和前綫兵士迫不及待的情緒定會發生作用的！更緊密地把隊伍團結起來吧，——無產階級定會獲得勝利！

寫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舊曆十八日）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二百五十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五七年版，第三卷，第二七七至二八〇頁

致中央委員書

同志們！

二十四日晚上我寫這幾行字時，局勢已經危急萬分。已是十二分明顯的了；現在，遲延起義就真正是等於自尋死路。

我竭盡全力來說服同志們，現在一切正如千鈞一髮，當前的問題決不能由會議或代表大會（甚至蘇維埃代表大會也好）來解決，而只能由人民、由羣衆、由武裝羣衆底鬥爭來解決。

科爾尼洛夫輩所實行的資產階級進攻，維爾合夫斯基之撤職²⁹，都證明不能再等待了。無論如何，必須在今天晚上或今天夜間解除士官生等等的武裝（如果他們抵抗，就戰勝之），把政府當局逮捕起來。

不能等待了！！等待就會失掉一切！！

立刻奪取政權的價值就是：保護人民（不是代表大會，而是人民，首先就是軍隊和農民）免受科爾尼洛夫政府之蹂躪，這個政府把維爾合夫斯基趕走並擬定了第二次科爾尼洛夫叛亂陰謀。

誰應當取得政權呢？

這在現時是不重要的：就讓革命軍事委員會³⁰或另一機關³¹取得政權吧，只要這個機關聲明，它只把政權交給真正代表人民

利益、軍隊利益（立刻提議和平）、農民利益（立刻奪取土地，廢除土地私有制）、飢民利益的人。

必須立刻把各區、各團，一切力量都動員起來，並馬上派代表團到革命軍事委員會去，到波爾什維克中央去堅決要求：無論如何，不管怎樣都不要讓克倫斯基及其伙伴們掌握政權到二十五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間解決一切。

歷史不會饒恕那些遲延從事的革命者，他們本來可以在今天獲得勝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勝利），却延到明天去冒犯喪失許多，喪失一切的危險。

我們今天奪取政權，並不是奪取它來與蘇維埃對立，而是爲了交給蘇維埃。

奪取政權乃是武裝起義的事情；它的政治目的，在奪取了之後就會闡明出來的。

等待十月二十五日動搖不定的投票表決，便是自取滅亡或形式主義；關於這種問題，人民有權而且必須不用投票，而用強力來解決；在革命危急的關頭，人民有權，而且應該指揮自己的代表，甚至自己最好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們。

這是一切革命底歷史所證明了的，而如果革命者明知挽救革命，提議和平，挽救彼得城，防止飢荒，把土地轉交農民的事業都唯他們是賴，却放過時機，那末這些革命者便是犯了滔天的罪惡。

政府正在動搖中。無論如何都必須把它完全推翻！

遲延發動，就等於自尋死路。

寫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六日（舊曆十月二十四日）

一九二五年發表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二九一至二九二頁

國家與革命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
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

初版序言

國家問題，現時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實際政治方面，都獲得了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戰爭非常加速並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國家與擁有莫大勢力的資本家組合日益密切地溶合起來，它所加在勞動羣衆身上的駭人聽聞的壓迫，就愈益駭人聽聞了。各先進國——我們在這裏是指它們的「後方」而言——已變成囚禁工人的軍事苦役牢獄。

遷延不止的戰爭所造成的空前慘象與災難，使羣衆底生活狀況困苦得無可忍受，使羣衆的義憤加強起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顯然在生長着。它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已獲得實際的意義了。

在幾十年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中所積累起來的機會主義成份，造成了在全世界上各正式社會主義黨內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思潮。這個思潮（在俄國有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科夫斯卡婭、路班諾維契以及稍帶掩飾色彩的策烈鐵里先生，切爾諾夫先生及其同流；在德國有謝德曼、列金、達維德等等；在法國和比利時有倫諾德爾、黑得、王德威爾得；在英國有

漢德曼和費邊派等等。)口頭上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沙文主義，其特點就在於這些「社會主義」的「領袖們」，不僅對於「自己」民族資產階級底利益，而且正是對於「自己」國家的利益，表示卑鄙奴僕式的迎合態度，因為大多數所謂偉大列強是早已剝削着，奴役着很多的弱小民族。而帝國主義戰爭恰恰就是爲了分割和重分這種贓物的戰爭。若不與關於「國家」的機會主義偏見作鬥爭，則使勞動羣衆從一般資產階級影響下，特別是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鬥爭，便無法進行。

首先，我們且來考察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而對於這個學說被遺忘了的或遭受了機會主義曲解的諸方面，加以特別詳細的論述。其次，我們將特別分析從事於這種曲解的主要代表，即在這次戰爭時期中陷於極端可憐破產的第二國際（一八九九至一九一四年）最著名的首領考茨基。最後，我們給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特別是一九一七年革命底經驗作一主要的總結。後而這次革命，現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初）大概正在完結其發展底第一個階段，可是一般講來，整個這次革命，祇能認爲是由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鍊條中的一個環節。於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就不僅獲得了實際政治意義，而且有了最迫切的意義，因為這個問題是關於要向羣衆說明，爲着使自己從資本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應當在最近將來做些什麼事情的問題。

作者 一九一七年八月

再版序言

本書再版時幾乎沒有改變。僅在第二章中增加了第三節。

作者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莫斯科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一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學說在現今的遭遇，正和各被壓迫階級解放鬥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底學說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的遭遇一樣。當偉大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用不斷的追究來酬答他們，總是以最野蠻的惡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中傷來對待其學說。當他們逝世以後，便企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說是把他們偶像化，給他們的名字賦予某種榮譽，以便「安慰」並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閹割革命學說底內容，磨滅其革命鋒芒，而使之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這樣「修琢」馬克思主義的事情上正趨於一致了。他們把這學說底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加以割裂、曲解和遺忘，而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覺得可以接受的東西，提在第一位，加以頌揚。現在，所有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都成了「馬克思主義者」，「不要藐視他們呀！德國資產階級的學者，這些昨天還是摧殘馬克思主義的專家，甚至日益頻繁地說着什麼「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彷彿這個馬克思造就了極有組織的工人協會是爲了進行劫掠戰爭哩！

在這樣的情形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空前流行的時候，

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馬克思關於國家的真正學說。爲了這點，我們就須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著作中拿出許多很長的引證來。自然，冗長的引證，對於行文上不免笨重，且難於通俗；但是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論及國家問題一切句段，或至少是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句段，必須儘可能完備地摘引出來，使讀者自己能夠獨立地領會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底全部見解，以及這些見解底發展，同時又使現時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於這些見解的曲解，得以真憑實據地證明出來和一目瞭然地指明出來。

我們現在先從傳播最廣的恩格斯著作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底起源一書講起，這書於一八九四年已在斯多德牙爾印行第六版了。我們必須從德文原本中譯出引句，因為該書俄文譯本雖多，但其中多半譯得不完全，或者是譯得極不好。

「國家——恩格斯在總結他那歷史的分析時說道，——絕不是從外面強迫加給社會的一個力量。國家也並不是如黑格爾所斷定的什麼「道德觀念底現實」或「理性底外形和現實」。國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社會陷入自身不可解決的矛盾中並分裂爲不可調和的對立方面而又無力擺脫這種對立情勢的表現。爲了使這些對立方面，這些彼此經濟利益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互相消滅而使社會同歸於盡，於是一種表面上似乎駕於社會之上而用以緩和衝突，使這些衝突不致超出「秩序」範圍以外的力量，就成爲必需的了。這個由社會當中產生出來，但使自己駕於社會之上，而日益與社會脫離的力量，便是國家」（德文第六版，第一七七至一七八頁）。

這一段話已經把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歷史作用及其意義的基本思想，十分明確地表達出來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凡是階級矛盾在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限度內便產生國家。倒轉來說：國家之存在，就證明階級矛盾之不可調和。

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恰巧就是在這個最重要的和根本的問題上開始，而按兩個主要方面進行着。

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雖迫於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而不得不承認僅僅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地方才有國家，但他們却來「改正」馬克思，說國家是調和階級底機關。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則國家就會既不能發生，也不能支持下去。而按市儈的和庸俗的大學教授與政論家們——他們往往好意地援引馬克思底言論哩！——看來，國家却正是調和階級的。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這樣一種「秩序」，既把這種壓迫法定和鞏固起來，同時又緩和階級衝突。按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底意見，秩序正是階級底調和而不是這一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壓迫；彷彿緩和衝突乃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以推翻壓迫者的一定的鬥爭工具和鬥爭手段。

比方所有一切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當關於國家底意義和作用的問題恰巧成了非常嚴重，成了在實踐上立刻行動，而且是廣大規模行動的問題時，他們都一下完全落到由「國家」來「調和」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理論方面去了。所有這兩個黨底無數決議及其政治家們底許多論文，都完全被這個市儈的庸俗的「調和」論所浸透。至於國家是一定階級底統治

機關，而這個階級決不能和它的對立方（和它的對抗階級）調和，這一點却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始終不能瞭解的。在對國家的態度上，也再明顯不過地表明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我們波爾什維克向來就這樣說），而是唱着貌似社會主義的空調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義」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更巧妙得多了。「在理論上」，它既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又不否認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是，它忽視了或抹煞了下述一點：如果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如果它是駕於社會之上而「日益與社會脫離」的力量，那末很明顯的，被壓迫階級底解放，不僅非有強力革命不可，並且非消滅統治階級之所建立，而在其中體現了這種「脫離」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這個在理論上不言而喻的結論，如我們在下面所可看見的，就是馬克思根據對革命任務之具體歷史分析而絕對肯定地作出的結論。而正是這個結論竟被考茨基——這點我們在下文中要來詳盡指明——所「遺忘了」和曲解了。

二．特別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國家與舊的氏族組織不同的第一個特徵——恩格斯繼續說，——就是它按地域標準來區分其管治下的人民」…這樣的區分法，現在我們看來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但它是與按宗族或氏族為標準的舊組織作過長期鬥爭才獲得的。

…「第二個特徵，就是社會權力底建立，這個權力已經和那自行組織為一個武裝力量的居民不直接符合了。這個特別的社會權力之所以必需，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成階級後，

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爲不可能的了……這個社會權力是在每一個國家裏都存在着。構成這個權力的，不僅有武裝隊伍，而且還有實體的附屬物，如監獄以及其他種種強迫機關，這些東西是氏族社會制度中所沒有過的」…

恩格斯在這裏闡明那稱之爲國家的「力量」，即由社會中產生出來，而使自己駕於社會之上且日益與社會脫離的力量底概念。這個力量底主要點何在呢？就在於那些支配有監獄等等的特別武裝隊伍。

我們完全有權說這是特別的武裝隊伍，因爲任何國家所特有的社會權力是與武裝居民，與其「自動的武裝組織」，「不直接符合」的。

恩格斯如同所有一切偉大革命思想家一樣，他盡力使覺悟工人注意的，正是那種普遍流行的庸俗觀念認作是最不值得注意的，最習慣了的，而爲那些不僅牢固並且可說是頑梗不化的偏見所奉若神聖的東西。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權力底主要工具，但是——難道可以不這樣麼？

在十九世紀末葉絕大多數歐洲人看來，——而恩格斯底話就是向他們講的，他們沒有經歷過，沒有眼見過一次大革命，——這是不能不這樣的。他們完全不知道什麼是「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對於何以需要駕於社會之上而使自己與社會脫離的特別武裝隊伍（警察、常備軍等）這個問題，西歐的和俄國的庸人一味從斯賓塞或米海洛夫斯基³⁰那裏借用三言兩語，藉口說什麼社會生活複雜化，什麼職能分化等等，來作答覆。

這樣的藉口似乎是「合乎科學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和蒙蔽主要的基本事實，即社會分裂爲不可調和的敵對階級的事實。

如果沒有這個分裂，則『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與那些使用木棍的猿猴羣，或原始人類，或聯合在宗族社會的人們底原始組織比較起來，祇是程度上複雜得多，技術上高越得多，但這樣的組織總會是可能的。

這樣的組織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文明社會已分裂成爲彼此敵對，且敵對得不可調和的階級，而如果這些階級各有其「自動的」武裝，那它們便會彼此武裝鬥爭起來。於是就有國家形成起來，就有特別的力量，特別的武裝隊伍成立起來，而每次革命破壞國家機關時，都明白表現給我們看，統治階級如何力圖恢復那替它服役的特別的武裝隊伍，被壓迫階級又如何力圖創造這類的新組織，即能於不替剝削者服役而替被剝削者服役的組織。

恩格斯在上述議論中從理論上提出的問題，即是每次大革命都在實際方面明顯地而且以廣大行動規模提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正是「特別」武裝隊伍與『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之間的互相關係問題。我們往下就會看見這個問題怎樣由歐洲歷次革命和俄國幾次革命底經驗所具體表現出來。

但我們且回頭來看看恩格斯底敘述吧。

他指出，有時候，譬如在北美某些地方，這個社會權力是薄弱的（這裏所講的祇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罕見的例外以及北美在帝國主義前期自由移民佔多數的那些地方），但一般說來，這個權力是在加強着：

…『社會權力是隨着國內階級矛盾尖銳化以及鄰近國家增大與人口增多的程度而加強起來。例如拿現今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裏，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已把社會權力激增到勢將吞食全社會甚至全國家這樣的高度』…

這一段文字至遲是在前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寫的。恩格斯最後的序言標明爲一八九一年六月十六日。當時，進到帝國主義的轉變——無論就托拉斯底完全統治來說，無論就最大銀行底專權現象來說，無論就大規模的殖民地政策等等來說——在法蘭西還剛才開始，而在北美和德意志兩國，甚至還更薄弱些。從那時起，「侵略競爭」已有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因爲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地球已被這些「互相競爭的侵略者」，就是說，被這些巨大的強盜國家所瓜分完結了。從此海陸軍備已無限增長，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由於英德兩國互爭世界統治權，由於瓜分贓物而進行的強盜戰爭，使社會一切力量都被強盜國家政權「吞食」到已接近於完全崩潰的地步。

恩格斯還在一八九一年就己能指出「侵略競爭」是各大強國對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徵之一，而社會沙文主義的惡棍們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當正是這個競爭已經加劇許多倍並產生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却用「保護祖國」，「保衛共和國與革命」等等的辭藻，來遮掩他們保護「自家」資產階級底強盜利益的行爲！

三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爲要維持駕於社會之上的特別的社會權力，就需要賦稅和國債。

…「官吏既掌握着社會權力和徵稅權，——恩格斯說，——他們就成爲駕於社會之上的社會機關。從前人們對於氏族社會各機關的那種自由自願的敬意，對官吏們說來已經是不夠的了。——就假定他們能夠獲得這種敬意的話」…於是

製定出一些關於官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特別法律。『一個區區不足道的小警察』都擁有大過於氏族代表的「權戒」，可是甚至文明國底軍權首領，一見氏族首長享有的那種『不是用威迫手段獲得的社會敬意』時，都得發生羨慕的心理。

這裏提出了官吏之為國家政權機關的特權地位問題。指出了基本的要點：什麼東西使他們能夠駕於社會之上呢？我們在下面就會看到這個理論問題在一八七一年如何由巴黎公社實際地解決過，而在一九一二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動地抹煞過。

…『既然國家是由於必須控制階級對立性而產生出來的，既然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衝突本身中產生出來的，那末，按通例講來，它就是那個最強有力的，在經濟上佔統治的階級底國家，這個階級藉助於國家，就成為在政治上也佔統治的階級，並由此獲得鎮壓並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 不僅古代的國家和封建的國家是對於奴隸和農奴的剝削機關，而且『現代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工具。不過也常遇到一些例外的時期，那時彼此鬥爭的階級達到這樣勢均力敵的狀態，使國家政權暫時得到對於這兩個階級的相當獨立性，成為彷彿是這兩個階級之間的中介人』… 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獨裁君主制，法國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底拿破崙主義，德國底俾斯麥時代，就是如此。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共和制俄國的克倫斯基政府，在已轉而壓迫革命無產階級以後，當蘇維埃因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導已經軟弱無力，而資產階級又還沒有充分力量來直接解散蘇維埃的時候，就是如此。

在民主共和國內，——恩格斯繼續說，——『財富運用

自己的權力，是間接的，但因此是更可靠的，」——第一，就是用『直接收買官吏』的方法（美國）；第二，就是用『政府與交易所聯盟』的方法（法國與美國）。

現今帝國主義和銀行統治，甚至在任何最民主的共和國內，都已把這兩種維護並實施財富專權的方法「發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舉例來說，既然在俄羅斯民主共和國頭幾個月中，也可以說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這兩種「社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聯姻的「蜜月」期間，帕里琴斯基先生在聯合政府中對於一切制裁資本家和制止其掠奪行為，制止其藉供給軍需品來盜竊國庫的種種辦法，都實行怠工，既然帕里琴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後（自然用另一個完全與帕里琴斯基同樣的人來代替了他），就被資本家「獎賞了」年薪十二萬盧布的位置，——那末，試問這是什麼？是直接的收買呢，還是不直接的收買呢？是政府同新迪加聯盟呢，還「僅僅」是一種友誼關係呢？切爾諾夫輩與策烈鐵里輩、亞甫克森鐵夫輩與斯科別列夫輩究竟起着什麼作用？他們是那些劫掠國庫的百萬富翁底「直接」同盟者呢，還僅僅是間接的同盟者呢？

「財富」專權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其所以更可靠些，是因為它不依賴資本主義之不良的政治外殼。民主共和制度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經過帕里琴斯基輩、切爾諾夫輩、策烈鐵里輩等等）這個最好的外殼之後，就能如此可靠地，如此牢固地來確立自己的權力，致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內無論何種人員、機關或政黨之更換，都不足以動搖這個權力。

還要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稱普選制為資產階級統治底工

具。他顯然是估計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底長期經驗，所以說道，普選制是：

『工人階級成熟底標誌。在現今國家中，普選制是不能而且始終不會給出更多東西的。』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像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及其同胞兄弟——西歐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一樣，都正是希望從普選制中得到『更多的東西』。他們自己懷着一種妄想，並且要人民相信這種妄想，以為普選制『在現今的國家裏』真正能夠表現大多數勞動者底意志並保障這一意志底實現。

我們在這裏只能指出這個妄想；只能指出，恩格斯這十分明確而具體的聲明，在「正式的」（即機會主義的）社會黨底宣傳和鼓動中，是隨時隨地都遭到曲解。至於恩格斯在這裏所駁斥的這個妄想起全部虛偽性，則我們以後在繼續敘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現今」國家的見解時，還會加以詳細揭破的。

恩格斯在他那部最通俗的著作中，把自己的見解總結如下：

『由此可知，國家不是自古就有的。曾經有過不必需要國家，而且根本就不知「國家」和「國家政權」爲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爲各階級時，國家就因這種分裂而成爲必要的了。在我們現時正迅速走近之生產發展底更高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復必要，而且還成爲對於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將不可避免地歸於消逝，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出來一樣。階級一經消逝，則國家也會不可避免地歸於消逝。以生產者自由平等聯合爲基礎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會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那時是它所應到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陳列館裏去，

而與紡紗車和青銅斧一並陳列起來。」

這一段引文，在現代社會民主派底宣傳鼓動作品中，很少遇見。而且就即令遇見有這段引文時，也多半是彷彿崇拜偶像才把它引用來的，就是說，是爲了向恩格斯正式表示敬意，而絲毫也不企圖思考一下，所謂「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古物陳列館裏去」，這意思是說，該預先要有何等廣闊而深刻的革命。他們甚至往往不懂得恩格斯所稱爲國家機器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四 國家「消亡」和強力革命

恩格斯關於國家「消亡」一語，負有這樣廣大的盛名，被人引證得這樣頻繁，又這樣明顯地指明機會主義偽造馬克思主義的流行把戲底本質所在，遂使我們必須對此作一番詳細考察。現在我們且把從中引出這語句的那段言論全部轉錄如下：

「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首先就把生產資料變爲國有財產。但這樣一來，它就消滅它自己之爲無產階級，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一切階級區別和階級對立，而同時也就消滅國家之爲國家。在階級對立中進展而至今存在着的社會，必需有國家，即必需有當時剝削階級底這個機關，以便維持其生產底外部條件，就是說，特別是用強力把被剝削階級箝制在當時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奴隸制、農奴制、僱傭勞動制）之內。國家曾是整個社會底正式代表，是社會集中爲有形的團體；但是國家之所以成爲這樣，祇是因爲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底國家：在古代，它是具有國家公民資格的奴隸主底國家；在中世紀時代，它是封建貴族底國家；而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它是資產階級底國家。

當國家終究真正成爲全社會底代表時，它就會自行成爲贅物了。當任何一個必須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已不復存在時，當一個階級對於另一個階級的統治以及根源於現代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單獨生存競爭已不復存在，而由此產生的衝突和過火情事也一併消失時，那時就會沒有什麼必須加以鎮壓了，而用以實行鎮壓的特別力量，即國家，也就會再不需要了。國家將來以全社會真正代表資格所作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名義佔有生產資料的行動，同時也就是它以國家資格所作的最後一次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涉，將由一部門又一部門地成爲贅舉而自行泯沒下去。那時，對於人的管理便會由對於物的管理和對於生產過程的指導所替代。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我們應當以此爲根據來估量關於「自由人民國家」的語句，這個語句在鼓動的意義上是可以暫時存在，但歸根到底說來，它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我也應當以此爲根據來估量所謂無政府主義者關於要在二十四小時內廢除國家的要求』（反杜林，杜林先生推翻科學的舉動，德文第三版，第三〇二至三〇三頁）。

可以大胆地說，從恩格斯這一段思想極其豐富的議論中，在各現代社會黨內成爲社會主義思想底真正遺產的，僅僅是馬克思認爲國家「消亡」而與無政府主義「廢除」國家的學說不同的這一點。這樣來截斷馬克思主義，就無異於把馬克思主義化爲機會主義，因爲在這樣的「解釋」之下，就僅僅留下一種模糊的觀念，以爲只有慢慢的、平坦的、逐漸的變化，而沒有突變和風暴，沒有革命。對於國家「消亡」之流傳的、普遍風行的、大衆

的——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瞭解，無疑是蒙蔽革命，甚至可以說是否認革命。

但是，這樣的「解釋」是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最粗暴的，只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曲解，這種曲解在理論上是由於把我們已在上面完全引來的恩格斯「總結」議論中也指出了的最重要情節和理由都遺忘了。

第一，恩格斯在那段議論中一開始就說，無產階級既取得國家政權，『這樣一來，就消滅國家之為國家。』至於這是什麼意思，那却是「照例」用不着思索的。通常不是完全忽略這點，便是認為這是恩格斯底「黑格爾主義的」「僻性」。其實，在這幾句話當中，把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之一底經驗，即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簡明地表示出來了，關於這點，我們以下將另闢一章來更詳細地論述。其實，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底國家，而他關於「消亡」的語句，則是指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無產階級國家底殘餘而言。據恩格斯底意思，資產階級的國家不是「自行消亡」，而是要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來把它「消滅」。在這個革命以後，自行消亡的則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或半國家了。

第二，國家是『特別的鎮壓力量』，恩格斯這個絕妙而極其深刻的定義，他在這裏已說得十分明顯了。而從這個定義中所得到的結論，就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少數豪富對千百萬勞動者所施行的『特別鎮壓力量』，應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所施行的『特別鎮壓力量』（無產階級專政）來替代。『消滅國家之為國家』，也就在於此。以社會名義來取得生產資料的「行動」，也就在於此。而且不言而喻的，這樣以另一個（無產階級的）「特

別力量」來代替這一個（資產階級的）「特別力量」的更換，絕對不能按「自行消亡」形式來實現。

第三，恩格斯說到「消亡」一語和甚至說得更鮮明更光彩些的「泯沒」一語時，他完全明白而肯定地說是指「國家以全社會名義來取得生產資料」以後，即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時代而言。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時「國家」底政治形式是最完滿的民主制。但是那些無恥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者，沒有一個人想到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也就是關於民主制底「泯沒」和「消亡」。驟然看來，這似乎是很奇怪。但是祇有那些對於民主制也是國家，因之當國家消逝時民主制也就消逝這點不曾思索到的人，才會覺得這是「不可瞭解」。資產階級的國家，是祇有革命才能夠把它「消滅」。而作為最完滿民主制的國家，是只能「自行消亡」的。

第四，恩格斯提出他說「國家自行消亡」的這個著名原理後，他立刻就具體地加以解釋，說這個原理是既反對機會主義者，又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而且恩格斯把他從「國家消亡」這個原理中所得出的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放在第一位。

可以担保地說，在讀過或聽過關於國家「消亡」言論的每一萬人當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記得，恩格斯不僅是把他從這個原理中得出的結論，用去反對無政府主義者而已。而在其餘的十個人當中，大概有九個人不懂得何謂「自由人民國家」以及為什麼攻擊這個口號就是攻擊機會主義者，歷史就是這樣寫法的！偉大的革命學說就是這樣被人暗中假造為普遍流行的庸人主義的！反對無政府主義的結論，被人重述了千百次，被人庸俗化了，被人簡單化地打進頭腦中去，成為頑固的成見了。而

關於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却被人蒙蔽了，被人「遺忘了」！

『自由人民國家』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底綱領要求和流行口號。在這個口號中，除了對於民主制概念的市儈浮誇的描寫而外，是別無半點政治內容的。既然人們當時是爲了合法而用這個口號來暗示民主共和國，所以恩格斯會同意從鼓動觀點上來「暫時」「辯護」這個口號。但這個口號是機會主義性的，因爲它不僅表現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粉飾，而且表現不瞭解社會主義觀對一般國家的批評。我們擁護民主共和制度，作爲在資本主義下對於無產階級最有利的國家形式，但是我們決不可忘記，即使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民衆底命運仍然是僱傭奴隸制。再則，任何國家都是對於被壓迫階級的「特別的鎮壓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是非自由的，非人民的。在七十年代的時侯，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把這一點向他們黨內的同志們解釋過。

第五，在恩格斯這本含有大家都記得他關於國家消亡議論的著作中，還有關於強力革命底意義的議論。恩格斯對這種革命作用底歷史估計也就變成了對強力革命的真正頌揚。這是『誰都不記得』的，關於這個思想底意義在各現代社會黨內是照例不談，甚至照例不想，而在羣衆中的日常宣傳鼓動中，這些思想簡直不起任何作用。其實這些思想是同國家「消亡」論密切聯系而成爲一個嚴密的整體。

請看恩格斯底這個議論吧：

…『至於強力在歷史上還起着另一種作用』（除作惡而外），『即革命的作用；至於照馬克思底話，當一個舊社會孕育着新社會的時候，強力就是這個舊社會底接生婆；至於強力是社會運動所藉以開闢自己道路和破壞殭死硬化了的政

治形式的手段，——關於所有這一切，杜林先生都一字也沒有提及。他僅僅在歎息和呻吟聲中勉強地承認，爲了推翻剝削制的經濟，強力也許是必要的——這是他覺得很可惋惜的咧！——因爲據他說，任何應用強力的行爲都會使應用強力的人敗壞德性呵！雖然在每次勝利的革命以後都有過高度的道德上和思想上的進展，但他終究說出這種話來了！加之這種話又是在德國說的，在德國須知民衆可能被迫進行強力衝突，這至少會有如下的益處：可以拔除那因三十年戰爭的恥辱而浸入民族意識中的一種奴僕精神。而這種黯淡的、萎靡的、軟弱無力的僧侶思維，竟敢自薦給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最革命的政黨麼？』（德文第三版第一九三頁，第二編第四章末段）。

怎樣才可以把恩格斯從一八七八至一八九四年，即直至他逝世時爲止，堅決貢獻給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這種對於強力革命的頌揚，來與國家「消亡」論結合爲一個學說呢？

人們往往用折衷主義，用無原則的或詭辯的方法任意（或爲了討好於當權者起見）抽出其中這個或那個議論來把它們結合起來。而且在一百次當中有九十九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話——都正是把國家「消亡」論提在第一位。以折衷主義來代替辯證法，——這就是現今社會民主黨人在其論馬克思主義的正式作品中最通常和最普遍的現象。這樣一種替代，自然是不新奇的，甚至在希臘古典哲學史上也是常見的事。當把馬克思主義偽造爲機會主義時，把折衷主義偽造爲辯證法是最易於欺騙羣衆的，能夠給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它顧到了過程底各方面，發展底一切趨勢，一切矛盾影響等等，而其實則不給予任何對於社會發展過程

的完整的革命的見解。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強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學說，是對於資產階級國家而言，這是我們已經在上面說過，而在以後的敘述中還要更詳細說明的。資產階級國家之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所替代，是不能經過『自行消亡』來實現，而按通例是只能經過強力革命來實現。恩格斯對於強力革命的頌揚，完全同馬克思屢次的聲明相符合（我們要記得，在哲學底貧困與共產黨宣言這兩部著作的結尾一段中，曾傲然公開聲言強力革命之必不可免；我們要記得，約在三十年以後，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著的哥達綱領批評³¹一書中曾毫不留情地攻擊這個綱領底機會主義性）——這種頌揚，絕不是「執迷」，絕不是豪語，也不是論戰伎倆。必須有系統地教育羣衆來這樣估計，而且只是這樣估計強力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底基礎。現在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的思潮對於馬恩學說的背叛，其特徵就在於所有這兩種思潮都把這種宣傳和這種鼓動遺忘了。

由無產階級國家來替代資產階級國家，除非有強力革命是不行的。無產階級國家底消滅，即國家底澈底消滅，則只能經過『自行消亡』而實現。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個別革命形勢時，分析每一個別革命底經驗教訓時，都詳細而具體地發揮了他們所持的這些見解。而我們現在就正要說到他們學說中這個顯然是最重要的部份。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一 革命底前夜

已經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底最初著作——哲學底貧困與共產黨宣言，恰巧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夜作成的。由於這種情況，所以在這兩部著作中，除了敘述馬克思主義一般基礎而外，還有在相當程度內對於當時具體革命形勢的反映，因此我們來考察考察這兩位作者在尚未做出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經驗結論之前他們關於國家的言論，也許是較為適當一些。

…『工人階級在發展進程中——馬克思在哲學底貧困中寫道，——將創造一個摺除階級和階級對抗的社會，以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從此已不會再有任何原來意義的政權，因為政權正是資產階級社會內階級對抗底正式表現』（一八八五年德文版，第一八二頁）。

拿這個關於國家隨階級消滅而消滅的思想之一般概述，來和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幾個月後，即在一八四七年十一月所著的共產黨宣言中的敘述對照一下，確是很有意義。

…『在描述無產階級發展底最一般的階段時，我們探究了現存社會內部多少隱藏着的內戰；直至這個內戰轉變為公開的革命，那時無產階級用強力推翻資產階級，來建立自己的統治』…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變（直譯：提昇）無產階級為統治階級，奪得民主制』。

『無產階級運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奪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於國家手裏；集中於已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儘量迅速地增加全部生產力』（一九〇六年德文第七版，第三一頁和第三七頁）。這裏我們看見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最精彩最重要的思想

之一，即「無產階級專政」（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後開始說的那樣）的思想，其次還有一個極有趣味的國家定義，這個定義也是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人遺忘了的話」。「國家，即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這個關於國家的定義，在各正式社會民主黨普遍流行的宣傳鼓動作品中，不僅從來沒有加以解釋過，而且恰巧是被遺忘了，因爲它是與改良主義絕不相容，它是當面打擊那些說什麼「民主制底和平發展」的通常的機會主義偏見和市儉幻想的。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一切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都這樣重覆着，硬說馬克思底學說就是如此，却「忘記」補充說，按照馬克思底意見，第一，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即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第二，勞動者所需要的「國家」是「即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國家是特別的權力組織，是爲了用以鎮壓某一階級的強力底組織。究竟無產階級所要鎮壓的是哪一階級呢？當然只是剝削階級，即資產階級。勞動者之所以需要國家，僅僅是爲着鎮壓剝削者底反抗，而能領導這個鎮壓的，能實現這個鎮壓的，却只有無產階級，因爲無產階級是唯一澈底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把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聯合起來進行反資產階級爭鬥，將資產階級完全剷除的階級。

剝削階級所以需要政治統治，是爲着維持剝削制，即是爲着極少數人底私利而反對絕大多數人民。被剝削階級所以需要政治統治，是爲着完全消滅一切剝削，即是爲着絕大多數人民底利益而反對極少數的現代奴隸主，即地主和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這些以階級妥協的夢想來代替階級鬥爭的假社會主義者，其對於社會主義改革的見解也是夢想的，他們不是把這個改革想像為推翻剝削階級底統治，而是想像為由少數來和平服從那已經瞭解本身任務的多數。這種小資產階級空想是和承認國家超階級性的觀點有不可分離的聯系，而在實踐上就走到叛賣勞動階級利益，舉例說，這是已由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與一八七一年革命底歷史所表明，這是已由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社會主義者」在英、法、意以及其他各國參加資產階級內閣的經驗所表明了。

馬克思曾畢生奮鬥來反對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即現時在俄國由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所復活了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他把階級鬥爭的學說一貫引伸為論政權，論國家的學說。

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無產階級這一特別階級才能做到，因為它所生存的經濟條件訓練它去進行這種推翻，給它以實現這種推翻的可能和力量。資產階級分散和拆散農民及一切小資產階級階層，同時却團結着、統一着、組織着無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由於它在大生產中的經濟作用——才能夠成為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底領袖，這些羣衆受着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往往比無產階級所受的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他們却不能為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獨立的鬥爭。

馬克思所運用到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的階級鬥爭學說，必然要歸結於承認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無產階級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享而直接憑藉羣衆武裝力量的政權。為要實現推倒資產階級，就只有使無產階級變為統治階級，變為能夠鎮壓資產階級所必然進行的拚命反抗，並能夠組織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來

建設新經濟制度的這樣的統治階級，才能夠做到。

無產階級必需有國家政權，集中的權力組織、強力組織，既用以鎮壓剝削者底反抗，又用以領導極廣大民衆——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黨，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並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並組織新制度，使它在一切被剝削勞動者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事業中，能做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底導師，領導者和領袖。反之，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却把工人黨教育成爲一些脫離羣衆而代表那班工資較優的工人們利益的代表，只圖在資本主義下「營謀」苟安生活，爲着一飯之惠竟賣去自己的嫡長權，即放棄領導人民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領袖作用。

『國家，即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馬克思這個理論，和他關於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學說，有不可分離的聯系。這個作用底完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

但是，既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作爲反對資產階級的特別的強力組織，那末由此就會自然得出如下的結論：不預先消滅，不預先破壞資產階級給自己設立的國家儀器，則創造這樣的無產階級組織是否可能呢？共產黨宣言曾接近到這個結論，而馬克思在總結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底經驗時，就說出了這個結論。

二 革命底總結

關於我們現在所講的國家問題，馬克思在他著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中，把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總結如下：

…『然而革命是澈底的。它還經歷着苦難的考驗。它在有條有理地執行着自己的事業。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第三舉行政變的日子）『以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預備工作底頭一半，現時它正在完成這個工作底另一半。它首先使國會權力臻於完備，以便得到推翻這個權力的可能。現在，當它已達到這地步時，它就來使行政權力臻於完備，使之表現出最純粹的形式，使之孤立，使之成爲與它自己對立的唯一的對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這個行政權力』（着重點是我們加的）。『而當革命完成其準備工作底這後半的時候，歐洲就會站起來歡呼說：老田鼠，你掘得好呀！』

『這個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組織和軍事組織，有極複雜的人爲的國家機器，有五十萬官吏隊伍加上五十萬大軍，——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氣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君主專制時代，正當封建制度崩潰時期產生的，而且這個寄生機體是加速了這種崩潰過程。』第一次法國革命發展了集中制，『但同時又擴大了政府權力底容量，機關和行政人員數目。拿破崙完成了這個國家機器』，合法帝制和七月帝制『除了更大的分工外，沒有增添絲毫新的東西』…

…『最後，國會制的共和國在其反對革命的鬥爭中，除採用高壓手段而外，竟不得不加強政府權力底工具和集中。迄今所有一切政變都祇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起來而不是把它毀壞』（着重點是我們加的）。『那些爭奪統治權而相繼更替的政黨，都把這個龐大國家建築物底奪得，視爲自己勝

利時主要的勝利品』(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九〇七年漢堡出版的德文第四版，第九八至九九頁)。

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段精彩議論裏，較之在共產黨宣言中，有了莫大的進步。在那裏，關於國家問題還提得極為抽象，還是表現於最普泛的概念和語句中。在這裏，問題已經提得具體了，而且做出了格外確切、肯定、實際而具體的結論說：過去一切革命祇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起來，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毀壞的。

這個結論乃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點。而正是這個基本點，不僅被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正式社會民主黨所完全遺忘，並且被第二國際最著名的理論家考茨基所公然曲解了(這點我們往下就要說到)。

在共產黨宣言中作了一般的歷史總結，使人們認識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而且得到一個必然的結論：無產階級如果不先得政權，不取得政治統治，不把國家變為『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它就不能推翻資產階級；並且這個無產階級國家在它勝利以後就會立即開始消亡，因為在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裏，國家既不需要，並且是不會有的。這裏還沒有提出究竟應當(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上來看)怎樣以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的問題。

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提出來且加以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馬克思既忠實於他自己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就拿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偉大年代底歷史經驗來做基礎。馬克思底學說就在這裏也像其他任何時候一樣，是由深刻哲學的宇宙觀和豐富的歷史知識所闡明的經驗總結。

國家問題提得很具體：資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統治所必需的國家機器，在歷史上是怎樣產生的呢？在各次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和在各被壓迫階級獨立行動面前，國家機器如何變遷，如何演進呢？無產階級對於這個國家機器的任務怎樣呢？

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集中的國家政權，產生於君主獨裁政體崩壞時代。最表現這個國家機器特徵的有兩種機關，即官吏和常備軍。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中，屢次說到這兩種機關恰恰與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每個工人底經驗都把這種聯系證明得格外明顯和特別動人。工人階級由於切身所受的苦痛領略到這種聯系的意味，——正因為如此，所以工人階級這樣容易懂得並且這樣牢固地領會到這種聯系不可避免的教訓，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則不是昏聩地和輕浮地否認這個教訓，便是更輕浮地「一般地」承認它，却不願做出相當的實際結論來。

官吏和常備軍——這是資產階級社會軀體上的「寄生蟲」，是那些腐蝕着這個社會的內部矛盾所產生的寄生蟲，然而正是「塞住」生命氣孔的寄生蟲。現時在正式社會民主黨內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機會主義，認為那視國家為寄生機體的見解，是無政府主義所專有的屬性。這樣曲解馬克思主義，對於那些把社會主義玷辱到這種地步竟將「保護祖國」概念應用於帝國主義戰爭中，藉此擁護並粉飾這個戰爭的市儈們，當然是很有益處的，然而這終究是絕對的曲解。

這個官吏的和軍事的機關經過歐洲從封建制度崩潰時起所發生的多次資產階級革命而發展、完備和鞏固起來。須得指出，小資產階級被吸引到大資產階級方面去並受其支配，大半就是經過這個機關來實現的，因為這個機關給予農民、小手工業者、商人

等等底上層份子以比較舒適、安靜和尊榮的位置，使這些位置底佔有者駕於人民之上。試看一看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以後半年中所發生的情形吧：以前首先委任黑幫份子充當的官吏職位，現在成為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贓物了。他們實際上並沒有想到任何認真的改良，却力圖把這些改良遷延「到立憲會議的時候」，而對立憲會議的召集則又慢慢遷延到戰爭結束時再說！但是對於瓜分贓物，佔據各部總長、次長、督撫等等肥缺，却没有延期，沒有等待任何立憲會議！配置政府要職的把戲，其實不過是全國上下在一切中央與地方管理機關中瓜分並重分「贓物」勾當底表現而已。從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十七日這半年中的總結，客觀的總結，毫無疑義的是：各種改良辦法是延期了，官吏位置是分配過了，分配方面的「錯誤」也由幾次的重新分配來改正了。

但在各資產階級黨和小資產階級黨間（如以俄國為例，就是在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間）「重分」官吏機關的事實愈多，則各被壓迫階級，首先是領導它們的無產階級，就會愈加認清自己與整個資產階級社會不可調和的敵對性。因此，一切資產階級黨——甚至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黨也包括在內——就必須加強高壓手段來反對革命無產階級，鞏固高壓機關，即仍是鞏固那個國家機器。這樣的事變進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去反對國家政權，迫使革命抱定任務不是改良這個國家機器，而是要把它破壞，把它消滅。

這樣提出任務，並不是由於邏輯的推論，而是由於實在的事變發展，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新穎經驗。馬克思該如何嚴格地依據歷史實際經驗，這點我們可從以下事實中看出來：他在—

八五二年還沒有具體提出用什麼東西去代替那必須消滅的國家機器的問題。當時，經驗還沒有給予提出這個問題的材料，只到後來，在一八七一年，歷史才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去。在一八五二年，根據如自然歷史觀察這樣的確切性所能指出的，還只有下述一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已接近到要「集中自己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國家政權的任務，即「毀壞」國家機器的任務。

這裏可以發生一個問題：把馬克思底經驗、觀察和結論作為公理，把它們移用到比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這三年間的法國歷史更大的範圍上去，是否正確呢？爲了分析這個問題，我們先把恩格斯底一段話回憶一下，然後再來研究實際材料。

…「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恩格斯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第三版序言裏說，——其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階級搏戰，每一次都比其他各國達到更加澈底的結局。這種階級搏戰所以在以進展及其結果所藉以表現出來的那種變易更替的政治形式，也在法國表現得最鮮明。在中世紀時代，法國是封建制度底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起，它是一個純粹等級帝制底模範國，當大革命時候，法國粉碎了封建制度而創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它所具有的典型式的明顯性，實爲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不及。而抬起頭來的無產階級反對那佔有統治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這裏所表現的尖銳形式，也是其他各國所未見過的」（一九〇七年版第四頁）。

最後一句話已經陳舊了，因爲自從一八七一年起，法國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發生了停頓，但這個停頓，無論如何長久，絲毫也不是說，在行將到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法國不可能表現爲階級鬥爭達到決然結局的模範。

我們且把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各先進國底歷史拿來作一個概括的觀察吧。我們可以看見比這要遲緩些、複雜些，舞台更廣闊得多，但總還是同樣的過程：一方面無論在共和制的國家（法國、美國、瑞士），或在君主制的國家（如英國，在相當程度上的德國、意大利以及斯堪的那維亞半島諸國等等），都形成着「國會權力」；另一方面，瓜分和重分官吏位置「贓物」的各資產階級黨和小資產階級黨，為搶奪政權而鬥爭，而資產階級制度底基礎却始終不變，——最後，「行政權力」，其官吏機關和軍事機關，又臻於完備和鞏固。

毫無疑義，這是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全部最新進化中的共同特徵。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這三年內，法國用迅速的、尖銳的、綜合的形式來表明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所固有的那種發展過程。

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時代，銀行資本時代，巨大資本主義壟斷組織時代，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無論在君主制的國家裏或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國家裏，由於對無產階級的高壓之加厲，「國家機器」都異常加強起來，官吏軍事機關都空前增長起來。

現在，全世界歷史，無疑是在較一八五二年更廣大得無比的範圍內，把無產階級革命底「一切力量集中起來」去「破壞」國家機器。

至於無產階級將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個國家機器，——關於這一點，巴黎公社給了最可注意的材料。

三 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對本問題的提法

一九〇七年，梅林格把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馬克思至衛登麥

爾的信摘要登載於新時代雜誌上（第二十五卷，第二期，第一六四頁）。在這封信裏有如下一段精彩的議論：

【至於講到我呢，那末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彼此鬥爭，這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早已敘述過階級鬥爭底歷史發展，而資產階級底經濟學家則早已作過各階級底經濟解剖。我所作出的新工作就在於證明下列幾點：（一）階級底存在僅僅是與生產發展過程所固有的一定歷史發展階段（historische Entwicklungsphasen der Produktion）相聯繫着的；（二）階級鬥爭必然要引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進到根本消滅階級，進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這一段話裏，馬克思極鮮明地說明兩點：第一，是他的學說和資產階級最先進最深刻的思想家底學說之間的主要根本區別；第二，是他的國家學說底實質。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點，是階級鬥爭。人們時常這樣說着，這樣寫着。但這是不正確的。而根據這個不正確的見解。往往就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機會主義的曲解，把馬克思主義偽造為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東西。因為階級鬥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所創造的，而且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誰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是有沒有離開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策範圍的人。以階級鬥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便是割裂馬克思主義，曲解馬克思主義，使它成為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東西。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

於此。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試驗對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瞭解和承認。無怪乎當歐洲底歷史在實踐上把工人階級引到本問題的時候，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一切「考茨基主義者」（動搖於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之間的人們），都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考茨基所著無產階級專政那小冊子，是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即在我著的這本書第一版刊行了很久以後出版的，他這本小冊子是按市儈觀點曲解馬克思主義，在口頭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在實際上則卑鄙地背棄它的一個標本例子（參閱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彼得格拉和莫斯科出版）。

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為主要代表的現代機會主義，完全站在馬克思用上述言論所品評過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因為這個機會主義也是把承認階級鬥爭的範圍局限於資產階級關係領域內。（而在這個領域以內，在這個領域範圍內，無論哪一個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在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的！）。機會主義恰巧不把承認階級鬥爭引伸到最主要之點，引伸到由資本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引伸到推翻資產階級以及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在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底國家也就必然是新式的民主國家，即供無產者和一般窮人享受的民主國家，必然是新式的專政國家，即為反對資產階級而施行的專政國家。

其次，必須瞭解，一個階級底專政不僅為一般階級社會所必需，不僅為已推翻了資產階級的那個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無階級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

代所必需，——只有瞭解了這一點的人，才算是領會了馬克思關於國家學說底實質。各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非常繁雜，但它們的本質是同一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很多的和很繁雜的政治形式，但在本質上却是不免是同一的：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七一年巴黎

公社底經驗。馬克思底分析

一 公社社員這次嘗試底英勇精神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以前幾個月，一八七〇年秋，馬克思曾經警告巴黎工人，硬說企圖推翻政府就會是絕望的蠢舉。但是，當一八七一年三月，人們強迫工人決戰，而工人已出身應戰時，當起義已成為事實時，馬克思就不管當時有種種惡兆，而終以極愉悅的心情來歡迎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並不以迂腐態度來非難「不合時宜的」運動，如臭名昭彰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叛徒普列漢諾夫那樣，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寫了一些鼓勵農奮鬥的文字，而到了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以後，却按自由主義精神大叫什麼「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

然而，馬克思不僅僅因公社社員們顯出如他所說的「衝天」的英勇精神而表示歡愉。雖然這次羣衆革命運動沒有達到目的，可是他在其中看見有極重大意義的歷史經驗，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

中的一個相當進步，是比較幾百個綱領和議論尤為重要的實際步驟。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據這個經驗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就是馬克思自己所抱定的任務。

馬克思認為對於共產黨宣言必須做的唯一的「修改」，就是由他根據巴黎公社社員底革命經驗而作出的。

在共產黨宣言德文新版上由兩位作者簽名的最後一篇序言，是於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寫成的。在這篇序言中，兩位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共產黨宣言底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陳舊了」。

…『特別是——他們繼續說，——巴黎公社證明了：
「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握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段引文中放在單括號內的語句，是由兩位作者從馬克思所著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借用來的。

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巴黎公社底一個基本主要教訓有如此重大的意義，竟把它作為對於共產黨宣言的一個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恰巧就是這個重要的修改被機會主義者曲解了，而這個修改底意思是共產黨宣言底讀者們，即使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大概也有十分之九的讀者們所不知道的。關於這個曲解，我們將在下面專論曲解的那一章內詳細說及。現在只須指出，對於我們上面所摘引的馬克思那句名言之流行的庸俗「見解」，就在於認為似乎馬克思在這裏是着重指出緩慢發展底觀念以與奪取政權的觀點等等對立。

而其實却恰巧相反。馬克思底意思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

毀壞『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是以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爲限。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卽正值巴黎公社時，馬克思寫給庫格曼說：

…『如果你讀到我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最後一章，那你就會看見，我認爲法國革命下一次的嘗試，不應如迄今以前一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毀壞』（着重點是馬克思所加；在原文上有zerbrechen一字），『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底嘗試恰巧就是如此』（見新時代雜誌，第二十卷（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第一期，第七〇九頁）。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俄文至少有兩種版本，其中有一種是由我校訂並由我作序的）。

在『毀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這幾個字中，已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對國家的任務問題的主要教訓，簡明表示出來了。而正是這個教訓，不僅已被現時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中所完全遺忘，而且簡直被他曲解了！

至於馬克思從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中引出的語句，我們已在上邊完全摘引出來了。

在馬克思上述那段議論中，有兩點是值得特別指出的。第一，他以大陸來局限自己的結論。這在一八七一年時是很明白的，那時英國還是純粹資本主義國家底模範，而沒有軍閥機關，並且在頗大程度內還沒有官僚制度。因此馬克思就把英國除外，當時在英國，革命，甚至於人民革命，曾想像不必有破壞『現成的國家機器』這一個預備條件，且是確有可能的。

現今，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這個例外已經失去時效。英國和美國，本來是盎格羅撒克遜「自由制」——在沒有軍閥機關和官僚制度的這個意義上說——在全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後的代表，現在它們兩者已經完全落入一般歐洲式的，號令一切，壓制一切的官僚軍閥機關底污濁血腥泥潭中了。現時，無論在英國或美國，『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就是打碎和毀壞「現成的」（已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在這裏造成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地步的）「國家機器」。

第二，馬克思所說破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是『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這個非常深刻的意見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從馬克思口中說出「人民」革命這一概念來，這似乎是很奇怪，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份子和孟什維克，這些司徒盧威信徒，這些想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人，也許會把馬克思這句話宣佈為「失言」。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曲解成非常鄙陋的自由主義思想，以為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對立以外，再沒有什麼別的東西；而且他們對於這種對立的見解也是極端死板的。

如果列舉二十世紀幾個革命做例子，那末無論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當然都得承認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可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為民衆，最大多數人民，無論在前者或在後者當中都沒有顯熱積極地，獨立地起來為着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而奮鬥。反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在其中未曾有過像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有時得到過的那般「燦爛的」成功，但它毫無疑義是一個「真正人民的」革命，因為民衆，大多數人民，呻吟於壓迫和剝削之

下的社會最「下層」的人，都曾獨立奮起，用自己的要求，用自己的嘗試，即按自己方式來建設新社會以代替那正被破壞着的舊社會的嘗試，影響了革命底整個行程。

在一八七一年的歐洲大陸上，無論在哪一國內，無產階級都還沒有成爲人民大多數。把真正大多數人民吸引到運動中來的「人民」革命，當時祇有將無產階級和農民兩者都包括在內，才能成爲這樣的革命。在當時正是這兩個階級組成爲「人民」。這兩個階級因爲同受「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所壓迫、摧殘和剝削而聯合起來。打碎這個機器，毀壞這個機器——這就是「人民」，大多數人民，即工人和大多數農民底真正利益，這就是貧農和無產者自由聯盟底「預備條件」，而沒有這個聯盟，則民主制就不穩固，社會主義改造就不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爲自己開闢過實現這個聯盟的道路，但由於許多內外原因而沒有達到目的。

所以，在說到「真正人民的革命」時，馬克思絲毫也沒有忘却小資產階級底特點（關於這些特點，他是說得很多而且時常說過的），而極嚴格地估計到了一八七一年在歐洲大陸上多數國家中各階級間的實在對比關係。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打碎」國家機器，既是工人利益，也是農民利益所要求的，這個共同要求把他們聯合起來，在他們面前提出一個關於剷除「寄生蟲」而用某個新東西來代替它的共同任務。

究竟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它呢？

二 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已被打碎了的國家機器呢？

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

還是十分抽象的，正確些說，還只指示出任務，而沒有指示出其解決的方法。以『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以『奪得民主制』來代替，——這就是共產黨宣言底回答。

關於這個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底組織究竟會採取哪種具體形式，這個組織究竟會如何與最完備和最澈底『奪得民主制』這點相吻合，——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既不願意陷於空想，就期待由羣衆運動的經驗作出答案來。

馬克思在其法蘭西內戰一書中曾把公社底經驗——不管它是怎樣少——加以最仔細的分析。我們且把該書最重要的幾段摘錄出來：

在十九世紀時，從中世紀發端的『集中的國家政權及其無孔不入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僧侶、法官等級』，都發展起來了。隨着勞資間階級對抗底發展，『國家政權愈益帶有用以壓迫勞動的社會權力底性質，帶有階級統治機器底性質。在每次表明是階級鬥爭相當進步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底純粹壓迫性質，總是日益公開顯露出來』。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就成爲『資本用以進行反勞動戰爭的全國武器』。第二帝國把這種情形鞏固了。

『公社是與帝國絕對相反的』。『它是這樣一種共和國制底一定形式』，『其任務不僅要消滅階級統治底帝制形式，而且要消滅階級統治本身』…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共和國底這個「一定」形式，究竟是什麼呢？公社所會開始創立的國家究竟怎樣呢？

…『公社所頒佈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武裝的人民』…

這個要求是現時一切想自稱為社會主義的政黨底綱領中都寫着的。但是，它們的綱領究有什麼價值，這是從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行爲中看得最明顯的，他們在事實上恰巧是在二月二十七日革命以後拒絕實現這個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按普選制選舉出來的城市代表所組成。這些代表是負責的並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自然是工人或已公認為工人階級代表的人」…

…「向來都是國家政府工具的警察，立刻就被革除其一切政治職能，而變為公社底負責的，並隨時可以撤換的機關…其他一切行政部門底官吏，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所有一切公務人員，都只應領得等於工人工資的薪水。上等國家官吏所享有的特權以及辦公費，都隨着這些官吏本身之消除而消除了…把舊政府物質權力底武器——常備軍和警察——廢除以後，公社立刻就着手來毀壞那精神壓迫底工具，即僧侶底勢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上的獨立性…他們今後應由公開選舉，而成為負責並隨時可以撤換的」…

由此可見，公社用來代替那已被打碎之國家機器的，似乎「僅僅」是更完備的民主制：取消常備軍，施行一切公務人員完全選舉和撤換制。但在事實上，這個「僅僅」却是表明以一種在原則上不同的機關來代替另一種機關的偉大的更替。這裏恰巧看見「數變為質」底實例之一：民主制一經實現到一般所能想像的那樣最完全最澈底的程度，它便由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制，由國家（即用以壓迫某一階級的特別力量）變為一種已非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東西。

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這對於公社曾是特別必要，而公社所以失敗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它沒有充分堅決地來這樣作。但是這裏，實行鎮壓的機關，已是居民大多數，而不是少數，如像向來無論在奴隸制下，無論在農奴制下，亦無論在僱傭奴隸制下所有的情形那樣。而既然是由人民大多數自己去鎮壓自己的那些壓迫者，那末專供鎮壓的「特別力量」已經不需要了！在這個意義上，國家就開始消亡。人民大多數能不要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底特殊機關（特權官吏，常備軍底長官），由自己來直接執行這些事情，而國家政權職能底執行本身愈是全民化，則這個國家政權底需要也就愈見減少。

在這方面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馬克思着重指出過的公社所採取的辦法：取消支給官吏的一切辦公費和一切金錢上的特權，把國家一切公務人員底薪薪水減低到等於「工人工資」的水準。在這裏恰巧是明顯地表現出如下的轉變：從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從壓迫者的民主制變為被壓迫階級底民主制，從用以鎮壓某一個階級的「特別力量」的國家，變為由人民大多數——工人和農民——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而馬克思底教訓中被人遺忘得最厲害的，正是這特別明顯的一點——在國家問題上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在通俗的解釋中——這樣的解釋不可勝數——是不說這一點的。對於這一點，正像對於已經過時的「幼稚行爲」一樣，「照例」是不講的，好像基督教徒得到國教地位時，便「遺忘了」原始基督教之帶有革命民主精神的「幼稚行爲」一樣。

減低國家高級官吏底薪俸，似乎「不過」是幼稚原始民主主義底要求。最新的機會主義底「創始者」之一，以前的社會民主

黨人伯恩施坦，曾屢次演習鄙陋的資產階級嘲笑「原始」民主主義的伎倆。他也如一切機會主義者那樣，也如現在的考茨基主義者那樣，完全不懂得：第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如不在某種程度內「回返」到「原始」民主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不然，試問怎可進到使國家職能由大多數居民和全體居民來執行呢？）；第二，以資本主義成果和資本主義文化為基礎的「原始民主主義」，是與原始時代或資本主義前期時代的原始民主主義不一樣的。資本主義的文化創立了大規模的生產、工廠、鐵路、郵政、電話等等，而在這個基礎上，舊「國家政權」底絕大多數職能，已如此簡單化，已可化為這樣一種簡單到極點的登記、填表、檢查的手續，以至每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執行這些職能，以至只要給以通常「工人工資」就足可執行這些職能，可以（而且應當）把這些職能中的任何特權性的「長官制」影子都取消掉。

一切公務人員毫無例外地實行完全選舉和隨時可以撤換，將其薪水降低到通常「工人工資」的水準，——這些簡單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辦法，足可把工人和大多數農民底利益結合起來，同時就會成為由資本主義過到社會主義的橋樑。這些辦法是關係於社會底國家改造，即純粹政治的改造，但這些辦法當然祇有與正在實行的或正在準備實行的「剝奪剝奪者」的步驟聯繫起來，即祇有與生產資料底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社會公有制的過渡聯繫起來，才能顯出其全部意思和意義。

『公社——馬克思寫道，——實現了一切資產階級革命關於「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為它消滅了兩項最大的費用，即軍隊和官吏。』

農民也同小資產階級其他階層一樣，他們當中只有很少數人能「高昇」，能「出頭」——在資產階級意義上說，——即是變成富人，變成資產者，或升為生活有保證而享有特權的官吏。在凡有農民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而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佔大多數的），絕對大多數的農民是受政府壓迫，是渴望推翻這個政府，渴望「廉價」政府。能夠實現這一點的，只有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既實現這一點，同時就是向着按社會主義方式改造國家這方面前進一步。

三 國會制底消滅

『公社——馬克思寫道，——應當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團體』…

…『這裏，普選權不是爲了每三年或六年一次解決統治階級中什麼人應在國會裏充當人民的代表者和壓迫者（*ver- und zertreten*），而是應當服務於組織在公社裏的人民，正好似個人選舉權服務於任何其他僱主來爲自己企業尋找工人、監工、會計員一樣』。

這個在一八七一年對國會制所作的精彩批評，現在由於社會沙文主義和機會主義底統治，也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人遺忘了的話』。現在以總長和議員爲職業的人們，無產階級底叛徒和『專講實利的』社會主義者，把對國會制的批評，完全讓給無政府主義者去作，且根據這個十足加二的正當理由來把任何對國會制的批評都宣佈爲『無政府主義』！所以毫不足怪的，就是在「先進的」國會制的國家中，無產階級一看見謝德曼、達維德、列金、桑巴、倫諾德爾、亨德孫、士德威爾得、斯道寧格、布蘭

亭、比沙拉底等等一流「社會主義者」，便起一種厭惡的心理，而日益同情於無政府工團主義，不管這無政府工團主義是機會主義底同胞兄弟。

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把革命辯證法看作爲時髦的空談，漂亮的辭藻，如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等人所慣作的那樣。馬克思善於無情摒棄無政府主義，因爲無政府主義不會利用資產階級國會制底「豬欄」，特別是在顯然沒有革命形勢的時候，但同時，馬克思又善於對國會制給以一種真正革命無產階級的批評。

每數年一次解決統治階級中什麼人應當在國會中鎮壓並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國會制底真正本質，不僅在國會制的君主立憲國內是這樣，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這樣。

但是，如果提出國家問題，如果把國會看作是國家底機關之一，那末，從無產階級在這方面的任務底觀點來看，擺脫國會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樣才可以不要國會制呢？

又得再三反覆地說：馬克思從研究公社中得出的教訓，竟被現代的「社會民主黨人」（請讀作：現代的社會主義叛徒）遺忘得一絲不留，以至他們除了對於國會制的無政府主義批評或反動批評而外，簡直不懂得任何其他的批評。

擺脫國會制的出路，當然不在於取消代表機關和廢除選舉制，而是在於把代表機關由清談館變爲「工作的」機關。『公社應當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團體。』

『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工作的』機關，這真是打中了現代的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員和國會「哈叭狗」們底要害！請看任何一個國會制的國家，由美國至瑞士、由法國至英國、挪威等等，那裏真正的「國家」工作是在後台辦理，是由閣部、官廳、參謀部執

行的。在國會裏，僅僅專爲愚弄「老百姓」而從事空談。這真是真情實理，甚至在俄羅斯共和國，在這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在它還未來得及建立真正的國會以前，國會制底所有這些弊病就已立刻發生作用了。腐敗市儈中的英雄們，如斯科別列夫和策烈鐵里輩，切爾諾夫和亞甫克森鐵夫輩，竟有本領把蘇維埃也按最卑劣的資產階級國會主義方式弄污了，將其變成爲清談館了。「社會主義的」總長先生們在蘇維埃裏，用種種清談和決議來愚弄那些輕信的農夫。在政府內面，實行不斷的更換角色，一方面爲的要依次安插儘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來「飽嘗」優厚尊榮的肥缺，另一方面爲的要「轉移」人民底「視線」。而「國家」工作則在官廳和參謀部中「作」着！

當權的「社會革命」黨底機關報人民事業，不久以前在一篇編輯社論中——用「大家」都以政治賣淫爲業的「好社會」中人底絕頂直爽口吻——自供說，甚至在屬於「社會主義者」（恕我用這個名詞！）的閣部中，全體官吏實際上仍然是舊的，它同從前一樣行使職權，十分「自由的」對那些革命創舉實行怠工！而且即使沒有這個自供，難道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參加政府的實際歷史不也是證明了這點麼？這裏值得注意的，只是這些在內閣官場中與立憲民主黨人並列的切爾諾夫輩、路薩諾夫輩、孫齊諾夫輩以及人民事業報其他諸編輯先生們，竟喪盡廉恥，公然毫不害羞，毫不赧顏地當衆宣佈說，——儼如談閒一樣，——在「他們的」閣部中一切照舊！！革命民主的辭句是用來欺騙一般鄉下愚民的，而官僚辦公廳裏的耽擱延宕則是博得資本家底「歡心」，——這就是「誠實的」聯合政府底實質。

在公社用以代替資本主義社會那貪污腐敗的國會制的機關

中，論斷和討論底自由是不會墮落為騙局，因為議員們應當親自來工作，親自來執行自己通過的法律，親自來檢查在實際生活中所得的結果，親自來直接對選舉者負責。代表機關仍然存在着，可是作為一種特殊系統，作為立法和行政底分工，以及議員們享有特權地位的國會制，在這裏是沒有了的。如果沒有代表機關，則我們就不能想像出什麼民主制，甚至連無產階級民主制也無從設想；但是，如果我們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的批評不是空言，如果推倒資產階級統治的志願，是我們鄭重的真誠的志願，而不是為騙取工人選票的「競選」辭句，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如謝德曼和列金輩，桑巴和王德威爾得一流人所幹的那樣，則我們就可以而且應當不要國會制。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馬克思講到既為公社，又為無產階級民主制所需要的那個官吏機體底職能時，他拿「其他任何僱主」所僱用的人員來與之比擬，即拿那僱用「工人、監工和會計員」的普通資本主義企業來與之比擬。

馬克思是連絲毫空想主義痕跡也沒有的，就是說，他並沒有虛構和幻想一個「新」社會。反之，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從前者轉到後者的過渡形式，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來研究。他拿無產階級羣衆運動和事實經驗作根據，而努力從這經驗中取得實踐的教訓。他向公社「學習」，正同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壓迫階級底偉大運動經驗學習一樣，從來不向這些運動講過一句迂儒的「訓言」（如像普列漢諾夫說：「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或如策烈鐵里說：「階級應當自己約束自己」）。

要一舉而把官吏機構到處澈底消滅，這是談不上的。這是空想。但是一舉而把舊的官吏機器打碎，而立刻開始建設一個新的

機器，以便可以逐漸使任何官吏機構化爲烏有——這却不是空想，而是公社底經驗，而是革命無產階級底直接當前任務。

資本主義把「國家」管理底職能簡單化了，給我們以拋棄「長官制」的可能，而把全部事情都歸結爲無產者（以統治階級資格）用全社會名義來僱用「工人、監工、會計員」的組織。

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決不「夢想」立刻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制，不要任何從屬關係，這些由於不瞭解無產階級專政任務而發生的無政府主義夢想，是根本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而事實上祇會把社會主義革命延遲下去，一直延遲到人們變成另外一種人時爲止。我們不是這樣，我們是想由現在的人們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現在的人們，沒有從屬關係，沒有監督，沒有「監工和會計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從，是服從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底武裝先鋒隊——無產階級。國家官吏底特別「長官制」可以並且應當立刻在二十四小時內就用「監工和會計員」底簡單職能來代替，這些職能現在已經是一般市民底知識水平所足可勝任，並且只給予「工人工資」就完全可以執行。

我們工人自己從資本主義所已造成的成果爲基礎來組織大規模的生產，倚靠自己工人的經驗，創立最嚴格的鐵的紀律，而用武裝工人底國家政權來維持它，把國家官吏底作用歸結爲不過是執行我們委託的人員，歸結爲必須是負責的，可以撤換的，而且是領取平常薪水的「監工和會計員」（自然要用所有各色各樣和各種程度的技術專家），——這就是我們的無產階級任務，這就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實現時可以而且應當從此開始的起點。這個開始，在大規模生產基礎上自然會使任何官吏機構逐漸「消亡」，

使這沒有括弧的，不像僱傭奴隸制的新秩序逐漸創立起來，在這一秩序下，日益簡單化的監督和報告職能，將由大家來輪流執行，然後將成為習慣，最後，便將不復成其為特殊階層底特殊職能。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有一個聰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曾稱郵政為社會主義經濟底模型。這是很對的。現在，郵政是按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底式樣組織起來的經濟。帝國主義逐漸把所有一切托拉斯都變為這種式樣的組織。這裏站在那些工作苦重而忍飢受餓的「簡單」勞動者頭上的，也同樣的是資產階級的官僚。但是，社會管理底機體，在這裏已經預備好了。祇須推翻資本家，用武裝工人底鐵手去粉碎這些剝削者底反抗，毀壞現代國家底官僚機器，——那時，我們就有一個去掉了「寄生蟲」而擁有高度技術設備的機體，這個機體完全可以由已經團結起的工人們自己動用起來，僱用一些技師、監工和會計員，而付給他們全體以等於工人工資的薪水，亦如付給全體「國家」官吏一樣。這就是對待所有一切托拉斯之具體、實際而且立即可以實現的任務，這個任務既使勞動者免除剝削，並估計到那已由公社實際開始了的（特別是在國家建設方面的）經驗。

把全部國民經濟組織得如像郵政一樣，使技師、監工、會計員以及所有一切職員都領取不超過「工人工資」的薪水，使其受武裝無產階級的監督和領導，——這就是我們最近的目的。這樣的國家，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的國家，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樣才能消滅國會制而保留着代表機關，這樣才能使各勞動階級免除資產階級對於這些機關的糟蹋。

四 民族統一底組織

…『公社在它來不及詳細去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簡要大綱上，十分肯定地說：公社應當成爲甚至一個最小村落底政治形式』…而巴黎「國民代表機關」也是會由各公社選舉出來的。

…『那時還會留歸中央政府的爲數不多而意義重大的一些職能，則不應該廢除——硬說應當廢除，這是故意僞造，——而應轉交給公社的官吏，即嚴格負責的官吏』…

…『民族底統一不應消滅，反而應當用公社制度組織起來。民族底統一應當成爲現實，其方法就是消滅那以這個統一底體現者自居，但同時却想離民族而獨立，且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其實，這個國家政權只是民族身體上的寄生贅瘤而已』…『任務是在於剷除舊政權底粹純壓迫機關，而其合理的職能，則要從這窺視着駕於社會之上的政權方面奪取過來，交給社會底負責公僕』。

現代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之不瞭解——也許可以更正確些說：不願意瞭解——馬克思這些議論，該到了何種程度，這點在叛徒伯恩施坦所著遺臭萬年的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與社會民主黨底任務一書上，表明得再清楚不過了。正是論到馬克思上述一段話時，伯恩施坦寫道：這個綱領『就其政治內容說來，在所有一切重要點上都十分類似蒲魯東主張的聯邦制…不管馬克思和「小資產者」蒲魯東（伯恩施坦把「小資產者」幾字放在括弧內，想必他是用以表示諷刺的意思）之間有其他種種分歧，可是在這幾點上，他們兩人底思維進程是萬分接近的」。自然，——

伯恩施坦接着又說，——市政局底意義在增長着，但是『我覺得成問題的，是民主制之第一個任務未必就是如此消散（Auflösung——直譯是：解放、融解）現代國家，如此完全變更（Umwandlung——變革）其組織，如像馬克思和蒲魯東所設想的那樣：由各省或各省區會議選出代表組織全國會議，而各省或各省區會議本身則又由各公社選出代表組織之，——這樣一來，全國代表機關底舊形式就會完全消失』（伯恩施坦：先決條件，一八九九年德文版，第一三四和第一三六頁）。

把馬克思對於『消滅國家政權這寄生蟲』的觀點拿來和蒲魯東底聯邦制混為一談，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事！但這不是偶然的，因為機會主義者連想也想不到馬克思在這裏所說的，根本不是要以聯邦制來和集中制對立，而是要打碎現存於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裏的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機會主義者所能想到的，只是他在自己周圍，在市僧庸人之流中和「改良主義」沈滯環境所看見的東西，即只是「市政局」！至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則機會主義者連想都不會去想了。

這是很可笑的。但也很值得注意的，就是關於這一點竟沒有人和伯恩施坦爭論過。許多人都曾駁斥伯恩施坦，——特別是在俄國著作界中有普列漢諾夫，在西歐著作界中有考茨基，但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沒有說到伯恩施坦這一對馬克思的曲解。

機會主義者之不會用革命頭腦思索問題，不會思考革命，真是到了極點，竟把「聯邦制」加到馬克思身上，把他和無政府主義底開山祖蒲魯東混為一談。而想做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想捍衛革命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却對此不置一辭！這就是考茨基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所固有的對於馬克思主義

和無政府主義的不同點所持之最庸俗見解底根源之一，關於這個庸俗見解，我們以後還要說到。

在馬克思上述那段論公社經驗的議論裏，是連一點聯邦制的影子也沒有的。馬克思和蒲魯東的相同處，恰巧是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所看不見的；而馬克思和蒲魯東不同之處，却恰巧是伯恩施坦所認為相同的。

馬克思和蒲魯東相同之處，就在於他們兩人都主張「打碎」現代國家機器。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和蒲魯東或巴枯寧）這一相同之處，是無論機會主義者或考茨基派都不願意看見的，因為他們在這一點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和蒲魯東或巴枯寧不同之處，恰巧就在聯邦制問題上（更不待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了）。聯邦制在原則上是從無政府主義底小資產階級觀點中產生出來的。馬克思是主張集中制者。在他上述那段議論中，絲毫也沒有離開集中制。只有那些對國家充滿市儈「迷信」的人們，才能把消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認作是消滅集中制！

而如果無產階級和貧農把國家政權拿到他們自己手裏，完全自由地組織在各地公社內，將一切公社底行動統一起來打擊資本，打破資本家底反抗，把鐵路、工廠、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財產轉交全民族、全社會，難道這不是集中制麼？難道這不是最徹底的民主集中制麼？並且不就是無產階級的集中制麼？

伯恩施坦連想都想不到可能有自願的集中制，可能由各公社自願結合而為一個民族，可能由各無產者公社自願溶合起來從事於破壞資產階級統治和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伯恩施坦，也如任何一個庸人那樣，以為集中制只是一種自上的，只能由官吏和軍閥

強迫實行並維持着的東西。

馬克思好像預知他的這些見解會有人曲解一樣，遂故意着重地說，如果非難公社要消滅民族統一並取消中央政權，那就是有意偽造。他故意使用「組織民族統一」一語，以便把覺悟的、民主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拿來與資產階級的、軍閥的、官吏的集中制對立。

但是…不願意聽說話的人，是比任何聾子都要聾些。而現代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者就正是^{不願聽說要消滅國家政權，不願聽說要消滅這個寄生蟲咧。}

五 寄生蟲式的國家之消滅

我們已經引用過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言論，現在還應當補引幾段。

…「新的歷史創舉底通常命運，——馬克思寫道，——就是人們把它當作是抄襲舊的，甚至是早已過時的社會生活形式，因為新的機關多少有些與之相似。於是這毀壞（*brich*，——打碎）現代國家政權的新公社，也就被人看作是中世紀公社底復活…看作是許多小國家底聯盟（孟德斯鳩、基朗特派）…看作是那反對過分集中制的舊鬥爭底放大形式」…

…「公社制度定會把那些寄生於社會而阻滯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所吞噬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即此一端也就會把法國底復興與向前推進了」…

…「公社制度定會使鄉村生產者，受每一省區內各主要城市底精神上的領導，並使他們能在那裏獲得城市工人作為其自身利益底天然代表。而公社本身底存在又自然帶來地方

自治，但這種自治已經不是用來對抗現時已在成爲贅物的國家政權了』…

「消滅」那是「寄生贅瘤」的「國家政權」，「剷除」它，「破壞」它，『國家政權現時成爲贅物了』，——這就是馬克思在估量和分析公社經驗時用來評論國家的說法。

所有這些，都是在將近半世紀以前所寫的，而現在却只得將其發掘出來，使廣大羣衆能夠認識未被曲解過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根據他對所經歷過的最後一次大革命的觀察中作出的結論，恰巧是在新的無產階級大革命時機已經到臨的時候，被人們遺忘了。

…『公社所引起的解釋之繁多，及其所表現的利益之複雜，證明了公社是一個極靈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舊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壓迫者的。公社底真正祕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底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反對佔有者階級之鬥爭底結果，是終究發現了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沒有最後這個條件，則公社制度就會沒有實現的可能，而且是一個騙局』…

空想主義者曾從事於「發現」各種使社會能在其中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政治形式。無政府主義者則根本擺手不談任何政治形式問題。現代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者認爲資產階級的國會制的民主國家政治形式，是不可超越的極限；他們在這個「模範」面前祈禱到碰破頭額的地步，並且把任何想毀壞這些政治形式的意向都稱之爲無政府主義。

馬克思從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底全部歷史中得出結論說，國

家是一定會消逝的，而國家消逝底過渡形式（從國家到非國家的過渡），將是『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但馬克思並沒有敢於去發現這個未來底政治形式。他只限於確切考察法國歷史，加以分析而作出按一八五一年事變所應作的結論：情形正歸結到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而當無產階級底羣衆革命運動業已爆發的時候，馬克思就不管這個運動遭到挫折，不管這個運動爲期很短且顯然軟弱無力，而終於開始來研討，看這種運動究竟發現了什麼政治形式。

公社是由無產階級革命『終究發現了的』使勞動底經濟解放可能實現的形式。

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第一次嘗試，並且是『終究發現了的』政治形式，這個政治形式可以而且應當用來代替已被打碎的國家機器。

我們往下就會看見，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革命，在另一個環境中，在另一種條件下，繼續着公社底事業，並證實着馬克思那種天才的歷史的分析。

第 四 章

續上。恩格斯底補充解釋

馬克思關於公社經驗底意義問題，指出了基本之點。恩格斯曾屢次說到這個問題，解釋馬克思底分析和結論。且有時把這個問題底其他方面發揮得非常鮮明而有力，因之我們對這些解釋必須加以特別說明。

恩格斯在他關於住宅問題的著作（一八七二年出版）中，已經估計到公社經驗，並再三說到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很有趣味的，就是在論到這個具體問題時，一方面顯然闡明無產階級國家與現今國家相似的特徵，這些特徵使我們有根據來把這兩者都稱爲國家；另一方面又顯然闡明那些不同的特徵，或者說達到國家消滅的過渡。

『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的社會裏，這個問題是完全如其他任何社會問題一樣解決的：即是藉供求關係在經濟上逐漸的均衡來解決，但是這種解決法，本身又再三地產生出這個問題，就是說，不能給予任何的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不僅會要看時間和地方情形而定，同時也與那些更深遠得多的問題相聯繫着，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消滅城市與鄉村對立的問題。既然我們不從事於臆造將來社會結構底空想體系，那就用不着在這一點上浪費時間了，不過有一件事是確實無疑的，就是現時在各個大城市中已有很充足的住房，只要把這些住房應用得合理，便可以立即幫助真正需要住宅的人。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剝奪現在的房東，而把那些沒有住房的工人或現時住在人數過多住宅裏的工人們搬進這些房屋裏去。而當無產階級一奪得政權時，這種爲社會福利所要求的辦法，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和佔據住宅那樣容易實現的了』（一八八七年德文版，第二二頁）。

這裏沒有考察國家政權形式底變遷，而只說到國家政權活動底內容。剝奪住宅和佔據住宅，也是按現代國家底命令實行着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從形式手續方面來說，也會「下令」佔據

住宅和剝奪房屋。但舊的執行機關，與資產階級勾結着的官吏，對於實施無產階級國家底命令，顯然，簡直是毫不中用的。

…『必須指出，由勞動人民來實際佔有一切勞動工具和全部工業，是與蒲魯東主義的「贖買」辦法完全相反。在實現後一種辦法時，單個工人變為一個住房、一塊農民土地以及某些勞動工具底所有者；而在實現前一種辦法時，則由「勞動人民」成為一切房屋、工廠和勞動工具的集體所有者。這些房屋、工廠等等底使用權，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發給個人或協作社。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的辦法並不就是要消滅地租，而是要把——雖然用變態的形式——地租轉交給社會。所以，由勞動人民來實際佔有一切勞動工具，無論如何都不會排除承租和出租制底保存』（第六九頁）。

我們在下一章內將考察這段引證中提到的問題，即關於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問題。恩格斯說得極慎重，他說無產階級國家『未必』——『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會毫無代價地發給住宅。把屬於全體人民的住宅取費租給各個家庭，就既要徵收這筆租金，也要實行相當的監督，又要有分配住宅的某種標準。凡此一切都需要有相當的國家形式，但決不需要有特別的軍閥官僚機關連同其負責人員獨享的特權地位。而過渡到可以免費發給住宅的情形，則是與國家完全「消亡」相關連的。

、恩格斯講到布朗基主義者在公社以後並因受到公社經驗的影響而轉到馬克思主義底原則立場上來的時候，曾順便把這個立場表述如下：

…『無產階級政治行動底必要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底必

要，乃是進到廢除階級，同時也就廢除國家的過渡』…（第五五頁）。

那些愛好咬文嚼字批評的人們，或那些從事於『摧殘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份子，也許以為，在這裏承認「廢除國家」，而在上述反杜林一段議論中又把這個公式當作無政府主義公式來駁斥，是有矛盾的。如果機會主義者把恩格斯也算作「無政府主義者」，那並沒有什麼奇怪，——現在社會沙文主義者責備國際主義者為無政府主義者的風氣，日益普遍地流行起來了。

國家隨階級之廢除而廢除，——這是馬克思主義所常常教導我們的。反杜林一書中那段人所共知的關於『國家消亡』的議論，並不是簡單斥責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廢除國家，而是斥責他們鼓吹似乎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廢除國家。

因為現時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民主主義」學說把馬克思主義在關於消滅國家問題上對無政府主義的態度完全曲解了，所以我們來回憶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與無政府主義者的一次論戰，是特別有益的。

二 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這次論戰是在一八七三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寄給意大利社會主義彙刊一些論文，以反對蒲魯東主義者，「自治派」或「反威權主義者」；這些論文僅在一九一三年才譯成德文發表於新時代雜誌上。

…『如果工人階級底政治鬥爭——馬克思譏笑無政府主義者否認政治的立場時寫道，——採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們建立自己的革命專政來替代資產階級專政，那他們就犯

了一種侮辱原則的莫大罪惡，因為他們爲了滿足自己可憐的粗俗的日常需要，爲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竟不放棄武器，不廢除國家，却賦予國家以革命的暫時的形式』…（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第三十二卷，第一冊，第四〇頁）。

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義者時僅僅是反對這樣的「廢除」國家哩！馬克思完全不是反對那認爲國家隨階級消逝而消逝，或國家隨階級廢除而廢除的意見，而是反對使工人拒絕運用武裝，拒絕採用有組織的強力，即拒絕那應服務於「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這一目的的國家。

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無產階級所需要的那種「革命的暫時的」形式」的國家，以免人們把他與無政府主義鬥爭底真實意義加以曲解。無產階級需要國家只是暫時的。在以廢除國家爲目的這一問題上，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完全沒有分歧意見。我們肯定地說：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暫時運用國家政權底武器、工具、手段去反對剝削者，正如爲要消滅階級，就必須有被壓迫階級底暫時專政一樣。馬克思選定最激烈最明顯的問題提法來反對無政府主義者…工人推翻資本家底統治後，是應當「放棄武器」呢，還是應當利用它來反對資本家以打破後者的反抗呢？而由這一階級來有系統地運用武器反對另一階級，若不是「暫時形式的」國家，那又是什麼呢？

讓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問問自己：他在與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是這樣提出國家問題的麼？第二國際絕大多數正式社會黨是這樣提出這個問題的麼？

恩格斯將同樣的意思闡明得更詳盡、更通俗得多。他首先就

譏笑蒲魯東主義者那種糊塗觀念，因為蒲魯東主義者自稱為「反威權主義者」，即否認任何威權、任何服從、任何權力。恩格斯說，試拿工廠、鐵路、航行中的海船來說吧，這些以應用機器和由許多人有計劃合作為基礎的複雜技術事業，如果沒有某種服從關係，因而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某種威權或權力，則其中任何一種都無法動作起來，這難道不明顯麼？

…『如果，——恩格斯說，——我提出這種論據來反對那些最頑固的反威權主義者，那他們就只能給我以下的回答：「是呵！這是對的，但這裏所說的並不是我們賦予我們代表的那種威權，而是說某種委任。」這些人以為只須改變某一事物底名稱，就可改變這一事物本身哩！』…

恩格斯這樣來指明了威權和自治都是相對的概念，運用它們的範圍是依着社會發展底階段不同而變更，把它們看作絕對的東西是很荒謬的；並補充說，採用機器和大規模生產的範圍是在日益擴大着，然後恩格斯就由關於威權問題的一般推論進而說到關於國家的問題。

…『如果，——恩格斯寫道，——自治派僅僅是想說將來社會組織祇會在生產條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威權存在，那也許還可以和他們說通，但他們對於一切使威權成為必要的事實都閉眼不看，却一味拚命反對名詞。

『爲什麼反威權主義者不只以叫喊反對政治威權和反對國家爲限呢？所有一切社會主義者都一致認爲，國家以及政治威權，將由於未來社會革命底結果而消逝，就是說，社會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爲關注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但是，反威權主義者却要求一舉而把政治國家廢除，

即要求在那些產生出政治國家的社會關係尚未廢除以前就把它廢除。他們要求社會革命底第一步動作就是廢除威權。

「這些先生曾經見過一次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威權的東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鎗大砲，即用非常有威權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動作。而獲得勝利的政黨往往迫於必要，不得不藉自己武器所給予反動派的威嚇，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會憑藉武裝人民底威權來反對資產階級，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麼？反過來說，我們不是有理由因為公社把這個威權運用得太少而加以責備麼？總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威權主義者自己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些什麼，而在這種場合，他們就僅僅是散佈糊塗觀念；或者是他們知道這一點，而在這種場合，他們就是背叛無產階級底事業。在前後兩種場合內，他們都只是效勞於反動派」（第三九頁）。

在這段議論中間，牽涉到那些在考察關於國家消亡時期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下一章將專門論述這點）時應當考察的問題。這就是關於社會職能由政治職能變為簡單管理職能的問題和關於「政治國家」的問題。後面這個名詞——特別容易惹起誤會的——係指出國家消亡底過程：正在消亡中的國家，在其消亡底相當階段上，可以名之為非政治的國家。

恩格斯這段議論中最精彩的地方，又是他用以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問題提法。願做恩格斯門徒的社會民主黨人，自一八七三年以來，已與無政府主義者爭論過幾百萬次，但他們在爭論時所採取的，恰巧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而且應當採取的爭論態度。無政府主義者關於廢除國家的觀念是糊塗的，而且是不革命的，

——這就是恩格斯對問題的提法。無政府主義者所不願看見的，正是革命底產生和發展，以及革命對於強力、權威、政權、國家的特殊任務。

現代社會民主黨人通常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批評，僅僅是歸結爲一句十足的市僧庸俗論調：『我們承認國家，無政府主義者則不承認！』。這樣的庸俗論調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思想的革命工人厭棄。恩格斯底意見則完全不是這樣：他着重指出，所有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承認國家底消逝乃是社會主義革命底結果。然後他就具體提出關於革命的問題，即恰巧是機會主義派中的社會民主黨人所通常迴避不說，而專門留給無政府主義者去「研究」的問題。並且恩格斯一提出這個問題，就很果斷地說：公社不是應該更多多運用國家底，即握有武裝、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底革命政權麼？

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正式社會民主派，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具體任務問題，通常都是簡單用庸人底譏笑語句來敷衍，或至多也不過是用一句詭辯來搪塞，說什麼『將來再看吧』。因此無政府主義者有權來攻擊這樣的社會民主派，說它背叛了自己以革命精神去教育工人的責任。恩格斯運用最近這次無產階級革命底經驗，正是爲了極具體地來考察：無產階級對於銀行和國家，究竟應當採取什麼態度。

三 給伯伯爾的信

恩格斯於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致伯伯爾信中所述的這一段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國家問題的著作內，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議論，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議論之一，附帶說說，

據我們所知道的，這封信第一次由伯伯爾刊印在他的回憶錄（我的生活）第二卷中，這卷回憶錄是於一九一一年，即在這封信寫就並寄出之後經過三十六年才出版的。

恩格斯在這封致伯伯爾的信中，批評了那也由馬克思在致布拉克的有名信中批評過的哥達綱領草案，並特別說及國家問題時，寫道：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按這幾個字底文法意思講來，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自己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橫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這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這一名詞來挖苦我們已夠多了，雖然在馬克思駁斥蒲魯東的著作中以及後來在共產黨宣言上，都已經直截說過：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施行後，國家就會自行消散（*sich auflöst*）和消逝的。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不得利用來以強力鎮壓敵人的一種暫時機關，那末說什麼自由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時，那就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成其爲國家了。因此，我們提議到處都把國家一字改成「公團」（*Gemeinwesen*）一字，這是個很好的德文古字，是與法文中的「公社」（*Commune*）相當的（見德文原本第三二二頁）。

要注意到：這封信是關係於黨綱，而這個黨綱是馬克思在他距此信僅幾星期後發出的信裏批評過的（馬克思底信寫於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當時恩格斯和馬克思一同住在倫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後那句話中使用「我們」二字時，他毫無疑義是以自己

和馬克思底名義來向德國工人黨底領袖提議，從黨綱中把「國家」字樣勾銷而代之以「公團」字樣。

如果向現在這班爲邊就機會主義者而偽造出的「馬克思主義」底頭目們提議如此修改黨綱，那末他們該會怎樣狂吠起來，大罵「無政府主義」呵！

讓他們狂吠吧。資產階級爲了這點會褒獎他們的。

而我們則要做我們的事。在審查我們黨綱的時候，是絕對要注意到恩格斯與馬克思底忠告，以便更接近於真理，以便恢復馬克思主義而清除掉一切對於它的曲解，以便更正確地指導工人階級爭取本身解放的鬥爭。在波爾什維克當中大概不會有人反對恩格斯和馬克思底忠告。困難也許只會在於名詞上。德文中有兩個字都解作「公團」，而恩格斯所採用的那個，並不是表示單個公團，而是表示各個公團底總和，公團底體系。在俄文中沒有這樣一個字，所以我們也許只得採用法文中的「公社」一字，雖則這個字也有其不便之處。

「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這就是恩格斯在理論上最重要的斷語。看了上文以後，這個斷語是完全可以懂得的。公社已再不成其爲國家了，因爲當時公社所要鎮壓的，不是居民底大多數，而是居民中的少數（剝削者）；它已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居民已自己上台來代替那特別的鎮壓力量。凡此一切，都是離開了原來意義的國家。而如果公社臻於鞏固，那末在它中間，國家底痕跡就會自行「消亡掉」，它就會用不着「廢除」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將無事可做而逐漸停止其作用。

「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字樣來挖苦我們，」——恩格斯說這句話的時候，首先是指巴枯寧及其對於德國社會民主

黨人的攻擊而言。恩格斯之所以認為這種攻擊是正確的，乃是因為「人民國家」是與「自由人民國家」一樣荒謬，一樣離開社會主義。恩格斯曾努力糾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使其在原則上正確，使其除去那些對於「國家」問題的機會主義偏見。可惜！恩格斯這封信竟被攔藏起來達三十六年之久。我們在下面便會看見，就在這封信發表以後，考茨基實際上還是頑固地重複着那些為恩格斯所警告過的錯誤。

伯伯爾於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寫信回答恩格斯，就中說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對於黨綱草案的批判，並說他責備了李卜克內西底那種讓步態度（伯伯爾底回憶錄，德文版第二卷第三〇四頁）。但是，如果拿伯伯爾所著的我們的目的這本小冊子來看，那我們就會在其中遇見一些對於國家問題的完全不正確的議論：

『必須把基於階級統治的國家變為人民的國家』（我們的目的一八八六年德文版，第四一頁）。

這是刊印在伯伯爾那本小冊子第九版（第九版！）中的話！難怪德國社會民主黨竟接受了這如此頑固重複着的關於國家的機會主義議論，尤其是當恩格斯底革命解釋被藏匿着，而全部生活環境又長期使人「忘記」革命的時候。

四 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評

在分析馬克思主義底國家學說時，決不能不說到恩格斯於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寄給考茨基，而直至十年以後才在新時代雜誌上發表出來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評，因為這主要是為了批評社會民主黨在國家制度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見解而作的。

我們要順便指出，恩格斯關於經濟問題也給了一個非常寶貴的指示，表明恩格斯曾如何細心深思地考察最新資本主義底種種變態，並因而如何善於在某種程度內預示到現今帝國主義時代底任務。這個指示如下：論到該綱領草案所用來說明資本主義特質的「無計劃性」（Planlosigkeit）一語時，恩格斯寫道：

…「當股份公司進到統治並壟斷各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時，那就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的現象也停止了」（見新時代雜誌，第二十卷，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第一冊，第八頁）。

這裏已經指出了對最新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理論估計中的最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變成爲壟斷的資本主義。後面這幾個字是必須加上着重點的，因爲最普泛的一種錯誤，就是根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來斷言，似乎壟斷的資本主義或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已經可以稱爲「國家社會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等等。完全的計劃性，當然是托拉斯所未曾產生，至今沒有產生，而且也不能產生的。就儘管托拉斯產生出某些計劃性，儘管資本大王們預先多少計算一國範圍或甚至國際範圍內的生產規模，儘管他們多少有計劃地調節生產，可是我們終究還是生存在資本主義之下，雖然是在其新階段上，但毫無疑義還是在資本主義之下。這樣的資本主義之「接近」於社會主義，在無產階級底真正代表看來，乃是證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接近，容易實現，可以實現和不可延緩，而決不是證明可以容忍所有一切改良主義者否認社會主義革命而粉飾資本主義的言論。

但我們再回轉來講國家問題吧。恩格斯在這裏給了三個特別寶貴的指示：第一是關於共和國的問題；第二是關於民族問題與

國家制度間的聯系；第三是關於地方自治。

至於說到共和國，那末恩格斯是把這點當作他對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評的重心。如果我們記起當時愛爾福特綱領在整個國際社會民主運動中具有怎樣的意義以及它成了整個第二國際底標本的事實，那就可以毫無誇大地說，恩格斯在這裏乃是批評整個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

『草案底政治要求——恩格斯寫道，——有一個很大的缺點。該草案中沒有說到那（着重點是恩格斯加的）本來應當說到的東西。』

其次，恩格斯指明，德國憲法不過是一八五〇年最反動憲法的抄本，德國國會，正像威廉·李卜克內西所說的，只是『君主專制底遮羞物』，想在這法定各小國存在和法定日耳曼各小國聯盟的憲法基礎上，實行把『一切勞動工具變為公產』，那就是『顯係荒謬的思想』。

『提到這個問題是危險的，』——恩格斯補充說，因為他深知在德國是不能把共和國的要求公開地在綱領中提出的。但是恩格斯並不因「大家」都以為滿足，就簡簡單單容忍這個不言而喻的理由。所以他又接着說：『但是，無論如何，事情總是應當推進的。恰巧現時在大部份社會民主黨刊物上散佈着的（*einreissende*）機會主義，表明這件事情是如何必要了。現在，人們害怕那反社會黨人的法令³⁸又會恢復起來，或是因回想起在這個法令盛行時所作過的某些過早的聲明，就想要黨承認德國現今的法定制度足以和平實現黨所提出的一切要求』…

恩格斯把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害怕非常法令復活為出發點的這

個基本事實提在第一位，且毫不遲疑地稱之爲機會主義，並申言說，正因在德國缺乏共和制度與自由，所以關於「和平」道路的梦想是完全荒謬的。恩格斯充分謹慎，而不自行掣肘。他承認，在具有共和制度或具有很廣泛自由的國家裏，「可以想像」（僅僅是「想像」呵！）有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可能，但在德國，他重複說：

…『在德國，政府幾乎是有無上權力的，國會和其他一切代表機關都沒有實權，在德國宣稱有這種可能，且在沒有任何必要時作出這種宣言，那就等於替君主專制揭去其遮羞物，而親自去替它遮蓋裸體罷了』…

德國社會民主黨既把恩格斯這些指示「置之高閣」，於是其中絕大多數正式領袖就果然成了君主專制底掩蓋者。

…『這樣的政策，歸根到底只能把黨引入迷途。他們把一些廣泛的抽象的政治問題提在第一位，而藉此將那些在大事變一發生，在政治危機一爆發時，就會自然而然提到日程上來的迫近的具體問題掩蔽起來。其結果就只會使黨在有決定意義的關頭突然陷於束手無策的狀態，而在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使黨不知所從和缺乏一致，因為這些問題是從來都沒有討論過的…

『這樣爲着眼前片刻的利益而忘却宏偉的根本大計，這樣貪圖一時的成功，這樣專爲一時成功而不估計將來結果的鬥爭，這樣爲了現在而犧牲將來運動的態度，也許是導源於「誠實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都是機會主義，而且「誠實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都更要危險些…

『毫無疑義的，是我們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一政治形式之下，才能取得統治。這民主共和國甚至是適用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特有形式，這是法國大革命所已經表明過的』…

恩格斯在這裏特別明顯地重複說到一個昭然貫澈於馬克思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就是認為民主共和國是進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捷徑。因為這樣的共和國雖絲毫也不消除資本統治，因而絲毫也不消除對於羣衆的壓迫和階級鬥爭，但必然會使這個鬥爭如此擴大、如此展開、如此暴露、如此尖銳化，以致一有可能滿足被壓迫羣衆根本利益時，則這種可能就會必然而且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即在這個羣衆由無產階級來領導的條件下，見諸實現。這在整個第二國際內，也是馬克思主義中『被人遺忘了的話』，而孟什維克黨在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上半年的歷史則把這種遺忘情形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

論到與居民民族成份有關的聯邦共和國問題時，恩格斯寫道：

『什麼東西應當來替代現在的德意志？』（它有反動的君主憲法和同樣反動的小國分立制，這個分立制把「普魯士主義」底種種特點鞏固起來，而不是把它們溶化在整體的德意志中）。『據我的意見，無產階級只能使用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形式。聯邦共和國一般和整個說來，現今還是在美國廣大地區上所必需的；雖然在其東部一帶它已成為障礙了。如果在英國建立聯邦共和國，那就會是一個進步，因為在英國兩個海島上居住着四個民族，而其國會雖然是統一的，可是此刻已有三種立法體系同時存在着。聯邦共和國在

小小的瑞士早已成爲障礙物了。那裏，其所以還可容忍聯邦共和制度，這僅僅是因爲瑞士自甘爲歐洲國家系統中純粹消極的一員而已。若在德國實施瑞士式的聯邦制度，那就會是一大退步。聯盟制國家與完全統一的國家有兩點區別，就是：每一個加盟的國家，都有其特別的民法和刑法，有其特別的司法制度，其次又有與國民議院同時並存的由各國代表組成的議院，在這個議院中，每一自治邦不管其大小如何都以一個邦的資格來參加表決。』在德國，聯盟制國家是達到完全統一的國家的過渡，我們的任務不是使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³¹往後倒退，而是要用「自下而上的運動」來對它作以必要的補充」。

恩格斯對國家底形式問題，不但毫不冷淡，反而非常細心地努力去分析那些過渡形式，以便依照每一個別情形底具體歷史特點來看清某一過渡形式是由什麼到什麼的過渡。

恩格斯也如馬克思一樣，從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底觀點來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他把聯邦共和國看作或者是例外情形和對於發展的障礙，或者是由君主國進到集中制共和國的過渡，是在一定特殊條件下的「進步」。而在這些特殊條件中，提出民族問題。

恩格斯也如馬克思一樣，雖然無情批評小國家系統底反動性以及在一定具體情形下用民族問題來掩蓋這種反動性的現象，可是他無論何處都絲毫沒有忽視民族問題的偏向，——這個偏向是荷蘭和波蘭兩國馬克思主義者在反對「自己的」小國家市儈狹隘民族主義之極正當的鬥爭中所常犯的。

甚至在英國，在這個無論從地理條件，或統一的語言，或數

百年來的歷史看來都似乎已把英國各單個小疆小城底民族問題「解決了」的國家裏，恩格斯也估計到明顯的事實，認定民族問題還沒有消逝，因此他承認聯邦共和國是一個「進步」。自然，這裏他絲毫沒有放棄批評聯邦共和國底缺點，絲毫沒有放棄爲實現統一集中的民主共和國而進行最堅決的宣傳和鬥爭。

但是，恩格斯絕不如那些資產階級思想家和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家運用這個概念時那樣，把民主集中制瞭解爲官僚主義的意思。在恩格斯看來，集中制絲毫也不排斥廣闊的地方自治制，只要這種地方自治有各「公社」和省區自願堅持國家統一爲條件時，便會把任何官僚主義和任何自上而下的「命令主義」都絕對消除的。

…『總之，需要統一的共和國』——恩格斯在發揮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問題的綱領觀點時寫道，——『但不是如像現今的法蘭西共和國那樣，現今的法蘭西共和國不過是一七九八年建立的沒有皇帝的帝國而已。從一七九二年至一七九八年，法國每一省、每一公社（Gemeinde）都享有美國式的完全自治權，而這正是我們也應當有的。至於應當怎樣組織地方自治和怎樣才可不要官僚制，這是美國和第一法蘭西共和國已經向我們指明和證明了的，而現在澳洲、坎拿大以及其他英屬殖民地又一次地指明給我們看。

這種省區的和公社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聯邦制自由得多的制度，在那裏，雖然單個自治邦對於整個聯邦國家是很獨立，但它對於縣和公社也是獨立的。自治邦的政府任命縣知事和地方長官，這是在那些講英語的國家中所絕對沒有的現象，我們將來在自己國家中也應當斷然排除，亦如排除普

魯士的專員、縣長、省長以及一般由上面任命的官吏一樣。根據這點，恩格斯提議把黨綱關於自治問題的條文規定如下：『在各省各縣各公社經過依普選制選出的官吏來實行完全自治；取消由國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當局和各省當局。』

在被克倫斯基以及其他「社會主義」總長底政府所封禁的真理報上（第六十八期，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已經指出過，關於這一點——自然遠不只這一點——我國假革命假民主派底假社會主義的代表們，是如何無恥地離開了民主主義。自然，這些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政府而把自己束縛起來的人們，對於這個指示是充耳不聞的。

必須特別指出的，就是恩格斯根據確鑿事實，按最確切的實例，駁斥那種非常流行的，特別是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間非常流行的偏見，以為聯邦制共和國一定比集中制共和國自由些。這種意見是不對的。恩格斯所舉關於一七九二至一七九八年法蘭西集中制共和國和瑞士聯邦制共和國的事實，推翻了這種偏見。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國所給予的自由是比聯邦制共和國所給予的自由真正要多些。換句話說：在歷史上地方和省區等等所享受過的最多的自由，是集中制共和國所給予，而不是聯邦制共和國給予的。

對於這件事實，以及一般關於聯邦制共和國與集中制共和國和地方自治的整個問題，在我們黨的宣傳和鼓動中，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充分注意到。

五 一八九一年為馬克思著法蘭西

內戰一書所作的序言

恩格斯在為法蘭西內戰一書第三版上作的序言中，——這篇

序言是作於一八九一年三月十八日，最初登在新時代雜誌上，——除了對有關國家態度問題作了許多饒趣的附帶指示而外，又對公社底教訓作了一個極鮮明的總結。這個總結，由於有從公社起至當時止二十年間的全部經驗而更加深刻化，並且是專門用來反對那流行於德國的「國家迷信」的這個總結，真可稱為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問題的定論。

『法國每次革命的結果，——恩格斯指出說，——工人總是武裝了的；』『因此，在掌握國家政柄的資產者看來，第一條金科玉律就是要解除工人底武裝。因此，在每一次由工人爭來的革命以後，就發生新的鬥爭，其結果總是工人遭受失敗』…

這個對於各次資產階級革命經驗的總結，真是又簡短，又明瞭。問題底實質——就中也關於國家問題（被壓迫階級有沒有武裝？）——在這裏說明得非常切要中肯。而恰巧這一實質，是那些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大學教授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常常迴避不說的。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中，有一個「孟什維克」，『也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策烈鐵里獲得了榮幸（卡芬雅克式的榮幸）機會來洩漏資產階級革命底這個秘密。策烈鐵里在其六月九日發表的「歷史的」演說中，偶然說出了資產階級要解除彼得城工人武裝的決定，同時當然把這個決定冒充為他自己的決定，並且一般地是「國家」之所必要的！

策烈鐵里於六月九日發表的有歷史意義的演說，當然會是每一個著述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歷史家都可引用的一個最明顯的例證，來證明策烈鐵里先生所主持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底聯盟，如何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革命無產階級。

恩格斯另一個也與國家問題有關的附帶指示，是關於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國社會民主黨因其腐朽而愈益機會主義化，於是對於『宣佈宗教為私人事情』的有名公式，也就愈益加上庸俗的曲解。就是把這個公式曲解成爲似乎宗教問題對於革命無產階級底黨也是一件私人事情！這種完全背叛無產階級革命綱領的立場，正是恩格斯當時所奮起反對的，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還只看見自己黨內機會主義底最微小的萌芽，因此他在當時說得很謹慎：

『參加公社會議的，幾乎盡是工人或已被公認的工人代表，因此它的決議就顯然帶有純粹無產階級的性質。有些決議是把作爲工人階級自由活動之必要基礎，而被共和派資產階級因其卑鄙怯懦所拒絕了的改良辦法，加以法定。例如實行了如下的原則：宗教對國家而言僅僅是私人事情。公社頒佈的另外一些決議，則是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而在某種程度內深深刺入了舊社會制度』…

恩格斯故意把『對國家而言』幾字加上着重點，乃是針對着德國機會主義的要害加以打擊，因爲德國社會民主黨把宗教宣佈爲對黨而言的私人事情，——也就把革命無產階級底黨降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的」市僧水準，這種市僧願意承認可以不信宗教，但是拒絕對麻醉人民的宗教鴉片進行黨的鬥爭這一任務。

將來著述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的人，當探究該黨在一九一四年陷於可恥破產的根本原因時，會找到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有趣材料：從該黨思想領袖考茨基論文中那些向機會主義大開門戶的曖昧言論起，直到黨對於一九一三年“Los-von-Kirche. Bewegung.”（與教會分離運動）的態度爲止。

但是現在我們且來看恩格斯在公社二十年後，怎樣給奮鬥的

無產階級總結公社的教訓吧。

以下就是恩格斯提在第一位的教訓：

…『正是至今存在的集中政府底壓迫權力——軍隊、政治警察、官僚，即拿破崙在一七九八年所創立，而從那時起被每屆新政府當作適宜工具接收並利用來反對自己敵人的權力——正是這個權力，應該在法國到處傾覆，亦如它已在巴黎傾覆過一樣。

『公社一開始就本來應當承認，工人階級得到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從事管理；工人階級爲要不致又喪失剛才爭得的統治，它就應當：一方面剷除那至今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全部舊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就應當保證有可能防範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而宣告所有他們毫無例外地都可以隨時撤換』…

恩格斯再三着重指出，不僅在君主國，而且就在民主共和國裏，國家依然是國家，就是說，它的根本特徵，即把本來是「社會公僕」、社會機關的官吏，變爲社會主人的現象仍然保留着。

…『爲了不讓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爲社會底主人——這種現象在迄今所有一切國家中都是不可免的，——公社採用了兩種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所有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都委任那些按普選制選舉出來的人們充任，同時施行了按選舉者決議隨時可以撤銷被選舉者的法制。第二，它給予所有一切公務人員的薪水，不分職位高低，都與其他工人所領取工資相等。公社所一般付過的最高薪金是六千佛郎。這樣就造成了防止那種鑽營職位和升官發財主義的可靠隄防，何況公社此外還施行了各代表機關

代表須絕對服從選民所給的委任書制度」……

恩格斯在這裏講到了一個有趣味的界線，一達到這個界線，澈底的民主制就變爲社會主義，同時也就要求實行社會主義。因爲，爲要消滅國家，就必須把國家服務機關底職能變爲非常簡單的監督和統計手續，以便使絕大多數居民都能擔負，都能勝任，然後且使全體居民都能擔負，都能勝任。而爲要完全排除升官發財主義，就必須使那些雖然是收入不豐但亦「榮譽」的國家服務機關中的位置，不能成爲博得銀行或股份公司內之收入豐厚的職位的橋樑，如像在一切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很常見的那樣。

但是，恩格斯沒有犯着比方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在民族自決權問題上所犯的那種錯誤：他們說民族自決權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下却又多餘的事。這種似乎很機智而實則不正確的論調，對於任何一個民主設施——連對官吏支付普通薪水的辦法也在內——都可以如此重復，因爲貫徹到底的民主制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下則任何民主制都是會消滅掉的。

這是一種詭辯，正像舊時有句笑話：如果一個人脫掉一根頭髮，那末他是否就成了禿頭呢？

把民主制發展到底，尋求這種發展底形式，拿實踐來試驗這些形式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爲社會革命而鬥爭中的基本任務

① 這在名義上約等於二千四百盧布，而按現在的行市計算，約等於六千盧布。有些波爾什維克，犯了一種完全不可寬恕的罪過，例如他們竟在市議會中提議支付九千盧布的薪水，而不提議對全國施行以六千盧布爲最高限度的薪金。——這個數目是足夠的。

之一。如果民主制是一種單獨存在的東西，那末任何民主制都不能產生社會主義，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民主制無論何時都不會是「單獨存在」，而會是「總合存在」的，將也要影響到經濟，推進其改造，受到經濟發展底影響等等。這是活生生的歷史底辯證律。

恩格斯續說：

…『這種炸毀（Sprengung）舊的國家政權並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它的情形，在法蘭西內戰第三章中已經詳細描寫過了。但是，這裏還須再一次簡單論述這種代替底幾個特點，因為恰巧在德國，對於國家的迷信，已經由哲學方面轉到資產階級一般意識中，甚至很多工人底一般意識中去了。依照哲學說來，國家是「觀念底實現」，或譯成哲學語句，便是上帝在人間的統治，亦即永恆真理和正義所由實現或應當實現的場所。而由此就產生了崇拜國家以及一切有關國家事物的迷信心理，這種崇拜心理之所以很容易根深蒂固起來，是因為人們從小就慣於想像，似乎全社會公共事業與公共利益只能用舊有方法來處置和保護，就是說，只有經過國家及其位高祿厚的官吏來作。人們以為，假使不再去迷信世襲君主制度而主張民主共和制度，那他們就已是非常勇敢地前進了一步。其實，國家無非是這一階級鎮壓另一階級的機器，即令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弱於在君主制下。至少國家也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獲得勝利之後所承受下來的一個禍害；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將也如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斬截這個禍害底惡劣方面，直到那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生長出來的一代人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制度的

廢物完全拋棄的時候為止。』

恩格斯曾經警告過德國人，叫他們在君主制度由共和制度所代替時不要忘記社會主義對於一般國家問題的基本原則。他的警告現在讀起來好像是直接對於萊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一般先生們的教訓，他們在其參加「聯合」政府的實踐中，正表現了他們對於國家的迷信和對於國家的崇拜！

還要指出兩點：（一）恩格斯說，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國家之爲『這一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機器』，是『絲毫不弱於』在君主制度下的，但這根本不是說，壓迫底形式對於無產階級就漠不相關，如像某些無政府主義者所「教誨」的那樣。更廣大、更自由、更公開的階級鬥爭形式和階級壓迫形式，能夠大大促進無產階級爲消滅一般階級而進行的鬥爭。

（二）爲什麼只有新起的一代人才能完全拋棄這全部國家制度的廢物呢——這個問題是與民主制度消除問題相關連的，我們現在正要講到這個問題。

六 恩格斯論民主制底消除

恩格斯講到「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個名稱在科學上不正確的時候，曾連帶說及這一點。

恩格斯在他那主要是論述「國際」問題的一八七〇年代雜著彙集（《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的自序（作於一八九四年一月三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時候）中寫道：所有一切論文裏面，他都用「共產主義者」一名詞，而不用「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名詞，因爲當時法國蒲魯東派和德國拉薩爾派都自稱爲社會民主主義者。

「因此在當時，馬克思和我兩人——恩格斯繼續說，——都覺得爲了表明我們特有的觀點，絕對不可用這樣一個有伸縮性的名詞。現在情形已經不同了，這個名詞（「社會民主主義者」）也許可以過得去（*mag passieren*），雖然它對我們這樣的黨，是仍舊不確切的（*unpassend*，不適當的），因爲我們黨底經濟綱領不簡單是一般社會主義的，而逕直是共產主義的，因爲我們黨底最終政治目的是在消除全部國家，因而也就是消除民主制。但是，真正（着重點是恩格斯加的）政黨的名稱，是始終不會完全名符其實的：黨在發展着，而名稱依然如舊。」

辯證學家恩格斯直到臨終時都仍然忠實於辯證法。他說，馬克思和我曾有一個很好的科學上確切的黨的名稱，但是未曾有真正的，即羣衆的無產階級黨。現在（十九世紀末葉）有了真正的黨，但其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不要緊，「可以過得去」，只要黨發展起來，只要其名稱在科學上的不正確性不會對它隱瞞起來，不會妨礙它向着正確方向發展！

也許某一個談諧家會用恩格斯的說法來安慰我們布爾什維克：我們有真正的黨，它發展得很好；就連「布爾什維克」這樣一個沒有意義的怪異名稱，除表示我們在一九〇三年布魯塞爾、倫敦代表大會上佔有多數⁸⁵的這一全屬偶然的事實而外，絕對沒有其他什麼意思的名稱，也是「可以過得去」的……也許現在，由於我們黨被共和黨人和「革命」市儈民主黨人在七八月間肆行追究的結果，已使「布爾什維克」這個名稱成爲享有全民榮譽的名稱，除此而外，這種追究又還表明我們黨在其真正的發展上作了有歷史意義的偉大進步，因此，也許我自己也對於我在四月間

提出的變更我黨名稱的提議猶豫起來。也許我要向自己同志們提出一個「妥協辦法」：把我們黨稱爲共產黨，而把「布爾什維克」這幾個字留下放在括弧內面…

但是黨底名稱問題，遠不及革命無產階級對國家的關係問題那樣重要。

在通常談論國家問題時，人們常常犯着恩格斯在這裏所警告過而我們已經在上文中順便指出了的那個錯誤。就是說：人們常常忘記，國家底消滅也就是民主制底消滅，國家底消亡也就是民主制底消亡。

驟然看來，這樣的斷語似乎是極端奇怪而難於了解的；也許，甚至有些人會發生這樣的恐懼心：莫不是我們期望有一個將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到來麼？因爲民主制也就是承認這種原則哩。

不是的，民主制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是同一東西。民主制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制度，就是說，是爲這一階級對另一階級，這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施行有系統的強力的組織。

我們所抱定的終極目的，是要消滅國家，就是說，要根本消滅任何有組織和有系統的強力，任何加於人們的強力。我們並不期望有一個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到來。但是，我們既趨向於社會主義，我們就深信社會主義將轉變爲共產主義，而到那個時候，就根本不會有任何必要來對人們施用強力，不會有任何必要來使這一個人服從於另一個人，使這一部分居民服從於另一部分居民，因爲人們將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底起碼條件，而不需要有強力和服從。

爲要着重指出這個習慣的因素，所以恩格斯就說到新起的一代人，他們是『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生長出來的，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制度的廢物完全拋棄掉』——這裏所謂國家制度是指任何國家制度而言，連民主共和的國家制度也在內。

爲要說明這一點，就必須考察關於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問題。

第五章

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

馬克思所著的哥達綱領批評一書（即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致布拉克的信，直到一八九一年才刊登於新時代雜誌第九卷第一期上，已有俄譯單行本），對於這個問題有最爲詳盡的說明。在這一精彩著作中批評拉薩爾主義的辯論的部分，可以說是遮掩了正面論述的部分，即對於共產主義發展與國家消亡之聯繫的分析。

一 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若把馬克思於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致布拉克的信，拿來與上述的恩格斯於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致伯伯爾的信，作一膚淺的比較，也許覺得馬克思比恩格斯帶有更濃厚得多的「國家派」的色彩，也許覺得這兩位作家對於國家的見解有很大的差別。

恩格斯勸伯伯爾根本拋棄關於國家的廢話，從綱領中完全剔除國家一語，而代之以「公團」一語；恩格斯甚至宣佈說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而馬克思則甚至講過『將來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國家制度』，就是說，彷彿他認爲甚至在共產主義下

也要有國家。

但這樣的觀點是根本不對的。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就可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對於國家及其消亡問題的見解完全相符合，而上面所引證的馬克思的說法，也就是指正在消亡的國家制度而言。

至於規定將來「消亡」的日期，這點當然無從說起，尤其是因為它顯然是一個長久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間的表面上的差異，是因為他們所研究的題目以及他們所抱定的目的彼此不同。恩格斯的目的，是要很明顯地、激烈地、扼要地向伯爾指明國家問題上所流行的（拉薩爾也是幾乎贊同的）那些偏見之全部荒謬性。馬克思却只是在論述另一題目，即共產主義社會底發展時，順便提到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底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澈底、最完備、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就要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行將崩潰的問題，並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將來共產主義底將來發展問題。

究竟根據什麼實際材料可以提出將來共產主義底將來發展問題呢？

這裏所根據的，就是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產生出來的，它在歷史上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起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個社會力量動作底結果。馬克思絲毫沒有企圖創造一個烏托邦和憑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他提出共產主義問題，也正像自然科學家提出——譬如說——某種新的生物變態底發展問題一樣，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這種變態如何產生出來以及按照怎樣一種方向變化着。

馬克思首先就掃除了哥達綱領所滲進到國家與社會相互關係問題中去的那些糊塗觀念。

…『現代的社會——他寫道，——就是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是多少免除了中世紀雜質，依每一國度歷史發展底特點而形態多少有所不同，多少已經發展了的。反之，「現代的國家」却是依每一國度而變更的。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與它在瑞士完全不同。它在英國是與它在美國也完全不一樣。所以，「現代的國家」乃是一種虛構。

『但是，不管其形式如何紛繁複雜，而各個不同的文明國度裏各個不同的國家却有一個彼此共同之點：它們都是建築在資本主義多少已經發展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底基礎上。所以它們具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的特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到「現代的國家制度」，以與其現在的根基即資產階級社會已經死亡時的那個未來相對立。

。『其次還有這樣一個問題：國家制度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將遭到怎樣的變化？換句話說：那時，還有哪些與現代國家職能類似的社會職能會仍然保存？這個問題只能用科學方法來答覆；不然，無論你千百次地把「人民」與「國家」這兩個名詞聯接起來，也是絲毫不會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的』……

馬克思這樣譏笑了一切關於「人民國家」的空話以後，就來說明問題底提法，且似乎是特別警告說，爲要給這個問題以科學的答覆，就祇可依據確切判明的科學材料。

已由整個發展論和全部科學所完全確切判明了的第一點，亦

即先前被空想主義者所忘記，現今又爲那些畏懼社會主義革命的現代機會主義者所遺忘的一點，就是在歷史上必然會有一個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特別時期或特別階段。

二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馬克思繼續說道，——橫着一個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合的也有一個政治過渡時期，而這個時期底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

這便是馬克思根據無產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起作用的分析，根據關於這個社會底發展情形以及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相對立而不可調和的那些實際材料所作出的結論。

從前，問題是這樣提出的：無產階級爲要達到自己的解放，就應當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革命專政。

現在，這個問題底提法已經有些不同了：從向着共產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非經過一個「政治過渡時期」不可，而這個時期底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

這個專政對於民主的關係又是怎樣呢？

我們已經看見，共產黨宣言是把兩個概念簡單並列起來：『變無產階級爲統治階級』和『奪得民主制』。根據上述一切，便可以更確切地斷定，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程中，民主制是怎樣變更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在這個社會最順利發展條件下所表現出的多少完備的民主制，便是民主共和國。但是，這個民主制始終受到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狹窄範圍的限制，因此在實際上始終只是

供少數人，只是供有產階級，只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自由，始終是與古代希臘共和國裏的自由大致相同：只是供奴隸主享受的自由。現代的僱傭奴隸，由於資本主義剝削底條件，始終是被貧苦困乏壓榨得『無暇過問民主』，『無暇過問政治』，以致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大多數居民都是被排除於社會政治生活範圍之外。

德國可以說是證實這一論斷正確的一個再好不過的例子，因為在這個國家裏，由憲法所規定的合法性支持得特別長久和穩固，幾乎有半世紀之久（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而德國社會民主黨際此時期中，在『利用合法性』並使工人參加政黨組織的人數百分比達到舉世未有的高度這點上，比其他各國社會民主黨作了更大得多的工作。

試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算是最高的這種政治上覺悟積極的僱傭奴隸人數百分比，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數目呢？在一千五百萬僱傭工人中間，只有一百萬是社會民主黨黨員！在一千五百萬人中間，只有三百萬是工會會員！

供極少數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民主制。如果仔細考察資本主義民主制底結構，那末我們無論在選舉法底「細微的」——似乎是細微的——條文上（居住的年限，婦女除外等等），或在代議機關底辦事手續上，或在行使集會權的實際障礙上（公共會場不供「窮人」享用！），或在日報純粹按資本主義原則組織起來以及其他種種事實上，到處都可看見民主制所受到的重重限制。專門用來對付窮人的這種限制、例外、除外以及障礙等等，看來似乎是很細微的，——尤其是在那些從來沒有親身感到過貧乏，從來沒有同被

壓迫階級大衆生活接近過的人（這種人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政論家中，若不佔百分之九十九，至少也要佔十分之九）看來，是很細微的，——但是這種種限制總合起來，却把窮人排斥和摒出於政治生活以外，不讓他們積極參加民主制。

馬克思絕妙地暴露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底這種實質，他在分析公社經驗的時候說道：容許被壓迫者數年一次來解決壓迫階級中什麼人應在國會裏充當他們的代表者和鎮壓者！

但是脫離這個資本主義民主制，從這個必然是範圍狹窄的，暗中排斥窮人的，因而也就是完全虛偽和欺騙的民主制之向前發展的過程，決不是像一般自由派教授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直捷、平穩朝着『愈益澈底的民主制』進行的。絕對不是。向前發展，即進到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而且決不能經過別的道路，因為要打破剝削者資本家底反抗，是別無他人可作、別無他路可走的。

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爲統治階級鎮服壓迫者，不能僅僅以擴大民主制爲限。除了把民主制大規模地擴大成爲第一次供貧民享受的民主制，供人民享受的民主制，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而外，無產階級專政還會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實行許多剝奪自由的手段。爲要使人類從僱傭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我們就必須壓倒這種人，必須用強力打破他們的反抗，——凡是有鎮壓，有強力的地方，當然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讀者記得，恩格斯在他致伯伯爾的信中很燦爛地說明了這一點，他說：『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復存在了。』

使絕大多數民衆享有民主，而以強力鎮壓那些剝削和壓迫人民的份子，即是把他們摒除於民主制之外，——這便是從資本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內的那種民主制。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當資本家底反抗已被澈底粉碎時，當資本家已被完全消滅時，當階級已不復存在時（即是當社會中各成員在其對社會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已經沒有什麼差別時），只有那時，『國家才會消逝，才可以講到自由。』只有那時，真正完全的，真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制才有可能，才會實現。也只有那時，民主制才會開始消亡，其原因很簡單，就是人們既然已經擺脫了資本主義奴隸制，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制所造成的無數殘暴、野蠻、荒謬和卑鄙現象，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數百年來人所熟知，數千年來一切處世箴言上所重複說明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自動遵守這些規則，而不需要什麼強力，不需要什麼強制，不需要什麼服從，不需要什麼叫作國家的特別強迫機關。

『國家消亡』一語，真是選得非常中肯，因為它既能表明過程底逐漸性，又能表明過程底自發性。只有習慣才能夠而且無疑會發生這樣一種作用，因為我們隨時隨地都可看見，如果沒有剝削，如果沒有一種令人憤恨，引起抗議和起義，使鎮壓成爲必要的東西，則人們是容易習慣遵守他們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規則的。

總之：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看見的民主制，是殘缺的、醜陋的、假冒的民主制，是只供富人享受、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制。無產階級專政，即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第一次給予以人民享受、供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制，同時對少數人、對剝削者實行必要的鎮壓。只有共產主義，才能給予真正完全的民主制，而民主制越完全，它就越迅速地成爲不需要的東西，而自行消亡下去。

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有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即由一個階級鎮壓別一個階級，而且是由少數人鎮壓多數人的特別機器。很明顯的，爲要使剝削者少數來一貫鎮壓被剝削者多數的這樣一種事情獲得成效，就必須採取極兇惡極殘酷的鎮壓手段，就必須造成無數流血慘痛，而這種流血慘痛是人類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和僱傭勞動制度下所確實經歷着的。

其次，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鎮壓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大多數加於少數，被剝削者加於剝削者的鎮壓。特別的鎮壓機關，特別的鎮壓機器，即「國家」，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過渡的國家，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因爲由昨天還是僱傭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這是一種比較容易、簡單而自然得多的事情，因而其中所流的血，將比從前爲了鎮壓奴隸、農奴和僱傭工人起義時所流的血要少得多，人類爲此所耗費的代價要便宜得多。而且這種鎮壓與把民主制普及於絕大多數居民的事是並行不悖的，於是對於特別鎮壓機器的需要性就開始消逝。自然，剝削者若沒有極複雜的鎮壓機器便不能鎮壓人民，但是人民爲了鎮壓剝削者，却只要有很簡單的「機器」，幾乎不要什麼「機器」，不要什麼特別機關，而只要有武裝羣衆底組織（如像工兵代表蘇維埃，——我們且預先在這裏指出一下）就夠了。

最後，只有共產主義才造成完全不需要國家的條件，因爲那時沒有人需要加以鎮壓——所謂「沒有人」是指階級而言，是指對某一部分居民進行有系統的鬥爭而言。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一點也不否認個人過火行動的可能與必不可免，同樣也不否認有鎮壓此種行動的必要。但是，第一，爲着這件事情，却用

不着什麼特別的鎮壓機器，特別的鎮壓機關，這件事情將由武裝人民自己來做，而且做起來是如此簡單容易，好像甚至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羣文明人都很易於和解打架的事或不許虐待婦女那樣。第二，我們知道，違背公共生活規則的過火行動之所由發生的根本社會原因，乃是羣衆被剝削，羣衆陷於飢寒貧困，而這個主要原因一消除，則過火行動就必然會開始「消亡」。其速率和漸進程度如何，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這種過火行動必然歸於消亡，却是我們所知道的。這種過火行動一消亡，則國家也會隨之消亡。

關於這個將來社會的問題，馬克思沒有憑空幻想，而是就現時所能確定的地方加以更詳細的確定，這就是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區別。

三 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

在哥達綱領批評中，馬克思很詳細地駁斥了拉薩爾認為工人在社會主義下將領取「不打折扣的」「全部的勞動產品」的思想。馬克思指明，在全社會底全部社會勞動中，必須扣去一部分作為後備基金，又扣去一部分用以擴大生產的基金，又扣去一部分來補償「用壞了的」機器等等，而後在消費品中，又須取出一筆作為管理經費，作為學校、醫院、養老院等等經費的基金。

馬克思不像拉薩爾那樣用一些含糊不清的籠統語句（「全部勞動產品歸工人」），而是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將不得不怎樣經營的問題作出很清醒的估計。馬克思具體分析那已沒有資本主義存在的社會底生活條件時說道：

『我們這裏所說的』（在分析工人黨底綱領時）『不是在自身基礎上發展了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從資本主義社會

中剛剛產生出來的，因此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智慧方面，都還保留其所由脫胎出來的那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

這個剛剛從資本主義胎胞中出世而在各方面都還保留着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便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

生產資料已經不是某些個人底私有財產，而是屬於全社會所有了。每個社會成員都擔負某一部分社會必需工作，都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個證明他做了若干工作的證書。根據這個證書，他就從公共消費品貯藏所中領取相當數量的產品。於是，除去劃入社會基金的一部分勞動而外，每個工人就從社會方面領得相當於他所貢獻於社會的分量。

這樣，似乎「平等」已經實現了。

但是，當拉薩爾把這樣的社會制度（即通常叫做「社會主義」，而馬克思則稱它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制度）形容為「公平的分配」，形容為『每人享有獲得同等勞動產品的平等權利』時，那末，拉薩爾是錯誤的，而馬克思就來解釋他的這個錯誤。

『我們看見，——馬克思說，——在這裏確實是有「平等權利」，但這還是「資產階級的法權」，它也如任何法權一樣，是以不平等為前提的。任何法權都是把同一標準應用於事實上各不相同，各不相等的人們，因而「平等權利」就是違背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確，每一個人既作出與別人相等的一份社會勞動，他就領得一份相等的社會產品（除上述種種扣除而外）。

然而各個人是不相等的：有的強些，有的弱些；有的是結了

婚的，有的是沒有結婚的，有的兒女多些，有的兒女少些，以及諸如此類等等。

…『在同等的勞動下』，——馬克思做出結論說，——
『亦即在同等享受社會消費品存額的條件下，某一個人實際上所領得的比另一個人多些，某一個人就會比另一個人富些等等。為要避免這一切，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所以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上，還不會有什麼公平與平等：富足程度的差別依然存在，而這種差別是不公平的，但是人剝削人的事情已經是不可能了，因為那時已無法把生產資料——工廠、機器、土地等等——據為私有。馬克思批駁拉薩爾所說一般「平等」與「公平」的小資產階級模糊辭句時，就指明了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行程，這個社會將迫不得已而起初僅僅消滅私人佔有生產資料這一「不公平」現象，却不能夠一下子就消滅『按工作』（而不是按需要）來分配消費品的那種尚屬存在的不公平現象。

庸俗的經濟學家，連資產階級的教授們，連「我們的」杜干³⁶也在內，常常譴責社會主義者，說他們忘記了人們中間的不平等，說他們「夢想」消滅這個不平等。我們看見，這樣的譴責僅僅證明資產階級思想家先生們毫無知識而已。

馬克思不僅極其確切地估量到人們中間不可免的不平等，而且還估計到，僅僅把生產資料轉為全社會公有（普通所講的「社會主義」），還是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資產階級法權」底不平等，這個法權還繼續統治着，因為產品是『按工作』來分配的。

…『但是這些缺點，——馬克思又繼續說，——在共產

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中，在它經過長久的產育苦痛以後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裏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權永不能超過社會經濟結構及由這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發展程度』…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普通稱為社會主義的階段）中，「資產階級法權」還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局部取消，只是在已經達到的經濟改革範圍內，即只是在對於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取消。「資產階級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某些個人底私有財產。社會主義將其變為公共財產。在這個限度內，——且只有在這個限度內，——「資產階級法權」是不復存在了的。

但是，它在其另一部分中却依然存在，它依然是社會各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等量勞動，領得等量產品』這一社會主義原則，也已經實現了。然而，這還不是共產主義，這還沒有消除那種給不相等人們之不等量（事實上不等的）勞動以等量產品的資產階級法權。

這是一個「缺點」，——馬克思說，——但這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若不陷於空想主義，就不能以為一推倒資本主義以後，人們立刻就可學會替社會勞動而不需要任何法權標準；而且資本主義底廢除並不能立刻造成這種變更底經濟前提。

可是除了「資產階級法權」外，便沒有其他的標準。而在這個限度內，就還需要有國家來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來保衛勞動底平等和產品分配底平等。

那時，國家就會消亡下去，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

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麼階級可以鎮壓了。

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那認許事實上不平等現象的「資產階級法權」。爲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就要有完全的共產主義。

四 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馬克思接着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當那奴役人們迫使其服從社會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後；當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已隨之消失後；當勞動已經不單單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爲樂生的第一要素時；當生產力已隨着每個人在各方面的發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財富泉源儘量湧現出來時，——只有那時，才可把資產階級法權底狹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會就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現在我們才可完全認識，恩格斯在無情譏笑那種把「自由」與「國家」兩名詞連接起來的荒謬見解時，是說得如何正確。當國家還存在時，便沒有自由。當有了自由時，就不會有國家了。

國家完全消亡底經濟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社會達到了高度的發展，那時，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會不平等底最重要根源之一已經消失，而這個根源，僅靠生產資料轉爲公有財產，僅靠剝奪資本家，是決不能立刻剷除的。

這種剝奪，會造成生產力極大發展的可能。我們既看見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如何不可思議地阻礙着這個發展，而在現今已經達到的技術基礎上又可以把這個發展推進得多麼迅速，於是我們就

能有十二分把握地說，施於資本家的剝奪，一定會使人類社會底生產力得到極大的發展。但是，這個發展將如何迅速前進，它將如何迅速達到打破分工，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以及把勞動變為『樂生的第一要素』——這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是我們所不能知道的。

因此，我們也就只可以說到國家底必然消亡，着重指出這個過程底長期性，以及這個過程依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底發展速度為轉移；而把消亡底日期或消亡底具體形式問題保留，作為完全沒有解決的問題，因為現在還沒有可供解決這種問題的材料。

當社會已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時，就是說，當人們已如此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底基本規則，而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已如此發展，致使他們自願地盡其所能來工作時，國家才會完全消亡。那時，『資產階級法權底狹隘眼界』，這迫使人們像施洛克³⁷那樣吝嗇地斤斤計較什麼我不要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也不要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就會被打破。那時，產品底分配就會不必要由社會來規定每人領取產品的數量；那時，每一個人都會『按其所需』來自由領取了。

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當然容易把這樣的社會制度叫作「純粹的烏托邦」，並胡說八道，彷彿社會主義者約許每個人有向社會取得任何數量的香菌、汽車、鋼琴等等的權利，而對個別公民底勞動不加以任何的監督。即在今日，大多數資產階級「學者」也還是用這種無理譏嘲來敷衍了事，但他們只是以此暴露他們的愚昧無知，以及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辯護而已。

其所以說是愚昧無知，是因為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會想到要「約許」共產主義高級發展階段的到來，而偉大社會主義者在預

察這個階段將會到來時所推想的前提，既不是現今的勞動生產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因這種庸人猶如波米洛夫斯基小說中的教會學生一樣³⁸，是慣於「無故」損壞社會財富的積貯，且提出不可執行的要求的。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尚未到來以前，社會主義者要求社會和國家對勞動量和消費量實行最嚴格的監督，不過這種監督應以實行剝奪資本家，以及由工人監督資本家來開始，且不是由官僚底國家，而是由武裝工人底國家來施行的。

資產階級思想家（以及他們的走卒，如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之流）對於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辯護，就在他們用一些關於遙遠將來的爭論與空談來替換目前政治上的緊急迫切問題：剝奪資本家，把全體公民變為一個巨大「新迪加」，即整個國家中的工作者和職員，使這個新迪加底全部工作完全服從於真正民主的國家，即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國家。

其實，當博學的教授，以及附和他的庸人，以及附和他的那些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輩先生們說什麼狂妄的烏托邦，說什麼波爾什維克盡惑人心的約許，說什麼不能「施行」社會主義等話的時候，他們正是指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而言。但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是誰也不僅沒有約許，而且連想也沒有想來「施行」，因為它根本是不可「施行」的。

於是我們也就講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區別問題了。這個問題，恩格斯在我們所引錄了的他那段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這一名稱不確當的議論中已經說到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與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間的區別，在政治上說來，將來有個時候大概會是很大的，但現時，在資本主義下，注重這個

區別，便是很可笑了，至於把這個區別提到第一位，那就也許只有少數無政府主義者才能這樣做吧，（如果在克魯泡特金輩、格拉弗、柯爾涅利遜以及其他無政府主義「明星」們『按普列漢諾夫那樣』變成社會沙文主義者，或如一個尚保有廉恥和良心的無政府主義者格所說那樣變成無政府掘壕隊隊員以後，而在無政府主義者當中還有人絲毫沒有學會一點東西的話）。

但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有區別，却是很明顯的。通常所稱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名之為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既然生產資料已變為公共財產，那末「共產主義」一語在此處也是可以應用的，如果不忘記這還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的話。馬克思這些解釋底偉大意義，就是他在這裏也一貫地應用了唯物主義辯證法，發展論，把共產主義看成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東西。馬克思並沒有煩瑣式地臆造和「虛構」過種種定義，也沒有從事於毫無意思的字面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而是分析了可以稱為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成熟性的各個階段。

在其第一階段上，共產主義還不能在經濟上已經完全成熟的，還不能是已完全擺脫資本主義底傳統或痕跡的。由此就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上，仍保留着『資產階級法權底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底分配方面保留着資產階級的法權，於是當然也就要有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因為若沒有一個能夠強迫人們遵守法權標準的機關，則所謂法權便等於零。

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時期以內，不僅會保留着資產階級的法權，甚至還會保留着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即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式的國家！

驟然看來，這好像是強詞奪理，或不過是一種玩弄聰明的辯證把戲，而那些沒有花費過絲毫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異常深刻內容的人們，就是時常這樣來責備馬克思主義的。

其實，新事物中間留下有舊事物殘餘的情形，我們無論在自然界或社會實際生活中是隨時隨地都可看見的。馬克思也並不是任意把「資產階級的」法權塞到共產主義中去，而是指出一種剛從資本主義胎胞中產生出來的社會裏在政治上經濟上所必不可免的東西。

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而謀自身解放的鬥爭中，民主制是有巨大意義的。但民主制決不是一個不可逾越的極限，而祇是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個階段。

民主制底意義就是平等。很明顯的，如果把平等正確瞭解為消滅階級，則無產階級之爭取平等的鬥爭以及平等口號，就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但是，民主制僅僅是形式上的平等。所以，一待社會全體成員對於佔有生產資料的平等實現以後，就是說，一待勞動平等和工資平等實現以後，在人類面前就必然會立刻發生要更進一步的問題，要從表面上的平等進到實際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一原則的問題。至於人類究竟會經過怎樣的階段，究竟用怎樣的實際方法去達到這個最高的目的——這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的。可是，必須認識，資產階級通常把社會主義想像為一種僵死、凝滯、永遠不變的東西的這種觀念，是無限虛偽的，其實，只有從社會主義實現時起，在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所有各方面才會開始發生迅速的、真正的、真是羣衆的，有大多數居民以至全國居民參加的前進運動。

民主制是一種國家形式，是一種國家形態。於是，它如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對人們所施行的有組織，有系統的強力。這是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民主制就是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人家都有平等權利來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而這又與下述一點有連帶關係：在民主制發展底某個階段上，它第一就把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並使其有可能去打碎、粉碎、根本剷除資產階級的——那怕就是共和派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即常備軍、警察和官吏機體，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終究還是國家的機器，即是由武裝的工人羣衆——過渡到全體人民概行參加的民警——所構成的國家機器。

在這裏就是『數變爲質』：這樣高度的民主制，是以越出資產階級社會底範圍，是以開始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這個社會爲連帶條件的。如果真正一切人都參加國家管理，那末資本主義便不能再支持下去了。而資本主義底發展本身又造成使真正「一切人」都能參加國家管理的前提。屬於這種前提的，就是已在許多最先進資本主義國中實現了的人人識字，其次就是千百萬工人被那巨大的複雜的和已經社會化的機關，如郵政、鐵路、大工廠、大商業、銀行事業等等所「訓練和紀律化」。

在這種經濟前提下，就完全有可能來立刻，在二十四小時內，進到實行推翻資本家和官吏，而用武裝的工人，普遍武裝的人民代替他們去從事於監督生產和分配，統計勞動和產品。（不要把監督和統計的問題，與有科學素養的工程師和農藝家等等人員的問題混爲一談：這些先生們今天在資本家管制下工作，明天他們就會在武裝工人管制下更好地工作的）。

統計和監督，就是爲了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安排好，使

它能正確動作所必需的主要條件。在這裏，一切公民都變成國家——武裝工人——底僱員了。一切公民都變成一個全民的、國家的「新迪加」底職員和工人了。全部問題就在於要他們正確遵守工作標準，同等工作，並同等領取報酬。對於這件事情的統計和監督，已由資本主義弄成簡單已極，弄成爲一種非常簡易的，連任何一個識字者都能勝任的視察和登記手續，計算加減乘除和發給相當收據的手續。

當大多數人民都自動地和在到處實行這種統計，實行這種對於資本家（此時已變成了服務人員的資本家）以及對於那些保留着資本主義習氣的智識份子先生們的監督時，於是這種監督就成爲真正包羅萬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了，那時就會無法逃避這種監督，就會『無處可逃』了。

全社會都將成爲一個管理處，成爲一個勞動平等、報酬平等的工廠。

但是，無產階級在戰勝資本家和推翻剝削者以後所推行於全社會的這種「工廠」紀律，絕對不是我們的理想，也不是我們的終極目的，而只是爲要澈底肅清社會上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卑鄙醜惡現象，並爲繼續向前進展所必需的一個階段而已。

當社會全體成員，或至少是絕大部分成員自己已經學會管理國家，自己把這個事務握在自己手中，已經「辦好了」對於極少數資本家的監督，對於那些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的先生們的監督，對於那些深爲資本主義所敗壞了的工人們的監督時，於是任

① 當國家底主要部分的職能，都簡單化爲由工人自己來實行這種統計和監督的時候，國家就不復成爲「政治的國家」，那時『社會職能就由政治職能變爲簡單的行政管理了』（參看本書第四章第二節——恩格斯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何管理的需要，就會根本開始消失下去。民主制愈完備，則它變成贅物的時候便愈逼近。由武裝工人所組成的「國家」——即「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愈民主，則任何國家也就開始消亡得愈迅速。

因為當一切人都已學會管理，而且已在實際上自動地管理社會生產，自動地實行監督那些寄生蟲、老爺、騙子以及諸如此類『資本主義傳統底保存者』的時候，迴避這種全民統計和全民監管的事情，就必然變成極困難，極罕見的例外，而且定會受到極迅速，極嚴厲的處罰（因為武裝工人是實事求是的人，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智識份子；他們未必會讓人來和他們開玩笑），致使遵守人類一切公共生活底簡單基本規則的必要性，很快就會成爲習慣。

到了那時，就會門戶洞開，可以從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進到它的高級階段，而國家也就會完全消亡下去了。

第六章

馬克思主義之被機會主義者所庸俗化

關於國家對社會革命和社會革命對國家的關係問題，也如一般關於革命的問題一樣，是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

- 約·維·斯大林在新的歷史環境中進一步發揮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他按新的方式提出國家消亡的問題。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聯共（波）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內，他闡述了社會主義國家底理論，指明了在蘇聯社會主義已獲勝利並開始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諸條件下國家的職能和任務。（參閱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一九四六年莫斯科外國文書局印行，中譯本第七八九至七九三頁）——編者。

最有名的理論家和政論家所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機會主義逐漸增長而使第二國際在一九一四年陷於破產的過程中，最標本的現象，就是甚至當他們直接觸及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還是竭力來加以迴避，或者不理會它。

一般整個看來，我們可以說，由於在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關係問題上採取了既有利於機會主義又培養機會主義的這種迴避態度，結果就產生出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和把它完全庸俗化。

為要簡括說明這個可悲的過程，我們且拿最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來說吧。

一 普列漢諾夫與無政府主義的論戰

普列漢諾夫著了一本專論無政府主義對社會主義關係問題的小冊子，標名為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這本小冊子是於一八九四年用德文出版的。

普列漢諾夫忽然異想天開的論述這個題目時，竟把反無政府主義鬥爭中最迫切最緊急和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事情，即關於革命對國家的關係和一般關於國家的問題完全避開不談！他的這本小冊子最出色的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歷史文藝的部分，其中包含許多關於斯底納³⁰和蒲魯東等人思想史的寶貴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部分，其中包含鄙陋的議論，說無政府主義者與強盜沒有區別。

題目上的這種配合，不但令人可笑，而且足以特徵普列漢諾夫在俄國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時期中的全部活動：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普列漢諾夫正是表明自己是個半學究，半庸人，在政治上是跟着資產階級底尾巴走的。

我們已經看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與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最詳盡地說明了自己關於革命對國家關係問題的見解。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出版馬克思所著哥達綱領批評時，寫道：『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那時正在同巴枯寧及其無政府主義者作最猛烈的鬥爭——那時距第一國際底海牙代表大會閉幕後還不到二年。』

無政府主義者曾企圖恰把巴黎公社宣稱為『他們自己的』，當作證實他們學說的實例，同時他們完全不懂公社底教訓和馬克思對這些教訓的分析。對於是否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和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它——這些具體政治問題，無政府主義甚至沒有給一個略近真理的解答。

但是，談到『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而把整個關於國家的問題迴避不說，毫不理會馬克思主義在公社以前和公社以後的全部發展過程，這就必然要滾到機會主義方面去。因為機會主義所最要求的，正是完全不提出我們剛才所指出的兩個問題。單是這也就是機會主義底勝利了。

二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考茨基底著作在俄國文壇中的譯本，無疑是比在任何其他國家文壇中多得無可計量。難怪有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戲謔說，在俄國讀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國的還要多些（附帶說說，在這句戲謔話裏含有比說出這話的人所料想的還更加深切的歷史內容：俄國工人在一九〇五年，對世界最優良的社會民主主義文獻作品的需求，表現得非常厲害，空前未有，並且所得到的這些作品的譯本要比其他各國多得無比，這樣就把一個比較先進的鄰國底豐富經驗加速度地移補到我國無產階級運動底所謂年輕基地上

來了)。

考茨基之特別著名於俄國，除了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通俗解釋以外，就是他與機會主義者及其首領伯恩施坦的論戰。然而有一件差不多沒有人知道的事實，如果我們要把考茨基怎樣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最大危機時期中滾到最可恥的錯亂境地和替社會沙文主義辯護的立場上去的情形加以考察，對於這個事實是不能放過不說的。這一事實就是當考茨基起來反對法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米勒蘭和曉勒斯）和德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伯恩施坦）之前，他已經表現了非常大的動搖。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在斯多德牙爾出版，捍衛革命無產階級觀點的馬克思主義曙光雜誌，曾不得不與考茨基爭辯，而把他在一九〇〇年巴黎國際社會黨人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決議叫作「橡皮性的」，因為這個決議對機會主義者所持的態度是曖昧的、躲閃的、並且是調和的。在德國文獻中還刊行過考茨基底信札，這些信札也表明他在奮起攻擊伯恩施坦以前表示過同樣厲害的動搖。

然而，含有更大得無比的意義的事實，就是現在當我們研究考茨基最近叛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時，我們可以看到，在他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中，在他的問題提法和問題解釋方式中，他恰恰在關於國家的問題上一貫傾向於機會主義。

試拿考茨基反機會主義的第一部大著作，即是他著的伯恩施坦與社會民主黨政綱一書來看吧。考茨基詳細地駁斥了伯恩施坦。但是很值得注意的，伯恩斯坦在其遺臭萬年的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一書中，指示馬克思主義為「布朗基主義」（自此以後，俄國機會主義者和自由資產者千百次重復這種指斥來攻擊代表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波爾日維克）。而且，伯恩施坦特別說到馬克思

所著法蘭西內戰一書，企圖——我們已經說過，他這種企圖是毫無成就的——把馬克思對於公社教訓的觀點與蒲魯東的觀點混為一談。伯恩施坦曾特別注意到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對共產黨宣言所作序言中特別着重指出的結論；這個結論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握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伯恩施坦非常「喜愛」這句格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書中把它至少重複過三次，將其極端曲解成爲機會主義的見解。

我們已經講過，馬克思是想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毀壞、炸毀（Sprengung，即炸毀，是恩格斯所應用的字眼）全部國家機器。而在伯恩施坦說來，似乎馬克思是用這句話來警告工人階級不要在奪取政權時採取過分的革命手段。

這真是對馬克思思想之最粗蠻最醜陋不過的曲解了。

而考茨基在他對伯恩施坦主義的最詳細的辯駁中採取了怎樣的態度呢？

他不肯分析機會主義在這一點上絕頂曲解馬克思主義的事實。他把我們在上面引證過的馬克思所著法蘭西內戰一書恩格斯序言中的一段引來後，就說什麼依照馬克思底意見，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握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但它一般地是能夠握取這個機器的，如此而已。至於伯恩施坦把與馬克思真正思想直接相反的東西加在馬克思頭上，至於馬克思從一八五二年起就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要「打碎」國家機器的任務——關於這一切，考茨基却不置一辭。

結果是：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之間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底任問題的最重要的區別，被考茨基抹煞了！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問題，——考茨基在「反

對「伯恩施坦」時說道，——我們可以完全安然留給將來去解決。」（見德文版第一七二頁）

這不是反對伯恩施坦的論戰，而其實是向他讓步，是把陣地讓給機會主義，因為機會主義者此刻所需要的，恰巧祇是要把一切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任務的根本問題都『完全安然留給將來去解決』罷了。

馬克思和恩格思從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九一年，在這四十年當中，教誨無產階級，說它應當打碎國家機器。而考茨基在一八九九年，當機會主義者在這一點上已完全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却玩弄手法，拿打碎國家機器的具體形式問題來替換要不要打碎這個機器的問題，而以『不可爭辯的』（和沒有結果的）庸俗道理，說具體的形式我們不能預先知道這樣的話頭來作護身符！

在馬克思和考茨基之間，在他倆對於無產階級黨應準備工人階級去幹革命的這個任務所持的態度之間，存在有一條不可逾越的深淵。

我們且拿考茨基另一部更加成熟的，也多半是用來駁斥機會主義錯誤的著作來說吧。這就是他那本論社會革命的小冊子。考茨基在這裏把「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制度」問題拿來作為他所特選的題目。他提供了很多非常寶貴的東西，但是恰恰把國家問題迴避過去了。在這本小冊子內到處都只是說奪取國家政權，這就是說，他選擇的語法是向機會主義者讓步的，因為它認許奪取政權而不必破壞國家機器。恰巧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認為在共產黨宣言綱領上已經「陳舊」的東西，考茨基却在一九〇二年把它復活起來了。

在這本小冊子中，又特開一節，專論「社會革命底形式與武

器」。其中講到羣衆政治罷工，講到國內戰爭，講到『現代大國家底權力工具如官僚和軍隊』，但是關於公社已經給予工人的教訓，他却一字不提。可見恩格斯警告工人們，特別是警告德國社會主義者不要「崇拜」國家，並非偶然的了。

考茨基把問題敘述成這樣：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將實現民主綱領』，接着就敘述這個綱領底條款。至於一八七一年在以無產階級民主制來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制這一問題方面所給的新東西，他却不置一辭。考茨基用下面這樣一些「堂皇」動聽的老生常談來敷衍了事：

『不言而喻，在現今制度下，我們是不能得到統治的。

革命本身就預定有一個長期的深刻的鬥爭，這個鬥爭定會改變我們現今的政治和社會結構。』

毫無疑義，這是『不言而喻』的，也如馬吃燕麥，窩爾加河流入裏海的真理一樣。所可惜的，只是他拿空洞而浮誇的，什麼「深刻的」鬥爭一類的話，來迴避下面這個對革命無產階級是很迫切的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對於民主制的態度，比較過去那些非無產階級革命不同的「深刻處」，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考茨基既迴避這個問題，在事實上就是在這最重要的問題上向機會主義讓步，而在口頭上却向先宣佈赫赫可畏的戰爭，強調「革命思想」底意義（試問如果害怕向工人宣傳革命底具體教訓，那末這個「思想」究竟還有多大的價值呢？），或者說「革命的唯心主義高於一切」，或者宣稱英國工人現在「差不多與小資產者不相上下了」。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考茨基寫道，——可以同

時存在着形式上極不相同的各種企業：官僚的（??）、工聯的、合作社的以及私人的企業』…『舉例來說，有些企業非有官僚（??）組織是不行的，——鐵路就是這樣。在這裏，民主組織可以採取如下的形式：由工人選舉代表來組成類似國會的東西，而這個國會就規定工作規則並監察官僚機關底行政。其他企業可以交給工會辦理，另外一種企業則可以按合作社原則組織起來。』（見一九〇三年在日內瓦出版的俄文譯本第一四八頁和第一一五頁）

這個議論是錯誤的，它比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年代拿公社教訓做例子所解釋的，是倒退了一步。

從似乎必須有「官僚」組織方面來看，鐵路是和大機器工業內所有一切企業，是和任何工廠、大商店以及大資本主義農場絕對沒有什麼區別的。在所有這些企業中，生產技術都要求有絕對嚴格的紀律，要求每個人萬分準確執行其所擔負的那一部分工作，不然就會有使整個企業陷於停頓或使機器損壞和產品損壞的危險。在所有這些企業中，工人們當然要『選舉代表來組成類似國會的東西。』

但是全部關鍵就在於這個所謂『類似國會的東西』不會是資產階級國會機關式的國會。全部關鍵就在於這個『類似國會的東西』不會僅僅『規定規則和監察官僚機關底行政』，如像思想沒有超出資產階級國會制範圍以外的考茨基所想像的那樣。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由工人代表組成的『類似國會的東西』，當然會『規定規則和監察』「機關」底「行政」，可是這個機關卻不會是「官僚的」。工人奪得了政權之後，就會把舊的官僚機關打碎，把它根本毀壞，把它粉碎無餘，而代之以仍然是由這些工人

和職員組成的新的機關；爲了防範這些人變成官僚起見，將立即採取那些已經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得很詳盡的辦法：（一）不僅選舉，而且隨時可以撤換；（二）薪水不得高於工人底工資；（三）立刻過渡到使一切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視底職能，使一切人都暫時變成「官僚」，因此就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爲「官僚」。

考茨基完全沒有思索過馬克思底話：『公社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團體。』

考茨基完全沒有瞭解資產階級國會制與無產階級民主制的區別，資產階級國會制是把民主制（不是供人民享用的）與官僚制（反人民的）聯成一氣，而無產階級民主制則會立即採取辦法來根本剷除官僚制，且能夠把這種辦法實行到底，一直到把官僚制完全消滅，把供人民享用的民主完全實現爲止。

考茨基在這裏又暴露了他「崇拜」國家，「迷信」官僚主義的態度。

現在我們進而研究考茨基最後的和最好的一本反機會主義的著作，即他那本到政權之路的小冊子（好像沒有俄文版，因爲它是一九〇九年，在我國反動勢力最猖獗的時候出版的）。這本小冊子是一個大進步，因爲其中不是說到一般革命綱領，像在一八九九年爲反對伯恩施坦而作的小冊子那樣，不是不管社會革命到來時期如何而泛論社會革命底任務，像在一九〇二年著的社會革命小冊子那樣，而是講述那些使我們必得承認「革命時代」正在到來的具體條件。

作者肯定指出一般階級矛盾尖銳化和在這方面起着特別巨大作用的帝國主義。在西歐『一七八九至一八七一年的革命時期』以後，在東方自一九〇五年起也開始着同樣的時期。世界戰爭以

驚人的速度逼臨而來。「無產階級已經不能再說什麼時機未到的革命了」。「我們已經進入革命的時期了」。「革命的時代正在開始」。

這些斷言是完全明顯的。考茨基這本小冊子應作為一個尺度，來測量帝國主義大戰前夜德國社會民主黨曾答應要作什麼，而到戰爭爆發的時候，它（考茨基本人也在內）却墮落到了怎樣下流地步了。「現在的形勢——考茨基在這本小冊子內寫道——會引起一種危險，使人很容易把我們（即德國社會民主黨）視作比現在更溫和的人。」事實上德國社會民主黨却原來比人們所感覺到的還要更溫和得多，更機會主義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考茨基雖然如此肯定說過革命時代已經到來，但是他在那本自稱為專門分析「政治革命」問題的小冊子裏，却又完全迴避了國家問題。

而所有這些迴避問題、甘守緘默、托辭推諉等行為總結起來，就必然產生完全轉到機會主義方面去的事實，關於這個轉向我們現在就要說到。

德國社會民主黨好像以考茨基為代表來聲明說：我保持着革命見解（一八九九年）；我特別承認無產階級底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一九〇二年）我承認革命底新時代已經到來（一九〇九年）；但是，既然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那我就畢竟要違背馬克思還在一八五二年說過的話而向後倒退（一九一二年）了。

在考茨基與潘業枯克的論戰裏，問題正是這樣直截提出的。

三 考茨基與潘業枯克的論戰

潘業枯克以「左翼急進」派代表之一的資格出來反對考茨基，這個派別有盧森堡，拉狄克及其他等人參加在內，極力堅持革命策略，而一致確信考茨基已轉到毫無原則地動搖於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的「中派」立場上。這一見解底正確性已為戰爭所充分證明，此時，「中派」（有人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的派別，這是不對的）或「考茨基派」，已把它全部可憎的卑鄙醜態性完全表露出來了。

潘業枯克在他標題為羣衆行動與革命，而論到了國家問題的一文（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二年第三十卷，第二冊）裏，把考茨基底立場估計為「消極的急進主義」立場，估計為「毫無作爲的等待論」。『考茨基不願看見革命底過程』（第六一六頁）。潘業枯克這樣提出問題後，就談到我們所注意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任務題目。

『無產階級鬥爭——他寫道，——不簡單是爲爭奪國家政權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而是反對國家政權的鬥爭…無產階級革命底內容，就是用無產階級力量底武器去消滅國家力量底武器和消除（直譯爲消散，*Auflösung*）這些武器…只有把國家組織完全破壞，即鬥爭底最後結果已經到來時，戰爭才告終止。人民多數底組織消滅佔統治地位的少數底組織，而以此證明自己的優越性。』（第五四八頁）

潘業枯克用以表示自己意思的措詞，有很大的缺點。但他的意思畢竟是很明顯，且來看看考茨基怎樣去反駁這種意思，倒是很有趣味的。

『直到現在——考茨基寫道，——社會民主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就在於前者想要奪得國家政權，而

後者却想要破壞這個政權。潘業枯克則想要把兩者兼而有之。」（第七二四頁）

如果潘業枯克底議論犯有不明晰和不充分具體的毛病（他論文中的別種缺點，因與本題無關，此地不談），那末考茨基恰恰是把潘業枯克所指出的原則的題旨找到了，而對於根本的原則問題，考茨基却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底立場，完全轉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他對於社會民主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所下的定義是完全不對的，馬克思主義完全被他曲解了和庸俗化了。

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是在於：（一）馬克思主義者以完全消滅國家為自己的目的，認為這個目的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把階級消滅之後，只有當使國家走到消亡的社會主義建成之後，才可以實現；無政府主義者則主張在二十四小時內便完全消滅國家，却不懂得實現這種消滅的條件。（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必須使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完全破壞舊的國家機器，而用新的由武裝工人組織所構成的公社式的國家制度代替之；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破壞國家機器，但他們完全不懂得無產階級應當用什麼去代替它和無產階級將怎樣來運用革命政權；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否認由革命無產階級運用國家政權，否認其革命專政。（三）馬克思主義者主張以利用現代國家為手段來準備無產階級去進行革命；無政府主義者則否認這一點。

在這個爭論中，反對考茨基而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恰恰是潘業枯克，因為馬克思正是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國家政權，就是說，不能簡單把舊的國家機關轉到新人手中來運用，而應當打碎、毀壞這個機關，代之以新的機關。

考茨基離開馬克思主義而走到機會主義者方面去，因為他恰

恰完全抹煞了爲機會主義者所絕然不能接受的這個破壞國家機器的思想，把「奪取」解釋成爲簡單獲得多數，這就恰恰是替機會主義者留下一個穴洞。

考茨基爲掩飾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曲解起見，就採用書獃子的辦法：「引證」馬克思自己底話。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曾說必須使『強力斷然集中於國家政權之手』。而考茨基就洋洋得意地問道：潘業枯克莫不是想破壞「集中制」麼？

這就不過是一套把戲了，正與伯恩斯坦在以聯邦制代替集中制的見解上，把馬克思主義與蒲魯東主義混爲一談的把戲相像。

考茨基所「引證」的話，與本題格格不入。集中制是無論用新的或舊的國家機器都有可能實現的。如果工人們自願地把他們的武裝力量集合起來，這就會是集中制，可是這將是以『完全破壞』國家集中機關——常備軍、警察和官僚——爲基礎。考茨基採用十足的騙子手段，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公社的那些盡人皆知的議論迴避不說，却拖出一些文不對題的引句。

…『也許潘業枯克想要消滅官吏底國家職能麼？——考茨基接着說道，——但是我們就在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內也非有官吏不行，更不待說在國家行政機關內了。我們的政綱不是要求消滅國家官吏，而是要求官吏民選…現在我們所談的，並不是關於在「將來國家」中的行政機關要採取怎樣的形式，而是關於在我們尚未奪得國家政權以前（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我們的政治鬥爭是不是要消除（直譯爲消散 auf löst）國家政權。內閣中有哪一部及其官吏可以消除呢？』於是他就列舉教育部、司法部、財政部、陸軍部。『不，現在內閣中沒有一部可以被我們反政府的政治鬥爭所取消…爲

避免誤解計，我再重說一遍：現在所說的，不是關於得到勝利的社會民主黨將賦予「將來的國家」以怎樣的形式，而是關於我們這個反對黨怎樣去改變現在的國家。」（第七二五頁）

這顯然是欺假手段。潘業枯克所提出的，恰恰是關於革命的問題。這是無論在他那篇論文底標題上或在上邊摘引的那一段文字當中，都說得很明顯。考茨基既跳到「反對黨」問題上去，就恰恰是以機會主義的觀點來代替革命的觀點。他所得出的結論是：現在我們是反對黨，而在奪得政權以後，我們再來特別談論吧。革命就化為烏有了…這正是機會主義者所需求的。

這裏所說的，不是反對黨，也不是一般政治鬥爭，而正是革命。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破壞「行政機關」以及整個國家機關，而代之以由武裝工人構成的新機關。考茨基暴露出自己對於「閣部」的「崇拜」，但試問爲什麼不可以由擁有十足全權的工兵代表蘇維埃所設各種專家委員會去代替「閣部」呢？

問題底本質並不在於將來會是「閣部」仍然存在，還是設立「專家委員會」或其他什麼機關；這些都是完全不重要的。問題底本質就在於是保存舊的國家機器（它與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並且是完全頑固守舊的），抑或要加以破壞而用新的去代替它。革命不應當是由新的階級用舊的國家機器來實行指揮，實行管理，而應當是由新的階級打碎這個機器，用新的機器來實行指揮、實行管理，——這是馬克思主義底基本思想，而考茨基卻把它抹煞掉，或是完全沒有瞭解它。

他提出關於官吏的問題，顯然表明他沒有瞭解公社底教訓和馬克思底學說。「我們就在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內也非有官吏不行」…

我們在資本主義下，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是非有官吏不行的。無產階級受資本主義所壓迫，勞動羣衆被資本主義所奴役。在資本主義下，民主制是被僱傭奴隸制和羣衆貧乏困苦底全部環境所縮小，壓抑和割削得殘缺不全。因此，而且僅僅因此，在我們的政治組織和工會組織內的職員就被資本主義環境所腐化（或者說得更正確些，有一種被腐化的趨勢），以及表現出變爲官僚的趨勢，就是說變爲脫離羣衆而駕於羣衆之上的特權者的趨勢。

這就是官僚主義底實質所在，而當資本家沒有被剝奪以前，當資產階級沒有被推翻以前，甚至無產階級公務人員都不免會相當「官僚化」的。

從考茨基的話語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既然選舉的公務人員將仍然存在，那末在社會主義下，官吏也將仍然存在，官僚制也將仍然存在！這點恰恰不對。馬克思正是按公社底實例而指明的社會主義之下，公務人員將不復是「官僚」，將不復是「官吏」，其所以如此，是因爲除實行選舉制以外，還實行隨時撤換制，而且還實行使薪俸減到工人平均工資的水準，而且還以「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的」機關去代替國會機關。

在實質上，考茨基用以反對潘業枯克的全部論據，尤其是考茨基說我們就在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內也非有官吏不行的那個妙極了的理由，就表明考茨基是重複着伯恩施坦一般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老「理由」。伯恩施坦在他所著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這本叛徒作品中，激烈反對「原始的」民主制觀念，反對他所稱爲「教條式的民主制」的東西：須絕對服從選民所給的委任書制度，不領報酬的公務人員，軟弱無力的中央代表機關等等。爲要證明「原始的」民主制之不中用，伯恩施坦就援引維伯夫婦所解釋的英國

工聯底經驗。據說，工聯似乎是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一三七頁）條件下發展起來的，按其七十年來發展的情形，工聯確信原始的民主制真已毫不中用，乃代之以通常的民主制，即與官僚制結合的國會制。

其實，工聯並不是在「完全自由」條件下發展，而是在完全的資本主義奴隸制度下發展的，在這個制度下，自然對於盛行一時的禍害、強力、不公平以及排斥窮人使其不能參加「高級」行政機關等等的現象，非有種種讓步，是「不行」的。在社會主義下，「原始的」民主制底許多成分是必然要復活起來的，因為，人民大眾在文明社會史上第一次起來不僅實行獨立參加投票和選舉，而且獨立參加日常管理。在社會主義下，一切人都將輪流來管理，於是就會很快地習慣於不要任何人管理。

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頭腦，在公社底實際辦法中所看到了的轉變，機會主義者因畏怯成性，因不願意與資產階級決然脫離關係而害怕它且不願意承認它，無政府主義者則或由於躁急，或由於一般不懂得大規模社會變動底條件而不願意看見它。『連想也不要想去破壞舊的國家機器，我們沒有關部和官吏哪能行得通呵』——機會主義者就是這樣推論的，因為機會主義者滿懷着庸人思想，實際上不但不相信革命與革命底創造性，而且還怕革命怕得要死（如我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害怕革命一樣）。

『祇須去想破壞舊的國家機器，用不着領略過去無產階級革命底具體教訓，用不着分析應當用什麼和怎樣去代替那被破壞了的東西，』——無政府主義者（當然是指無政府主義者中的優秀份子，而不是那些跟着克魯泡特金先生一流人去做資產階級尾巴

的無政府主義者)就是如此推論的;所以無政府主義者所得出的策略就是一種絕望底策略,而不是那種勇敢無情、同時又注意到羣衆運動實際條件、用以解決具體任務的革命工作底策略。

馬克思教我們要避免這兩種錯誤,教我們極勇敢地去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同時又教我們具體提出問題:公社在數星期間就能開始創造一個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並作出實行上述種種辦法來擴大民主制和根絕官僚主義的榜樣。我們將效法公社社員底革命勇氣,我們將把他們的實際辦法當作是指示實際迫切且立刻可能實現的辦法,那時,我們既按這樣的道路前進,就能達到完全破壞官僚主義。

實現這種破壞的可能性是有保證的,因為社會主義將縮短工作時間,將推動羣衆去過新生活,將使大多數居民一無例外地都可執行「國家職能」,而這也就會一般地使任何國家都完全消亡下去。

…『羣衆罷工底任務——考茨基繼續說道,——無論何時都不能是破壞國家政權,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某問題上採取讓步態度,或用一個遷就(entgegenkommende)無產階級的政府去代替敵對無產階級的政府…可是,無論何時,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這(即無產階級對於敵對政府的勝利)不能造成國家政權底破壞,而只能引起國家政權內部勢力對比底相當變動(verschiebung)…於是我們政治鬥爭底目的也如從前一樣,仍然是以取得國會中大多數為手段來奪取政權,並使國會變成爲駕於政府之上的主人翁。』(第七二六,七二七,七三二頁)

這就是最純粹、最鄙陋的機會主義,在口頭上承認革命而在

行動上則背叛革命了。考茨基底思想僅限於要一個『遷就無產階級的政府』——這較之一八四七年共產黨宣言所宣佈的『無產階級組織成爲統治階級』這一原則，是倒退到庸人思想方面去。

考茨基祇須實現他所愛好的與謝德曼輩、普列漢諾夫輩以及王德威爾得輩的「統一」，因爲所有他們共同的鬥爭目標，也就是造成『遷就無產階級的』政府。

我們則要實行和這些背叛社會主義的叛徒們分裂，而爲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奮鬥，務使武裝無產階級自己成爲政府。這真是『天大的區別』。

考茨基祇須同列金輩、達維德輩、普列漢諾夫輩、波特列索夫輩、策烈鐵里輩和切爾諾夫輩這些親熱伙伴們同處，因爲他們都完全贊成爭取『國家政權內部勢力對比底變動』，爭取『國會中的大多數和爭取支配政府的全權國會』，這是極高尚的目的，其中一切都是機會主義者所可接受的，其中一切都是始終不超出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範圍以外的。

我們則要實行和機會主義者分裂；而整個覺悟無產階級就會隨同我們一塊鬥爭，不是爲爭取『勢力對比底變動』，而是爲推翻資產階級，爲破壞資產階級國會制，爲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國或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共和國，爲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而鬥爭。



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有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別，如在德國有社會主義月刊派（列金、達維德、科爾布以及其他許多人，包括斯塔的那維亞人斯道寧格和布蘭亭在內），在法國和比利時有曉勒斯派和王德威爾得，在意大利黨內有居拉梯、特列維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國有費邊派和「獨立黨人」（即「獨立工黨」，

其實是一個始終依賴自由派的)，以及諸如此類等等。所有這些先生們，在國會黨團工作裏和在黨底政論方面起着很大的，而且往往是統治的作用，他們公開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鼓吹毫無掩飾的機會主義。在這班先生們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與民主相「矛盾」的！他們在實質上却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毫無重大的區別。

我們根據這一情況，可以作出結論說：第二國際絕大多數正式代表們已經完全滾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公社底經驗不僅被他們遺忘，而且被他們曲解了。他們不但沒有教導工人羣衆說，快到工人們應當發動起來的時候，那時務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而用新的代替它，並這樣來把自己的政治統治變為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社會的基礎；——他們不僅沒有這樣作，反而教導工人羣衆以相反的東西，且用他們的『奪取政權』的方法，替機會主義留下千百處逃身穴洞。

當國家連同其因帝國主義比賽而加強的軍事機關，已變成軍事怪物來屠殺千百萬人民底生命，以解決這一爭執：究竟是由德國或英國，由這個或那個財政資本來統治世界的時候，把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關係問題曲解和隱諱起來，是不能不起極大作用的。

● 在手稿內還有如下一段：

初 版 書 後

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八九兩月寫的。我當時已擬定了下一章，即第七章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底大綱。但是除題目以外，我簡直一行字也未來得及寫成，因為被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機所「妨礙」了。這種「妨礙」只可引為慶幸。但是，本書第二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也許要延擱一個長的時期；因為作出「革命底經驗」總是比論述「革命底經驗」更為愉快，更為有益。

作 者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彼得格拉

寫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一九一八年
印成單行本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
七年版，第三卷，第一至一〇四頁

第 七 章

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

本章所標明的題目，如此廣闊無垠，是可以而且應當寫幾卷書來論述它的。在這本小冊子中，當然只好限於說明那些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對國家政權的任務有直接關係的最主要的經驗教訓。（手稿在此截止。——編者）。

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

蘇維埃代表大會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

告工人、兵士和農民的宣言

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了。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有絕大多數蘇維埃選派的代表。代表大會上也有很多農民蘇維埃代表參加。妥協派把持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底職權從此完結了。代表大會憑靠着絕大多數工人、兵士和農民意志，憑靠着工人和防軍在彼得格拉所實現了的勝利起義，業已把政權掌握到自己手中。

臨時政府已被推翻了。臨時政府大多數委員已被逮捕了。

蘇維埃政權將向各國人民提議立刻締結民主和平，並在一切戰綫上立刻休戰。蘇維埃政權將保證把地主、皇室和寺觀的土地概無報償地轉交農民委員會處理，將實行軍隊充分民主化，以捍衛兵士底權利，將建立工人監督生產制，將保證按時召集立憲會議，將設法供給城市的糧食和供給鄉村的首要日用品，將保證俄國境內所有一切民族都享有真正自決權。

代表大會議決：各地全部政權一律轉歸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各地蘇維埃也就應負責保證真正的革命秩序。

代表大會號召前綫兵士應具有警覺性和堅定性。蘇維埃代表大會堅信革命軍隊在新政府尚未爭得締結其將直接向各國人民提出的民主和平以前，定能捍衛革命，使其不受帝國主義的任何侵犯。新政府將採取一切辦法，實行向各有產階級徵發和收稅的堅決政策，以此來保證革命軍隊的一切需要品，並改善兵士家屬底生活。

科爾尼洛夫黨徒——克倫斯基、卡列金及其他人等——正企圖調遣軍隊到彼得格拉來。有幾個被克倫斯基用欺騙手段調動的隊伍已經轉到起義民衆方面了。

兵士們，積極反抗科爾尼洛夫黨徒克倫斯基呵！小心戒備着呵！

鐵路工作人員們，阻止克倫斯基派往彼得格拉的一切兵車呵！

兵士們、工人們、職員們，革命底命運與民主和平底命運完全握在你們手中呵！

革命萬歲！

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
農民蘇維埃代表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舊曆十月二十六日）刊載於工人與兵士報第九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三〇一至三〇二頁

關於和平問題的報告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和平問題是現時最緊急，最迫切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講得很多，寫得很多，想必你們大家對於這個問題也有過不少的討論。因此讓我來宣讀這個應由你們選出的政府來頒佈的宣言吧。

和 平 法 令

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革命所建立起來並憑靠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工農政府，向一切交戰國人民及其政府提議，立刻開始進行正義民主的和平談判。

本政府認為，一切交戰國中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痛苦不堪、備受摧殘的工人和勞動階級絕大多數所渴望，而為俄國工農在推翻沙皇帝制後所極肯定堅決要求的正義的或民主的和平，乃是必須立刻締結的不兼併（即是不侵佔別國土地，不強迫合併別的民族）和不賠款的和平。

俄國政府向一切交戰國人民提議立刻締結這樣的和平，並決意毫不遲延地，不待各國和各民族底人民代表會議最終批准這一和約底全部條件，就馬上採取一切堅決步驟。

本政府根據一般民主派底法權意識，特別是勞動階級底法權

意識，認為凡是把弱小民族合併於強大國家而沒有得到這一民族所明確自願表示出的同意和願望，都是兼併或侵佔他國土地的行爲，並不管這種強迫合併是何時實行的，不管被強迫兼併或被強迫拮据在別國境內的這民族之發展或落後的情形如何，最後，不管這個民族是住在歐洲或是住在遠隔大洋的國家中，都是一樣。

如果某個民族被強力拮据在別國境內，如果違反這一民族方面的願望，——不管這個願望是表示在刊物上、人民大會上、政黨決議上、抑或表現於反對民族壓迫的激動和起義上，都是一樣，——而不給這個民族以權利，使之能在完全撤退兼併國軍隊或任何較強民族底軍隊條件下，不受絲毫強制地、用自由表決方法來解決這個民族底國家生存問題，那末合併這民族的行爲便是兼併，亦即侵佔或暴力行爲。

本政府認為，爲了各富強國家來如何瓜分它們所侵佔的弱小民族而繼續這次戰爭，便是反人類的莫大罪行，所以鄭重聲明，決意根據上述對一切民族都是同樣正義的條件，立刻訂立停止這次戰爭的和平條約。

同時本政府聲明，決不認為上述和平條件是最後通牒式的條件，即是說，它同意考慮其他任何和平條件；所堅持的，只是交戰國任何一方提出這種條件都要儘量迅速，條件本身要提得極端明顯，要絕對排除任何含糊和任何祕密。

本政府廢除祕密外交，決意在全體人民面前完全公開進行一切談判，立刻着手把地主資本家政府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起至十月二十五日止所批准或締結的祕密條約完全公佈出來。既然這些祕密條約底全部內容往往大半是使俄羅斯地主和資本家獲得利益和特權，使大俄羅斯人保持或加強兼併，所以本政府宣佈這些條約

無條件地立刻作廢。

本政府向各國政府和人民提議立刻開始公開進行媾和談判時，同意或用電報交換公文，或由各國代表互相談判，或在各國代表會議上舉行討論等方法，來進行這種談判。爲了便利這種談判起見，本政府特派自己的全權代表到各中立國去。

本政府向一切交戰國政府和人民提議，立刻締結休戰條約，同時認爲這休戰期間要至少是三個月，俾使所有捲入戰爭或被迫參戰的一切民族代表所參加的和平談判完全可能結束，同時又使各國人民代表會議完全可能召集起來最終批准和平條約。

俄國臨時工農政府向一切交戰國政府和人民作此種媾和提議時，又特別向人類三個最先進民族和此次戰爭中三個最大參戰國，即英法德覺悟工人們呼籲。這些國家的工人對於進步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貢獻最多，如英國憲章運動之偉大模範，法國無產階級實行過多次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革命，最後，德國工人之反非常法令的英勇鬥爭，以及爲建立德國無產階級羣衆組織所進行的那種足爲全世界工人模範的長期堅強而有紀律的工作。所有這些無產階級英勇精神和歷史創舉底模範，都使我們堅信上述各國工人定會瞭解他們現在所擔負的，使人類擺脫戰禍及其惡果的任務，因爲這些工人定會以各方面的、堅決的、竭誠努力的活動，來幫助我們把和平事業以及使被剝削勞動民衆擺脫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的事業順利進行到底。



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革命所建立起來並憑靠於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工農政府，應當立刻開始和平談判。我們的呼籲應當是既向各國政府，也向各國人民發出的。我們不能漠視各國政

府，因為這樣就會使訂立和約的機會遷延下去；而人民政府是不應當這樣作的，但是我們沒有任何權利不同時也向各國人民呼籲。各國政府與人民之間到處都是分歧的，所以我們應當幫助各國人民來干預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我們自然要極力堅持我們所主張的不兼併不賠款的全部和平綱領。我們決不會放棄這個綱領，但我們應當不讓敵人有可能來說，他們的條件是另一種性質的，所以無須來同我們進行談判。我們不應該這樣做，應當使他們無機可乘，而不用最後通牒的方式提出我們的條件。所以也就加入了一項，說我們同意考慮任何和平條件與一切提議。我們同意考慮，這並不是說我們就去接受。我們把這些條件和提議提到立憲會議上討論，立憲會議將有全權來決定，什麼是可以讓步的，什麼是不能讓步的。我們要與各國政府底欺騙手段作鬥爭，這些政府都是口頭上講和平、講正義，而實際上在進行強盜侵略戰爭。沒有一個政府會將它所想的事情全部都說出來。我們却是反對秘密外交，所以定要在全體人民面前公開行動。我們不忽視困難，而且沒有忽視過困難。戰爭是不能用拒絕的辦法來結束的，戰爭是不能由單方面來結束的，我們提議休戰三個月，可是我們也不拒絕更短的休戰期，好使疲憊了的軍隊可以在相當時期中喘息一下，此外在一切文明國家中都必須召集國民大會來討論和平條件。

我們提議立刻締結休戰條約，同時就向那些在發展無產階級運動方面有過許多貢獻的國家中的覺悟工人呼籲。我們既向作過憲章運動的英國工人呼籲，也向屢次在起義中表現過其全部階級覺悟力量的法國工人呼籲，也向經歷過反對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令的艱苦鬥爭並建立了強大組織的德國工人呼籲。

在三月十四日的宣言中，我們曾提議推翻銀行家，但自己不但沒有推翻本國的銀行家，而且甚至和他們締結了聯盟。現在我們已把銀行家政府推翻了。

這個政府和資產階級會盡心竭力以圖彼此聯合起來，而把工農革命沈沒於血泊裏面。可是三年戰爭使羣衆獲得了充分的教訓。其他國家中也發生了蘇維埃運動，在德國有被劊子手威廉底容克軍官們鎮壓下去了的海軍起義。最後，要記着，我們不是住在非洲荒漠中，而是住在歐洲，這裏一切事情都是很快就可知道的。

工人運動定會佔上風，定會開關達到和平與社會主義的道路。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舊曆十月二十七日 and 二十八日）分載於中央執委新聞報第二〇八期和真理報第一百七十一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三〇三至三〇七頁

三

關於和平問題報告的結論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我不來說宣言底一般性質。你們代表大會將要成立的政府，對於個別不大重要的條款可以提出改變。

我要堅決反對把我們對和平的要求用最後通牒方式提出。最後通牒的方式可以葬送我們的全部事業。我們不要由於與我們的條件有某些細微出入，遂使帝國主義政府可能藉口說，因為我們抱着毫不調和的態度，所以無法進行和平談判。

我們要把我們的宣言到處散發，使大家都能知道。要想隱瞞我們工農政府所提出的條件是不可能的。

要想隱瞞我國推翻了銀行家和地主政府的這個工農革命，是不可能的。

若用最後通牒的方式，各國政府就會置之不理，若採用我們提出的條文，則各國政府就一定要回答的。讓各國每個人都知道，他們的政府究竟想的是什麼。我們不願意祕密談判，我們願意使政府隨時都在本國輿論監督之下。

如果由於我們的最後通牒方式以致某一個遼遠邊區的農民無從知道別國政府是想的什麼時，那他會怎樣說呢。他就會說：同志們，為什麼你們排除了提出各種和平條件的可能呢。我本想來

討論討論這些條件，審查審查這些條件，然後就叫我的那些出席立憲會議的代表們怎樣去對付就行了。如果別國政府不同意的話，那我就決意用革命手段來為正義的條件鬥爭，可是，也許對某些國家說來真會造成一種條件，竟使我要決意向這些國家的政府提議，由它們自己去繼續爭鬥吧。我們的思想：只有推翻全部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完全實現。這就是農民所能對我們說的話，他還會責備我們在小節上也太不讓步了，其實我們主要的任務，是要揭破資產階級及其派去充當政府首領的君主或非君主劊子手們所幹的全部卑鄙可惡行為。

我們不可以，而且不應當使各國政府可能藉口說我們不肯讓步，而向人民隱瞞其驅使他們走上殺場去的目的。這只是滴穿資產階級侵佔行為這如同頑石般的一滴水，可是我們不可以而且不應當拒絕這一滴水。最後通牒方式就會幫助我們的敵人，減輕他們的困難地位。我們要把一切條件都告訴人民。我們要把我們的條件向各國政府提出，讓它們去回答它們本國的人民吧。我們要把一切和平提議都提交立憲會議去解決。

同志們，條文中還有一項是你們應當仔細注意的。秘密條約一定要公佈。關於兼併與賠款的條款一定要廢除。同志們，有各種各樣的條款，——強盜政府彼此間不只是訂立關於搶劫的協定，而且在這種協定中，也包括有一些關於經濟協定以及其他關於友善邦交的條款。

我們既不用條約來拘束自己，也不讓別人用條約來束縛我們。我們拒絕一切關於搶劫和暴力的條款，但凡是關於友善條件和經濟協定的條款，我們都是樂於接受的，這樣的條款我們決不能拒絕。我們提議休戰三個月，我們其所以選定這樣長的期間，

是因爲各國人民被這延長到三年以上的血腥戰禍弄得疲憊不堪，渴望休息休息。我們應當懂得，必須讓各國人民來討論和平條件，要他們在有國會參加之下表示自己的意志，爲此就必須有足夠的時間。我們之所以提出長期休戰，是要使終日備受屠殺慘禍的前線軍隊得到休息，可是我們也不拒絕更短休戰期間的提議，我們要把這種提議加以考查，並且我們定要接受這種提議，那怕是向我們提議休戰一個月或一個半月都好。我們關於休戰的提議也不應當是最後通牒式的，因爲我們決不讓敵人藉口於我們毫不調和來向人民隱瞞全部真象。休戰提議決不應當是最後通牒式的，因爲不願休戰的政府便是犯罪的政府。假使我們不把關於休戰的提議用最後通牒方式提出，那我們就能迫使各國政府在本國人民面前成爲罪魁，而人民對於這樣的罪魁是不會客氣的。有人會反駁我們說，我們不採用最後通牒方式，便是表示我們軟弱無力；可是現在已是要把資產階級方面所謂人民力量的全部謊語拋掉的時候了。在資產階級看來，只有當羣衆服從帝國主義政府底意旨，盲目跑上殺場去的時候，才算是有力量。只有當國家能用政府機關底全部權力，按資產階級當局意志，隨便把羣衆拋到什麼地方去的時候，資產階級才承認這個國家是強有力的國家。我們對於力量的見解却是另一樣的。照我們看來，國家之所以強而有力，是由於羣衆有覺悟。只有當羣衆能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能自覺地去進行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是強有力的。我們絲毫用不着害怕說出關於疲憊的真象，因爲試問現在有哪一個國家不疲憊，有哪一國人民不公開說出這種情形呢？且拿意大利來看吧，在那裏，由於這種疲憊而產生了要求停止戰爭的長期革命運動。難道在德國不是發生了喊出停戰口號的工人羣衆示威運動

麼？難道劊子手威廉及其奴僕們所無情鎮壓了的德國海軍起義不是由於疲憊所引起來的麼？既然在像德國這樣有紀律的國家中都能發生這樣的現象，都開始說到疲憊，說到要停止戰爭，那我們絲毫也用不着害怕公開講出這點來了，因為這是真情，無論對於我國或一切交戰國，甚至非交戰國，都是確實的真情。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舊曆十月二十八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一百七十一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三〇八至三一〇頁

四

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我們認為革命已經證明並表明出，把土地問題提得十分明顯是非常重要的。武裝起義，第二次革命，即十月革命之發生已顯然證明應當把土地交給農民。已被推翻的政府以及實行妥協政策假借各種口實來拖延土地問題的解決，因而把國家弄到經濟破壞並激起農民起義的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是犯了莫大的罪惡。他們所說的鄉村中的騷亂和無政府狀態，顯然是謊言和怯懦的欺騙手段。試問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有因合理辦法而引起騷亂和無政府狀態的呢？假使政府底舉動是合理的，假使它所施行的辦法適合貧農的需要，難道農民羣衆還會激動起來嗎？但是政府所採取的，也就是亞甫克森和唐恩領導的蘇維埃所贊同的一切辦法，都是反對農民，這便迫使農民不得不舉行起義。

這個政府既引起了起義，却又來把自己所引起的這種現象高喊爲騷亂和無政府狀態。政府本想用鐵和血來鎮壓起義，可是它自己却被革命兵士、水兵和工人底武裝起義所剷除了。工農革命政府首先應當解決土地問題，這個問題是可以安慰和滿足極大量貧農羣衆的。現在我向你們宣讀應由你們蘇維埃政府頒佈的法令條文。這法令中有一條內載入了根據二百四十二個地方農民代表

蘇維埃委託書所制定的給各土地委員會的委託書。

土地法令

(一) 立刻毫無報償地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

(二) 地主的田莊以及一切皇室和寺觀教堂的土地，連同耕畜農具，莊園建築和一切附屬物，都一律轉交區土地委員會和縣農民代表蘇維埃支配，直到立憲會議解決時為止。

(三) 對於沒收來的財產，即今後已屬全民公有財產之任何損害行動，一律認為是應受革命法庭懲辦的嚴重罪行。縣農民代表蘇維埃應採取一切必要辦法來保證在沒收地主田莊時遵守最嚴格的秩序，決定應沒收的是某些地段以及這些地段底大小，編造全部被沒收財產的確切冊據，用革命手段嚴格保護轉歸人民所有的土地上的產業及一切建築物、工具、牲畜和儲存的食物等等。

(四) 實現偉大土地改革的方針，在立憲會議對於這些改革尚未作最終決定之前，到處都應以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新聞報編輯部根據二百四十二個地方農民委託書製定的農民委託書為基礎，這個委託書已公佈在該報第八十八期上（彼得格拉，第八十八期，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九日）。

(五) 普通農民和普通哥薩克底土地概不沒收。

關於土地問題的農民委託書

『土地問題只有全民立憲會議才能加以全盤解決。』

解決土地問題的最公正辦法應如下：

(一) 土地私有權永遠廢除；禁止土地買賣、租佃或抵押，以及任何其他方式的讓渡。

全部土地：國家的、皇室的、閣部的、寺觀的、教堂的、租有的、嫡長繼承的、私人的、公共的和農民的等等土地，概無報償，取消其原主所有權，轉為全民財產並交歸一切耕種土地的勞動者使用。

因財產制改革而受到損失的人，只有在為適應新生活條件所必需的那時間內，才有權享受社會的幫助。

(二) 所有地內蘊藏：鑛產、煤油、煤炭、食鹽等等，以及有全國意義的森林和水利，一律轉歸國家享用。一切小河、小湖、小森林等等轉歸村社使用，但必須由地方自治機關管轄。

(三) 凡屬具有高度技術的農場地段，如菓園、種植場、苗圃、溫室等等不得分割；而應改為模範農場，並視其範圍大小和意義如何，一律轉歸國家或村社使用。

城市和鄉村中的莊園土地連同家有菓園和菜園，仍歸原主使用，同時這種地段之大小和因使用而應繳納稅額之多寡，概由立法手續規定之。

(四) 養馬場、官有和私人的純種牲畜場和純種家禽場等等，概行沒收，轉為全民財產，並視其大小和意義如何，一律轉歸國家或村社使用。

關於贖金問題應由立憲會議審核之。

(五) 所有已被沒收土地上的耕畜和耕具，視其大小和意義如何，概無報償一律轉歸國家或村社使用。

地少農民底耕畜和耕具不在沒收之列。

(六) 俄國全體公民（不分性別），凡願意用自己的勞動，在自己的家口幫助下，或組織共耕社來耕種土地者，都

可獲得土地使用權，但僅以他們有力耕種土地時爲止。禁止僱傭勞動。

凡村社社員偶然喪失勞動力在兩年以內時，該村社必須在該員尙未恢復勞動力前這期間內，用共耕辦法予以幫助。

凡農人因年老或殘廢而永遠無法自耕土地時，便喪失其土地使用權，但因此可以領得國家撫卹金。

(七) 土地使用制應當是平均的，即是把土地依地方條件，按勞動標準或消費標準分配給勞動者。

土地使用方式應當是完全自由的，可以根據各個鄉村的決議，隨便採用按戶、按村、按村社、按協作社的方式來耕種。

(八) 全部土地從其脫離原主之日起，即劃入全民公有地產總額中。關於分配土地給勞動者的事宜，由地方和中央自治機關——自按民主原則組成的無等級的城鄉公社起至各省中央機關止——掌管之。

地產應視居民增長以及農業生產率和技術之提高程度如何而舉行定期的重新分配。

當改變份地界限時，份地上原來歸某人享用的基本地段應保存下來，不得加以更變。

因故離村者底土地，應歸還地產總額中，同時離村者底家屬或離村者所指定的人，有領得離村者所遺下地段之優先權。

因增加肥料和根本改良田土所耗費的價值，在將土地交還地產總額中時，其尙未使用部分，應予以報償。

若個別地方現有地產不夠滿足當地全體居民需要時，則

多餘的人口應遷往他處。

移民事宜以及移民費用和農具供給等等概由國家負擔。

移民應按下列次序辦理：首先是自願遷移的無地農民，其次是行為不端的村社社員，逃兵及其他此類人等，最後，是用抽籤或商妥的辦法。』

這個委託書底全部內容既是全俄絕大多數覺悟農民唯一的願望，着即宣佈其為臨時法律，並應在立憲會議尚未開幕之前儘可能立刻實行，其中某些部分必須逐漸施行時，則由縣農民代表蘇維埃決定之。



在這裏有人喊道，這個法令和委託書原是社會革命黨人所製定的。就讓它這樣吧。無論是誰製定的，豈不都是一樣嗎，我們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不顧及下層民衆底決議，那怕我們是不同意這個決議的。把這個決議運用到實際中去，在各地實行起來，農民自己就會在生活考驗中懂得，究竟真理何在。即令農民甚至會繼續贊成社會革命黨人，即令他們甚至會使該黨在立憲會議上獲得多數，那我們也還是要說：就讓它這樣吧。生活是最好的教師，生活會指明出誰是正確的，就讓農民從這一頭，我們從另一頭來解決這個問題吧。生活會使我們兩者在革命創造工作的總流中，在製定新的國家制度事業中接近起來的。我們應當跟隨生活走，我們應當讓民衆享有完全發揮其創造精神的自由。已被武裝起義推翻了的舊政府，曾想藉助於沒有更換的舊時沙皇官僚，來解決土地問題。可是這些官僚不但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反而一味反對農民。農民在我國八個月的革命時期中，已學會了一些東西，他們自己想解決關於土地的一切問題。所以我們反對在這個

法令草案中加以任何修正，我們不想把它詳細規定，因為我們寫的是法令，而不是行動綱領。俄國幅員廣大，各地條件不同；我們相信農民自己會比我們更善於正確適當地解決問題。究竟是按照我們的方式，還是按照社會革命黨人綱領的方式，問題底實質並不在這裏。問題底實質是在於使農民堅信鄉村中再沒有地主了。讓農民自己去解決一切問題吧，讓他們自己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吧。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舊曆十月二十八日）刊載於中央執委新聞報第二百〇九期和真理報第一百七十一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外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三一一至三一五頁

關於工人監督條例草案

(一) 在僱用工人職員共計五人和五人以上，或每年資金週轉在一萬盧布以上的一切工業、商業、銀行、農業等等企業中，施行由工人監督一切產品和原料之生產，保存和買賣事宜的辦法。

(二) 工人監督，在小企業中則由全體工人和職員直接實行，在其他情況下則經過其所選出的代表實行之，此種代表應立刻在全體大會上選出，須有選舉記錄，並須把被選人姓名通知政府和當地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三) 非經工人職員所選代表之同意，絕對禁止具有全國意義的企業或工廠（參看第七條）停工，以及對生產進程作任何改變。

(四) 一切賬簿文件及一切倉庫和儲存的原料、工具、產品等，應一無例外地向工人和職員選出的代表公開。

(五) 凡工人和職員選出的代表底決定，企業主必須服從，只有職工會和代表大會才有權取消這種決議。

(六) 在一切有全國意義的企業中，一切企業主和一切由工人職員選出行使工人監督權的代表，概應對國家負維持嚴格秩序、紀律和保護財產之責。凡犯有玩忽怠慢、隱瞞存貨和賬目等

等罪行者，除沒收全部財產外並處以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七) 凡為國防事業工作以及與生產民衆生活必需品有關的企業，概認為是有全國意義的企業。

(八) 工人監督辦法細則，由各地工人代表蘇維埃以及工廠委員會代表會議和職員委員會之全體代表會議規定之。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舊曆三日）

刊載於真理報第一百七十八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

版，第三卷，第三一七至三一八頁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

中央委員會宣言

告全體黨員及俄國一切勞動階級

同志們！

大家知道，在第二次全俄工兵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黨代表佔了大多數。

這個事實是爲要瞭解剛在彼得格拉和莫斯科以及全俄各地發生了並獲得了勝利的革命所必須知道的基本事實。正是這個事實常常被資本家底一切擁護者和不自覺的幫手，即破壞新革命之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基本原則的人所置諸腦後而避開不說的。俄國除了蘇維埃政府外，決不應當有別政府。在俄國，已經奪得了蘇維埃政權，並保證使政府從一個蘇維埃政黨手裏過渡到另一個蘇維埃政黨手裏，能簡單由蘇維埃決議，簡單由改選蘇維埃代表的辦法來實現，而不必經過任何的革命。

在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黨佔了大多數。所以，只有由這個黨所組織的政府才算是蘇維埃政府。人家知道，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在成立新政府和把政府委員名單提交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批准的幾點鐘前，曾邀請三位著名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即卡姆科夫、斯皮羅和卡列林三同志來參加自

已的會議，並請他們參加新政府。我們深為惋惜的，就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同志竟拒絕了這一提議，我們認為他們這樣拒絕，是革命者和擁護勞動羣衆利益的人所不容許有的行爲，我們隨時都願意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接納到政府中來，可是我們聲明，我們既是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多數黨，不僅有權，而且要在人民面前義不容辭地組織政府。

大家知道，我黨中央委員會向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提出了純粹是波爾什維克的人民委員名單，並且代表大會也批准了這個純粹是波爾什維克的政府委員名單。

所以那些說什麼波爾什維克政府不是蘇維埃政府的種種欺騙聲明，是絕對撒謊，只有人民公敵，只有蘇維埃政權底敵人，才能說出這樣的謊話。恰恰相反，只有波爾什維克政府，現時，在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後，直到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集時止，或直到蘇維埃改選時止，或直到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新政府時止，只有波爾什維克政府才可承認爲蘇維埃政府。

★

同志們！有幾個我黨中央委員和人民委員會委員，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諾根、李可夫、米留亭及其他幾人，在昨天，十一月四日退出了我黨中央，而後面這三個人並退出了人民委員會。在我們這樣大的黨裏，雖然我們的政策方針是實現無產階級革命，也難免有個別同志在和人民之敵作鬥爭中表現缺乏堅定果決精神的事實。目前擺在我黨面前的任務真是極其宏偉，而困難也是很大的，——於是有些以前負責重的我黨黨員，隨着資產階級進攻時動搖了，並從我們隊伍中逃跑了。全體資產階級及其一切幫手們因此歡天喜地，幸災樂禍，高喊什麼波爾什維克

政府塌台了，預言波爾什維克政府將要傾覆。

同志們！不要相信這些謊話。逃跑同志底行爲簡直像逃兵底行爲一樣，不僅拋棄了付託他們的職位，並且破壞了我黨中央委員會要他們至少等到彼得格拉和莫斯科黨組織決議後再行退出的直接決議。我們堅決責斥這種臨陣脫逃的行爲。我們堅信，凡身爲我黨黨員或同情我黨的覺悟工人、兵士和農民，也都會這樣堅決責斥這些逃兵的。

可是，我們聲明，我黨幾個上層份子底臨陣脫逃行爲，連絲毫連一分鐘也不會動搖那些擁護我黨的羣衆底一致，因而也就不會動搖我們的黨。

同志們總還記得，這些逃兵中的兩個，即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彼得格拉起義前就已表現過逃兵和工賊的行爲，因爲他們不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那有決定意義的中央會議上表決反對起義，而且在中央通過決議之後，竟在黨工作人員面前鼓勵反對起義。大家知道，那些害怕站到工人方面，而多半趨向於資產階級方面的報紙（如新生活報）當時都隨同一切資產階級刊物大喊大叫，說什麼我黨「塌台了」，「起義破產了」等等。可是實際生活很快就推翻了這一些人底謊言和譁譟以及另一些人底懷疑動搖和怯懦。人們想藉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破壞彼得格拉起義的步驟來煽起的「風浪」，原來不過是一杯水裏的風浪罷了，而羣衆運動底偉大高潮，彼得城和莫斯科，前綫戰壕中和鄉村中的千百萬工人、兵士和農民底偉大英勇精神，一下子就把這些逃兵拋開了，簡直像火車拋開路上的木屑一樣。

讓一切信念不堅定的份子、一切動搖份子、一切懷疑份子、一切甘受資產階級威嚇，或被資產階級直接或間接幫手們底叫喊

所嚇怕了的份子去慚愧無地吧。在彼得格拉、莫斯科及其他地方的工人兵士羣衆中是半點也沒有動搖的。我黨堅定一致如像一個人一樣，屹立不搖地保護蘇維埃政權，保護一切勞動者底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貧苦農民底利益。

資產階級的下流記者和甘受資產階級恐嚇的人齊聲責備我們，說我們不讓步，說我們不調和，說我們不願與他黨分享政權。同志們！這是說話！我們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提出過，並且現在還提議請他們和我們分享政權。既然他們拒絕了，這並不是我們的罪過。談判是由我們開始的，並且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之後，我們又在談判中作了種種讓步，直到有條件地同意讓彼得格拉城市杜馬一部分議員底代表參加政府，雖則這彼得格拉城市杜馬是科爾尼洛夫黨羽底巢穴；如果科爾尼洛夫派的這班萬惡匪徒，如果資本家和地主子弟，士官生們，又像上星期日在彼得格拉所作過，而現在還想再做的（這是由破獲普里什克維奇陰謀以及昨天十一月三日在他那裏搜獲的文件所證實了的）那樣來試圖抵抗人民意志的話，那這個巢穴就一定會首先被民衆剷除的。可是那些站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背後並經過他們來為資產階級利益活動的先生們，却把我們的退讓態度解釋為我們軟弱無力，並藉此來向我們提出新的最後通牒。在十一月三日的會議上，有阿布拉莫維奇和馬爾托夫先生出現，並提出最後通牒，說如果我們政府不停止逮捕，不停止封禁資產階級報紙，便不能進行任何談判。

我們黨和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執委會拒絕了履行這個顯然是從卡列金、從資產階級、從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黨羽方面發出的最後通牒。普里什克維奇底陰謀，以及第十七年團之一部底

代表於十一月五日來到彼得格拉威嚇我們，說要向彼得城進攻（這種威嚇是很可笑的，因為這些科爾尼洛夫黨羽底先鋒隊已被擊潰，並在加琴納附近逃竄了，其中大部份已經拒絕反對蘇維埃）等事變，都表明阿布拉莫維奇和馬爾托夫先生們底最後通牒實際上是由誰發出的，證明這些人實際上是替誰服務。

讓一切勞動者安心而堅定吧！我們任何時候都不會向蘇維埃中的少數所提出的最後通牒讓步，這個少數是甘受資產階級恐嚇，不管他們有怎樣的「良好願望」，實際上不過是科爾尼洛夫黨徒手裏的傀儡。

我們堅定地站在蘇維埃政權原則上，即是站在由最近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多數所組成的政權原則上；我們會同意，並且現在還同意與蘇維埃中的少數分掌政權，但這個少數必須誠懇忠實地服從多數，並執行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全體批准的，即採取逐漸而堅定不移步驟走向社會主義的綱領。然而對於那些並沒有羣衆擁護，實際上只有科爾尼洛夫黨徒、沙溫可夫黨徒，士官生等等擁護着的知識份子小團體提出的最後通牒，我們是決不會屈從的。

讓一切勞動者安心而堅定吧！我們的黨，在蘇維埃中佔多數的黨是團結一致、屹立不搖地保護他們的利益，而那些決意無論如何都要達到和平勝利和社會主義勝利的千百萬城市工人、前綫兵士和鄉村農民，照舊是在擁護我們黨的！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舊曆七日）

刊載於真理報第一百八十二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三五六至三六〇頁

工人與被剝削勞動農民意聯盟

致真理報編輯部的信

今天，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六，當我在農民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有人當衆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立即回答過了。這個問題和我的回答，必須立刻讓全體讀者大衆知道，因為形式上我雖只用自己個人的名義回答，其實我是代表整個波爾什維克黨說話的。

當時情形如下：

講到波爾什維克工人與現在爲許多農民所信任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聯盟時，我在發言中極力證明，這個聯盟可能是「誠懇的聯合」，誠懇的聯盟，因為僱傭工人底利益與被剝削勞動農民底利益並沒有根本的分歧。社會主義制度完全可以滿足兩者底利益。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滿足他們的利益。所以無產階級與被剝削勞動農民間的「誠懇聯合」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反之，被剝削勞動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聯合」（聯盟）決不能是「誠懇的聯合」，因為這些階級底利益是根本分歧的。

請設想，——我說，——在政府中波爾什維克將佔多數，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僅佔少數，甚至那裏假設只有一個例如担任農業

人民委員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這樣的情形下，波爾什維克能夠實現誠懇的聯合麼？

能夠的，因為在與反革命份子（包括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護國派在內）作鬥爭中波爾什維克是不調和的，但他們在表決由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批准的土地綱領內那些有關純粹是社會革命黨人條款的問題時，却應該放棄表決權，例如關於土地平均使用和把土地重行分配給小農的條文。

波爾什維克在表決這樣的條文時放棄表決權，絲毫也不是背棄自己的綱領。因為在社會主義勝利條件下（實行由工人監督工廠，接着是剝奪這些工廠，實行銀行國有，建立最高經濟委員會來調節國內全部國民經濟），在這樣的條件下，工人必須同意被剝削的勞動小農所提出的過渡辦法，只要這些辦法不致危害社會主義事業。我在發言中說，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九年），也曾屢次承認說，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辦法，在大農業國中與在小農業國中是不能一樣的。

我們波爾什維克在人民委員會或中央執委會議上表決此種條文時，應該放棄表決權，因為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以及站在他們方面的農民）同意實行工人監督，銀行國有等等時，土地平均使用制只會是走向完全社會主義的過渡辦法之一。無產階級強迫農民接受這樣的辦法當然是荒謬的，可是無產階級爲了社會主義勝利的利益，在選擇這些過渡辦法的問題上應當向被剝削的勞動小農讓步，因為這些辦法不會危害社會主義事業。

當時有一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我彷彿記得是飛奧費拉克托夫同志）向我提出如下一個問題：

『如果在立憲會議中，農民想通過關於土地平均使用制的法

律，資產階級却反對農民，問題全靠波爾什維克的態度來決定時，波爾什維克將採取怎樣的態度呢？』

我當時回答說：工人與被剝削勞動農民底聯盟責成無產階級黨在社會主義事業將由實行工人監督、銀行國有等等有了保障的情形下，必須投票贊成農民，反對資產階級。照我的意見，波爾什維克在這樣的場合舉行表決時，有權特別聲明，說自己有不同意的地方等等，可是在這樣的場合舉行表決時放棄表決權，就無異是因與自己同盟者有局部問題上的意見分歧，而叛賣在為社會主義鬥爭中的同盟者。波爾什維克在這樣的情況下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叛賣農民的。土地平均使用等等辦法無論如何也不會危害社會主義，只要政權握在工農政府手裏，只要實行了工人監督，實行了銀行國有，建立了工農最高經濟機關來指導（調節）全部國民經濟等等就行了。

我當時所給的回答就是如此。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日（舊曆十一月十九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一百九十四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三八八至三九〇頁

關於立憲會議問題的提綱

(一) 以前把召集立憲會議的要求列入在革命社會民主黨綱領裏是完全合理的，因為在資產階級共和國中，立憲會議是民主制的最高表現，因為以克倫斯基為首的帝國主義共和國，在建立國會時，就用許多違反民主制的辦法來準備偽選。

(二) 革命社會民主黨在提出召集立憲會議的要求時，從一九一七年革命最初時起，便屢次着重指出過，蘇維埃共和國較之具有立憲會議的普通資產階級共和國乃是更高形式的民主制。

(三) 在由資產階級制度轉到社會主義制度的過渡時期，即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的民主制形式（與具有立憲會議這一花冠的普通資產階級共和國相比較），而且是唯一能夠保證最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

(四) 在我國革命進程中，立憲會議因為是按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所提名單來召集的，這樣召集的事實，就沒有可能經過立憲會議的選舉來正確表示一般民衆底意志，特別是勞動羣衆底意志。

(五) 第一，按比例制的選舉，只有當各黨候選人名單適合

於民衆實際分化，就是說，只有當民衆真是分化爲反映在這些名單上的各黨派情形時，才能真正表現民衆意志。大家知道，在我國，從五月起至十月止，在民衆中特別是在農民中擁有最多同情者的黨是社會革命黨，它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提出了對立憲會議選舉的統一的候選人名單，可是在立憲會議選舉後與其召集之前，這個黨已經分裂了。

因此，在選民大衆底意志和立憲會議當選人成份兩者之間，連形式上的符合都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

(六) 第二，還有以下這一事實，成爲民衆意志，特別是勞動階級意志與立憲會議成份這兩方面不相符合之更加重要的，不是形式上、法律上的，而是社會經濟的、階級的原因，這就是立憲會議選舉是在絕大多數民衆還不能知道十月蘇維埃革命，即工農革命之全部規模和意義時舉行的，因爲這次革命是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開始，即是在立憲會議候選人名單已經提出之後開始的。

(七) 十月革命爲蘇維埃奪取了政權，從資產階級手裏奪得了政治統治，而把它轉交了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這次革命目前正在經歷其各階段而一貫向前發展。

(八) 這次革命是從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首都的勝利開始，當時第二次全俄工兵蘇維埃代表大會，即無產者和政治上最積極部分的農民之先鋒隊代表大會，使波爾什維克黨佔有大多數，並把它擁上了執政的地位。

(九) 隨後，革命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間蔓延到了全體軍隊和農民羣衆中，其表現首先是在撤換和改選那些舊的上層組織（各集團軍委員會、省委員會，農民委員會，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中

央執委會等等)，這些上層組織所代表的是革命底過去階段、妥協階段，即它的資產階級階段而不是無產階級階段，所以這些上層組織必然要在更深更廣的民衆逼攻之下退出舞台。

(一〇) 被剝削羣衆實行改造自己組織領導機關的這一強大運動，到現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中旬還沒有完結，而尙未閉幕的鐵路工人代表大會便是這運動的階段之一。

(一一) 因此在俄國階級鬥爭中所形成的階級力量底分化，事實上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情形與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各黨所提立憲會議候選人名單中曾表現過的那種情形之間，是有原則上的區別的。

(一二) 最近烏克蘭的事變(局部地在芬蘭和別洛露西亞以及高加索的事變)也同樣表明出在烏克蘭拉達⁴⁸，芬蘭議會等等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與這些民族共和國內的蘇維埃政權、工農革命兩者間的鬥爭過程中發生着階級力量底新分化。

(一三) 最後，立憲民主黨和卡列金派的反革命暴動所發動的反蘇維埃政權，反工農政府的國內戰爭，使階級鬥爭澈底尖銳化了，並使歷史提在俄國各族人民面前，首先是提在俄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面前的最迫切的問題，再完全沒有可能用形式民主主義的手續來解決。

(一四) 只有由工農鎮壓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暴動(其表現是立憲民主黨和卡列金派的運動)而獲得完全勝利，只有用武力無情鎮壓這種奴隸主的暴動，才能實際保障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革命中事變進程和階級鬥爭的發展已使『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的口號，在事實上成了立憲民主黨和卡列金派及其幫手們底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全不顧及工農革命底勝利品，不顧及蘇維埃

權，不顧及第二次全俄工兵蘇維埃代表大會和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底決議等等。全體人民都明白起來了，這個口號實際上就是號召進行推翻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人民都明白起來，如果立憲會議與蘇維埃政權背道而馳的話，那末前者就等於在政治上宣佈了自己的死刑。

(一五) 人民生活中特別緊迫的問題之一，就是和平問題。在俄國爭取和平的真正革命鬥爭，只是在十月二十五日革命勝利之後才開始，這個勝利已經產生出初步的成果，如公佈秘密條約，締結休戰協定，以及開始公開談判不兼併不賠款的普遍和平。

廣大民衆直到現在才真正充分看到有爲和平鬥爭的革命政策，並注視這一政策的結果。

在選舉立憲會議時，民衆是沒有這種可能的。

顯然，從這一方面看來，在終結戰爭問題上，選入立憲會議的代表成份與真正民意也必然不相符合。

(一六) 總括上述各節就得出如下的結論：立憲會議既是在工農革命以前按資產階級統治下各政黨所提候選人名單選出的，它也就必然與在十月二十五日開始舉行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被剝削勞動階級底意志和利益相衝突。這個革命底利益自然要高於立憲會議形式上的法權，何況因為在召集立憲會議的法令中缺乏承認人民有隨時改選自己代表的權利，以致這些形式上的法權也被損毀了。

(一七) 凡是直接或間接想從形式法律方面，只以通常資產階級民主制爲限來觀察立憲會議問題，而不估計階級鬥爭和國內戰爭情形的企圖，都是叛變無產階級事業而轉到資產階級觀點上

去。在波爾什維克黨內有少數上層份子因不善於估計十月起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而陷入了這種錯誤中，但革命社會民主黨底絕對天賦就是要警告所有一切人，都不要犯這種錯誤。

(一八) 由於立憲會議選舉結果與民意不相符合，以及與彼剝削勞動階級底利益不相符合所造成的危機，只有由人民來儘可能廣泛迅速地實現其改選立憲會議代表的權利，只有立憲會議自身贊同中央執委會關於這種改選的法令，只有立憲會議絕對聲明承認蘇維埃政權，蘇維埃革命及其在和平問題、土地問題、工人監督制問題上的政策，只有立憲會議堅決加入到與立憲民主黨和卡列金派反革命勢力相敵對的營壘中來，它才有希望得到無痛楚的解決。

(一九) 若沒有這些條件，則因立憲會議所產生的危機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決，即是由蘇維埃政權方面採取最積極、最迅速、最堅決的革命手段來反對立憲民主黨和卡列金派的反革命勢力，並不管這個反革命勢力是用何種口號和機關（那怕是用立憲會議代表名義）來作掩飾的。凡是想使蘇維埃政權在這一鬥爭中受到掣肘的任何企圖都是幫助反革命。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舊曆十三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二百一十三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四三六至四四〇頁

關於國民經濟社會化的法令草案

糧食恐慌情形，以及由於資本家和官吏底投機、怠工和一般經濟破壞所造成的飢荒威脅致使必須採取非常的革命辦法來反對這種禍害。

爲了使全國公民，首先是一切勞動階級在其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領導下，能立刻從各方面毫無顧忌地採取最革命的手段來進行這種鬥爭並着手調整全國正常的經濟生活起見，特議決下列法規：

實行銀行國有及其必要辦法的法令草案

- (一) 一切股份企業概行宣佈爲國有財產。
- (二) 各股份公司底董事和經理以及屬於富有階級（即全部財產在五千盧布以上或每月收入在五百盧布以上者）的一切股東必須有條不紊地繼續經營業務，執行關於工人監督的法令，把一切股票交給國家銀行，每星期應將自己的活動情形向當地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報告。
- (三) 所有國家內外公債一律宣告作廢。
- (四) 握有債券和各種股票的小私有者，即屬於居民中勞動

階級的小私有者底利益，予以完全保障。

(五) 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即從十六歲起至五十五歲止的一切男女公民，都必須執行當地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或其他蘇維埃政權機關所指定的工作。

(六) 規定下列辦法為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的第一個步驟：凡對於富有階級的人（參閱第二條）都必須備有工作人消費摺或工作人收支摺並正確記載之，必須把這些證摺交到相當工人機關，或當地蘇維埃及其機關去登錄各人已執行的工作情形，每星期登錄一次。

(七) 爲了使糧食及其他必需品有正確的統計和分配起見，國內全體公民都必須加入某一個消費協社。糧務局，供給委員會及其他類似機關，以及鐵路工會和運輸工會，都必須在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領導下實行監督本法令之執行。特別是富有階級的人，在組織和進行消費協社業務方面，必須執行蘇維埃所指定的工作。

(八) 各鐵路職工會必須火速製定並立刻開始實行各種非常辦法來更正確地辦理運輸事業，特別是載運糧食，燃料及其他最緊要的必需品，其行動準則首先是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定單和發車證，其次是由各蘇維埃及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所委託的機關發出的定單和發車證。同樣責成各鐵路工會協同各地蘇維埃採取最積極的辦法以至採用革命手段來反對投機小販，並無情取締一切奸商。

(九) 各工人組織，職員工會和地方蘇維埃，必須毫不遲延地把快關閉的和要復員的企業以及失業工人動用去進行有益的生產，製造必需品，着手尋找定貨，原料和燃料。各地工會和蘇維

埃必須無論如何都不攔延這種工作，同時在尚未奉到上級機關特別指令之前，即開始實行城鄉產品底交換，但須嚴格遵守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底指示和指令。

(一〇) 凡屬富有階級的人必須將其所有現金存入國家銀行或分行以及各儲金社中，每星期領作消費需要的數目不得超過一百至一百二十五盧布（按當地蘇維埃底規定），而領作生產和商業需要的，必須有工人監督機關所發給的證書。

爲了監視本法令之切實執行起見，將頒佈用現行紙幣兌換其他紙幣的規則，凡犯有欺騙國家和人民的罪行者應受沒收全部財產的處分。

(一一) 凡不服從本法令的人，怠工者，罷工官吏以及投機商人均受上述處分並加以拘禁或押往前線，或罰作苦工。各地蘇維埃及所屬各機關，必須趕急擬定最革命的辦法來反對這些真正的人民公敵。

(一二) 職工會及其他勞動者組織應協同地方蘇維埃組成飛行監督團，其中須有黨和其他組織所推薦的最可靠的人參加，監督團底責任就是監視本法令執行的情形，檢閱工作底數量和質量，並將違犯法令或迴避法令者提交革命法庭審判。

寫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

刊載於一九一八年國民經濟雜誌
第十一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
三七年版，第三卷，第四四三至
四四五頁

關於遣散軍隊事向第一次全軍隊 代表大會代表們提出的問題

(一) 德國人在最近將來開始進攻的可能程度如何：

(甲) 從冬季舉行進攻之體力上與技術上的可能性來看；

(乙) 從德軍兵士羣衆底情緒方面來看；這種情緒是否能阻止德軍進攻，或至少延緩進攻？

(二) 在我們立刻破裂媾和談判，德軍立刻舉行進攻的情形下，可否預料德國人能使我們受到有決定意義的失敗呢？他們能否佔領彼得格拉呢？

(三) 是否要顧慮到和平談判破裂的消息會在軍隊中引起普遍的混亂情緒以及從前綫逃跑的現象，或者可以深信，軍隊聽到這種消息後還是會堅定地守住防綫呢？

(四) 如果德軍在一月十四日（舊曆一日）開始進攻，我軍在戰鬥力方面能否抵抗住這一進攻呢？如果不能夠的話，那末要經過多久時間後，我軍才能實行抵抗德軍底進攻？

(五) 在德軍迅速舉行進攻的情形下，我軍能否有秩序地退却，並保存所有的大炮，如果能夠的話，那末在這種情形下，能把德軍深入俄國腹地的動作阻住多久？

(六) 總之：從軍隊狀況看來，究竟是應當努力遷延媾和談判，還是因為德國人堅持兼併政策，甯可用革命手段立刻斷行破裂媾和談判，作為準備過渡到可能進行革命戰爭的堅決步驟呢？

(七) 應否立刻加緊進行反對德人兼併政策和主張革命戰爭的鼓動呢？

(八) 若是向作戰軍中頗大部份隊伍徵求意見，並要得到對於上述諸問題比較合式的完滿答覆，這件事情能否在很短時間內（譬如五天到十天）辦好？

(九) 可否指望在聽到關於德國人堅持兼併政策的消息以後，大俄羅斯與烏克蘭人的紛爭便會減輕下去，甚至這種紛爭將變成爲友誼的力量團結呢，或者也許烏克蘭人會乘大俄羅斯人更加困難的狀況來加強其反大俄羅斯人的鬥爭呢？

(十) 如果軍隊能夠舉行表決的話，那它是會贊成在割地（喪失所有被佔各省區）及使俄國經濟極感困難的諸條件下立刻媾和呢，還是會贊成極度緊張力量來進行革命戰爭，即是贊成抵抗德國人呢？

寫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末

一九二七年刊載於列寧學院錄存，第二卷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四五六至四五七頁

怎樣組織競賽

資產階級的作家在過去以至現在都耗費着無數紙筆，來頌揚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制度底競爭及私人進取心等等壯舉和美質。責備社會主義者不願意瞭解這些壯舉底意義，不顧及「人底天性」。其實，資本主義早已把那能使競爭在相當廣闊範圍內培植進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倡精神的小商品獨立生產排倒下去，而代之以大工廠生產、股份公司、新迪加及其他壟斷組織。在這樣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就是空前殘暴地壓制居民大衆的，即居民中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九的勞動者底進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倡精神，競爭也就是排斥競賽而代之以財政上的欺詐行爲，專橫霸道和對社會上層份子的卑鄙逢迎。

社會主義不僅不窒息競賽，反而是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大規模地、真正廣闊地運用競賽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數勞動羣衆來參加這種工作，在這工作中，他們可以顯現自己的身手，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力，可以表露出自己的才幹，這種才幹在民衆中是尚未開掘的泉源，可是它們被資本主義成千成萬以至成百萬地壓抑、蹂躪和窒息了。

現在當社會主義政府執政時，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組織競賽。

資產階級底傭僕和食客們把社會主義描寫成爲枯燥的、官場的、單調的、死氣沈沈的軍營生活。資本家底看門狗，剝削者底奴僕，即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老爺們，總是用社會主義來「恐嚇」民衆，而民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却正是陷於勞苦不堪、半飢半飽、極端貧困的苦工牢獄和軍營生活的境況中。使勞動羣衆擺脫這種苦工牢獄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沒收地主土地，施行工人監督制；實現銀行國有。往後的步驟將是實行工廠國有，務使全體居民加入消費合作社（同時這種合作社也就是產品推銷會社），由國家壟斷糧食及其他必需品的貿易。

只有現在才真正使羣衆有廣泛的可能來表現進取心，競賽和大胆首倡精神。趕走了資本家或至少是實行真正工人監督來制裁他的每個工廠，趕跑了地主剝削者並已奪去其土地的每個農村，現在，而且只有現在，才是使勞動者可以表現自己能力，可以稍爲揚眉吐氣，可以覺得自己是人的這活動場所。千百年來都是替別人勞動，替剝削者做奴隸式苦工的人，經過了這樣的時光之後，現在才第一次有可能來爲自己工作，而且是憑靠一切最新技術和文化的成果來工作。

當然，自爲勞動代替了奴役勞動，這種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交替，是不能不遇到摩擦、困難和衝突，不能不採用強力手段來對待那些頑梗不化的寄生蟲及其傭僕的。對於這一點任何一個工人也不會有什麼幻想：工人和貧農們，既受了積年累歲替剝削者做苦工時的無數欺侮凌辱所鍛鍊，既受了苦重難堪的貧困生活所鍛鍊，他們也就知道要打破剝削者底反抗定是需要時間的。工人和農民絲毫也沒有沾染智識份子老爺們，所有這些新生活報派以及其他敗類等等底情感主義幻想，這般老爺們「高喊」反對資本

家，喊得喉嚨嘶啞，並「指手畫腳」「痛斥」資本家，可是一到要真正作事，要實現自己的威脅，要在實踐中來真正撤銷資本家的時候，他們便痛哭流涕起來，好像挨了打的小狗兒一樣。

用自爲的勞動，即用在全國的（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在國際的，在世界的）巨大規模中有計劃有組織的勞動來代替奴役勞動，這種偉大更替，除了要用「軍事」辦法來鎮壓剝削者底反抗之外，還需要無產階級和貧農施展出組織上和組織家的巨大努力。組織任務是與採用軍事辦法無情鎮壓昨日的奴隸主（資本家）及其奴才——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老爺們的任務溶爲一體而不可分割的。昨天的奴隸主及其在智識界中的僮僕們總是這樣想，這樣說：我們從來都是組織者和長官；我們曾號令一切，我們想仍舊當這樣的人物，我們不會來聽從那些「老百姓」，那些工人和農民，我們不會服從他們，我們要把知識變作保護資本特權和資本對人民統治的武器。

資產者和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總是這樣說着、想着、行動着。從自私自利的觀點上看來，他們的行爲是很自然的：農奴地主所豢養的那些食客和寄生蟲，果戈理所描寫的那些典型牧師、司書、官吏等類人物，痛恨柏林斯基的那些「智識份子」，也「很難」與農奴法分離。可是剝削者及其在智識界中的奴僕們底事業決毫無希望，工人和農民正在打破他們的反抗——可惜還打得不十分堅決無情，——並且一定會打破這種反抗的。

「他們」以爲「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貧農，決辦不好社會主義革命所加到勞動羣衆肩上的那種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真正英勇偉大的組織任務。『沒有我們是不行的，』——那些慣於替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疲勞的智識份子這樣安慰自己說。他

們這種厚顏無恥的打算決不會實現；富有學識的人現在就已分化出來，轉到人民方面，轉到勞動羣衆方面，幫助民衆來打破資本僕役們底反抗。而具有組織才能的人物在農民和工人階級中是很多的，這些人才現在剛剛才自覺有力，醒悟起來，趨向於生動的、創造性的偉大工作，獨立從事於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事業。

現在最主要任務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最主要任務的話，——就是要儘量廣闊地發展工人以及所有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在組織工作的創舉中所表現的自動首倡精神。無論如何都要打破那種荒謬、妄誕、卑鄙醜惡的舊成見，似乎管理國家，管轄社會主義社會底組織建設工作，只有所謂「上等階級」，只有富人或受過富有階級教育的人，才能勝任。

這是成見。支持這種成見的，則是那些腐敗慣例，頑固守舊，奴才習氣，尤其是資本家醜惡的私利觀念；這些人正是有利於藉管理來搶劫，爲搶劫而管理。這樣不行。工人們一分鐘也不會忘記自己需要智識力量。工人們在求知方面表現得非常熱心，又恰恰是在現時，這就證明無產階級對於這一點沒有迷誤，也決不會有迷誤的。可是組織家的工作是凡能識字，善於知人，有實踐經驗的普通工人和農民都可以勝任的。這樣的人，在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所藐視鄙稱的「老百姓」中，是多得很的。這樣的人才，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有如毫未開掘的泉源，並且是一個最豐富的泉源。

工人和農民還有些「胆怯」，還未領會到他們現在是統治階級，他們還不夠堅決。革命是不能在畢生都迫於飢餓貧困而不得不在鞭笞威脅下工作着的千百萬人中，一下子就造成這種品質的。可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正是喚醒着這些品質，打破一切

舊障礙，斬斷陳腐的桎梏，把勞動羣衆引上獨立創造新生活的大道，十月革命底力量就在這裏，它的生命力量就在這裏，它的不可戰勝性也就在這裏。

實行統計與監督，這就是每個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每個消費合作社，每個供給會社或委員會，每個工廠委員會或一般工人監督機關底主要經濟任務。

人們有一種舊習慣：總是用不自由人底眼光來觀察勞動標準，觀察生產資料，只想擺脫多餘的重担，只想從資產階級那裏奪得一點東西。必須與這種陳舊習慣作鬥爭。這種鬥爭已由先進的有覺悟的工人開始了，他們正在給工廠工人中的異己份子以堅決的回擊，這種份子在戰時出現得特別多，而現在還想照舊用怎樣能『多撈一塊就跑』的唯一想法來對待人民工廠，對待那些已轉爲人民財產的工廠。農民中和勞動羣衆中所有一切覺悟的、誠實的、有思考力的份子，都會在這一鬥爭中站到先進工人方面來。

既然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已經建立，已有保障，則實行統計與監督，——如果這些辦法是由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以最高國家政權機關的資格來實行，或者依照這個政權的指示和委託來實行的話，——即到處實行普遍的，包括一切的統計與監督，實行對勞動數量和產品分配的統計與監督，這便是社會主義改造實質之所在。

爲過渡到社會主義所必需的統計與監督，只能是由羣衆來實行的。只有由工農羣衆自願而誠意地帶着滿腔革命熱情來共同進行這種對富人、對騙子、對懶漢、對流氓而實行的監督和統計，才能克服可惡資本主義社會底這些餘孽，才能克服人類中的這些

糟粕，這些無可救藥的、腐敗的、僵死了的成份，這種由資本主義遺留給社會主義的惡疾、癩瘡和毒癰。

工人和農民們，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們！土地、銀行、工廠都已轉為全民財產了！大家親自來統計與監督產品底生產和分配吧。——這就是，而且只有這才是達到社會主義勝利的道路，才是社會主義勝利的保障，才是戰勝一切剝削和一切貧窮困苦的保障！因為俄國有足夠全體人民享用的糧食、鐵、木料、羊毛、棉花和麻，只是要正確分配勞動和產品，只是要對這種分配建立全民認真切實的監督，只是要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日常經濟生活中戰勝那些人民公敵：富人及其食客，其次是騙子、懶漢和流氓。

對於這些人民公敵，社會主義底公敵，勞動者底公敵，是不容有絲毫寬恕的。要對富人及其食客即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作殊死的決戰；要對騙子、懶漢、流氓決戰。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是同胞兄弟，都是資本主義底兒子，都是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社會底餘孽，在這種社會中，一小羣人掠奪人民、欺侮人民，在這種社會中，貧窮困苦的現象使成千累萬的人走上邪路，忘記自己的人格，去幹無賴流氓、賣身受賄、欺騙詐取勾當，在這種社會中，必然養成勞動者這樣一種心理：只要能逃避剝削，那怕用欺騙伎倆也好；只要能設法避免可惡的工作，那怕是一分鐘都行；只要能避免飢餓，能使自己和家口飽足一下，便想盡方法，不擇手段來奪得麵包，那怕是一小塊也不錯。

富人和騙子是同胞兄弟，這是資本主義養育成的兩種主要的寄生蟲，這是社會主義底兩種主要敵人，對於這些敵人應當由全體人民加以特別監視，當他們稍一違犯社會主義社會底規則和法

令時，便應無情地加以懲治。在這方面表示任何軟弱，任何動搖，任何憫惜，都是對社會主義的莫大罪行。

爲要使社會主義社會免除這些寄生蟲的危害，就應當組織對勞動量，對物品生產和分配的全民統計和監督，即由千百萬工農羣衆自願、努力、帶着滿腔革命熱情來擁護的統計和監督。統計和監督是十分簡易的，是每個誠實、精明、能幹的工人和農民都能勝任的，要組織這種統計和監督，就必須喚起工農自己的，即從他們中間產生的組織人才，就必須喚起他們在組織成績方面實行競賽，——並在全國範圍內佈置好這種競賽，——就必須使工農份子明白懂得，要向有學識的人徵詢意見是一回事，要由「簡樸的」工農來監督那些「有學識」的人所常有的疏懈行爲，却是另一回事。

這種疏懈、粗忽、大意、草率、舉動急燥，愛用討論來代替作事，用空話來代替工作的惡習，無事不幹而一事不成的惡習，是「有學識的人」底特性之一，這根本不是由於他們天性惡劣，更不是由於他們心懷惡意，而是由於他們的一切生活習慣，由於他們的勞動環境，由於疲勞過度，由於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非常態的分離現象等等所產生出的。

由於我們隊伍中智識份子這種可悲的，但在現時是不可避免的特性，由於工人對智識份子底組織工作沒有實行充分的監督所產生的那些錯誤等等，在我國革命進程內所常有的那些錯誤、缺陷、過失中，的確起了不少的作用。

工人和農民還有些「胆怯」，他們應該免除這種毛病，而他們定會脫掉這種毛病。若沒有有學識的人、智識份子、專門家底意見和指示是不行的。每個多少精明的工人和農民對於這點，都

知道得很清楚，我們人中的智識份子決不能抱怨說工農方面不充分注意他們的意見，對他們的同志尊敬態度不夠。但意見和指示是一回事，組織切實的統計和監督却是另一回事。智識份子往往能提供極好的意見和指示，可是到了要實行這些意見和指示，要真正切實監督來把言論變成事實時，他們却「笨手笨腳」，無力得可笑，無力得可恥，無力得荒謬絕倫。

所以在這一方面，若沒有從「人民」出身，從工人和勞動農民出身的實際組織家的幫助，沒有這些人底領導作用，是無論如何也行不通的。『萬事皆人爲，』——工人和農民應當把這個真理記得爛熟。他們應當懂得，現在最主要的應當是實踐，現在已經進到了這樣的歷史關頭，這時，理論要變爲實踐，理論要由實踐來鼓舞，要由實踐來糾正，要由實踐來檢閱，這時，原來馬克思所說的這句話是特別正確的：『一步實際運動勝於一打綱領，』⁴⁵——在實踐上對富人和騙子加以切實約束、制裁、加以完全統計和監督的每一步驟，都勝過一打關於社會主義的漂亮議論。因為『朋友啊，理論是暗淡的，而生活之樹却是常青的』⁴⁶。

必須在工農出身的實際組織家們中間組織競賽。應當反對智識份子所愛好的一切死板公式以及想從上面規定統一模型的企圖。死板公式和從上面規定統一模型的辦法是與民主集中制和社會主義的集中制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在細則方面，在地方特徵方面，在處事方式方面，在實踐監督的方法方面，在消滅和制裁寄生蟲（富人和騙子、智識份子中的懈怠者和狂人等等）的手段方面的多樣性，在基本上、根本上、主要問題上，不僅不會破壞統一性，反而會保證統一性。

巴黎公社作出了把下層的首倡、自動精神、自由機動、宏偉毅力和那自願實行而與死板公式絕不相容的集中制配合起來的偉大模範。我們的蘇維埃現在也是遵循着這些道路。可是它們還有些「胆怯」，還沒有開展自己的能力，還沒有「浸入」到自己建立社會主義秩序的新的偉大創造工作中去。必須使各地蘇維埃更大胆、更有自動精神地來進行工作。必須使每個「公社」——每個工廠、每個鄉村、每個消費合作社、每個供給委員會都能來實際組織對勞動和產品分配的統計與監督，都能來互相競賽。這種統計和監督底綱領是簡單明瞭，誰都懂得的：就是要使每個人都有麵包吃，每個人都不穿壞鞋子和破衣服，都有溫暖的住宅，誠實作工，使任何一個騙子（其中也包括不願作工的懶漢）都不致逍遙法外，而是坐在牢獄裏，或受到最苦重的強迫勞動的處分，使任何一個違反社會主義規則和法令的富人都不會逃脫騙子所遭受的命運，而這種命運照道理也是富人所應該遭受的。『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就是社會主義實踐的訓條。這就是要在實踐上辦好的事情。我們的「公社」，我們由工農出身的組織家，尤其是智識份子出身（其所以說尤其，是因為他們太慣於，過分慣於以自己的普泛指示和決議案自豪）的組織家是應以這樣的實踐成績來自豪的。

公社和城鄉小支部，都應當自動製定出成千的對富人、騙子和懶漢作實際統計和監督的方式與辦法，並在實踐中把它們試驗好。在方式與辦法方面底多樣性，是生命力底保障，是勝利地達到共同一致目標的保證，這個共同一致的目標就是肅清俄國土地上的一切害蟲，肅清跳蚤般的騙子，臭蟲式的富人等等。在一個地方拘禁幾十個富人，一打騙子，半打偷懶的工人（如像在彼得

格勒，特別是黨印刷局裏的排字工人懶於工作，這同樣也是流氓式的行爲)。在另一個地方叫他們去清掃廁所。在第三個地方，叫他們坐了監牢之後，給他們一張黃紙證書，使全體人民在他們悔過以前，把他們當作危害份子來加以監視。在第四個地方，從十個偷懶罪犯中拿出一個來就地槍斃。在第五個地方，想出各種不同方法來配合運用，例如用有條件釋放的辦法來使富人、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騙子和流氓中那些可以改正的份子迅速自新過來。方式愈紛繁愈好，共同的經驗就會愈加豐富，社會主義的成功就會愈加可靠而迅速，實踐就會愈加容易規定出——因為只有實踐才能規定——最好的鬥爭手段和方法。

究竟做到了在哪一個公社裏、在大城市中哪一個街坊裏、在哪一個工廠裏、在哪一個鄉村中，沒有飢餓者、沒有失業者、沒有富足的懶漢、沒有資產階級奴僕中的惡徒以及自稱為智識份子的怠工者；哪裏對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事情作得多些；哪裏對於為貧人建造良好的新房屋，把貧人安置到富人房屋裏去居住的工作做得多些；哪裏對於正常供給貧家每個小孩一瓶牛奶的事情作得多些；——正是在這些問題上，各公社、村莊、消費生產合作社、共耕社和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應當開展競賽。正是在這種工作上，組織家的才幹應當實際顯現出來，並提拔去參加全國範圍的管理事業。組織家的人才在民衆中是很多的。不過他們被壓抑住了。應該幫助他們發揮起來。他們，而且只有他們，在羣衆贊助之下，能夠挽救俄國，挽救社會主義的事業。

寫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至十日（舊曆一

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 月載於真理報第十
七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
第三卷，第四六八至四七六頁

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草案⁴⁷

立憲會議決議：

一

(一) 俄國宣佈為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權均歸蘇維埃掌握。

(二)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於各自由民族之自由聯盟基礎上，而成為各民族蘇維埃共和國聯邦。

二

立憲會議之基本任務是消滅任何人對人的剝削，完全消除社會之劃分為各階級的現象，無情鎮壓剝削者底反抗，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使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獲得勝利，茲決議如下：

(一) 廢除土地私有制。全部土地連同一切建築物、農具及其他農業生產上的附屬物，均宣佈為全體勞動人民底財產。

(二) 批准蘇維埃關於工人監督和關於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的法令，以便保證勞動人民對剝削者實行統治的權力，並作為使工廠、礦山、鐵路和其他生產資料及運輸機關完全轉歸工農國家

所有的第一步驟。

(三) 批准將一切銀行收歸工農國家所有的法令，作為使勞動羣衆擺脫資本壓迫的條件之一。

(四) 爲了消滅社會中的寄生階層起見，施行普遍勞動義務制。

(五) 爲了保證勞動羣衆掌握全部政權和消除恢復剝削者政權的任何可能起見，特令實行武裝勞動者，建立社會主義工農紅軍並完全解除有產階級底武裝。

三

(一) 立憲會議表示具有不屈不撓的決心，要把人類從造成此次空前罪惡戰爭以致殺人遍野的財政資本和帝國主義底血爪下解救出來，因此完全贊同蘇維埃政權所執行的下述政策：廢除祕密條約，與交戰雙方軍隊中的工農進行最廣泛的聯歡，無論如何都要用革命手段來達到各國人民間以民族自由自決爲基礎的不兼併不賠款的民主和平。

(二) 爲了同一目的，立憲會議主張與資產階級文明世界底野蠻政策完全斷絕關係，這種政策是以奴役亞洲和一般殖民地以及弱小國家中數萬萬勞動民衆爲基礎，造成少數特殊民族中剝削者底幸福。

立憲會議表示歡迎人民委員會宣佈芬蘭完全獨立，開始從波斯撤退軍隊，宣佈阿爾明尼亞有權自決的政策。

(三) 立憲會議認爲宣告廢除歷來沙皇、地主和資產階級政府所訂債款的蘇維埃法令是對國際銀行和財政資本的第一個打擊，並深信蘇維埃政權定會堅定地遵循這條道路前進，一直達到

國際工人起義反對資本壓迫的完全勝利。

四

立憲會議係根據十月革命前各黨所提出名單選出，當時民衆還不能全體奮起反對剝削者，還不知剝削者在捍衛其階級特權時實行反抗的力量多麼巨大，還沒有動手在實踐上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所以立憲會議認為，如果將自己與蘇維埃政權對立起來，那就甚至從形式觀點上說，都是根本不正確的。

按實質說，立憲會議認為現在當人民與剝削者作最後鬥爭的關頭，在任何一个政權機關中都決不能有剝削者插足的餘地。政權應當唯一屬於勞動羣衆及其全權代表機關——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立憲會議擁護蘇維埃政權和人民委員會頒佈的法令，並認為自己的任務應僅限於規定社會之社會主義改造底根本原則。

同時，立憲會議力圖創立俄國各民族勞動階級間真正自由自願的聯盟，因而也就是更加密切鞏固的聯盟，所以它認定自己的任務僅在於規定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底根本原則，而讓每個民族中的工農羣衆在自己的全權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去獨立決定，究竟他們是否願意，並在何種基礎上參加聯邦政府及其他聯邦蘇維埃機關。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七日(舊曆四日)刊

載於真理報第二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四八五至四八七頁

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草案⁴⁶

俄國革命一開始就提供出了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作為一切被剝削勞動階級底羣衆組織，作為唯一能夠領導這些階級爲其政治上經濟上完全解放而鬥爭的組織。

在俄國革命第一個時期中，蘇維埃壯大了、強固了、數量上增加了，並根據自身經驗消除了與資產階級妥協的幻想，認識了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形式的欺騙性，而在實踐上得出結論：若不和這種形式以及任何的妥協政策破裂，則被壓迫階級底解放是不可能的。十月革命把全部政權交給了蘇維埃，便是這種破裂的表現。

立憲會議是根據十月革命以前所提候選人名單選出的，因而它所表現的乃是妥協派和立憲民主黨人執政時舊的政治勢力對比關係。那時人民投票贊成社會革命黨候選人時，還不能在擁護資產階級的右派社會革命黨人與擁護社會主義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之間加以選擇。於是這個應成爲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花冠的立憲會議，就不能不成爲橫梗在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道路上的障礙。

十月革命既把政權交給蘇維埃，並經過蘇維埃又交給被剝削

勞動階級，就引起了剝削者底拚命反抗，而在鎮壓這個反抗中，便完全表露了它是社會主義革命底開端。勞動階級根據經驗於是信服了：舊資產階級國會制已經過時，它與實現社會主義的任務是絕不相容的，只有階級機關（蘇維埃便是這樣的機關），而不是全民機關，才能克服有產階級底反抗並奠定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在現時，凡是拒絕由蘇維埃掌握全部政權，拒絕人民所已奪得的蘇維埃共和國而贊助資產階級國會制和立憲會議，便是向後倒退，便是使整個的工農十月革命陷於破產。

在一月五日召集的立憲會議上，由於上述各種情形，右派社會革命黨，——克倫斯基、亞甫克森鐵夫和切爾諾夫底黨得以佔有多數。這個黨當然拒絕了討論蘇維埃政權最高機關，即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提出的承認蘇維埃政權綱領，承認「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承認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之確切明瞭而不容任何曲解的提案。於是立憲會議就斬斷了它與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間的任何聯繫。所以現時在蘇維埃中佔有顯然絕大多數並享有工人和大多數農民信任的波爾什維克黨團和左派社會革命黨黨團之退出這樣的立憲會議，自然是不可免的了。

事實上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在立憲會議外拚命進行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在自己的機關刊物上公開號召推翻蘇維埃政權，把勞動階級爲了擺脫剝削而以強力來鎮壓剝削者底反抗的必要辦法叫做非法橫行，辯護替資本服務的怠工者，甚至公然號召採用恐怖手段，這種手段並已由一切「不知名的團體」着手實行起來。因此，留在立憲會議中的那一部分人顯然只會起着這種作用，即掩蓋反革命派爲推翻蘇維埃政權所進行的鬥爭。

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

立憲會議宣告解散。

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刊載於中央執委
新聞報第五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
版，第三卷，第四九四至四九五頁

關於立刻單獨媾和並簽訂割地 和約問題的提綱

(一)按俄國革命現時狀況看來，幾乎全體工人與絕大多數農民都無疑地是站在蘇維埃政權方面以及它所開始了的社會主義革命方面。在這點上，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已經有了保障。

(二)同時，各有產階級深知爲保存土地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最後決戰就在眼前而實行瘋狂反抗，由於這種反抗所引起的國內戰爭還沒有達到它的頂點。蘇維埃政權在這次戰爭中的勝利是有了保障的。但必然還要經過一個相當時間，必然要大大緊張力量，必然要經過一個爲任何戰爭，尤其是國內戰爭所定會引起的嚴重破壞與混亂的相當時期，才能把資產階級底反抗鎮壓下去。

(三)此外，這種反抗還採用各種不如此積極的和非軍事的方式：如怠工、收買流氓、收買替資產階級服役的奸細，使他們鑽進社會主義者隊伍中來破壞社會主義者底事業等等，——這種反抗竟是這樣頑強而又能採取種種不同的形式，遂使打破這種反抗的鬥爭必然還要遷延一些時日，恐怕至少要經過幾個月的工夫，才能使各種主要形式的鬥爭告一結束。然而若不堅決戰勝資產階級及其擁護者所實行的這種消極與隱藏的反抗，則社會主義

革命底勝利便是不可能的。

(四)最後，俄國社會主義改造事業上的各種組織任務，是非常龐大而且困難，所以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既有為數衆多的小資產階級同路人，而本身的文化水準又不很高的條件下來解決這些任務，也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

(五)總括所有這些情況，便可以完全肯定地得出結論說，爲使社會主義在俄國獲得勝利，便需要有一個相當的時期，至少是幾個月的时间，在這幾個月過程中，社會主義的政府要完全不受束縛地來先在本國戰勝資產階級，並把廣泛而深刻的羣衆組織工作辦理就緒。

(六)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底實際狀況，應成爲決定我們蘇維埃政權底一切國際任務的基礎，因爲在戰爭第四年度的國際形勢，使我們對於在歐洲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中（連德國也在內）爆發革命並推翻其政府的大概時機，完全無法估計。毫無疑義，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是應當來到，並且一定會來到的。我們對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一切希望，正是以這種信心和這種科學先見爲根據。我們的一般宣傳工作，尤其是組織交戰兵士聯歡的工作，應當加緊並使之發展。但是若以企圖斷定在歐洲，特別是在德國是否在最近半年內（或類似這樣的短時間內）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爲基礎，而來規定俄國社會主義政府底策略，那就是一種錯誤。因爲這點絕對無法斷定，所以一切類此的企圖，客觀上都必然會走到盲目的孤注一擲。

(七)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所進行的和平談判，已完全闡明，在現時，即是到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時，德國政府（它是完全能夠操縱四盟國中其餘政府的）內無疑是主戰黨佔了上風，

該黨在實際上已向俄國提出了最後通牒（可以而且必須預料到，這在日內便會正式提出）。這個最後通牒就是，或則繼續戰爭，或則接受割地和約，即是簽訂此種條件的和約：我們要讓出自己所佔據的一切土地，而德國人則保存其已佔得的一切土地，並要求我們賠款（以支付俘虜給養費爲名義），其數目大約爲三十萬萬盧布，分作幾年付清。

（八）現在俄國社會主義政府面前擺着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或是立刻接受這種割地的和平，或是立刻進行革命戰爭。這裏，任何中間的決定，實際上都是不可能的。再無法繼續推延下去了，因爲我們爲了故意遷延談判，已經施盡了一切可能的以至不可能的方法。

（九）若把主張立刻進行革命戰爭的論據拿來考察時，我們首先所看到的論據，就是說現在單獨媾和，客觀上便是同德帝國主義者妥協，便是『同帝國主義者勾結』等等，因而這種媾和就是完全背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底基本原則。

然而，這個論據顯然是不正確的。工人在罷工失敗時簽訂不利於他們而有利於資本家的復工條件，這並不是叛變社會主義。只有那些爲着一部份工人底利益而使資本家有利的人，才是叛變社會主義，只有這類的妥協才是原則上不可允許的。

誰把同德帝國主義進行的戰爭稱爲防衛戰和正義戰，而實際上却得到英法帝國主義者的幫助，並把同他們訂立的祕密條約對人民隱瞞起來，那他就是叛變社會主義。誰一點也不隱瞞人民，不與帝國主義者訂立任何祕密條約，而只因當時沒有力量繼續戰爭，才同意簽訂不利於一個弱國，而利於一個帝國主義者集團的和約，那他絲毫也沒有叛變社會主義。

(一〇) 主張立刻進行戰爭的另一個論據，就是以為我們若簽訂和約，客觀上便成了德帝國主義底奸細，因為這會使德帝國主義能從我國戰線上調走軍隊，並獲得由我方釋放的幾百萬俘虜等等。可是這個論據顯然也是不正確的，因為現在進行革命戰爭，客觀上便會使我們成爲英法帝國主義底奸細，給它們以達到自己目的的助力。英國人曾向我們的最高總司令克里連科直接提議，若是我們繼續戰爭，就按每個兵士每月一百盧布來付給我們的經費。即令我們不拿英法分文款子，然而我們既牽制一部分德軍，客觀上畢竟還是幫助它們。

由這一方面看來，在此兩種情況下，我們都不能完全擺脫某種與帝國主義的聯繫，並且顯然在未推翻全世界帝國主義之前，是不能完全擺脫這種聯繫的。由此應得出的正確結論，就是從社會主義政府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時起，解決各種問題時，不應以某個帝國主義較好爲出發點，而應專以如何能使已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獲得最便於發展和鞏固的條件爲出發點。

換言之，現在我們的策略不應以幫助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中的某一集團比較有利的原則爲基礎，而應以如何可以更加穩妥可靠地保證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在一國內鞏固起來，或至少能支持到別國也起來加入時的原則爲基礎。

(一一) 有人說，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反戰派，現在已成了「敗北派」，並且請求我們不要對德帝國主義讓步。可是我們之承認敗北主義，只是對本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而言，而在形式上或實際上同「友好」的帝國主義聯合來達到戰勝他國帝國主義的辦法，我們始終是反對的，因為這種辦法在原則上既不允許，並且根本上是不中用的。

因此，這個論據不過只是上述論據的變形而已。如果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向我們提議把單獨媾和一事遷延到一定時期，而保證在此時期內在德國發動革命的話，那我們對此問題也許能作另一種看法。可是德國的左派不僅不這樣說，反而正式聲明：『你們儘力支持下去吧，但在解決問題時，要以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底實際狀況為根據，因為關於德國革命的事，絲毫也不能給以確切的約許。』

(一二)有人說，在黨所作的許多聲明中，我們直接「約許過」進行革命戰爭，現在若簽訂單獨媾和條約，那就是違背我們自己所說的話。

這不是事實。我們說過，在帝國主義時代，社會主義政府必須「準備並進行」革命戰爭，我們說這話原是爲了反對那種抽象的和平主義，反對那種完全否認在帝國主義時代可以進行「保護祖國」戰爭的理論，最後，是反對一部份兵士中貪生怕死的本能；但我們並沒有担承任何義務，竟不顧時機可能如何而冒昧開始革命戰爭。

就是現在，我們也絕對應當準備革命戰爭。我們執行着自己的這個約許，也如同我們一般地執行了一切能夠立刻執行的約許那樣：我們廢除了各種秘密條約，我們向各國人民提出了正義的和平，我們曾儘量設法遷延，並屢次遷延了媾和談判，以便使其他各國人民有時間起來參加媾和談判。

但是解決關於此刻可否立刻進行革命戰爭的問題，就應專以估計到實現這點的物質條件和已經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底利益為依據。

(一三)把我們對於主張立刻進行革命戰爭的各種論據之批

判總括起來，就應得出結論說，這種政策也許可以適合那班專求外觀漂亮，色彩奪目的人底癖性；可是完全沒有顧及到已開始了的社會主義革命所處時期的階級力量及物質因素之客觀對比。

（一四）毫無疑義，我們的軍隊在目前和在最近幾星期內（也許會在最近幾個月內）絕對無力來順利擊退德國的進攻，第一，因為大多數兵士極端疲憊，加上糧食事宜的空前破壞，以及過於疲憊的軍隊無人替換；第二，因為馬匹完全無用，會使我們砲隊必遭滅亡；第三，因為完全沒有可能保衛由里加至列維里一帶的海岸，這就給敵人以最可靠的機會來佔據里夫梁省其餘部分，而後佔據愛斯特梁省，並從後方來包抄我軍很大一部分隊伍，最後，進佔彼得格拉。

（一五）其次，同樣無可懷疑的，我軍中大多數是由農民出身的兵士，在現時絕對會贊成割地媾和，而不會贊成立刻進行革命戰爭，因為按社會主義原則改組軍隊，把赤衛隊編進軍隊等等的事業還剛剛開始。

在軍隊完全民主化的情況下，違反大多數兵士底意志去進行戰爭，那就是冒險的行動，而要組成真正堅固與思想健全的社會主義工農軍隊，又至少需要若干月的工夫。

（一六）俄國貧苦農民是能夠擁護工人階級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但是他們在現時却無力馬上就去進行嚴重的革命戰爭。若在此問題上忽略這種階級力量的客觀對比，那就會犯着無可補救的錯誤。

（一七）因此對於現時進行革命戰爭的問題應有如下的看法：

如果德國革命會在最近三四個月內爆發並獲得勝利，那末立

刻進行革命戰爭的政策，也許不致斷送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

如果德國革命在最近數月內不爆發，那末在繼續戰爭的條件下，事變進程必如下述：俄國會因最嚴重的失敗不得不簽訂更不利的單獨媾和條約，並且這種條約將不是由社會主義政府來簽訂，而是由某個其他的政府（例如，由資產階級拉達與切爾諾夫派聯盟的政府，或由類此的政府）來簽訂了。因為被戰爭弄得疲憊不堪的農民軍隊受到最初幾次失敗之後，——可能甚至不是經過幾個月，而是經過幾個星期後，——就會把社會主義的工人政府推翻的。

（一八）在這樣的情勢之下，若僅僅爲着德國是否會在最近幾星期的最短期間內開始革命這一點，而把已在俄國開始了的社會主義革命底命運作孤注一擲，那就是完全不可容許的策略。這種策略乃是冒險的策略。我們沒有權利去這樣冒險。

（一九）況且，即令我們簽訂單獨媾和條約，德國革命按其客觀基礎說來，也絕不會因而感到困難。也許沙文主義的烏煙瘴氣會使它暫時遭到削弱，然而德國的狀況仍然會是極端困難，它同英美的戰爭將是持久的，雙方都是侵略性的帝國主義這一事實已被完全澈底揭穿。俄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榜樣，將在全世界各國人民面前成爲活生生的模範，而這個模範所起的宣傳作用與革命化作用將是非常巨大的。這裏是資產階級的制度及兩個強盜集團間赤裸裸的侵略戰爭。那裏是和平與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共和國。

（二〇）我們締結單獨和約，便能在現時可能的最大限度內從彼此敵對的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下擺脫出來，利用它們相互間的敵視和戰爭，——這種敵視和戰爭是阻礙它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

的，——而取得相當的行動自由時期來繼續並鞏固社會主義革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在銀行和大工業國有化的基礎上，在城市與鄉村小農消費合作社實行物與物交換的情形下，如果有幾個月和平工作的保證，則俄國的改造，經濟上是完全可能的。這種改造將使社會主義在俄國並在全世界內都成爲不可戰勝的了，同時也就可以造成建立強大工農紅軍的強固經濟基礎。

(二) 在現時，只有社會主義共和國本着明顯提出並由社會主義軍隊完全贊同的，即推翻其他各國資產階級的這目的而進行的反對資產階級國家的戰爭，才算是真正革命的戰爭。不過現時，我們顯然還不能提出這個目的。如果我們現在進行戰爭，那客觀上就是爲解放波蘭、立陶宛和庫爾蘭而進行戰爭。可是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若不離開馬克思主義與一般社會主義底原則，便不能否認社會主義底利益應該高於民族自決權底利益。我們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已盡其所能來爲芬蘭、烏克蘭以及其他民族實現自決權，並且還在繼續這樣作。然而，如果具體情勢使得社會主義共和國底生存在現時會因維護幾個民族（波蘭、立陶宛、庫爾蘭等等）被破壞了的自決權而遭受危險，那末，保證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這一利益，當然應當高於民族自決權底利益。

因此，誰說「我們不能簽訂恥辱和約而出賣波蘭等等」，那他就是沒有看清若簽訂以解放波蘭爲條件的和約，只會更加使德國帝國主義去加緊反對英國、反對比利時、塞爾維亞及其他各國。以解放波蘭、立陶宛、庫爾蘭爲條件的和約，從俄國方面看來也許是「愛國主義的」和約，可是絲毫也不會改變其爲同業併者，即同德國帝國主義者締結的和約。

寫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舊曆七日)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三十四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
一九三至一九九頁

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爲了使疲憊不堪，瘡痍滿目的國家免除新的戰禍，我們作了莫大的犧牲，竟向德國人聲明我們同意簽訂他們所提出的媾和條件。我們的使者已於二月二十日（舊曆七日）下午從列日查出發到特文斯克去，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回答。德國政府大概是有意遲遲不答，顯然是不願意媾和。德國軍閥執行各國資本家底委託，想窒息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工農，把土地交還地主、工廠交還銀行家、政權交還沙皇。德國將軍們想在彼得格拉和基也輔建立自己的「秩序」。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危急萬分。俄國工農底神聖責任，是要在德國無產階級尚未起義和尚未勝利之前，始終忠誠地捍衛蘇維埃共和國，反對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德國的寇軍。

人民委員會議決：（一）全國所有一切人力物力全部都用於革命防衛事業。（二）責成各蘇維埃和各革命組織戰到最後一滴血來保衛每一個陣地。（三）各鐵路組織及與之有關的各蘇維埃，必須以全力阻礙敵人利用交通機關，在退却時必須破壞道路，炸毀鐵道建築物；全部車輛——車箱和車頭——立刻開往我

國東方內地去。(四)凡有落入敵手危險的一切存糧和一般食品以及一切貴重財物，應當無條件地加以消滅；責成各地蘇維埃對此加以監視，並由各蘇維埃主席親身負責。(五)彼得格拉、基也輔以及沿新戰綫所有一切城鄉市鎮的工農，都應當組織掘壕營，由軍事專家指揮，挖掘戰壕。(六)資產階級中所有一切有勞動能力的男女，均應加入挖壕營，受赤衛隊員底監視；違者槍斃。(七)所有一切反對革命防衛事業而站到德國資產階級方面，以及企圖利用帝國主義寇軍底侵入來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出版機關，一律封禁，這些出版機關中凡有勞動能力的編輯員和工作人都動員去參加挖掘戰壕以及其他有關國防的工作。(八)所有敵方奸細、投機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動者、德國偵探，一律就地槍決。

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社會主義祖國萬歲！國際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人民委員會

刊載於國內戰爭時期的列寧著作，一九三四年版，第二九至三〇頁

奇談與怪論

我黨莫斯科省區常委局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所通過的決議案中，表示不信任中央委員會，拒絕服從那些『與履行同奧德所訂和約條件有關的』中央決議，並在其對於該決議案的「說明書」中聲明說，「黨在最近將來的分裂是恐難避免的」^①。

所有這些語句中，不僅沒有什麼奇談，而且也沒有什麼怪論。在單獨媾和問題上與中央意見大相背馳的同志們，嚴厲責備中央，並認定分裂不可避免，這是完全自然的。這都是黨員極正當的權利，這是完全可以瞭解的。

但是附在決議案後面的「說明書」便是奇談怪論了。該說明書的全文如下：

『莫斯科省區常委局認為黨在最近將來的分裂是恐難避免的，因而抱定任務，要團結所有那些既反對單獨媾和派，又反對黨內一切機會主義穩健份子的澈底革命的共產主義

① 決議案底全文如下：『俄國社會民主黨莫斯科省區常委局，在討論中央工作之後，對於中央底政治路線及其成份表示不信任，因此一有機會，便主張改選中央。此外，莫斯科省區常委局並不認為自己應當絕對服從那些與履行同奧德所訂和約條件有關的中央決議。』本決議案是由全體一致通過的。

者。爲着國際革命底利益，我們認爲那怕就是喪失這現時變成爲純粹形式東西的蘇維埃政權，也是適當的。我們照舊認爲我們的基本任務是把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傳播到其他一切國家去，並在俄國堅決實行工人專政及無情鎮壓資產階級底反革命勢力。」

這裏我們把那些真是…奇談與怪論的字句加上了着重點。問題中心也就恰恰在這些字句中。

這些字句把該決議案作者底全部路綫都引伸到荒謬絕倫的地步。這些字句非常明顯地暴露出他們錯誤的根源。

『爲着國際革命底利益，那怕就是喪失這蘇維埃政權，也是適當的』…這是奇談，因爲甚至在前提與結論之間都沒有聯繫。『爲着國際革命底利益，那怕就是使蘇維埃政權遭到軍事失敗，也是適當的』——這樣的提綱還可說是正確或不正確的，但總還不能稱之爲奇談。這是第一。

第二，蘇維埃政權『現時變成爲純粹形式的東西』。這就不僅是奇談，而且簡直是怪論了。顯然作者陷入到糊塗不堪的迷宮中了。須得打破這個迷宮才行。

關於第一個問題，作者的意思顯然是說，爲着國際革命底利益，那怕是遭受軍事失敗而弄到喪失蘇維埃政權，即使俄國資產階級獲得勝利，也是適當的。作者說出這句話，就是間接承認我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寫的，而於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發表在真理報上的提綱中的話是正確的，我說，若不接受德國向我們提出的媾和條件定會使俄國失敗，並使蘇維埃政權被人推翻。

由此可知，la raison finit toujours par avoir raison——真理始終是佔上風的！我的「極端」反對者，以分裂相威嚇的莫

斯科派，正因為他們已公開說到分裂，便不得不也將自己的具體意見徹底說出，這種意見正是那些專用關於革命戰爭的籠統空談來搪塞了事的人們所寧肯迴避不說的。我的提綱與論據底全部實質（這是凡願細心讀讀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我所寫的提綱的人，都會看得出來），是指明現在必須立刻接受極苛刻的和約，同時又要嚴重準備革命戰爭（並且正是為着這種嚴重準備工作的利益）。而那些專說什麼革命戰爭的籠統空談的人們，却把我的論據底全部實質迴避不談，或是沒有注意到這個實質，不願意注意到這個實質。但是現在我應當誠懇感謝我的這些「極端」反對者——莫斯科派了，因為他們把自己對我的論證實質所持的『默然抵制的陰謀』撕破了。莫斯科派首先對於這些論據實質作了回答。

他們的回答究竟是什麼呢？

他們的回答就是承認我的具體論據底正確：是的，——莫斯科派承認了，——我們現在若同德軍開戰，我們的確會遭受失敗^①。是的，這種失敗，的確會使蘇維埃政權場台。

我再一次誠懇感謝我的「極端」反對者——莫斯科派，感謝他們把那種對我的論據實質，即是對我所說的，如果我們即刻應戰就會遭到何種結局這一具體指示所持的『默然抵制的陰謀』撕破了，並感謝他們毫無畏懼地承認了我的具體指示之正確性。

① 有人反駁說，當時躲避戰爭橫擊是不可能的。對於這種反駁意見已有事實作回答：我的提綱是在一月八日宣讀的：到一月十五日我們本已有可能得到和平。若不是……若不是由於革命的空談，我們一定已經得到了暫時的休戰（對於我們，即令是最短促的暫時休戰：無論在物質方面，或在精神方面，都有巨大意義——，因為那時德國人將要宣佈新的戰爭）。

其次，我的論據底正確性，既然實際上已爲莫斯科派迫不得已而承認了，可是他們仍然來從事反駁，究竟有何理由呢？

理由就是爲着國際革命底利益，那怕就是喪失蘇維埃政權也可以的。

爲什麼國際革命底利益定要求這樣作呢？問題中心就在於此，那些要想反對我的論據的人，其立論的真正實質也就在此。但無論在決議案中，無論在說明書中，恰巧對於這個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却一字也沒有提到。關於衆所共知與無可爭辯的問題，決議案作者却找到了時間與地方來說到——既說到「無情鎮壓俄國資產階級底反革命勢力」（就是用喪失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底手段和辦法嗎？）又說到反對黨內一切機會主義穩健份子，而關於恰恰是爭論的問題，也就是有關反對媾和者的立場實質問題，却一聲不響！

這真是奇怪。非常的奇怪。決議案作者對此之所以默不作聲，豈不正是因爲他們覺得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特別軟弱無力嗎？若是明白說出爲什麼（爲什麼國際革命底利益要求這樣作），那他們就也許會揭穿自己了……

但不管怎樣，我們須得找出那些可能是決議案作者引爲根據的理由來。

也許作者以爲國際革命底利益禁止與帝國主義者締結任何和約嗎？這種意見已由一些反對締結和約者在彼得城的一次會議上說過，可是擁護這種意見的，只有反對單獨媾和者中極少數的一部份人。顯然這種意見是走向否認布列斯特談判的適當性，否認「甚至」以歸還波蘭、拉脫維亞和庫爾蘭爲條件的和約。這種觀點之不正確（例如在彼得城的反對媾和者中的大多數便反對這種

意見)是一目了然的。按照這種觀點，社會主義共和國處在帝國主義列強中間是連任何經濟條約也不能締結的，假若不飛到月球上去，那就簡直無法生存了。

也許作者以為國際革命底利益是要求助長這種革命，而能助長這個革命的，大概只是戰爭，絕不是和平，因為和平便會使羣衆覺得彷彿帝國主義是「法定了」的吧？像這一類的「理論」是完全脫離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始終否認「助長」革命，革命是隨着那產生革命的階級矛盾尖銳化底成熟程度而發展的。這類的理論與認為武裝起義無論何時和在何種條件下都是必須採取的鬥爭形式的觀點一樣。其實，國際革命底利益，是需要已推翻國內資產階級的那蘇維埃政權起來幫助這個革命，不過幫助的形式應根據自己的力量去選擇。為要在國際範圍內幫助社會主義革命，那怕是使這種革命在本國內失敗，——這種觀點，甚至從助長革命的理論中也是引伸不出來的。

也許決議案作者以為德國革命已經開始，已經達到公開的全國內戰的程度，所以我們應當獻出自己的力量去幫助德國工人，應當以犧牲自己（『喪失蘇維埃政權』）去拯救已經開始決戰而陷在嚴重打擊之下的德國革命吧？這樣看來，我們前去犧牲，也許可以牽制住德國一部份反革命勢力，因而就會救全德國革命。

當然在這種前提之下，我們那怕就是遭受失敗，那怕就是喪失蘇維埃政權，這不僅是「適當的」（如決議案作者所說），而且簡直是應該的了。但這種前提顯然沒有。德國革命在成熟着，可是顯然還沒有成熟到在德國爆發革命的程度，還沒有成熟到在德國發生內戰的程度。我們『那怕就是喪失蘇維埃政權』的辦法，顯然也幫助不了德國革命之成熟，反而會妨礙它。我們會以

此幫助德國反動勢力，為其所利用，而使德國社會主義運動更感困難，使那些尚未轉到社會主義運動方面來的德國無產者與半無產者廣大羣衆更加離開社會主義，因為他們被蘇維埃俄國的潰敗所嚇倒，如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之潰敗把英國工人嚇倒了一樣。

不管怎樣，在作者的議論中，是找不出邏輯來的。足以辯護『爲着國際革命底利益，那怕就是喪失蘇維埃政權，也是適當的』這一主張，是沒有合理論據的。

『蘇維埃政權現時變成爲純粹形式的東西』——這就真是怪論，莫斯科決議案底作者竟公然說出這種怪論來了。

大概，既然德帝國主義者要我們繳納貢賦，既然他們要禁止我們進行反德的宣傳鼓動，那末蘇維埃政權便失掉了意義，而『變成爲純粹形式的東西』了，大概這就是決議案作者底「思維」程序。我所以說「大概」，是因爲作者並沒有拿出絲毫明確理由來證實自己的上述提綱。

說蘇維埃政權的意義似乎是形式上的，因而可以採取那怕就是喪失蘇維埃政權的策略，這一「理論」底內容便是沒有出路的極端悲觀情緒，是完全絕望的悲觀心理。反正沒有救路，就讓蘇維埃政權也遭滅亡吧——從這種心理上才寫出了這個怪誕的決議。有時用以掩飾這種意思的所謂「經濟」論據，也是歸結於同樣沒有出路的悲觀主義：既然人家可以強迫我們繳納貢賦，要這要那，試問哪裏還說得上什麼蘇維埃共和國呢。

除了絕望以外，再沒有旁的東西了：反正是要滅亡的！

在俄國現今極困難的境況下，這種心理是很了然的。不過所謂「了然」，並不是對於覺悟的革命者說。正是這樣一種心理表

明莫斯科派底觀點走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一七九三年時的法國人，無論如何也不會說他們的勝利品，即共和國與民主制變成爲純粹形式的東西，說那怕就是喪失共和國也可以的。他們所充滿在胸懷中的，並不是絕望，而是對勝利的信心。但口頭上號召進行革命戰爭，同時却在自己的正式決議案中寫着『那怕就是喪失蘇維埃政權』，這便是把自己的面目澈底揭破了。

十九世紀初，在拿破崙戰爭時期，普魯士及其他許多國家所遭到的失敗以及被侵略者征服、侮辱、壓迫等等的痛苦，較之一九一八年俄國所遭受的這種痛苦，簡直大得無可比擬，無可測量。然而普魯士底優秀人士，當拿破崙軍隊底鐵蹄把他們踐踏得比我們現在所已遭到的蹂躪更加厲害百倍的時候，也沒有絕望過，也沒有說過他們的國家政治機關成了『純粹形式的東西』。他們並沒有表示絕望，也沒有被『反正是滅亡』的心理所支配。他們曾簽訂了比布列斯特和約更加苛刻得多、殘酷得多、恥辱得多，受壓迫得多的和約，他們善於堅定地忍受住侵略者所橫施的壓迫，靜待時機，然後又奮起作戰，又陷於侵略者的壓迫下，又簽訂屈辱的，屈辱到了極點和約，然後又重新奮起，並終於獲得了解放（當然也利用了那些互相競爭的強大侵略者間的爭執）。

爲什麼這樣的事情不能在我國歷史上重演一次呢？

爲什麼我們定要陷入絕望境地而寫出比最恥辱的和約還更加可恥的決議，說什麼『蘇維埃政權變成爲純粹形式的東西』呢？

爲什麼在同現代帝國主義巨魁鬥爭中所遭到的嚴重軍事失敗，就不能也使俄國人民性格鍛鍊起來，加強其自我紀律，消滅高傲空談惡習，學會堅韌精神，引導羣衆走向普魯士人被拿破崙

打敗時所採取過的正確策略：自己既沒有軍隊了，就只好簽訂最恥辱的和約，以便養精蓄銳，爾後一再奮起呢？

爲什麼他國人民能堅忍地經住多次慘痛，而我們祇初次遇到非常苛刻的和約時，便應陷入絕望境地呢？

試問這種絕望策略與無產者底剛毅精神有什麼符合之處？因爲無產者懂得，若是沒有力量的時候，那就只好屈服，並善於隨後在任何條件下都養精蓄銳，以便無論如何都要一再奮起，——試問這種絕望策略究竟是適合於無產者底剛毅精神，還是適合於小資產者底無氣節性呢？因爲小資產者在我國以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爲代表，在大放革命戰爭的空砲方面，真是打破紀錄了。

莫斯科「極端」派中的親愛同志們，這不是無產者底剛毅精神！每天的艱苦考驗都會使最有覺悟與最有堅忍性的工人離開你們。他們會說，蘇維埃政權不僅當侵略者已進到普斯科夫城並要我們繳納價值一百萬萬的糧食、礦產、現金的貢賦時，沒有變成爲，也不會變成爲純粹形式的東西，而且就是當敵人出現於尼什涅城和頓河岸羅斯托夫城，並要我們繳納價值二百萬萬的貢賦時，它沒有變成爲，也不會變成爲純粹形式的東西。

任何時候，任何外國侵略，都決不能把人民的政治機關（而蘇維埃政權不僅是比歷史上所有過的一切政治機關都高出多倍的政治機關而已）變成「純粹形式的東西」。相反的，外國的侵略，只會加強人民對於蘇維埃政權的同情，只要…只要蘇維埃政權自己不去幹冒險舉動。

若是沒有軍隊而拒絕締結最屈辱的和約，那就是冒險，人民對於這樣拒絕和約的政權所作的冒險行動，是有權加以責難的。

簽訂比布列斯特和約還沈痛百倍恥辱百倍的和約，在歷史上

已有過這樣的先例（上邊已經舉出了例子），它並沒有使政權喪失威信，又沒有使政權成爲形式的東西，也沒有使政權或人民遭到滅亡，反而鍛鍊了人民，教導了人民甚至在侵略者鐵蹄踐踏的艱鉅情況下，也善於作這種準備真正有力軍隊的極困難的事業。

俄國現今正在準備進行新的、真正的衛國戰爭，即保衛與鞏固蘇維埃政權的戰爭。也許另一個時代——如拿破崙戰爭時代一樣——將會是侵略者強使蘇維埃俄國進行的多次解放戰爭（定是多次戰爭，而不是一次戰爭）的時代。這是可能的。

因此，可恥的絕望心理，比那因爲沒有軍隊而不得已締結的任何苦重和約，極端苦重的和約更爲可恥，比那最可恥的和約還要可恥。如果我們認真看待起義和戰爭的話，那我們就是簽訂十個極端苦重的和約也決不會滅亡。如果我們不讓絕望與空談來斷送自己的話，那侵略者是決然滅亡不了我們的。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和三月一日刊

載於真理報第三十七期和第三十八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

二九七至三〇三頁

脚踏實地

由於德寇背信棄義襲擊俄國革命所掀起的革命高潮，已經成爲事實。到處都來電表示，決心爲保衛蘇維埃政權而斷殺到最後一個人。本來以另一種態度來對待自己的工農政權也是決不會有的事。

然而與德帝國主義這樣的敵人進行戰爭，單靠熱忱是不夠的。若以輕率態度去對待現時這次嚴重、頑強、流血的戰爭，那就會是極端幼稚，甚至是犯罪行爲。

戰爭應當以認真的態度去進行，不然就根本不要進行戰爭。中間道路這裏是不會有的。既然德帝國主義者強迫我們進行戰爭，那末我們的神聖義務就是要清醒地估計自己的狀況，籌算力量，檢查經濟機構。所有這一切工作都應以戰時速度來完成，因爲在我們目前狀況下，任何遲緩，便真正等於『自尋死路』。甘尼巴爾已闖到門口了⁴⁹；——這是我們一分鐘也不應忘記的事。

爲要認真進行戰爭，必須有組織得很堅固的後方。若沒有充分的武裝，沒有充分的給養與充分的訓練，那怕是最優秀的軍隊，最忠實於革命事業的人員，也會立刻被敵人消滅掉的。這是極端明顯，用不着加以解釋的事。

我們革命軍底後方情形怎樣呢？至少可說是最可悲痛的。由於前次戰爭的結果，我們的運輸業完全解體了，城鄉間的商品交換被破壞了，其直接結果，就是各大城市中發生飢荒。

我們的軍隊受到敵人底打擊，現時正在實行根本改組。熟悉現代作戰條件的舊軍隊，已經沒有了。被這次戰爭弄得困苦不堪，因三年半的戰壕生活以致精疲力竭的舊軍隊，其戰鬥力已等於零了。紅軍無疑地是極好的戰鬥「材料」，然而還是沒有加工製造過的原料。爲要使它不致成爲德軍的砲灰，就必須加以教練，使其嚴守紀律。

我們面前擺着極大的困難。各地方蘇維埃在拍發了關於決心與外敵鬥爭的電報之後，應即呈報以下各項：已向彼得格拉送去了多少車箱糧食；能立刻派出多少軍隊到前綫去；有多少紅軍戰士在受訓練。對於一切武器和彈藥都應加以登記，要立刻恢復武器與彈藥的生產。應把鐵路上的投機小販和流氓一概肅清。到處都應恢復極嚴格的革命紀律。只有履行所有這些條件時，才可以認真談到戰爭。否則，一切關於「最革命戰爭」的議論，都會是空話。空話在任何時候都是有害的，而際此緊急關頭，則可能造成覆滅的厄運。

我深信，我們的革命能夠克服當前的巨大困難。它已經作了很大的工作，但爲要順利完成我們的事業，還須加倍努力。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勝利。

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刊載於真理報第
三十八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
第三〇四至三〇五頁

嚴重的教訓與嚴重的責任

我們可憐的「左派」昨天竟出版了自己的報共產主義者⁵¹（應當說是：馬克思時代以前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在報上說了許多遁詞，想來逃避歷史教訓，逃避多次的歷史教訓，逃避自己的責任。

逃避也是枉然的，無論如何都逃避不了的。

拚命逃避的人們，大費氣力，勞累得滿面是汗，「甚至」不惜耗費印刷油墨，在報紙上登載無數論文，來證明「暫息論」是毫無根據的壞「理論」。

唔！儘管他們怎樣大賣氣力也推翻不了事實。英國諺語說得好：事實是很頑強的東西。事實是：自三月三日下午一時德軍停止軍事行動時起，至三月五日晚上七點鐘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止，我們是獲得了暫息時機，並且我們已經利用這兩天工夫來進行了切實的（不是空談，而是腳踏實地做去）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工作。這是事實，這是會為羣衆日益明瞭的事實。當無力再戰的前綫軍隊，拋棄大砲，連橋樑也顧不及炸毀就狼狽奔逃的時候，要保衛祖國並提高其國防能力，那就不是空談進行革命戰爭（在軍隊這樣狼狽奔逃時，主張革命戰爭的人連一個部隊也沒有

退阻住，却還空談革命戰爭，——簡直可恥已極）所能辦到的，而是要作有秩序的退却來挽救殘餘軍隊，要利用每天的暫息時間來實現這一目的，——所有這一切都是事實。

事實是很頑強的東西。

我們可憐的「左派」，爲要逃遁事實，逃避事實的教訓，逃避責任問題，就極力對讀者掩蓋不久前才發生的，有歷史重要性的，尚屬新鮮的事實；而以引證早已過去並且是不關重要的事實來模糊他們。例如拉狄克在自己的論文中，回憶他十二月間（在十二月呵！）在遞給「人民委員會的報告書」中寫過關於必須幫助軍隊支持下去的問題。我沒有機會閱讀這個報告書，因此我就尋思自問：爲什麼拉狄克不把這報告書全部發表出來呢？爲什麼他沒有確切地當地說明，他當時對「妥協和約」這一名詞究竟作何瞭解呢？他爲什麼不回想一下不久前的事實：他在真理報上所寫的話，他以為可能在歸還波蘭的條件下與德帝國主義者締結和約的幻想（最壞的幻想）呢？

爲什麼？

就是因爲可憐的「左派」不能不抹煞那些揭穿他們「左派」應負散佈幻想之咎的事實，因爲這種幻想在實際上幫助了德帝國主義者，並且妨礙了德國革命底增長和發展。

布哈林現在甚至企圖否認他同他的朋友曾斷定說德國人不能舉行進攻的事實。可是，許許多多人都知道這是事實，都知道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是這樣斷言過，都知道他們既散佈這種幻想，也就是幫助了德帝國主義，並且妨害了德國革命底發展；須知德國革命現在因大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在由農民組成的軍隊狼狽奔逃時，喪失了成千上萬的大炮和價值若干萬萬的財富而被削弱了。

這是我在一月七日提綱中已經明白確切地預言過的。如果布哈林現在迫不得已却『拒不招認』的話，那對於他就會更壞。凡是記得布哈林及其朋友們所說德國人沒有進攻可能這句話的人，現在看見布哈林只好『拒不招認』他親口說出的話時，只會聳肩表示詫異而已。

而對於那些不記得這些話的人，或是沒有聽見這些話的人，我們就給他們指出一些比拉狄克在十二月所寫的東西對現時更有價值，更有意義並更有教益的文件。這些文件可惜是被「左派」向他們的讀者隱瞞了的，這就是（一）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我黨中央與現今「左傾」反對派共同會議上的表決結果；以及（二）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七日中央會議上的表決結果。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會議在表決關於是否應當立刻與德國破裂談判的問題時，贊成的（在可憐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報底撰稿人中）只有斯徒可夫一人。其餘的人都是反對的。

關於萬一德國人破裂談判或是他們提出最後通牒時，是否可以締結割地和約的問題，表決反對的只有奧波林斯基（究竟什麼時候才會把「他的」提綱登載出來呢？爲什麼共產主義者報對於這點默不作聲呢？）和斯徒可夫，其餘的人都是贊成的。

關於在這樣的情形下是否應當簽訂已提出的和約條件問題，表決反對的只有奧波林斯基和斯徒可夫，其餘的「左派」份子都表示懷疑！這是事實。

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七日表決關於誰贊成進行革命戰爭的問題時，布哈林和洛莫夫「在這樣的問題提法下拒絕參加表決」。表決贊成的沒有一個人。這是事實！

關於是否應當「把恢復和平談判的事推延下去，就是說，在

德國進攻尚未充分（正是如此！）明顯之前以及這種進攻對德國工人運動的影響尚未表現出來以前，暫不舉行談判」的問題，在現今的「左派」報紙撰稿人中，表決贊成的有布哈林、洛莫夫和烏里茨基三人。

關於「如果德國人進攻已成事實，而在德國和奧國又還沒有革命高漲的時候，我們是否要締結和約」的問題，表示懷疑的有洛莫夫、布哈林和烏里茨基。

事實是很頑強的東西。而事實說明，布哈林否認了德國有進攻的可能，散佈了幻想，他用這種幻想在實際上，——雖不是他所心願的，——幫助了德帝國主義者，並且妨害了德國革命底增長。革命空談底實質也就在於此。本來是向這間房裏走，却走進另一間房裏去了。

布哈林責難我不來具體分析現今和約的條件。可是不難明白，爲了說明我的論據和問題實質，並沒有任何必要來具體分析這些條件。爲了這層，只須證明下述一點就夠了，就是說，在我們面前的真實絕路，而不是幻夢中的絕路只有兩個條件：或者是承認這樣的條件，而獲得至少幾日的暫息時間，或者就淪爲比利時和塞爾維亞的地位。這是布哈林——至少對彼得城說——也未能否認的，這是他的同志波克羅夫斯基所承認了的。

至於說，新條件比惡劣、苛刻、屈辱的布列斯特條件更惡劣、更苛刻、更屈辱的話，那末這種在偉大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面前所犯的罪過是要由我們可憐的左派布哈林、洛莫夫、烏里茨基之流來負責的。這是由上面引證過的表決情形所證實了的歷史事實。這件事實是用任何遁詞也躲避不了的。給過你們的布列斯特條件，而你們却以裝威作勢，妄自誇大作回答，以致弄成更

惡劣的條件。這是事實。並且你們對此應負的責任是決然推卸不掉的。

我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寫的提綱中，極端明顯地預言過，由於我們軍隊的狀況（這是不能由「反對」疲憊農民羣衆的空談而變更的），俄國若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約，就會要締結更壞的單獨和約。

「左派」是上了俄國資產階級的圈套，因為這些資產階級本來是要把我們拉進對於我們最不利的戰爭中去。

至於「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主張立刻進行戰爭，顯然是與農民分離了，這是事實。而這件事實也就說明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政策的不鄭重性，正如一九一七年夏季所有社會革命黨人所執行的那種似乎是「革命」政策一樣的不鄭重。

最覺悟與最先進的工人很快就會撇開這種革命空談的瘴氣！這是彼得城與莫斯科的榜樣所正在表明着的。彼得城內的優秀工人區域，如維波爾格區與瓦西列也夫島區，已經覺醒起來了。彼得格拉工人代表蘇維埃並不主張立刻進行戰爭，它懂得必須準備，並且已在準備這個戰爭。在莫斯科，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至四日舉行的波爾什維克城市代表會議上，反對革命空談的人已經獲得勝利了。

「左派」之傲然自欺該到了何種怪誕地步，這點從波克羅夫斯基文章裏的一句話中就可看出來。他說：「要打仗，就要現在打」（波克羅夫斯基加的重點……）「要趁着，——聽吧！聽吧！——趁着俄國軍隊尚未遣散而新軍尚未編成的時候來打」。

誰不逃避事實，那他就會知道，在一九一八年二月間，無論在大俄羅斯、在烏克蘭、在芬蘭，妨害回擊德寇的莫大障礙都是

我們的那個沒有遺散的軍隊。這是事實。因為這個軍隊已經不能不狼狽奔逃，並使紅軍部隊也受到它的牽動。

誰願意學習歷史教訓，不躲閃對這種教訓應負的責任，不逃避這種教訓，那他至少也會記得拿破崙第一與德國的戰爭。

普魯士與德國屢次同侵略國締結過比我們的苛刻十倍，恥辱十倍的和約，直至承認由外國人充任警察，直至承認派遣自己軍隊去幫助拿破崙第一進行侵略戰爭的義務。拿破崙第一同普魯士所訂的條約之蹂躪德國，分割德國，比現時奧登堡和威廉對我們所施的壓迫要厲害十倍。可是，在普魯士却有人能不裝威作勢，而簽訂了極端「可恥」的和約，他們之所以簽訂這樣的條約，是因為沒有軍隊，雖是簽訂了苛刻十倍恥辱十倍的條約，但後來他們還是做到了起義和進行戰爭。這樣的情形不是一次，而是許多次。歷史上有過幾次這類的和約與幾次這類的戰爭。有過幾次得到暫息的情形。有過幾次侵略者重新宣佈戰爭的事實。有過幾次某一被壓迫民族與某一壓迫民族聯盟的事件，這個與侵略國互相競爭的壓迫民族，自己也同樣是侵略國（請那些主張不要帝國主義者幫助而進行「革命戰爭」的人們注意！）。

歷史就是這樣演進的。

過去是如此。將來也會如此。我們已達到多次戰爭的時代。我們正接近新的衛國戰爭。我們是在社會主義革命正在成熟的條件下去開始這個新戰爭。俄國無產階級和俄國革命在這一艱難困苦的道路上，定能醫好裝威作勢與革命空談的惡習，甚至既能接受極苛刻的和約，也能重新奮起的。

我們締結了提里齊特式的和約。我們也會達到我們的勝利，達到我們的解放，如像德國人在一八〇七至一八一〇年的提里齊

特和約之後，達到了在一八一三和一八一四年從拿破崙壓迫下解放出來的目的一樣。由我們的提里齊特式和約到我們獲得解放時的距離，想必短一些，因為現在歷史進展得快些。

打倒裝威作勢的惡習！爲切實工作，整飭紀律和加強組織而奮鬥。

一九一八年三月六日刊載於真理報第
四十二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
第三〇六至三一〇頁

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報告

一九一三年三月七日在俄國共產黨(波)

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

政治報告底內容本來可以用列舉中央委員會各種設施的方式，可是現時所需要的，並不是這樣的報告，而是關於我國整個革命的概述；祇有這種概述，才能使我們的一切決議有着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根據。我們應該考查革命發展之已往的全部進程，並闡明爲什麼革命底繼續發展起了變化。在我國革命中發生了對於國際革命將有巨大意義的轉變，這就是十月革命。

二月革命最初勝利底原因，在於當時隨着無產階級走的，不僅有農村羣衆，而且還有資產階級。所以很容易戰勝了沙皇制度，達到了我們在一九〇五年所沒有達到的目的。在二月革命時，工人代表蘇維埃之自動的自發的成立，重複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底經驗，——我們當時就宣佈了蘇維埃政權原則。羣衆根據本身鬥爭經驗學習了革命底任務。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的事變，是示威運動與類似武裝起義舉動之一種特殊的結合。單是這次事變就足夠使資產階級政府傾覆。從此就開始了長期間的妥協政策，此種政策是由當時執政的小資產階級政府之固有本質中產生的。七月事變還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因爲羣衆對這還沒有充

分覺悟。所以無論哪一個負責的組織，都不曾號召羣衆這樣去作。可是，在偵察敵情的意義上說，七月事變具有極大的意義。科爾尼洛夫叛亂和接着發生的種種事變，給了一些實際的教訓，而使十月勝利成爲可能的了。在十月革命中還想與他黨分掌政權的人們底錯誤，就在於他們沒有將十月勝利與七月事變、前綫進攻和科爾尼洛夫事變等等聯繫起來，正由於這些事變，才使千百萬羣衆覺悟到蘇維埃政權已是必不可免的了。接着就是我們在全俄各地凱歌行進，隨之而來的便是大家對和平的渴望。我們知道，單方面拒絕戰爭是得不到和平的；還在四月代表會議上⁵¹，我們就已經指出了這一點。從四月到十月的這個時期中，兵士們已明白地覺悟到：妥協政策總是遷延戰爭，促使帝國主義者荒謬粗野地企圖舉行進攻，而更加沉陷到還會延長多年的戰爭中去。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無論如何都要趕快轉而採取積極的和平政策，必須將政權拿到蘇維埃手裏來，澈底掃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你們知道，不僅克倫斯基，而且亞甫克森鐵夫都是擁護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他們甚至逮捕了各土地委員會委員。於是，這個政策，這個已經由我們灌入到了最廣大民衆意識中的『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就使我們能夠在十月間很容易地在彼得堡獲得勝利，並將俄國革命底最後幾個月變成全盤的凱歌行進時期。

國內戰爭業已成爲事實。我們在革命初期，甚至在戰爭初期所預言過的，即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意見，當時大部份社會主義者都對這表示不相信，或甚至加以嘲笑，而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一個最大而又最落後的交戰國內，却已變成事實了。在這國內戰爭中，絕大多數的人民，都站在我們方面，因而使我們非常容易地獲得了勝利。

前綫歸來的軍隊，把自己那種要剷除妥協主義的最大的革命堅決性，帶到他們足跡所至的一切地方去了；於是妥協份子、白衛隊、地主子弟們，便在民衆中間失去了任何靠山。這一反對他們的戰爭，隨着廣大羣衆以及調來反對我們的軍隊轉到波爾什維克方面的情形，而逐漸變成了革命的凱歌行進，在彼得城區域加琴納戰綫上的情形是如此，那裏克倫斯基和克拉斯諾夫企圖調來進攻赤色首都的哥薩克軍隊，動搖起來了；此後在莫斯科、奧倫堡、烏克蘭等地的情形，也是如此。在全俄各地湧起了國內的戰爭的巨浪，我們到處都異常容易地獲得了勝利，這是因爲果實已經成熟了，因爲羣衆已經經歷過了與資產階級妥協的一切經驗。「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已經由羣衆用長期的歷史經驗來實際審查過，而成爲羣衆底切身要求了。

正因爲如此，所以俄國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的最初幾月，就成了全盤的凱歌行進時期。由於有這種凱歌行進的情形，遂使人們把社會主義革命當時所立即遇到而且不能不遇到的那些困難情況忘記，放到了次要的地位上。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基本區別之一，就是對於由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說來，還在舊制度內部，就已有新經濟組織逐漸形成起來，而這些經濟組織逐漸改變着封建社會所有各方面。在資產階級革命面前，祇有一個任務——掃除、摒棄和破壞舊社會所有一切桎梏。任何資產階級革命一完成這個任務，就算是完成了它所應作的一切：它加強着資本主義發展過程。

社會主義革命却處在完全另外一種情況中。由於歷史進程轉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落後，則它由舊時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也就越困難。這裏除破壞任務而

外，更加上一種空前困難的新任務，即組織任務。如果俄國革命中那種經歷了一九〇五年偉大經驗的民衆創造力，不是尙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就創立了蘇維埃，那它們在十月間就會無論如何也不能奪得政權了，因為在當時，成功只是依靠於那包括千百萬羣衆的運動已有現成的組織形式爲轉移。蘇維埃就是這種現成的形式，因此我們在政治方面就能預期我們後來所經歷的那些燦爛的成功和全盤的凱歌行進，因為新政權形式已經預備好了，而我們祇須頒佈幾道法令來把蘇維埃政權從它在革命最初幾月間的胚胎狀態中，變成爲在俄羅斯國家內奠定的法定形式，即變成爲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政權一下子就產生了，其所以產生得這樣容易，是因爲羣衆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甚至當任何政黨還沒有來得及宣佈這個口號以前，就已經創立了蘇維埃。受過一九〇五年苦辣經驗而更加有了鍛鍊的民衆創造力，就是這個無產階級政權形式底創造者。當時，戰勝國內敵人的任務，是極其容易的任務，建立政權的任務，也是極其容易的，因為羣衆已給我們造成了這個政權底骨幹和基礎。蘇維埃共和國一下子就產生了。可是還剩下兩個極困難的任務，而這兩個任務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按照我們革命在最初幾月間所經歷的那種凱歌行進的道路來解決的，——當時我們沒有懷疑而且也不能懷疑，社會主義革命往後還要遇到一些極困難的任務。

第一，這就是擺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內部組織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就在於當資產階級革命發生時，已有資本主義關係底現成形式，而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政權，却得不到這種現成關係，祇不過是有資本主義那些最發展的形式，而資本主義那些最發展的形式，實際上又祇包括一小

部份工業上層，却還極少觸及農業。組織統計、監督各巨大企業，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爲一整架大機器；變成爲一個使幾萬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動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擺在我們肩上的偉大組織任務。據現時勞動條件看來，這個任務無論如何都是不容許如像我們從前解決國內戰爭任務時那樣用高呼「烏啦」的方式來解決的。問題底實質不容許採用這樣的解決方式。如果我們很容易就戰勝了我國的卡列金匪徒，創立了蘇維埃共和國，而只遇到了一些甚至值不得嚴重注意的反抗；如果這種事變進程，已爲以前整個客觀發展進程所預決，因此我們祇要來作出最後的結論，換換招牌，去掉『蘇維埃是職工組織』的字樣，寫上『蘇維埃是唯一國家政權形式』的字樣，——那末在組織任務方面，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這裏我們遇着了莫大的困難。每一個願意細心對待我國革命任務的人，馬上就知道：祇有用艱苦的長期的自守紀律的方法，才能克服戰爭給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的那種腐化現象；只有經過非常長期的、艱苦的和頑強的道路，我們才能克服這種腐化現象並戰勝那些擴大這種現象的份子，因爲這些人把革命看成只是一種解除舊桎梏的方法，而從革命中儘量攫取一切。在小資產階級國家內，在經濟極端破壞的時候，這種份子之大量出現是必不可免的，我們還須進行更加困難百倍的鬥爭來反對他們，這個鬥爭不能預期任何輕易的成效，——這個鬥爭，我們還剛剛開始進行。我們現時正處在這個鬥爭底第一階段。這裏我們還要遇到極艱難的考驗。這裏由於客觀情勢的關係，我們絕對不能限於高舉旗幟凱歌行進的方式，如像我們過去反對卡列金匪徒時那樣。誰要企圖將這種鬥爭方式拿來解決革命進程上的組織任務，那他就必然會遭受完全破產，而不成其爲政治家、不成其爲

社會主義者、不成其為社會主義革命底活動家了。

當革命前面具體出現了落在革命肩上的第二個極大困難，即國際問題時，我們有些迷戀於革命最初期間那種凱歌行進情形的青年同志，也遇到了同樣的命運。如果我們很容易就打破了克倫斯基匪股，如果我們很容易就在本國創立了政權，如果我們毫未費力就得到了關於土地社會化和工人監督制的法令，——如果我們很容易就獲得了所有這一切，那就只是因為當時僥倖湊成的條件，在一個短時間內給我們擋開了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帝國主義擁有全部資本勢力，擁有組織得極其完備而成為國際資本之真正實力和真正堡壘的軍事技術，——它無論如何，無論在什麼條件下，無論按國際帝國主義底客觀地位來說，或按它所體現的那個資本主義階級底經濟利益來說，都是不能與蘇維埃共和國和平共處的，——其所以不能，是由於商務聯繫，是由於國際財政關係。在這裏，衝突是必不可免的。由此就有俄國革命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有它所應解決的最大歷史問題：必須解決國際任務，必須引起國際革命，實現由狹隘的、一國範圍的我國革命進到世界革命的這個過渡。擺在我們面前的這一任務，真是困難到了極點。我重複說一遍，很多自稱為左派的青年朋友們却忘記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即在十月革命後偉大勝利的幾星期和幾個月當中，我們之所以能如此容易一勝再勝的原因安在。其實這祇是因為當時的特殊國際情形，暫時給我們擋開了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當時無暇來對付我們。而我們當時覺得，我們也無暇去對付帝國主義。而單個個的帝國主義者當時之所以無暇來對付我們，祇是因為現代世界帝國主義全部極大的社會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在那時已被內鬨分裂成了兩個集團。捲入這個鬥爭的帝國主義強盜們

已走到極端，走到殊死戰，以致無論哪一集團，都不能集中幾許嚴重力量來反對俄國革命。在十月間，我們恰巧碰着這樣的時機：我國革命，恰巧碰着了良機——說來好像奇怪，實則是很正確的，——那時絕大多數的帝國主義國家，都遭受着空前的災禍，有幾百萬人的性命被殲滅了，那時戰爭所造成的空前災難正使民衆困苦不堪，那時在大戰第四年度中，交戰各國都陷於絕境，都處在進退維谷的歧路上，那時客觀上已提出一個問題：陷於此種境地的各國人民，能否繼續戰爭下去呢？祇是由於我國革命碰着了這樣的良機，那時兩個巨大的強盜集團中，無論哪一個都不能立即撲滅對方，也不能聯合起來反對我們，——我國革命祇是由於能夠利用而且利用了國際政治和經濟關係中的這種時機，才能在歐俄完成自己燦爛的凱歌行進，蔓延於芬蘭，並開始氾濫到高加索和羅馬尼亞去。只有這一點，才能說明爲什麼在我黨先進份子中間，出現了一種超人的智識份子，黨工作者，他們迷於這種凱歌行進的情形，而倡言說：國際帝國主義，我們會對付得了的；那裏也會是凱歌行進的，那裏並沒有真正的困難。俄國革命客觀情勢底特點也就在這裏，它祇是暫時利用了國際帝國主義底難關，因爲要開來反對我們的那架機器，正像火車壓碎路軌上搖車一樣開來反對我們的那架機器，暫時發生了停滯，——而這架機器之所以停滯，是因爲兩個強盜集團衝突起來了。當時革命運動到處都在增長着，可是在一切毫無例外的帝國主義國家中，革命運動大半都還處在開始的階段上。其發展速度，完全不像在我國這樣。每一個細心思索過歐洲社會主義革命底經濟前提的人，都不會不明白：要開始革命，在歐洲是難得多，而在我國却容易得多，可是要繼續革命，在我國却比在歐洲要困難些。這

種客觀情勢，也就使我們要遇着歷史上非常困難而陡峭的轉折關頭。我們要由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間在國內戰綫上反對本國反革命派和蘇維埃政權之敵的凱歌行進，轉到與真正敵對我們的真正國際帝國主義接觸。我們當時要由凱歌行進的時期，轉到情形非常困難艱苦的時期，而這種情形當然不是用空話和漂亮口號所能搪塞得了的，——雖然這樣做法是很痛快的，——因為在我們這個殘破國家內的民衆已疲憊至極，他們已達到無論如何也不能再戰下去的境地，三年的苦戰使他們元氣喪盡，陷於完全無戰鬥力的狀況。還在十月革命以前，已有一些並非波爾什維克黨員的兵士羣衆代表，當着全體資產階級面前大胆地說出這樣的實話：俄國軍隊是不會去打仗的。軍隊底這種狀況，造成了巨大的危機。一個按居民成份說來是小農的國家，被戰爭破壞得已呈空前危急的狀態，已陷於非常嚴重的境地：我們既沒有軍隊，却不能不繼續同強盜比鄰相處，這個全副武裝的強盜直到現在始終還是強盜，而要用一種主張不兼併不賠款和平的鼓吹去感動他，當然是不行的。這就好像一隻馴良家畜同猛虎臥在一塊，却去勸導猛虎，以求實現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一樣。其實這種和平是祇有用襲擊猛虎的方法才能達到。而我們黨底一些上層份子——智識份子和一部份工人組織，則企圖首先用空話和遁辭來搪塞這種前途，他們說：這是不會有的事。這種和平是太不近情理的前途：我們至今都是高舉義旗，直接作戰，振臂一呼，即可摧毀一切敵人，現在却要我們讓步，接受恥辱的條件，——這絕對不行！我們是過於自傲的革命家，我們首先就申明說：「德國人決不能進攻的。」

這就是這些人所引以自慰的第一個遁詞。歷史現在已使我們

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我們要用空前困難的組織工作來渡過許多沉痛的失敗。當然，若從全世界歷史範圍內看來，那就可以說，如果我國革命始終是孤立的革命，如果在其他各國不發生革命運動，則我國革命底最終勝利便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已將全部事業拿到唯一波爾什維克黨手裏，我們之所以負起這個事業，是因為我們深信各國革命正在成熟着，不管我們會經受怎樣的困難，不管我們會遭到怎樣的失敗，但歸根到底，——而不是立刻，——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總會來到的，因為它正在走來；它定會完全成熟的，因為它正在成熟着，而且快要成熟了。我再說一遍，能把我們從這一切困難中拯救出來的，就是全歐革命。我們從這個真理出發，從這個完全抽象的真理出發，並以這個真理為指南時，我們應該留心，不要使這個真理以後變成空談，因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你不加以任何分析就來應用它的時候，都會變成空談的。如果你們說，每一個罷工中都含有革命怪物，誰要不懂得這個道理，他就不是社會主義者，——這是對的。的確，每個罷工中，都含有社會主義革命底因素。可是如果你們說，每一個現有的罷工都是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直接步驟，——那你們就是講說空洞到了極點的廢話。我們聽見這種說法已是千番百次了，大家聽得討厭，以致工人們都將這一切無政府主義者的空話拋開不理了，因為毫無疑義，每個罷工是都含有社會主義革命怪物，但同樣明顯的：若說每個罷工都能轉為革命，這便是廢話。我國革命底一切困難，祇有在現時到處都在成熟着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完全成熟的時候才能免除，——這種說法是完全無可爭辯的；但是要像以下這樣設想的人便是荒謬絕倫的了，這些人認為我們應該隱藏我國革命現有的一切具體困難，而說了「我專指望着世界

社會主義運動，我可以作任何蠢事』。『李卜克內西定會拯救我們，因為他橫豎是要勝利的。』他將作出這樣完美的組織，把一切事都預計妥當，好使我們坐享現成的形式，正如我們坐享了西歐現成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一樣，——正是由於這樣，所以這個學說在我國，也許祇在幾月內就獲得了勝利，而它在西歐的勝利，却花費了好幾十年工夫。總之，如果把那用凱歌行進來解決鬥爭問題的舊方式移用於新的歷史時期，就是毫無意味的冒險政策；這個歷史時期已經到來，其中我們所遇到的，並不是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一類的朽木，而是國際的強盜，即德帝國主義，至於德國革命，只是在成熟着，但顯然還沒有完全成熟。斷言敵人不敢向革命進攻，便是這樣的冒險政策。布列斯特談判，還不是我們應該接受任何和平條件的時機。當時客觀的力量對比表明，我們祇得到暫息時間還是不夠的。布列斯特談判顯然表明了：德國人定會進攻，德國社會內革命底醞釀，還沒有達到立刻爆發的程度；絕不能歸咎於德帝國主義者，說他們的行動還沒有促成這個爆發，或是說，還沒有造成使德國人不能進攻的那種情況，我們那些自稱為左派的青年朋友們就是這樣說的。當人們告訴他們說，我們沒有軍隊，我們不得已才遣散了軍隊——雖然我們絕對沒有忘記在我們的馴良家畜旁邊臥着有一隻猛虎，——而他們却不願意了解這點。如果我們不得已而遣散了軍隊，這絕對不是說我們忘記了：祇有單方面發出放下武器的命令，是不能結束戰爭的。

一般說來，為什麼我們黨內任何一個思潮，任何一個派別，任何一個組織，都沒有反對過遣散軍隊呢？難道我們完全發了瘋嗎？絕對不是。還在十月革命以前，並非波爾什維克黨員的軍官

們就已說過：軍隊再不能作戰了，要使它在戰線上再留下幾個星期都是不可能的。十月革命以後，這種情形已更加明顯，凡是願意觀察事實，願意看清不堪入目的慘狀，並不逃避實情或故意遮蓋眼睛而用驕矜的空話來敷衍了事的人，都已一目瞭然。沒有軍隊，無法維繫軍隊。比較好的辦法，就是趕快遣散軍隊。這是我國機體上一個備受痛苦，備受戰災折磨的病痛部分；它在加入戰爭時，技術上原來就沒有準備，而在退出戰爭時，它的狀況又是如此惡劣，以致一遇到敵人進攻，就會狼狽失措的。這並不能歸罪於那些飽嘗空前痛苦的人們。我們在幾百次的決議案中，甚至在俄國革命初期的時候，就已完全公開地說過：『我們已沉淪在血海之中，我們再不能作戰了。』本來也可以用人工方法來遷延戰爭的結束，本來也可以幹幹克倫斯基那樣的欺騙勾當，本來也可以把這結束遷延幾個星期，可是客觀事實依然遵循着自己的道路。俄羅斯國家機體上的這個病痛部分再也經受不了這個戰爭的重担了。我們愈快地把它遣散，使這個病痛部分愈快地從那受病還不如如此深重的其他部分中消散掉，則我國便愈能更迅速地準備起來，應付新的嚴重的考驗。當我們沒有遇到絲毫反對而一致通過遣散軍隊的決議，通過這個從國外事變上看來好像是荒誕的決議時，也就是因為我們感覺到了這點。這是一個正確的步驟。我們講過：企圖維繫軍隊，是一個輕浮的幻想。軍隊遣散得愈快，則整個社會機體也就會愈快地開始恢復康健。所以說什麼『德國人不能進攻』的這種革命空話，是多麼深刻的錯誤，是多麼很可痛惜的過分估計事變，而從這個空話中又產生了另一種空談：『我們可以宣佈戰爭已經停止了。既不戰爭，也不媾和。』可是，如果德國人進攻，又怎樣呢？』那決不會，德國人是不能進攻

的。』你們有權拿去孤注一擲的，並不是世界革命底命運，而是一個具體的問題：如果德國人進攻的時期一旦到來，那你們豈不是成了德帝國主義底幫手嗎？可是，我們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起都成了護國派，都承認保護祖國，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事實上同帝國主義者決裂了：我們廢除了密約，戰勝了本國資產階級，並提議了公開的誠實的和平，所以各國人民都能在事實上知道我們的一切意圖。試問認真主張保護蘇維埃共和國的人，怎樣能夠採取這個已經產生了惡果的冒險政策呢？而這惡果却是事實，因為我們的黨由於黨內有左傾反對派形成而遇到的這個嚴重危機，乃是俄國革命所遭遇的最大危機之一。

這個危機定會消除的。我們的黨以及我國革命，無論如何都不會因這個危機而陷於滅亡，——雖然這個情形在現時是已非常接近，已非常可能的。担保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不會陷於滅亡的，有下面的一個事實：事變已給人們提供了學習的新方法，來代替那解決黨內派別間意見分歧的舊方法，這種舊方法是無數的著作和討論，以及數量足夠的分裂。而這個新方法，却是用全世界歷史事實，事變和教訓來審查一切。你們說：德國人不能進攻。根據你們的策略就得出了可以宣佈戰爭已經停止的結論。而歷史却懲戒過你們，歷史推翻了這個幻想。不錯，德國革命正在發展，可是它發展得並非如我們所願望的那樣，並非如俄國智識份子們所快意的那樣迅速，並不是像俄國歷史在十月時所造成的那種速度，——在十月時，我們無論走到哪個城市裏去宣佈蘇維埃政權，幾天之內，十分之九的工人便都站到我們方面來了。德國革命不幸還沒有這種速度。可是誰應該顧及誰：是我們應顧及德國革命，還是德國革命應顧及我們呢？你們曾希望德國革命顧及

你們，可是歷史却懲戒過你們。這是教訓，因為真理是絕對的，沒有德國革命，我們便會滅亡，——我們底滅亡，也許不在彼得城、不在莫斯科、而在海參崴，而在我們將來也許會要遷往的更遠的地方，我們遷往的地方，也許比彼得格拉到莫斯科的距離還要遠些，可是，無論如何，在一切可能想像到的事變之下，如果德國革命不發生，我們定會滅亡的。但是這種說法，絲毫不能搖動我們的信念：我們應善於毫不裝威作勢地渡過最困難的關頭。

革命之到來，並不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迅速。歷史已證明了這一點，應該善於把這一點看作事實，要善於估計到：各先進國家中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決不能像俄國革命那樣容易開始，俄國當時是尼古拉和拉斯普庭⁵²統治的國家，在這裏，最大部分的人民完全不關心住在各邊疆的是哪些民族，那裏發生着什麼事變。在這樣的國家內，革命是容易開始的，——這不過是一舉手之勞而已。

而在資本主義已很發展，每個居民都擁有民主素養和組織性的國家裏，若沒有準備就去開始革命，便是不正確的，便是荒謬的。這裏我們還祇接近到各國社會主義革命開始底痛苦時期。這是事實。我們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也許社會主義革命在幾星期後，甚或幾天之後，就會勝利，——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我們終不能拿這來作孤注一擲。我們應該準備應付非常大的困難，應付那些非常嚴重而不可避免的失敗，其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歐洲革命那怕明天就可以開始，可是畢竟還沒有開始；而在歐洲革命已經開始的時候，那末我們的疑慮，當然也就不會苦惱我們，那時的問題，將不是什麼革命戰爭，而會是全盤的凱歌行進。這樣的情形定會到來，且必然會到來，但是現在還

沒有到來。這是歷史教訓了我們，並用來沉痛地打擊了我們的一個簡單事實，——而前車之覆，便是後車之鑒。所以我認為，當歷史因為我們希望德國人不能進攻，於是以高呼「烏啦」了事，而沉痛地打擊了我們之後，這個教訓，會因我們有蘇維埃組織而非常迅速地深入到全蘇俄羣衆底意識中去。羣衆已活動起來，已在集合着：已在準備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案，考慮已發生的事變。我們現在所進行的，並不是像革命前始終不出乎黨內狹隘範圍以外的舊式爭論，現在一切決議案都要提交羣衆去討論，羣衆是要用經驗和事實來檢查這些決議的，他們從來也不為輕浮演說所迷誤，從來也不肯被人誘惑而離開爭變客觀進程所指定的道路。某個智識份子或左派波爾什維克，當然能夠託詞推開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當然能夠託詞推開我們沒有軍隊的事實，推開德國革命尚未發生的事實。羣衆底人數是千百萬的，——而政策正是開始於千百萬羣衆所在的地方；不是幾千人所在的地方，而是千百萬人所在的地方，才能開始嚴重的政策，——千百萬羣衆見過從前綫上回來的兵士，他們知道軍隊成了什麼樣子。羣衆知道——如果不拿單個人，而拿真正的羣衆來說——我們不能作戰，知道前綫上每一個人都備嘗過凡是可以想像到的痛苦。羣衆懂得了這個真理：你既沒有軍隊而又與強盜為隣，這時你就不能不簽訂極苛刻極恥辱的和約。在革命未產生以前，在你們還沒有整頓好自己的軍隊以前，在軍隊還沒有遣散回家以前，這是必不可少的事。際此以前，病體是不會恢復康健的。我們靠高喊「烏啦」，是不能打敗德國強盜的，我們不能像打倒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一樣來打倒德國強盜。這就是羣衆所明瞭領會了的教訓，他們並不聽那些想撇開痛苦實況的人所企圖用以款待他們的各種

遁詞。

俄國革命起初在十月、十一月的時候是全盤的凱歌行進，此後，它忽然在幾星期內爲德國強盜所擊破，而決意接受掠奪性的和議條件。不錯，歷史底這種轉折是非常難受的，對於我們，所有這樣的轉折都是難受已極。一九〇七年，當我們同斯托雷平訂立空前恥辱的內部條約時，當我們不得已要經過斯托雷平杜馬這種豬欄走去時，當我們担承某些義務署名於君主制度的文件上⁵⁸時，我們也經受過了同樣的痛苦，不過這痛苦的規模比現在的要小些罷了。當時有些屬於革命優秀先鋒隊的人們說（他們也是絕對確信自己正確有理的）：『我們是高傲的革命家，我們相信俄國革命，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去參加斯托雷平的合法機關。』你們會參加的。羣衆的生活，歷史，比你們的信念更強有力些。你們不參加嗎，那末歷史就會強迫你們去參加的。這班人是非常左的，可是當歷史初一轉折的時候，他們這個政派就如一陣煙似的消散了。如果過去我們能夠依然不失爲革命家，在苦痛的條件之下工作，並重新走出這種苦境，那末現在也會能走出這種境況的，因爲這並不是我們異想天開，這是客觀的必然性，而在我們這個破壞不堪的國家內，其所以造成了這種必然性的原因，是由於歐洲革命竟敢違反我們的願望而遲滯未到，而德帝國主義竟敢違反我們的願望而實行進攻。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善於退守。空洞詞句終不能掩住極端苦惱悲痛的事實，應該說：讓我們一半有秩序地退却吧。我們要做到完全有秩序地退却是不可可能的，——就讓我們一半有秩序地退却也罷，以便贏得一個短短的時間，來使我們軀體中的病痛部分可以稍得消散一些。軀體整個說來是健康的：它能克服病痛。可

是不可要求它在一瞬間立刻就把病痛完全克服掉，要想一下子制止潰逃的軍隊是辦不到的。我曾向一個願意做左派的青年朋友說過：同志！請你到前綫上去看一看，看看那裏軍隊中的情形怎樣。可是他却把這當做是個惡意的提議，以為『他們想派我們去充軍，免得我們在這裏宣傳進行革命戰爭底偉大原則』。我之所以這樣提議，確實不是打算把派別敵人拿去充軍；這不過是向他們提議，去看一看軍隊已在大開小差的情形。我們早已知道這種情形，我們早已不能不看見那裏的解體現象已經弄出駭人聽聞的事實，弄得把我們的大砲換得幾個哥比就賣給德國人。我們知道了這種事實，同樣我們也就知道：軍隊是無法維繫的，說德國人不會進攻的這種遁詞，是個莫大的冒險政策。如果歐洲革命遲延發生，我們就會遇到極嚴重的慘敗，因為我們沒有軍隊，因為我們沒有組織，因為這兩個任務都不能立刻解決。如果你不會適應環境，不願意在污泥中爬行，那你就不是革命家，而祇是空談家；我之所以提議爬行，並不是因為我喜歡這樣做，而是因為除此之外則無路可走，而是因為歷史並沒有安排得這樣愜意，致使各處革命都能同時成熟起來。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國內戰爭之開始是實行與帝國主義衝突的一個企圖，這個企圖證明帝國主義已完全腐朽，證明每個軍隊以內都有無產階級份子發動起來。是的，我們會看見世界革命的，可是暫時這還不過是一種非常好聽的童話，非常美妙的童話，——我完全懂得，兒童底本性是愛聽美妙童話的。可是我要問一問：真正的革命家庭本性，是不是在於相信童話呢？任何童話中都有它的現實成份：如果你給兒童們講童話時，其中雄雞和貓兒不是說的人話，那兒童們便不會對它發生興趣。現在也是一

樣，如果你們對民衆說，德國國內戰爭定將到來，你們就担保說，不會有與帝國主義的衝突，祇會有戰地上的國際革命，那末，民衆會說你們欺騙他們。你們祇是在自己的見解中，在自己的願望中，藉此去跳過歷史造成的那些困難。如果德國無產階級能發動起來，這是很好的。可是你們是否測量過，你們是否已經找得一種儀器來測定，德國革命會在哪一天發生呢？不，這點你們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你們把一切都拿去作孤注一擲。如果革命發生了，則一切都會得救。這是當然的！但如果革命並不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發動起來，如果革命明天還不會勝利，——那時又怎樣呢？那時羣衆會向你們說：你們的行動和冒險主義者一樣，——你們把孤注下在事變底這個幸運進程上，而這個進程竟沒有到來，結果你們就成了完全不能適應於沒有世界革命的那種狀況的人，世界革命必然會到來的，可是目前它還沒有完全成熟。

我們已進到被全副武裝的帝國主義給了我國以最嚴重失敗的一個時期，我國已經遣散了自己軍隊，並且是不得已才遣散的。我從前的預言已完全證實了：我們所得到的，已不是布列斯特和約，而是更加恥辱的和約，這是那些拒絕了前次和約的人應負其咎的。我們知道，我們是因為軍隊解體才同帝國主義媾和。當時我們是同郭福曼談判，而不是同李卜克內西談判；——我們也就以此幫助了德國革命。現在你們却幫助德帝國主義，因為你們把自己數百萬的財富，——大炮和炮彈——讓給了它，而這種情形是每一個看到了軍隊中那種不堪設想的狀況的人，都會應預先料到的。如果德國人稍一進攻，我們就會必然而不可倖免地一敗塗地，——前綫上每一個誠實的人都這樣說過。那時在幾天以

內，我們就會成爲敵人手上的鹵獲品。

既得到了這個教訓以後，我們定能消除我們的外裂，我們的危機，不管這個病症是如何沉重，因爲一個更可靠得多的同盟者——全世界革命——會來援助我們的。當人們說我們批准的這個條約是空前屈辱的提里齊特式條約，是比布列斯特條約更其恥辱的掠奪條約時，我就回答道：當然是的。我們應該這樣做，因爲我們是站在羣衆底觀點上觀察問題。企圖把十月到十一月間在一個國家內部運用過的策略，企圖把這一革命凱歌行進時期運用過的策略，就根據自己的幻想而搬到世界革命事變進程上去，——這種企圖是會必遭失敗的。當人們說獲得暫息乃是幻想的時候，當名爲共產主義者的報紙——這名稱想必是從「公社」這個字來的——連篇滿幅地企圖推翻暫息論的時候，我就說道：我既已經歷過許多派別組織的衝突和分裂，我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實際經驗，所以我應該說：我看得很清楚，這個病症是不會由舊方法——黨內派別的分裂方法——來醫治好的，因爲實際生活是會先把它醫治好的。實際生活進展得非常迅速。在這一點上，它的作用是妙不可言的。歷史將生活底火車頭推進得如此迅速，以致在共產主義者報編輯部還未來得及出版最近一期以前，彼得城的大多數工人，就會開始對該報底主張表示失望，因爲實際生活證明，暫息已是事實。你看，現在我們簽訂和約，我們就得着一個暫息時機，我們利用這個暫息機會來更好地保衛祖國，——因爲如果我們進行戰爭，我們就會遇到軍隊狼狽逃竄的情形，這種軍隊是必須加以遏止的，可是我們的同志，無論過去和現在都無法遏止它，因爲戰爭比較宣傳，比較成千成萬的議論，是更強有力的東西。既然他們沒有瞭解客觀的情況，他們無法遏止軍隊的逃

竄，他們當然不會把它遏止住的。這個病態的軍隊，傳染到全部軀體，於是我們就受到了新的空前失敗，受到了德帝國主義給予革命的新打擊，——這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我們輕浮地弄到使自己處在帝國主義打擊之下而沒有機關槍。可是我們現在却利用這個暫息機會來說服民衆，教他們聯合起來，進行擄殺，同時又告訴俄國工農說：『要造成自覺紀律，嚴格的紀律，否則你們將來也會遭受德帝國主義鐵蹄底蹂躪，如像現在所遭受的蹂躪一樣，在民衆還沒有學會鬥爭，還沒有造成能夠不逃跑而能忍受空前痛苦的軍隊以前，你們必然會遭受這種蹂躪的。』其所以必然如此，是因為德國革命還沒有發生，並且不能保證說，它明天就會發生。

因此，共產主義者報上用連篇累牘的論文想來根本推翻的暫息論，乃是由實際生活本身提出的。大家都看見，暫息已是事實，大家都在利用暫息的機會。我們會預料我們會在幾天之內失去彼得格拉，因為在當時向我們進攻的德國軍隊離彼得格拉不過幾天行程的距離，而優秀的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廠工人，不管其熱忱如何巨大，終究是孤立無援，當時發生了空前的混亂和狼狽狀態，使軍隊一直潰退到了加琴納，而當時我們竟有過佔回並未失去的土地的事實，而且這一事實的經過是這樣的：一個電報生跑到火車站，坐在發電機旁邊發出電報說：『這裏一個德軍也沒有。火車站已由我們佔領。』經過幾點鐘以後，交通部給我打電話說：『下一火車站已由我們佔領，我們快達到雅姆堡格地方。一個德軍都沒有。電報生照常工作。』這就是我們當時所經歷過的情形。這就是十一天戰爭底實際歷史。這乃是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廠工人們告訴我們的實況，應請這些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廠工人

來參加蘇維埃代表大會，讓他們講出真情。這是極辛酸、極恥辱和極苦痛的真情。但它的益處要大過百倍，俄國民衆是會懂得這種真情的。

我讓人們去迷戀戰地上的國際革命，是因為它定會到來的。時候一到，一切都會到來的，可是現時却應從事整飭自我紀律，無論如何都應該服從節制，以造成優良的秩序，使工人們學習戰鬥，——那怕一天只學習一小時也好。這件事情要比描繪美妙的童話困難一些。這是現時已在進行的，你們就以此幫助着德國革命，幫助着國際革命。暫息究竟能夠延長多少時日，——我們不得而知，可是我們已經得到了暫息。應該趕快遣散軍隊，因為這是一個有病的器官，而現時我們就來幫助芬蘭革命。

當然，我們是違背着條約，我們違背條約已經三四十次了。祇有小孩子才會不懂得：我們是處在長期痛苦的解放鬥爭時期，——這個解放鬥爭剛才創立了蘇維埃政權，還只把它提昇到其本身發展底初步階段，——在這種時代，一定要進行長期慎重的鬥爭。恥辱的和約激起反抗運動，可是，共產主義者報中的同志，在議論戰爭問題的時候，却訴之於人們底情感，而忘掉人們當時是握緊拳頭而痛心忍辱。這些同志怎樣講呢？他們說：『有覺悟的革命家，無論如何都不會忍受這種恥辱，都不會接受這種恥辱的。』他們的報紙名叫「共產主義者」，實則應該命名為「貴族」，因為它正是以貴族底觀點來觀察問題，這個貴族擺出美妙姿勢仗劍而死的時候，說道：『媾和是恥辱，戰爭是光榮。』他用貴族底觀點來談論問題，我却以農民底觀點來談論問題。

如果當軍隊潰竄，而且是不能不潰竄，否則就會損失成千成萬生命的時候，那末，我接收此項和約，是免得把事體弄得更

糟。難道締結和約是恥辱嗎？每一個認真處事的農民和工人，都會爲我辯護，因爲他們懂得：媾和是積聚力量的手段。歷史上有過——這點我已經講過多次，——德國人在締結提里齊特和約以後，擺脫了拿破崙底桎梏而獲得解放的事實；我故意把我們的和約稱爲提里齊特和約，雖然我們並沒有簽訂提里齊特和約上所有的那種條件，即必須派遣我國軍隊去幫助勝利者征服其他民族的義務；可是，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事實，如果我們專於指望戰地上的國際革命，那我們也會陷於這種境地。你們留心吧，不要讓歷史把你們也推落到這樣的軍事奴隸地位啊。當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在各國獲得勝利時，蘇維埃共和國有淪於奴隸境地的可能。拿破崙在提里齊特強迫德國人接收了空前恥辱的媾和條件。那裏的情形，弄到簽訂過幾次和約。當時的郭福曼——拿破崙——曾藉口德國人違背和約來捉住他們，現在的郭福曼也會這樣來捉拿我們的。不過我們定要努力設法使他不致於迅速捉住我們。

最近一次戰爭給了俄國人民一個辛酸、苦痛而又嚴重的教訓：教他們組織起來，紀律化，服從節制而造成一種模範的紀律。我們要向德國人學習紀律，否則我們就會是不可救藥的人民，而將永遠處於奴隸地位。

歷史就是這樣而且只是這樣演進的。歷史提示我們：和平是爲了準備戰爭的一種暫息方式，戰爭是獲得某種較好或較壞和平的手段。在布列斯特談判時的力量對比，使我們要締結戰敗國底和約，但還不是屈辱的和約。在普斯可夫時的力量對比，已使我們要締結恥辱的和約，要締結較屈辱的和約，而在往後的階段上，要是在彼得城和莫斯科的話，那我們就會不得不簽訂更屈辱數倍的和約。我們不會說蘇維埃政權祇是形式，——如莫斯科的

青年朋友們向我們說過的一樣；——我們不會說，爲挽救某種革命原則起見，可以犧牲內容；我們要說：讓俄國人民懂得，應當紀律化，組織起來，那時他們才能夠渡過一切提里齊特和約的苦痛。解放戰爭底全部歷史告訴我們：當這種戰爭有廣大羣衆參加時，解放本身總是來得迅速的。我們說：如果歷史是這樣演進着，那我們就會要拋開和平，再來作戰，而且這也許是在近幾天以內的事，每個人都應該準備起來。在我看來，德國人毫無疑義是正在納爾瓦城那邊準備一切——如果各報所載屬實，納爾瓦城還未被佔領的話；他們不是在維爾瓦城裏，而是在納爾瓦城附近，不是在普斯可夫城裏，而是在普斯可夫城附近，集中自己的正規軍，整理自己的鐵路，以便隨後一躍就奪下彼得格拉。這個野獸是很會跳躍的。它已經表明了這一點。它將再跳一次。這是毫無疑問的。所以我們應該準備起來，要善於不裝威作勢，而取得暫息時間，那怕祇是暫息一天也好，因爲甚至這一天我們都可以利用來從彼得城撤退，如果彼得城竟被佔領，則我們的幾十萬無產者就會受到空前的苦痛。我再一次申明，我決意簽訂和約，我認定爲了取得幾天工夫來撤退彼得城，就是簽訂更加恥辱幾十倍以至於一百倍的條約都是應該的，因爲這樣我就能夠減輕工人們底苦痛，否則這些工人就會淪於德國人底鐵蹄之下；我可以使我們所需要的那些材料和火藥等容易於從彼得城運出，因爲我是護國派，因爲我主張準備軍隊，那怕就是在極遼遠的後方去準備軍隊，而那裏此刻却正在整頓現已遣散的病態軍隊。

我們不知道，這個暫息將是多久的暫息，——我們要試圖來抓住時機。這個暫息時間也許比較長，也許祇有幾天。一切變化都是可能的，這是誰也不知道的事，其所以不得而知，是因爲一

切最強大的國家都被束縛着，被纏繞着，被強迫着在幾處戰場上作戰。郭福曼底行動決定於幾方面：一方面是要撲滅蘇維埃共和國，另一方面是他正在幾個戰場上作戰，第三方面，是德國革命在成熟着和發展着，郭福曼也知道這點，所以他不能立即奪取彼得城、奪取莫斯科，正像人們所斷言的那樣。可是他明天就會這樣幹，——這是完全可能的。我要重說一遍：當軍隊解體已是眼前事實的時候，當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利用每一時機，那怕祇取得一天暫息機會的時候，在這個關頭，我們認為：每一個與羣衆有聯繫，知道戰爭是什麼和羣衆是什麼的莊重的革命家，都應該使羣衆紀律化，都應該整頓羣衆，努力鼓起羣衆來進行新的戰爭，——每一個這樣的革命家都會替我們辯護，認為訂立任何恥辱條約都是正確的，因為這乃是爲了無產階級革命底利益，是爲了革新俄國並解除俄國底病痛部份。每個思想健全的人都會懂得，我們簽訂這個和約，並不停止我們的工人革命；誰都懂得，我們同德國人簽訂和約，我們並不停止對革命的軍事援助：我們給芬蘭人送去的是軍械，而不是失去戰鬥力的部隊。

也許我們會出而應戰；也許明天我們會退出莫斯科，然後轉取攻勢：如果我們在民衆心理中造成一個轉變，——這個轉變已在成熟，也許爲了這點，需要很多時間，可是它定會到來的，——那時廣大羣衆所講的就會不是他們現時所講的這種話了，——那時我們便將調遣我們的軍隊向敵軍進攻。我之所以不能不接受甚至最苛刻的和約，是因爲現時我不能自信這種時機已經到來。當氣象更新的時刻到來時，大家都會感覺到這一點，都會知道，俄國人不是傻子；他們看到，他們懂得：應該慎重從事，這個口號應該實行，而我們黨的代表大會和蘇維埃代表大會底主要

任務，也就在這裏。

應該善於在新的道路上工作，這是困難得無可計量的事情，但這決不是沒有希望的事情。這件事情決不會破壞蘇維埃政權，如果我們自己不用最蠢笨的冒險政策來破壞它的話。時機一到，民衆就會說：我再不能讓人苦惱我了。而這樣的時機定會到來的，只要我們不採取這種冒險政策，而善於在困苦的條件下，在我們日前簽訂了的那個空前恥辱條件下進行工作，因為這樣的歷史危機，決不是一次戰爭，一個和約所能解決的。德國人民經過幾次恥辱和約——其中每一次恥辱條約都不過是重新受辱和重新斃約的暫息——以後，而於一八〇七年簽訂提里齊特和約時，是由於受了本國帝制組織的束縛；而我國羣衆底蘇維埃組織，却能使我們的任務易於完成。

我們的口號應該只有一個：切實學習軍事，整頓鐵路上的秩序。沒有鐵路而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戰爭，便是最有害的叛賣行為。應該建立秩序，應該造成那種能創造革命最好果實的全部毅力和實力。

要極力抓住你們所已獲得的暫息時機，那怕是一小時的暫息時機也好，以便同遼遠的後方建立聯繫，在那裏去建立新軍隊。要拋掉幻想，你們因懷有這種幻想，已受到了實際生活的懲治，你們若不把這幻想拋掉，還會受到更嚴重懲治的。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一個極慘痛失敗的時代，這個時代已擺在眼前，要善於顧到這個時代，應該有決心去在祕密條件下，在顯然被德國人奴役的條件下，作堅忍的工作：這是用不着掩飾的；這真是提里齊特和約。如果我們能夠這樣行動，那末，雖然遭了失敗，我們還能絕對有把握地說：我們是定會勝利的。

刊載於一九二三年出版的俄國共產黨
(波)第七次代表大會(一九一八年
三月六日至八日)速記錄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
第三一三至三三〇頁

現時主要任務

俄羅斯媽媽呵！

你又豐富，你又單薄，

你又強大，你又軟弱。

人類歷史現時正經歷着一個最大而最困難的轉變，這個轉變，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是有解放全世界的莫大意義。這個轉變是由戰爭進到和平；是由兩夥強盜間爲規定瓜分頭號強盜所已掠奪之贓物的新規則，而把千百萬被剝削勞動者趕到殺場上去的戰爭，轉到被壓迫者爲擺脫資本桎梏而反抗壓迫者的戰爭；是由痛苦、災難、飢荒、野蠻化的黑暗地獄走向共產主義社會，走向共同福利與堅固和平的光明將來；——無怪乎在這急劇轉變的陡峭關頭，舊制度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來，同時新社會又在難以筆墨形容的痛苦中產生着的時候，有的人頭暈目眩，有的人陷於絕望，有的人則想用美妙動聽詞句來尋找救路，逃出那往往是令人過份苦惱的現實。

俄國曾特別明顯地經歷過，特別緊張而痛苦地經歷過由帝國主義轉向共產主義革命這歷史進程上的一些最急劇的轉變。我們在幾天內就破壞了一個最老大、最雄強、最野蠻和最殘暴的君主

制度。我們在幾個月中就經過了同資產階級妥協和消滅小資產階級幻想的許多階段，而別的國家走過這些階段却花費了幾十年的工夫。我們在幾個星期內就推翻了資產階級，並在國內戰爭中戰勝了資產階級的公開反抗。我們以波爾什維主義的凱歌行進在這個龐大國家中各處各地獲得了勝利。我們喚起了那些受沙皇與資產階級壓迫的最下層勞動羣衆，把他們引向了自由與獨立的生活。我們創立並鞏固了蘇維埃共和國，這是比最完善的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更高越得多，更民主得多的新式國家。我們建立了爲貧苦農民所擁護的無產階級專政，並已開始實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計劃。我們在全世界千百萬工人中喚起了他們的自信力，燃起了他們的熱情火焰。我們到處發出了國際工人革命的號召。我們向世界各帝國主義強盜們宣戰了。

而在幾天內，那個乘我們手無寸鐵的機會來實行襲擊的帝國主義強盜，竟把我們打得跌倒下去了。它強迫我們簽訂了極苛刻極恥辱的和約，這是因爲我們擅敢從帝國主義戰爭的鐵鉗中掙脫出來——那怕只在一個極短時間內掙脫出來——所付出的代價。這個強盜憤怒若狂，就極力打擊俄國、窒息俄國、把俄國撕成碎塊，而當他本國工人革命的怪影愈加可怕地顯現出來的時候，則他的憤怒也就愈加厲害。

我們不得已才簽訂了「提里齊特」和約。不要自欺，而要有勇氣來正視着赤裸裸的沉痛真象。要全盤地，澈底地認清我們現在所陷入的慘重失敗、分割、奴役、恥辱底深淵。我們對於這種情形愈是明瞭，則我們爭取解放的意志，我們從奴役境地重新達到獨立地位的意向，以及我們無論如何都要使俄羅斯從貧弱國變成真正富強國的堅決意志就會愈加堅毅，愈加鍛鍊得像鋼鐵一般。

俄羅斯能夠成爲這樣的國家，因爲我們還剩下有廣大的國土和天然財富，足可供給所有一切人底生活資料，若不是很豐富的話，至少是有足夠的數量。我們在天然財富方面，在人力後備方面，在大革命發揚起來的巨大規模的民衆創造力方面——都有足夠的材料來建立真正富強的俄羅斯。

俄羅斯定將成爲這樣的國家，如果它拋掉一切頹喪情緒和空談而咬緊牙關，聚集自己一切力量的話，如果它緊張起每根神經，每條筋絡的話，如果它明白只有走我們已經走上的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道路才能得救的話。按照這條道路邁進，絕不因失敗而氣餒，要一磚一石地去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底強固基礎，爲樹立紀律與自我紀律，爲在到處鞏固組織性，鞏固秩序和務實精神，鞏固全民力量底整齊合作，鞏固對產品之生產和分配的全盤統計與監督制，而毫不鬆懈地工作，——這就是達到造成軍事實力與社會主義實力的道路。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受了嚴重失敗之後，既不應裝成作勢，也不應悲觀失望。若以爲我們只有二中取一：或者是締結極苛刻的和約而「不光榮地」（從貴族觀點看來）死掉，或者是進行絕望戰鬥而「英勇地」死掉，此外別無出路，這種說法是不對的。認爲我們簽訂「提里齊特」和約，似乎就是叛變了自己的理想或叛變了自己的朋友，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我們沒有叛變過任何人和任何東西，我們沒有辯護和掩飾過任何一句欺假話，我們對於任何患難朋友和同志都沒有拒絕過幫助，都是竭其所能，儘其所有去幫助了的。若是一個統帥把被打敗了的或染上了狼狽奔逃病的殘餘部隊，撤退到國境內地，他在萬不得已時才接受極苛刻恥辱的和約，藉以掩護這種退却行動，那末他對於他所無力援助

以及被敵人截斷了的那部分軍隊是絲毫也沒有背叛行爲的。這個統帥選擇了救出那尙可挽救的東西的唯一道路，不同意去作冒險舉動，不在人民面前掩飾痛苦的真理：『讓出空間以便贏得時間，』而利用一切暫息機會，那怕是最短期的暫息機會，以便聚集力量，以便使軍隊喘息喘息，或醫治醫治它所患的瓦解病和頹喪病，——這樣的統帥是盡了自己的天職的。

我們簽訂了「提里齊特」和約。當拿破崙第一在一八〇七年強迫普魯士簽訂提里齊特和約時，侵略者把德國人底全部軍隊都打潰了，佔據了國都及一切大城市，設置了自己的警察，強迫失敗者派出輔助軍團去幫助侵略者進行新的掠奪戰爭，把德國分裂成許多小國，實行與這些德國人的國家聯盟而反對另一些德國人的國家。可是德國人民甚至在簽訂了這樣的和約之後仍能自立，仍能聚集力量，仍能奮起爭得本身自由與獨立的權利。

凡是願意思索或能夠思索的人，都可從提里齊特和約（這不過是該時代中強迫德國人簽訂的許多苛刻恥辱和約之一而已）的例子中明顯看出，那種以爲無論在什麼條件下，簽訂極苛刻的和約都是陷入滅亡的深淵，而進行戰爭則是英勇行爲與得救之路的想法是如何幼稚可笑。各個戰爭時代都教訓我們，和約在歷史上起過不少藉以獲得暫息和聚集力量來準備新搏戰的作用，提里齊特和約對於德國曾是極大的恥辱，而同時又是走向民族大興的轉變。當時歷史環境除走向資產階級國家的出路之外，沒有達到民族復興的別種出路。當時，在一百多年以前，創造歷史的是極少幾個貴族和小羣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而工農羣衆則尙在沈寐不醒的狀態中。因此，當時歷史的進展也是緩慢得可怕的。

現在資本主義大大提高了一般文化，其中也有羣衆底文化。

戰爭催醒了羣衆，以空前未聞的慘禍和痛苦把他們驚醒起來了。戰爭推進了歷史，於是歷史在現時就以火車頭般的速度飛快前進。現在歷史是由千百萬人獨立創造的。資本主義現在已發展到社會主義底門前了。

因此，俄國現在如果要從「提里齊特」和約走向——無可爭論地是在走向——民族興盛，走向偉大衛國戰爭的話，那末達到這一興盛的道路，就不是走向資產階級國家的道路，而是走向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我們從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起已是護國派了。我們贊成「保衛祖國」，不過我們準備進行的衛國戰爭是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戰爭，保衛社會主義制度，也就是保衛祖國，保衛蘇維埃共和國，也就是保衛世界社會主義軍隊底一支隊伍。

『仇恨德國人，打死德國人』——始終是通常愛國主義的口號，即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口號。我們却說：『仇恨帝國主義強盜，仇恨資本主義，消滅資本主義，』可是同時又說：『要向德國人學習！照舊忠實於與德國工人的兄弟聯盟。他們對我們的援助來遲了。我們要贏得時間，我們會等得到他們的，他們一定會來援助我們。』

是的，要向德國人學習！歷史正沿着曲綫，繞着圈子前進。事實正是這樣：德國人除了體現殘暴的帝國主義而外，同時還體現了紀律、組織和在最新機器工業基礎上的整齊合作以及極嚴格的統計與監督的原則。

而這正是我們所缺乏的。這正是我們所要學會的。這正是我們偉大革命爲要由勝利的開始，經過許多嚴重考驗而走向勝利的終結所缺少的東西。這正是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爲要停

止其爲貧弱國家，而永遠成爲富強國家所需要的東西，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二日刊載於全俄中

央執委新聞報第四十六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

第三七五至三七八頁

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底國際狀況與

社會主義革命底基本任務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由於達到了和平，——雖然是極其苛刻和極不堅固的和平，——就能夠在相當期間內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社會主義革命之最重要和最困難的方面，——即集中到組織任務上來。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六日在莫斯科舉行的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⁵⁵第四段（或第四部）中，——即在論勞動者底自我紀律，以及無情地反對混亂現象和搗亂組織現象的這一段（或這一部）中，已經將這個任務向一切被壓迫勞動羣衆明顯而確定地提出來了。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所已得到的和平之所以不穩固，自然不是由於這共和國現在圖謀恢復軍事行動；——除對產階級反革命派及其應聲虫（孟什維克等等）以外，沒有一個頭腦健全的政治家會想到這種事情。和平之所以不穩固，是由於在東西兩方與俄國接壤的，擁有強大軍力的帝國主義國家內的主戰黨，隨時能佔得上風，這些主戰黨因看見俄國暫時衰弱而垂涎，並且是受着仇

視社會主義和嗜嗜搶劫的資本家們的慫恿的。

在這種情勢下，對於我們說來，和平之真實的而不是紙上的保證，只是由於帝國主義列強間有已達到最高限度的爭執，其表現，一方面是西方國家間帝國主義戰爭之重新繼續進行，另一方面是日美互爭太平洋及其沿岸統治權之極端尖銳的帝國主義競爭。

很明顯的，防禦力如此薄弱的我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是處於非常不穩固而絕對危急的國際狀況中。必須把我們的一切力量極度緊張起來，以利用全部客觀情勢所給予我們的這個暫息期間，來醫治戰爭所禍及俄國整個社會機體的極重創傷，來達到國家底經濟高漲，沒有這個條件，則國防力之多少嚴重的增高，都簡直無從說起。

同樣很明顯的：我們對於西歐那因為種種原因而遲遲尚未爆發的社會主義革命所將給予的嚴重協助，這就全看我們解決我們面前組織任務的程度如何而定。

使我們當前首要的組織任務得以順利解決的基本條件，就是要民衆底政治領導者，即俄國共產黨（波爾什維克）黨員們，其次是勞動羣衆中一切有覺悟的份子，能夠完全理解以前資產階級革命和現在社會主義革命間在這一方面的根本區別。

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勞動羣衆底主要任務，是在於實行消滅封建制度、帝制政體和中世紀關係這種消極的或破壞的工作。組織新社會之積極的或建設的工作，則是由佔人口少數的有產者或資產者來執行的。他們之所以能夠不顧工人和貧苦農民底反抗而比較容易地執行此種任務，這不僅因為當時受資本剝削的羣衆所作的反抗，由於自身的散漫性和不開通而表現得極其微弱；而且也因為那建築在無政府狀態上的資本主義社會，有在深度和廣度

方面都是自發發展着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爲其基本的組織力量。

反之，無產階級和它所領導的貧苦農民，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因而也在已由我們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開始進行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主要任務，却是積極的工作或建設的工作，就是要把包括千百萬人生存必需品之有計劃生產和分配的這一極繁雜而極精密的新組織系統辦理就緒。這種革命，只有當人民大多數，首先是勞動羣衆大多數表現出有歷史意義的獨立創造精神之下，才能順利實現。只有在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能夠表現充分的自覺性、理智性、犧牲精神和堅定精神的情形之下，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然後才有保障。我們建立了使被壓迫勞動羣衆能夠積極參加獨立建設新社會事業的新形式，即蘇維埃形式的國家，但這還只解決了困難任務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難是在經濟方面：對產品底生產與分配上實行普及全國的最嚴格的統計與監督，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生產在事實上社會化。



現時已在俄國執掌政權的波爾什維克黨底發展過程，特別明顯地表明構成目前政局特點的現時歷史轉變究竟何在；這個歷史轉變，使蘇維埃政權必須抱定新的方針，即是要以新的方法來提出新的任務。

任何負有遠大使命政黨底第一個任務，原是說服大多數民衆，使他們相信這個黨底綱領和策略是正確的。在沙皇制度時代以及在切爾諾夫輩和策烈鐵里輩與克倫斯基和基什慶妥協的時期中，這個任務都佔着首要地位。現時這個任務，它雖顯然還遠未完成，而且無論何時都不會完成到底的，但大體上是已經解決

了，因為在莫斯科舉行的最近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已經無可置辯地證明：俄國大多數工農顯然是站在波爾什維克黨方面的。

我們黨底第二個任務，原是奪取政權並鎮壓剝削者底反抗。而這個任務也還沒有澈底完成，並且不能加以漠視，因為帝制派和立憲民主黨人以及他們的走卒孟什維克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仍然繼續在企圖聯合起來，以求推翻蘇維埃政權。可是，鎮壓剝削者反抗的這個任務，已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到（大約說來）一九一八年二月間或越到博加也夫斯基⁵⁶投降的時期內，大體解決了。

現時提到了日程上而構成目前時局特點的，有第三個迫切任務，就是組織對俄國的管理。當然，這個任務；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底第二天，就已提出並努力解決過，可是在剝削者底反抗還採取公開的國內戰爭形式的時候，這個任務，曾不能成爲主要中心任務。

現在它已成爲這樣的任務了。我們波爾什維克黨已經說服了俄國。我們奪得了俄國——從富人手中奪給窮人，從剝削者手中奪給勞動者。現在我們應當管理俄國。目前時局底全部重心，全部困難，就在於要明瞭由說服民衆和用武力鎮壓剝削者的主要任務轉到管理的主要任務這一過渡底特點。

社會主義黨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得以大體完成了奪取政權和鎮壓剝削者的這一事業，得以緊緊接近到管理的任務。務須使我們成爲確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底這個最困難（而且是最高尙的）任務的人。應該澈底想清：要有成效地實行管理，除了善於說服民衆以外，除了善於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以外，還須善於實際地進行組織工作。這是一個最困難的任務，因為這裏是要用新方

法去組織千百萬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經濟基礎。而且這是最高尚的任務，因為只有在解決這個任務以後（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解決以後），才可以說，俄國不僅成了蘇維埃共和國，而且成了社會主義共和國。

現時的總口號

由於極端苛刻而不穩固的和約，由於戰爭和資產階級統治（其代表為克倫斯基和擁護他的孟什維克以及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所遺留給我們的極痛苦的經濟破壞，失業和飢荒，——由於這一切所造成的上述客觀情勢，必然產生出廣大勞動羣衆底極端疲憊，甚至精疲力竭的現象。他們極力要求——也不能不要求——相當的休息。現時擺在日程上的任務，就是要：恢復被戰爭和資產階級統治所破壞的生產力；醫治由戰爭、失敗、投機業和資產階級企圖恢復已被推翻的剝削者政權等所造成的創傷；促進國內經濟復興；牢固地維持起碼的秩序。蘇維埃政權現時縱然有資產階級、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底反抗，也只有在實踐上正是解決維持社會秩序的這些初步和最初步的任務，才能使俄國穩固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一點，看來好像是很奇怪的，而其實因為上述種種客觀條件，成為毫無疑義的了。由於現時情勢中具體的特點，由於蘇維埃政權及其關於土地社會化與工人監督生產等法令存在的情形下，實際解決這些最初步的任務與克服走向社會主義之初步工作中組織上的困難，這在現時乃是一物底兩面。

精確而誠實地計算金錢，節省經濟，不懶惰，不盜公肥私，在勞動中遵守最嚴格的紀律——正是這些口號，從前資產階級用

以掩飾自己這剝削階級的統治地位時，曾爲革命的無產者所正當譏笑過的，而現時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却已變成目前迫切的主要的口號了。一方面，勞動羣衆切實執行這些口號，便是挽救被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強盜們（以克倫斯基爲首）弄得半死半活的國家的唯一條件；另一方面，由蘇維埃政權，用自己的方法，根據自己的法令來切實執行這些口號，又是社會主義澈底勝利所必要的和足夠的條件。那班毅然拒絕將這些似乎是極其「陳腐」和極其「庸俗」的口號當作首要任務的人，正是不善於瞭解這層道理。我們這個小農國家僅在一年以前才推翻沙皇制度，僅在上半年以前才肅清克倫斯基之流，當然遺留下了不少的自發的無政府主義，而那種必然與長期反動戰爭伴隨而來的殘忍行動和野蠻行爲更把這種無政府主義加強了，同時就造成了很多失望情緒和無端憤恨的情緒，如果再加上資產階級走狗們（孟什維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等等）底挑撥政策，那末，非常明顯地，優秀的和最有覺悟的工農要使羣衆底情緒完全轉變，並引導他們過渡到正確的、堅忍的、紀律化的勞動，就必須有如何長期堅強的努力。只有由貧民羣衆（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實現的這種過渡，才能完成對於資產階級，尤其是對於最頑強和人數衆多的農民資產階級的勝利。

與資產階級鬥爭的新階段

資產階級在我國已被擊敗，可是還沒有根除，沒有消滅，甚至於還沒有澈底摧破。因此，在日程上便提出反資產階級鬥爭底新的最高形式，由繼續剝奪資本家的極簡單的任務，轉到一個更複雜和更困難得多的任務，就是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

也再不能產生的條件。很明顯的，這個任務是要高得不可測量，如不解決這個任務，那就還沒有社會主義。

拿西歐革命底規模來比較看，我們現時大約處於一七九三年和一八七一年所達到了的水準。我們完全有權來以達到了的這種水準而自豪，可是有一方面，我們毫無疑義還走得更遠一些，這就是：我們在全俄境內宣告並成立了最高式樣的國家——蘇維埃政權。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因已得的成績而自滿，因為我們僅僅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而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達到什麼有決定意義的事情。

有決定意義的事情，就是對產品底生產和分配上建立最嚴格的全民統計和監督。然而，在我們已從資產階級那裏奪來的那些企業和經濟部門中，我們還沒有實行統計和監督，若不做到這一點，便絕對談不到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第二個同等重大的物質條件，即在全國範圍內提高勞動生產率。

此因，決不能以繼續向資本進攻這個簡單公式來決定現時的任務。資本雖顯然還沒有被我們澈底擊敗，無條件地必須向勞動者底這個敵人繼續進攻；可是這樣來決定任務終究是不精確的、不具體的，其中並沒有估計到現在時局底特點，即是爲了保障往後繼續進攻能取得勝利起見，便應當在目前「停止」進攻。

關於這點，可以拿我們在反資本戰爭中的狀況與一個常勝軍隊底狀況作一比較來加以說明，譬如這個常勝軍隊，已奪取了敵人一半或三分之二的領土，此時它却不能不停止進攻，以便聚集力量，增加武器彈藥儲藏，修理並鞏固交通綫，建築新的軍需庫，調集新的後備軍等等。在這種條件之下，停止進攻，正是常勝軍隊爲了奪取敵人其餘的領土，即是爲了取得完全勝利所必需

的。現時客觀情勢所要求於我們的，正是要這樣「停止」向資本進攻，誰不懂得這一點，那他就完全不了解現時的政局。

當然，只有加上括弧，即是只是用比喻的說法，才能講到「停止」向資本進攻。在通常的戰爭中，可以下停止進攻的總命令，可以真正停止前進。而在反資本的戰爭中，却不能停止前進；因此，要我們放棄繼續剝奪資本，這是決然談不到的。這裏所講的，是改變我們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底重心。迄今以前，是直接剝奪剝奪者的設施，佔着首要的地位。現時佔着首要地位的，則是在資本家已被剝奪的那些企業和其餘一切企業中組織統計和監督。

如果我們在現時，仍然想用以前的速度繼續剝奪資本，那我們定會遭受失敗，因為每一個肯費思索的人都明白知道，我們組織無產階級的統計和監督的工作，顯然落後於直接「剝奪剝奪者」的工作。我們現在只有用一切力量去辦好組織統計和監督的工作，我們才能解決這個任務，才能彌補所沒有做到的事情，才能在反資本的「戰役」中獲得勝利。

我們承認應該彌補沒有做到的事情，但這是否就等於承認以前犯了某種錯誤呢？絕對不是的。我們再拿戰爭作比喻吧。如果能夠單用輕騎隊擊潰並壓退敵人，那就應該這樣幹去。如果這個動作祇能在相當限度內獲得戰果，那末，在這個限度以外，自然要調來重砲隊。我們承認現在應彌補以前沒有作的調來重砲一事，這絕對不是承認輕騎隊底勝利攻擊是一個錯誤。

資產階級底奴僕們常常責罵我們採用了「赤衛隊」來攻擊資本。這種責罵是荒謬絕倫的，祇有財庫守門狗才說得出口。因為用「赤衛隊」攻擊資本，是當時各種情況所絕對要求的：第一，

當時資本會以克倫斯基和克拉斯諾夫、沙溫可夫和郭茨、杜托夫和博加也夫斯基等人爲代表，實行軍事反抗（而黑格啓科利現時仍在作這種反抗）。要打破軍事反抗，除了用軍事手段以外，別無他法，赤衛隊正是作了這一使勞動者和被剝削者擺脫剝削者壓迫而得到解放之最高尚最偉大的歷史事業。

第二，當時我們之所以不能將管理方法擺在首要地位來代替鎮壓方法，還因爲管理的藝術並不是人們生來就有，而是要從經驗中得來的。當時我們還沒有這樣的經驗。現在却已經有了。第三，當時，我們還未能使各種具有知識和技術的專家受着我們的支配，因爲他們或者參加在博加也夫斯基之流底隊伍中作戰，或者還能用怠工方法進行有系統的頑強的消極反抗。現在我們已經把怠工打破了。「赤衛隊」對資本的攻擊有了成效，獲得了勝利，因爲我們既戰勝了資本底軍事反抗，又戰勝了資本底怠工反抗。

這是不是說用「赤衛隊」攻擊資本，在任何時候都是適當的，在任何情勢之下都是適當的，此外我們再沒有別種同資本作鬥爭的方法呢？如果這樣設想，那就是幼稚病。我們雖用輕騎隊獲得了勝利，可是我們也有重砲隊。我們雖用鎮壓方法獲得了勝利，可是我們也能夠用管理方法來取得勝利。當情勢改變的時候，應該善於改變反對敵人的鬥爭方法。我們連一分鐘都不會拒絕用「赤衛隊」去鎮壓沙溫可夫輩和黑格啓科利輩先生們以及其他一切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派。可是我們並不會如此蠢笨，竟在須用「赤衛隊」攻擊時代大體已告結束（而且勝利地結束了）的時候，在由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利用資產階級專門家來精耕土壤，使這土壤上絕不能再生長出任何資產階級來的這種時代已經到臨

的時候，還將「赤衛隊」的攻擊手段擺在首要地位。

這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別時代，或者更確當些說，這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別階段，爲了澈底戰勝資本起見，就要善於使我們的鬥爭形式適合於這種階段底特別條件。

沒有在各種知識、技術方面富有經驗的專家底指導，便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因爲社會主義需要有廣大羣衆自覺地在資本主義已達到的成績基礎上前進到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社會主義應該照自己的特別形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體些說，照蘇維埃的方法，——來實現這種前進步驟。而專門家，因爲受了過去培養他們成爲專門家的那種社會生活底全部環境的影響，其大多數必然是資產階級的。如果我們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很快就在全國範圍內解決了統計、監督和組織的任務（當時由於戰爭和俄國落後底緣故，這是無法實現的），那末，我們打破了怠工以後，就能用全盤統計和監督的方法，而使資產階級的專門家完全服從我們了。由於一般統計和監督工作，都「遲延」未作，所以我們雖然已經戰勝了怠工，但還沒有造成那種使資產階級專門家受到我們支配的環境；大多數怠工者雖「到職服務」，但國家要利用優秀的組織者和最高明的專門家却祇有兩種方式：或是按照舊的方式，資產階級的方式（即是付給高度薪俸），或是按照新的方式，無產階級的方式（即造成自下的全民統計和監督的環境，有了這種環境，就能必然和自然制服這些專門家，並吸收他們來參加工作）。

現時我們却不得不採用舊的資產階級的方式，同意付給最高明的資產階級專門家以很高的「酬」金。一切熟悉情形的人們，都知道這點，可是並不是大家都仔細思考到了無產階級國家採用

這種辦法有什麼意義。顯然，這個辦法是一種妥協，是離開巴黎公社和任何無產階級政權底原則的，這些原則要求把薪俸降到中等工人工資的水準，要求在事實上而不是在口頭上同陞官發財思想作鬥爭。

不僅如此。這種辦法，顯然不只是停止在相當部門內，在相當程度內對資本進攻（須知資本並不是一批貨幣，而是一定的社會關係），而且還是我們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向後退了一步，因為這個政權一開始就宣佈過並實行過把高度薪俸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資水準的政策。

自然，資產階級底走僕，尤其是像孟什維克，新生活派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這樣下賤的走僕，會因我們承認後退一步而來幸災樂禍地譏笑我們。可是我們絕對用不着去理會這種譏笑。我們應該研究達到社會主義這極端困難的新道路底特點，不要掩蔽我們的錯誤和弱點，而努力及時地完成尙未做到的事情。我們用非常高的薪金來吸收資產階級專門家一事是離開公社原則，如果我們對羣衆隱瞞這點，那就無異是墮落到資產階級政治家的水準，並欺騙羣衆。公開宣佈我們怎樣和爲什麼後退了一步，然後公開討論，有什麼方法來彌補沒有做到的事情，——這就是訓練羣衆，並在實際經驗上同他們一塊來學習建設社會主義。在歷史上任何一次勝利的戰役中，勝利者未必沒有犯過個別的錯誤，未必沒有遭過局部的失敗，未必沒有因某種原因而在某地暫時退守過的。而我們所舉行的進攻資本主義的「戰役」，比較最困難的戰役還要困難一百萬倍，如果因爲部分的和局部的退守，就垂頭喪氣，那便是愚蠢而可恥的了。

現在從實踐方面來考察問題吧。假設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需

要一千個在各種知識、技術方面富有實際經驗的頭等學者和專門家來指導國民勞動，以謀國內經濟儘可能迅速地高漲起來。假設這些「頭等明星」——自然，其中大多數，愈是狂烈地叫喊工人們腐化，則他們受資產階級道德的腐化也就愈深——每人每年應付以二萬五千盧布。假設這個薪金總額（二千五百萬盧布）還加多一倍（假定因成績特別優良和特別迅速地完成了組織上和技術上最重要的任務，還要給以獎金），或者甚至再加多三倍（假定還要聘請幾百個要求更加苛刻的外國專門家）。試問每年花費五千萬或一萬萬盧布來根據最新技術和科學改組國民勞動，能不能說這項費用對於蘇維埃共和國是過多的或擔負不起的呢？當然不能這樣說。絕大多數覺悟的工農會贊成這種費用，因為他們從實際生活中知道：我們底落後使我們不能不受到千百萬盧布的損失，然而我們在組織、統計和監督方面，則還沒有達到能引起資產階級智識界「明星」全體自願來參加我們工作的那種程度。

當然，問題也有它的另一方面。高度薪金對於蘇維埃政權的腐化影響（尤其是當革命迅速成功時，不會沒有相當數量的野心家和騙子混入這個政權，他們連同各種委員當中那些無才或鮮恥之輩，是會願意去充當盜竊國庫的「明星」…的）以及對於工人羣衆的腐化影響，是無可爭辯的事。可是，工人和貧農中一切善於思考和居心誠實的人們，都會同意我們，都會承認：我們無力一舉擺脫資本主義底遺毒，要使蘇維埃共和國免除每年五千萬或一萬萬盧布「貢獻」的負擔（這是因為我們自己在組織全國統計和實行自下監督這事業上落後之故所付出的貢獻），除了自己組織起來，在自身隊伍內整頓紀律，清除自己行列中一切『保存資本主義遺傳』，『遵守資本主義傳統』的人們，即是清除一切懶

漢、寄生蟲、盜竊國庫者（現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廠、一切鐵路、都是蘇維埃共和國底「國庫」）以外，別無辦法。如果有覺悟的先進工人和貧農能在一年以內，在蘇維埃機關幫助之下，自動組織起來、紀律化起來、振奮起來、並建立強固的勞動紀律，那末，一年以後，我們便能擺脫這項「貢款」，而且隨着我們工農勞動紀律和組織性所達到的程度，甚至還能更早日…縮減這種「貢款」。我們工農自己能愈快地利用資產階級專門家來學會優良的勞動紀律和最高的勞動技術，則我們就能愈加迅速地免除繳給這些專門家的一切「貢款」。

我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組織對產品生產與分配的全民統計和監督的工作，大大地落後於我們直接剝奪者的工作。這種情形是瞭解目前時局特點以及由此產生的蘇維埃政權各種任務的基本關鍵。反資產階級鬥爭底重心，要移到組織這種統計和監督的工作上來。只有從這點出發，才能正確決定在實行銀行國有，壟斷對外貿易，由國家監督金融流通方面，在舉辦從無產階級觀點看來是可滿意的財產稅和所得稅方面，以及在實行勞動義務制方面，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當前任務。

在這些部門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上，我們還極為落後（而這都是極關緊要的部門），其所以落後，正因為統計和監督一般地就沒有充分組織好。自然，這個任務是最困難的任務之一，在戰爭所造成的經濟破壞情形下，祇有經過長時期才能解決這一任務；可是不能忘記，資產階級，尤其是人數衆多的小資產階級和農民資產階級，恰恰是在這方面向我們進行最嚴重的戰鬥，他們破壞正在整頓中的監督辦法，例如破壞糧食壟斷，奪取陣地來作投機事業和投機買賣。我們所已頒佈的法令，還遠沒有充分實

施，而現時主要任務，正在於集中一切力量，來切實在實踐上實現那些已經定為法令，可是還沒有見諸實施的改造事業的各原則。

爲要繼續向前實行銀行國有，並不屈不撓地去把銀行變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社會簿計底樞紐，首先就要極力在下列各事中達到實際成效：增加國民銀行分行底數量，吸收存款，改善存款取款的手續，使之便利於人民，消除那裏的「排隊」現象，捉拿並鎗斃受賄者和騙子等等。起初把最簡單的事情切實執行，把現有的事情好好組織起來，然後再準備作比較複雜的事情。

將那些已經施行的國家壟斷（如糧食壟斷、皮革壟斷等等）加以鞏固，加以整理，藉此準備實行由國家壟斷對外貿易；若不實行這種壟斷，那末專靠繳納「貢款」，我們就不能擺脫外國資本的羈絆。而社會主義建設是否可能，就全看我們能否在相當的過渡時期內，用向外國資本繳納某些貢款的辦法來保護自己國內經濟獨立性這點爲轉移。

在徵收一般的國稅，尤其是財產稅和所得稅的工作上，我們也非常落後。向資產階級徵收罰款，在原則上雖是絕對容許並值得無產階級贊同的辦法，但它表明我們在這一方面所採用的，多半像是從富人手裏（將俄國）奪來交給窮人的方法，而很少像是實行管理的方法。可是，要加強自己的力量和鞏固自己的地位，我們就應該轉而採用這第二種方法，就應該用經常正確徵收財產稅和所得稅的辦法來代替向資產階級徵收罰款的辦法。前一種辦法，能給無產階級國家更多的好處，並要求我們有更大的組織性，有更完善的統計和監督。

我們實施勞動義務制過遲，這就再一次地表明，準備工作與

組織工作成了當前的迫切任務；這種工作，一方面爲了徹底鞏固已得的勝利，應當這樣作，另一方面爲了準備「包圍」資本並強迫它「投降」的行動，必須這樣作。我們本該馬上開始實施勞動義務制，可是，我們在實施這個制度時，應當極其審慎，逐漸進行，用實際經驗來審查每一步驟，當然，第一步就是要對富人們實施勞動義務制。對於每個資產者——鄉村資產者也在內——施行工作、消費簿制，將是進到完全「包圍」敵人和建立對產品生產與分配上之真正全民統計和監督的一個嚴重步驟。

爲全民統計和監督而鬥爭的意義

千百年來，國家都是壓迫人民和掠奪人民的機關，它給我們留下了這種遺產：即羣衆們對一切國家政權之極端仇視和不信任的心理。克服這種心理，是非常困難的任務，這一任務祇有蘇維埃政權才能勝任，然而就連蘇維埃政權也須花費長久的時間和表現極大的堅毅精神才能完成這一任務。這個「遺產」底影響，在統計和監督問題上，即在推翻資產階級後第二天就成爲社會主義革命之根本問題上，表現得特別厲害。那些在推翻地主和資產階級之後第一次覺得自己得到了自由的羣衆，必然要經過相當的時間，不是根據書本，而是根據親身經歷的蘇維埃經驗，才能瞭解並感覺到：如果對於產品之生產與分配不實行極周到的國家統計和監督，則勞動者底政權，勞動者底自由，便不能維持，則資本主義壓迫制度底復辟便是無可避免的。

資產階級尤其是小資產階級底一切習慣與傳統，也是反對國家監督，而要求「神聖私有財產制」和「神聖」私有企業底不可侵犯性。現在我們特別明顯地見到，馬克思主義說無政府主義和

無政府工團主義係資產階級思潮為理論是如何正確，它們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是處於如何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力求將蘇維埃的，即由國家實行統計和監督的思想灌注到羣衆底意識中，力求實現這種思想，力求打破養成人們把獲得衣食看作「私人」事情，把買賣看作『祇是與我有關』的這種舊時惡習，——這便是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門爭，這便是社會主義自覺勢力反對資本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發勢力的鬥爭。我們已將工人監督制定為法律，可是這種制度還剛剛開始浸潤到生活中，甚至還剛剛開始浸潤到無產階級廣大羣衆底意識中去。至於說，在產品之生產與分配方面不實行清算清報制，便會使社會主義幼芽陷於滅亡，便是盜竊國庫，——因為現在一切財產都是屬於國庫的，而國庫也就是蘇維埃政權，即大多數勞動羣衆底政權；至於說，在統計和監督上表現疏忽，便是直接幫助德國的和俄國的科爾尼洛夫派，這些敵人只要我們一不執行統計與監督的任務，便能乘機推翻勞動者底政權，他們現時正在農民資產階級全體幫助之下，在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幫助之下，「窺伺」着我們，待機而動，——關於這一切，我們在自己的鼓動中沒有充分說明，先進的工農份子沒有充分地加以思索，加以討論。可是在工人監督還沒有成為事實以前，在先進工人還沒有辦好監督事宜，沒有實行勝利的和無情的進攻動作去反對破壞這種監督或不關心這種監督的人們以前，便不能由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即工人監督）進到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二步，即實行由工人調節生產。

社會主義國家祇有當它是由許多生產消費公社構成的體系，而這些公社都誠實計算自己的生產和消費，節省勞動，不斷提高

勞動生產率，並因而能夠減少每日勞動時間到七小時或六小時以至於更少的時間，——只有在這種形式之下，社會主義國家才能產生。在這裏，若不辦妥對糧食和糧食生產（隨後，再對一切其他必需品）實行最嚴格的，包括一切的全民統計和監督，是不行的。資本主義遺給了我們一種羣衆組織，能便於我們對產品分配實行廣泛的統計和監督，——這就是消費協社。在俄國，這種組織比之先進國家裏發展得微弱些，可是它們還是包括有一千萬以上的社員。日前頒佈的關於消費協社的法令，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現象，它鮮明地表明出現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狀況底特點和任務。

這個法令，是對資產階級合作社以及仍舊站在資產階級觀點上的工人合作社的一種協定。這個協定或妥協就是：第一，上述這些機關底代表不僅參加了該法令的討論，而且實際上還取得了表決權，因為法令中有遇到這些機關堅決反對的一部份條文，是被刪掉了的。第二，這種妥協，實質上就是蘇維埃政權放棄了免費加入合作社的原則（這是唯一澈底的無產階級原則），同樣也就是放棄了某地全體居民都要加入一個合作社的原則。我們放棄了這個與消滅階級的任務相適合的唯一社會主義的原則，而允許了「工人的階級合作社」（這些合作社之所以稱爲「階級合作社」，祇是因爲它們服從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仍舊存在。最後，蘇維埃政權所提出的要把資產階級完全從合作社管理處內摒除出去的條文，也大大放鬆了，祇有私人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商業主，才被禁止加入合作社管理處內。

假使無產階級經過蘇維埃政權而行動，已經辦妥了全國範圍內的統計和監督，或者至少是辦妥了這種監督底基礎，那就決不

會有作這種妥協的必要。那時我們就能經過各蘇維埃底糧食部，經過各蘇維埃附設下的供給機關，將居民聯合為各個統一的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合作社，而不要資產階級合作社底協助，不要對純粹資產階級的原則實行讓步，這種原則，促使工人合作社仍舊是與資產階級合作社同時並存的工人合作社，而不是把兩種合作社合併起來，以便由自己掌握全部管理權，由自己監視富人底消費，這樣來使資產階級的合作社，完全服從自己。

蘇維埃政權同資產階級合作社成立這種協定時，具體確定了自己在現今發展階段上的策略任務和特殊的行動方法，這就是說：領導資產階級份子，利用他們，對他們作某些局部的讓步，這樣來造成向前進展的條件，此種進展，雖然比我們最初預定的要緩慢些，可是比較切實些，比較可靠地保證我們的根據地和交通綫，比較完善地鞏固我們已經奪得的陣地。蘇維埃現在能夠（而且應該）用非常明顯、簡單而實際的設施尺度來測量自己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的勝利。就是要看有多少地方（公社或村落、街坊等等）並在何種程度上，合作社底發展已接近於包括全體居民的地步。

提高勞動生產率

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在已經解決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以後，隨着剝奪剝奪者的任務在大體上和基本上得到解決的程度，必然把創造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並且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勞動組織。我們蘇維埃政權現時正處於這種狀態中，它因為戰勝了剝削者，——由克倫斯基起到科爾尼洛

夫止，——就已經獲得有直接從事解決這個任務，直接着手執行這個任務的可能。這裏馬上就可以明白看見，我們曾在幾天內就能奪得國家中央政權，在幾個星期內就能在一個龐大國度內到處去壓服剝削者底軍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而現在要切实解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任務時，那就至少（尤其是在極其痛苦的和帶有極端破壞性的戰爭以後）也需要幾年的工夫。這工作底長期性質，無條件地是客觀環境所預決了的。

提高勞動生產率，首先就要保證大工業底物質基礎：提高燃料、鐵、機器製造業、化學工業等等的生產。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所處的條件非常優越，因為它甚至在布列斯特和約以後還擁有極大的富源：鐵礦（烏拉爾一帶）、燃料（西伯利亞西部的石炭、高加索和俄國東南部的煤油以及中部的泥炭），極豐富的森林、水力、化學原料（加拉步格茲灣）等等。用最新技術來開採這些天然富源，就能造成生產力空前發展底基礎。

另一種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條件，第一，就是民衆文化教育程度底高漲。這種高漲，現時正在突飛猛進，這是那些被資產階級陳腐習慣蒙住了眼睛的人們所看不到的，這些人不能瞭解，現在因有蘇維埃的組織，民衆「下層」中的求知熱潮和首創精神，該是如何廣闊地發展着。第二，就是提高勞動者底紀律，提高工作藝能，提高勞動技巧和勞動強度，改善勞動組織，這也是經濟高漲底條件。

在這一方面，我們的工作情形，特別不好，而據那些甘受資產階級恐嚇，或貪圖私利而替資產階級服務的人們說，甚至是沒有希望的。這些人不懂得：世界上從來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不被舊社會擁護者罵為崩潰現象和無政府狀態等等的革命。自然，剛

才脫離空前殘酷壓迫的羣衆，是充滿着深刻而廣泛的狂放熱潮和激暴心情，自然，造成勞動紀律底新基礎是一個非常長期的過程，在沒有完全戰勝地主和資產階級以前，這種造成勞動紀律新基礎的工作，甚至是不能開始的。

我們固然絕對不要被資產者和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已經喪盡保持舊有特權希望的人）所散佈的那種往往是假裝的絕望情緒所迷惑，但同時我們却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掩蔽顯係惡劣的現象。恰恰相反，我們要揭發這種惡劣現象，並加強反對這些現象的蘇維埃鬥爭方法，因為如果無產階級自覺的紀律性沒有戰勝那真正保證克倫斯基派和科爾尼洛夫派有復辟可能的自發的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則社會主義底勝利便無從設想。

俄國無產階級最有覺悟的先鋒隊，已經抱定目的，要來提高勞動紀律。例如五金工會中央委員會和全國總工會中央局，已在開始製定相當的辦法和法令草案。這種工作，應該加以贊助，應該用全力去推進它。應該把實際採用和試行按件工資制，採用太羅利制中許多合乎科學的進步方法，以及根據各工廠製出的產品總量，或鐵路運輸業及水道運輸業底運載結果來決定工資之多寡等等，作為當前的急務。

同先進民族比較起來，俄國人是較劣的工作者。而在沙皇制度統治下和農奴制殘餘存在的時候，是不會不這樣的。學習作工，這是蘇維埃政權應該向民衆盡量提出的一個任務。資本主義在這方面的最新發明，即太羅利制——也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一樣——包含着兩種成分，一種是資產階級剝削底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另一種是許多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即按科學來分析勞動中的體力動作，消除多餘的笨拙的動作，製定最精確的工作方

法，實行最完善的統計和監督制等等方面所獲得的成就。蘇維埃共和國，在這方面無論如何都要採用科學和技術上一切有價值的成就。社會主義實現的程度如何，正是要靠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與資本主義最新進步相結合這方面的成功來決定。應該在俄國研究與教授太羅利制，有系統地試行這個制度並使它適應於我國條件。同時，在提高生產率的時候，還須注意到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這個過渡時期的特點；這些特點，一方面，要求奠定組織社會主義競賽的基礎，另一方面，要求採取強迫手段，使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口號，不致為無產階級政權軟弱的實殘所玷污。

組織競賽

說社會主義者否認競賽底意義，這是資產階級所樂意散佈來譁譎社會主義的妄談之一。其實，社會主義既然消滅階級，因之也消滅對羣衆的奴役，也祇有它才第一次開闢真正大規模競賽的坦途。正是這由資產階級共和國底形式民主制過渡到勞動羣衆實際參加管理工作的蘇維埃組織，才第一次廣泛地提出競賽。在政治方面實行競賽，比在經濟方面容易得多，可是爲了社會主義的勝利，重要的正是在經濟方面實行競賽。

我們拿組織競賽的一個方法，如公佈的方法來講吧。資產階級共和國祇是在形式上保證此種方法的實行，實際上，它使報紙刊物受資本的節制，用引人入趣的政治瑣談來玩弄「老百姓」，以保護「神聖私有財產制」的營業祕密來掩蔽作坊裏，商業契約裏，交貨手續裏及其他等等當中所有的黑幕。蘇維埃政權已經取消營業祕密，已經走上新的道路，可是利用公佈法去進行經濟競

賽，我們還幾乎是毫無成就。應該有系統地從事這種工作，以便除了無情打擊純係欺騙和無恥造謠的資產階級刊物之外，還能努力去創辦這樣一種刊物，它不以政治趣語和瑣談來玩弄和愚弄羣衆，而正是將日常經濟問題，提交羣衆裁判，幫助他們認真來研究這些問題。每個工廠、每個鄉村、都是生產消費公社，都有權並應該照自己的方法去施行一般的蘇維埃法規（所謂「照自己的方法」，並不是說破壞法規，而是說用各種不同的形式實施這些法規），照自己的方法來解決產品生產和分配底統計問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是個別資本家，地主和富農底「私事」。而在蘇維埃政權下，這不是私事，而是國家大事。

我們差不多還沒有着手進行那種巨大而困難的，同時却是富有結果的工作，即組織各公社間的競賽，將工作報告制和公佈法實行到出產衣服糧食等等的生產過程中去，把乾燥的、死板的官僚主義的工作報告變成活的榜樣——壞的使人討厭，好的使人羨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個別榜樣底意義，比如說，某個生產組合榜樣底意義，必然是極其有限的；祇有滿懷小資產階級幻想的人，才能夠夢想以慈善機關榜樣的影響來「糾正」資本主義。在政權轉歸無產階級掌握以後，在剝奪者已被剝奪以後，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榜樣底力量——如最著名的社會主義者所多次指示過的那樣，——第一次有可能來表現自己的廣大影響。模範公社應該成爲，而且必將成爲落後公社的訓導人，教師和提攜者，報章刊物應該成爲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介紹模範公社所獲成績的一切詳情，研究它們成功底原因以及它們經營的方法；另一方面，將那些堅決保持「資本主義傳統」，即無政府狀態，偷懶，亂無秩序，投機行動等等的公社登上「黑板」。在資本主義

社會內，統計純粹是「公務人」或本行專家底事務，我們却應該將它貫輸到羣衆中去，把它通俗化，使勞動羣衆逐漸地學會親自瞭解並看到應該如何工作，工作多少，怎樣休息，休息多久，使各個公社間經濟成績底比較，成爲大家注意和研究底對象，使優良的公社，立即得到獎賞（如在相當時期內縮短勞動時間，提高工資，獎賞大量文化的或美術的貴重物品等等）。

當新階級以社會首領和指導人的資格走上歷史舞台的時候，從來不會不經過最強烈的「動盪」、震撼、鬥爭和風浪時期的，這是一方面；而在另一方面，又不會不經過在選擇適合新客觀環境的方法上發生無把握的步驟，試驗、動搖和猶豫時期。以前，趨於滅亡的封建貴族，當報復那些排擠自己並已在獲勝的資產階級時，不祇使用各種陰謀手段，企圖暴動與復辟，而且還滔滔不絕地譏笑「暴發戶」「無恥漢」底笨拙、魯鈍和錯誤，說這些人既沒有王侯、貴族、世家所有過的長期執政訓練，竟膽敢執掌國家「神聖大權」——現在，科爾尼洛夫輩和克倫斯基輩、郭茨輩和馬爾托夫輩，所有這些資產階級滑頭主義或資產階級懷疑主義的英雄們，對於那「胆敢」企圖奪取政權的俄國工人階級，也正是採用這種報復手段。

當然，新社會階級，而且是迄今以前受壓迫的，被貧困與黑暗所高壓過的階級，必須經過長期的年月，——而不是經過幾個星期，——才能夠把握新的情勢，看清環境，辦妥自己的工作，造就出自己的組織者。當然，領導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過去是不能造成從事大規模的，預計到包括千百萬公民的組織設施底經驗和技能，而要把舊的，差不多純係鼓動家的技能改造過來，這是一件很長久的事。可是這裏並沒有什麼絕不可能的事情。既然

我們會明知轉變底必要，並有實現轉變的堅決心，並有達到偉大而困難目的的毅力，——那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這個轉變。「老百姓」中，即工人和不剝削別人勞動的農民大眾中，有極多的天才組織家；資本把這樣的天才組織家成千地摧殘、毀滅和拋棄，而我們呢，却還不會把他們發現出來、鼓勵起來、扶持起來、提拔出來。可是，如果我們能以全部的革命熱忱——沒有這種革命熱忱，便不會有勝利的革命——去着手學習這種工作，那我們就一定能學會這種工作。

在歷史上，任何一個深刻強大的民衆運動都不免帶有污濁的浮泡——都不免有黏附於經驗缺少的革新家方面的野心家和騙子，大言不慚和誇口吹牛份子，不免有荒謬的混亂，無謂的舉動，徒然的忙碌，不免有個別「領袖」企圖百事承當而一事無成的現象。讓資產階級社會底哈巴狗——由別洛魯梭夫起到馬爾托夫止，在我們砍伐古木老林的時候，對每一塊多餘砍去的木屑去嘶聲狂吠吧！既是些哈巴狗，也就祇能向無產階級這巨象狂吠。讓他們去狂吠吧！我們走自己的道路，力求盡量謹慎，盡量耐心地試驗並辨識真正的組織家，即那些具有清醒頭腦和實際本領的人才，他們既忠實於社會主義，而又能毫不喧嘩地（並不顧別人的忙亂和喧嘩）做到使蘇維埃組織範圍內的大批人衆都能團結堅牢，和衷共濟地工作。祇有這種人才，在經過多次試驗之後，才應該提拔起來，由最簡單的任務進到最困難的任務，使之擔負要職，充當民衆勞動底領導者，管理工作的領導者。我們還沒有學會這點。我們定能學會這點的。

「嚴整的組織」與專政

最近在莫斯科舉行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底決議案，提出建立「嚴整的組織」與提高紀律，作為現時最主要的任務。現在，大家都樂意「表決」和「簽署」這樣的決議案，可是關於實施這些決議案需要採用強迫手段，而且正是要採用專政形式的強迫手段，——這一點，人們通常却不去思索一下。其實，如果認為可以不用強迫手段，不用專政手段，便能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那就是絕頂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義。馬克思底理論，在很久以前就已十分確定地反對過這種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和無政府主義的妄談。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俄國事變，已經非常明顯、觸目、動人地證實了馬克思這種理論，祇有絕頂愚鈍或硬不承認真理的人，才能在這方面依然執迷不悟。或者是科爾尼洛夫專政（如果把科爾尼洛夫看作俄國式的資產階級的卡芬雅克的話），或者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這經過了幾次非常急劇轉變而達到非常迅速發展的國家裏，在由最痛苦的戰爭所造成的經濟絕頂破壞情形下，別種出路簡直是談不到的。一切中間的解決辦法，若非資產階級對民衆的欺騙，——資產階級不能講真話，不能說出他們需要科爾尼洛夫，——便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切爾諾夫輩、策烈鐵里輩、馬爾托夫輩（他們高談什麼民主派的統一、民主派專政、民主聯合戰綫以及諸如此類的胡說）底愚蠢想法。誰要是經過了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俄國革命事變，却還沒有懂得決不能有中間的解決辦法，那麼對於這樣的人，就只好置之一笑。

另一方面，不難瞭解，在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任何過渡中，由於兩個主要原因，或者說在兩個主要方向上，必須有專政制度。第一，若不無情地鎮壓剝削者底反抗，便不能戰勝和剷

除資本主義，因為不能一下子就把這些剝削者的財產，把他們在組織上和知識上的優勢完全剝奪掉，所以在一個相當長的期間，他們必然會企圖推翻他們所仇視的貧民政權。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即令不發生對外戰爭，也決不會不經過國內戰爭，而國內戰爭比之對外戰爭會造成更大的經濟破壞，國內戰爭中會發生千百萬種動搖和倒戈事件，會造成極不確定、極不穩定和混亂的狀態。而舊社會中的一切腐化份子，其數量必然極多，大半都與小資產階級有聯繫（因為一切戰爭和一切危機，首先就使小資產階級破產，首先就是摧殘他們），這些份子，在這種深刻轉變的時候，自然不能不「顯露頭角」。而除了增多犯罪行爲、流氓行爲、賄賂、投機及作出各種壞事以外，這些腐敗份子是不能以別種方法來「顯露頭角」的。爲要消除這種現象，就必須花費時間，必需有鐵的手腕。

在歷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民衆沒有不本能地感覺到這一點，沒有不表現其除惡決心而把盜賊就地鎗決的。從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於使羣衆保持緊張心情而能無情鎮壓腐化份子的那種革命熱忱，未曾長久支持下去。當時羣衆革命熱忱之所以這樣不穩固，其社會原因，即階級原因，就是無產階級本身上薄弱，而祇有無產階級（如果它已經有充分的數量，充分的覺悟和充分的紀律），才是唯一能夠將大多數被剝削勞動者（如果更簡單更通俗些說，就是大多數窮人）吸收到自己方面來，能夠充分長期地執掌政權，來完全壓服一切剝削者和一切腐化份子。

歷次革命中這個有歷史意義的經驗，這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教訓也就爲馬克思所確認了，他給了一個簡單、嚴格、精確、明顯的公式：無產階級專政。至於俄國

革命之正確地實現這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任務，這是蘇維埃組織在俄國所有一切民族中的勝利傳佈所證明了的。因為蘇維埃政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即先進階級專政底組織形式，這個先進階級，把千百萬被剝削勞動者提高到實行新民主制，提高到獨立參加國家底管理，而他們根據自身經驗正在學習認識這有紀律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確為自己最可靠的領袖。

然而專政是一個大字眼。而大字眼是不可以隨便亂說的。專政就是鐵一般的政權，是有革命勇氣的和行動敏捷的政權，是無論對剝削者或流氓都實行無情鎮壓的政權。而我們的政權却柔軟極了，往往不大像鐵，却很像漿糊。我們一分鐘也不應忘記，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兩方面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一方面，是從外部來動作，其方法為沙溫可夫輩、郭茨輩、黑格啓科利輩、科爾尼洛夫輩所採用的陰謀和暴動手段以及立憲民主黨、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刊物上之不斷的造謠誣蔑，努力傳播這些人的齷齪「思想」；另一方面，是這種自發勢力從內部來動作，利用各種腐化成份，利用一切弱點來實行賄賂，來助長無紀律性、放蕩性和混亂現象。我們愈是用軍事辦法完全壓服資產階級，則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底自發勢力對於我們也就愈加危險。要與這種自發勢力作鬥爭，決不能祇靠宣傳和鼓動，祇靠組織競賽，祇靠選拔組織者，——還必須用強迫手段來進行這個鬥爭。

當政權底基本任務已逐漸由軍事鎮壓轉為管理工作時，鎮壓和強迫手段底標本表現，也會逐漸由法庭審判來代替就地鎗決。在這一方面，革命羣衆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就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並證明出革命底生命力，他們在尚未頒佈解散資

產階級官僚司法機關的任何法令以前，就已開始組織自己的，即工農的法庭。可是我們的人民革命法庭還極端軟弱。還可以感覺到，民衆把法庭看作是一種異己的官場東西，這種由地主資產階級壓迫所遺傳下來的觀點，還沒有澈底打破。民衆還沒有充分意識到，法庭正是吸引全體貧民參加國家管理的機關（因為司法事務是國家管理機能之一），法庭是無產階級和貧農底政權機關，法庭是訓練人民遵守紀律的工具。民衆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樣一個簡單明顯的事實：俄國底主要不幸是在於飢荒和失業，而要戰勝這些苦難，不是用任何一時的熱情所能奏效，而祇有用各方面的，包羅一切的，全民的組織和紀律來增加生產人民所需要的糧食以及工業所需要的燃料，及時運輸並正確地加以分配，才能達到這個目的；——所以無論在哪種經濟中，無論在哪件事情上，凡是破壞勞動紀律的人，就是造成飢荒痛苦和失業痛苦的罪人，對這種罪人，應該善於查出，提交法庭，嚴懲無貸。我們現在要與之作最堅決鬥爭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正表現在人們很少意識到飢荒和失業現象是與一切人和每個人在組織上紀律上所犯的放蕩行爲，有着國民經濟上與政治上的聯繫，——人們牢固地保持着小私有者的觀點：只要我能多抓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

鐵路事業，可說是最顯明地體現着大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機體之經濟的聯繫，在這裏，小資產階級放蕩性的自發勢力反對無產階級組織性的這個鬥爭，表現得特別鮮明。「管理」份子中產生出大量的怠工者和受賄人；優秀的無產階級份子却在爲遵守紀律而鬥爭；可是，在前後兩種份子當中，自然有很多動搖的，「軟弱的」人，他們無力抵抗投機、賄賂和私人利益的誘惑，而取得此種個人利益的代價，就是敗壞整個機關；但要消除飢荒和失業

現象，則恰恰有賴於這個機關底正確工作。

在最近頒佈的關於鐵路管理的法令，即賦與個別領導人以獨裁全權（或「無限」全權）的法令問題周圍所開展起來的鬥爭，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生的，這個鬥爭很可表明一切。自覺表現小資產階級放蕩性的份子（而大部分大概是不自覺的），當時想把賦與個別人員以「無限」（即獨裁的）全權的法令，看作是離開委員制原則，離開民主制以及蘇維埃政權底其他原則。有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正進行着簡直是流氓式的煽動，即是利用惡劣天性，利用小私有者「抓取」的慾望來進行煽動，反對關於獨裁制的法令。這裏發生了具有真正巨大意義的問題：第一、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即一般講來，委任負有獨裁者無限全權的個別人員的辦法是否與蘇維埃政權底根本原則相容；第二、這件事情，——也可說是這個先例，——對於目前政權底特殊任務，有什麼關係。我們對於前一問題和後一問題，都應該非常細心來加以研究。

無可爭辯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革命運動史上，個人獨裁之成為革命階級專政底表現者、代表人和執行者，是極常見的事。個人獨裁與資產階級民主制，毫無疑義是彼此相容的。可是在這一點上，咒罵蘇維埃政權的資產階級份子，以及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應聲虫總是表演圓滑手腕：一方面，他們宣佈蘇維埃政權不過是一種荒謬的，無政府式的粗野東西，而極力漠視我們為證明蘇維埃是最高形式的民主制，甚至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底開端所引用的一切歷史上的比擬和理論上的證據；另一方面，他們却向我們提出比資產階級民主制更高的民主制要求，而說：個人獨裁是與你們布爾什維克的（即不是資產階級的，而是社會主義的）

蘇維埃民主制絕不相容的。

這種議論簡直壞透了。如果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那我們就應該承認必須有國家，即是說，承認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必須採用強迫手段。強迫手段底形式，是取決於當時革命階級發展底程度，其次是取決於某些特別情況，例如長期反動戰爭底遺毒，以及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反抗底形式。所以蘇維埃的（即社會主義的）民主制與實行個人獨裁之間，絕無任何原則上的矛盾。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之間的區別，就在於無產階級專政是打擊佔少數的剝削者以謀佔大多數的被剝削者底利益，其次在於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由被剝削勞動羣衆——經過個人——來實現，而且由一種組織來實現，這種組織之構成，正是便於喚醒和喚起這種羣衆去從事具有歷史意義的創造工作（蘇維埃的組織就是這類的組織）。

關於第二個問題，即從現時特殊任務看來，個人獨裁制有何意義的問題，我們應該說，任何大機器工業——即社會主義之物質的和生產的泉源和基礎——都必須有無條件的和最嚴格的統一意志，來指揮幾百人、幾千人以至幾萬人底共同工作。這一點的必要，無論從技術上、經濟上或歷史上看來，都是非常明顯的，——一切對社會主義思索過的人，始終承認這是實現社會主義底一個條件。可是怎樣才可以保證意志之最嚴格的統一呢？這就只有使千百人底意志服從於一個人底意志。

在參加公共工作的人們有盡善盡美的自覺性和紀律性的情形下，這種管制就會很像音樂指導人底柔和領導一樣。如果在沒有盡善盡美的自覺性和紀律性的時候，管制可以具有嚴厲的獨裁形式，但是，不管怎樣，爲要使這種按照大機器工業式樣組成的工

作過程獲得成效，則無條件地服從統一意志，便是絕對必要的了。在鐵路業上，此種服從，更是加倍必要的。這種由一個政治任務轉到另一個政治任務的過渡，——在表面上看來，後一種任務與前一種任務是全不相像的，——就是現在時局底特點。革命剛剛才打破了使羣衆在鞭笞威嚇之下受其管制的那種最陳舊、最堅牢、最沉重的鎗銬。這是昨天的事，而在今天，同時這個革命，而且正是爲着社會主義底利益，却要求羣衆無條件地服從勞動過程指導者底統一意志。當然，這個過渡是不能一下子做到的。只有經過極大的動盪、震撼、復舊以及那領導民衆建設新生活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極度緊張自己的精力，這個過渡才會實現。那些沾染了新生活、前進、人民事業和我們時代各報⁵⁷底庸俗瘋狂病的人們，是不肯思索這層道理的。

且拿被剝削勞動羣衆中普通份子底心理來看，並將這個心理來同他們的社會生活客觀物質條件作一對照吧。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在事實上還沒有看見過有產者、剝削者階級會真正作出什麼嚴重犧牲來施捨給他。他還沒有看見有產者、剝削者階級會給他以多次約許過的土地和自由，給他以和平，會犧牲「大強國主義」底利益和大強國密約底利益，會犧牲資本和利潤。祇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當他自己用強力取得了這種東西，並且不得不用強力來捍衛已獲得的勝利品，使之免遭克倫斯基輩、郭茨輩、黑格啓科利輩、杜托夫輩、科爾尼洛夫輩侵犯的時候，他才看見了這種情形。當然，在相當時間以內，他的一切注意、一切思想、一切精力，都祇求來舒舒氣、伸伸腰和展展軀體，取得一切可以取得而爲現已推翻了的剝削者所沒有給予過他的那種眼前生活上的福利。當然，需要經過相當時期，羣衆中的

普通份子才能不僅親眼看見，不僅切實相信，而且還會親身感覺到：這樣簡單地「取得」、奪得、抓得是不行的，這樣做去，會助長經濟破壞，招致滅亡，引起科爾尼洛夫輩底復辟。普通勞動羣衆生活條件上(因之也是心理上)相當的轉變，剛剛開始，而我們的全部任務，被剝削羣衆解放要求之自覺代表者，即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底任務，就在於領會到這個轉變，瞭解這種轉變的必然性，起來領導這些困倦的和疲於尋求出路的羣衆，引導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走上勞動紀律的道路、走上這種把經常開羣衆大會討論工作條件的任務與在工作時間內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人——獨裁者——底意志的任務協調起來的道路。

資產者、孟什維克和新生活派嘲笑「開羣衆大會」的辦法，更常常惡意地指謫「羣衆大會」，認爲這裏祇是混亂現象，無謂之舉和小私有者利己主義的衝動。可是，不舉行羣衆大會，則被壓迫羣衆永遠也不能由剝削者強制他們遵守的紀律，轉到自覺的和自願的紀律。羣衆大會，這也就是勞動羣衆底真正民主制，這是他們揚眉吐氣之際，這是他們向新生活醒覺起來，這是他們在親自既已掃除毒物(剝削者、帝國主義者、地主、資本家)的活動場所中的初步行動，現在他們又想親自本着這個不是別人的，不是貴族的，不是資產階級的，而是自己的「蘇維埃」政權底原則，按自己的方式，爲自己的利益，去學會整頓這個活動場所。正需要有勞動羣衆戰勝剝削者的十月革命勝利，需要有勞動羣衆自己初期討論新生活條件和新任務的整個歷史時期，才能夠穩固地過渡到更高形式的勞動紀律，過渡到自覺地領會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的思想，過渡到在工作時間內絕對服從蘇維埃政權代表底獨斷命令。

這個過渡現在已經開始了。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一個任務，我們看見過勞動羣衆怎樣在自己隊伍中造成了革命勝利底基本條件：這就是大家一致努力去反對剝削者，以求推翻他們。像一九〇五年十月以及一九一七年二月和十月這樣的階段，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二個任務：這就是喚醒和喚起那些過去被剝削者抑壓下去了的社會「下層份子」，他們祇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才得到完全的自由來推翻剝削者，並開始認清環境，按照自己的方式來佈置生活。這些最受壓迫、最遭抑壓、最少知識的勞動羣衆舉行羣衆大會，他們之轉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他們到處建立起自己蘇維埃的組織，——這便是革命底第二個偉大階段。

現時正在開始第三個階段。必須把我們所業已奪得的東西，把我們所已經下過了明令，已經定爲法規，已經討論過，已經擬定了的東西鞏固起來，——必須把這些東西鞏固成爲日常勞動紀律底鞏固形式。這是一個最困難而又最有成果的任務，因爲祇有解決這個任務，才能樹立起社會主義的秩序。應該學會將勞動羣衆舉行羣衆大會的這種洶湧澎湃有如春潮泛濫一切隄障的民主精神，與在工作時間內實行鐵的紀律，及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者一個人意志的精神聯成一氣。

這件事我們還沒有學會。

我們一定會把它學會的。

昨天，我們會遇到資產階級剝削制復辟的危險，其表現就是科爾尼洛夫、郭茨、杜托夫、黑格魯科利、博加也夫斯基之流的行動。我們戰勝了他們。今天，這個復辟，同是這個復辟的危

險，又表現於別種形式上，表現於小資產階級放蕩性和無政府主義底自發勢力以及小私有者這「與我無關」心理底自發勢力，表現於這個自發勢力對無產階級紀律性在進行日常的、細小的，可是數量極多的進攻和襲擊。我們應該戰勝這種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底自發勢力，而且我們一定會戰勝它的。

蘇維埃組織底發展

蘇維埃民主制，即目前具體實施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底社會主義性質就在於：第一、選舉人爲被剝削的勞動羣衆，而資產階級則不在其列；第二、廢除了選舉上一切官僚主義的形式手續和限制，羣衆自己決定選舉手續和期限，選舉人有召回被選舉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成勞動者先鋒隊，即大工業無產階級底最優良的羣衆組織，此種組織，使這先鋒隊能夠領導最廣大的被剝削羣衆，吸收他們參加獨立的政治生活，根據他們自身的經驗給他們以政治訓練，——因而是空前第一次着手來使真正全體人民都學習管理國家，並且已開始管理國家。

這就是已在俄國實施的民主制底主要特徵，這是更高式樣的民主制，是與資產階級對民主制之曲解完全背馳，是過渡到社會主義民主制，過渡到使國家能夠開始消亡的條件。

當然，小資產階級反組織性底自發勢力（在任何無產階級革命中，這種自發勢力都必然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來，而在我國革命中，因爲我國具有小資產階級性質，因爲我國落後以及由於反動戰爭所造成的惡果，更表現得特別厲害），也不能不影響到蘇維埃方面。

必須毫不鬆懈地去進行發展各地蘇維埃組織和蘇維埃政權組

織的工作。現在有一種使蘇維埃代表變爲「國會議員」，或在另一方面變爲官僚的小資產階級趨勢。必須用吸收全體蘇維埃代表實際參加管理工作的方法來同這種趨勢作鬥爭。在許多地方，蘇維埃底各部變成逐漸與各辦事處融合一塊的機關。我們的目的，是要吸收全體貧民來實行參加管理工作，而實現這個目的的一切步驟，——其形式愈多愈好——應該詳細地登記起來，加以研究，使之系統化，以更廣泛的經驗來從事審查，並定爲法規。我們的目的，是要使每個勞動者，除作完八小時生產工作的「功課」以外，無報酬地執行國家義務。過渡到這個制度，是特別困難的，可是只有實現這種過渡才可保證社會主義徹底鞏固起來。這種過渡乃是一種創舉，是一件難事，這當然要引起許多所謂摸索行進的步驟，許多錯誤和動搖，——不經過這種現象，決不會有任何急劇的前進。在許多願意自認爲社會主義者的人們看來，目前情況底全部特點就是人們已慣於抽象地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起來，而在兩者之間安上一個意味深沉的名詞：「躍進」（有些記得恩格斯著作底片段的人，更補上一句意味深沉的話語：『由必然界躍進到自由界』）。可是大多數所謂社會主義者，即祇『在書本上讀過』社會主義而從來沒有認真領會過事實的人們，都不善於想到：社會主義底這位導師所說的「躍進」，是指全世界歷史變遷上的轉變關頭，並且這種躍進，往往包括十年或更多的年代。自然，在這種時候，在鼎鼎大名的「智識界」中，會出現無數的哭喪婦：有的哭立憲會議、有的哭資產階級紀律、有的哭資本主義秩序、有的哭文明地主、有的哭帝國主義的大強國精神以及諸如此類等等。

偉大躍進時代底真正足以注意的地方，就在於舊制度底碎片

極多，並且有時比新制度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底數量還積累得更快些，這就使我們要善於從發展路線或鏈條中抽出最重要的環節。有這樣的歷史時機，這時為謀革命底勝利，最重要的是在多積累些碎片，即是多破壞些舊機關；也有另一種時機，即在破壞已經足夠的時候，當前的事情是一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看來，是「枯燥無味」的工作），即清除碎片的工作；此外還有一些時機，這時最重要的是在瓦礫還沒有清除淨盡的土壤上，慫慂地看護着從碎片下生長出來的新制度底幼芽。

僅僅一般地做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擁護者或共產主義者，還是不夠的。必須善於在每個時機裏找出鏈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這個環節是為了把握住整個鏈條並穩穩準備過渡到下一個環節所必須用全力抓住的；同時，在事變發展的歷史鏈條裏，各個環節的次序，它們的形式、它們的關連、它們彼此間的區別，都不像鐵匠所製成的普通鏈條那樣簡單、那樣笨拙。

蘇維埃與「人民」，即是與被剝削勞動者之間有鞏固的聯繫，有着靈活的和伸縮自如的聯繫，這就足以防止官僚主義惡化蘇維埃組織的現象。貧民無論何時都不把資產階級的國會，那怕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按民主制說來——資本主義共和國底資產階級國會，認為是「自己的」組織。而蘇維埃在工農羣衆看來，則是「自己的」，而不是異己的。無論是謝德曼式的，或幾乎是同為一邱之貉的馬爾托夫式的現代「社會民主派」之厭惡蘇維埃，他們之羨慕威儀十足的資產階級國會或立憲會議，正和六十年前屠格涅夫之羨慕溫和的、帝制的和貴族的立憲制，而厭惡多布洛留波夫和契爾內舍夫斯基所主張的農夫民主主義一樣。

正是由於蘇維埃與勞動「人民」接近，才造成一種特別式的召回制和另一種的自下監督制，現在應該極力使這些形式發展起來。例如，國民教育委員會是蘇維埃選民及其代表為討論並監督蘇維埃政權在這方面的活動而舉行的定期代表會議，這種委員會是值得享受完滿的同情和擁護的。若是把蘇維埃變為一種凝固的和閉關自大的東西，那就再愚蠢不過了。現在，我們愈堅決主張無情強硬的政權，愈堅決主張在某種工作過程中，在某種純粹執行的職能方面實行個人獨裁制，則我們便應該有愈加紛繁的自下的監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杜絕惡化蘇維埃政權的任何可能性，以便再三不倦地剷除官僚主義的莠草。

結 論

國際方面的情形，是非常嚴重，困難而危險的；必須隨機應變和實行退守；等候西歐革命新爆發的時期，這個革命底成熟過程竟長久得令人難耐；在國內，是緩慢建設，無情「督促」的時期，是無產階級的森嚴紀律性與那小資產階級放蕩性及無政府狀態之險惡自發勢力作長期堅決鬥爭的時期；——簡略說來，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中現今特殊階段底特點。這就是歷史事變鏈條中這樣一個環節，即現時我們必須用全力抓住，以便在過渡到下一環節前能於順利解決任務的這個環節，至於下一環節，却正以特別的光輝，即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底光輝，引人注目。

我們試將「革命家」通常流行的概念，與根據現今階級底特點而產生的口號比較一下，這些口號就是：隨機應變、退守、等候、慢慢建設、無情督促、森嚴紀律、撲滅放蕩性等等。有些「革命家」，聽到這些口號以後，不覺義憤填膺，開始「痛斥」

我們，說我們忘掉了十月革命底傳統，說我們主張與資產階級專門家妥協，與資產階級調和，說我們贊成什麼小資產階級性、改良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等等，這是不足驚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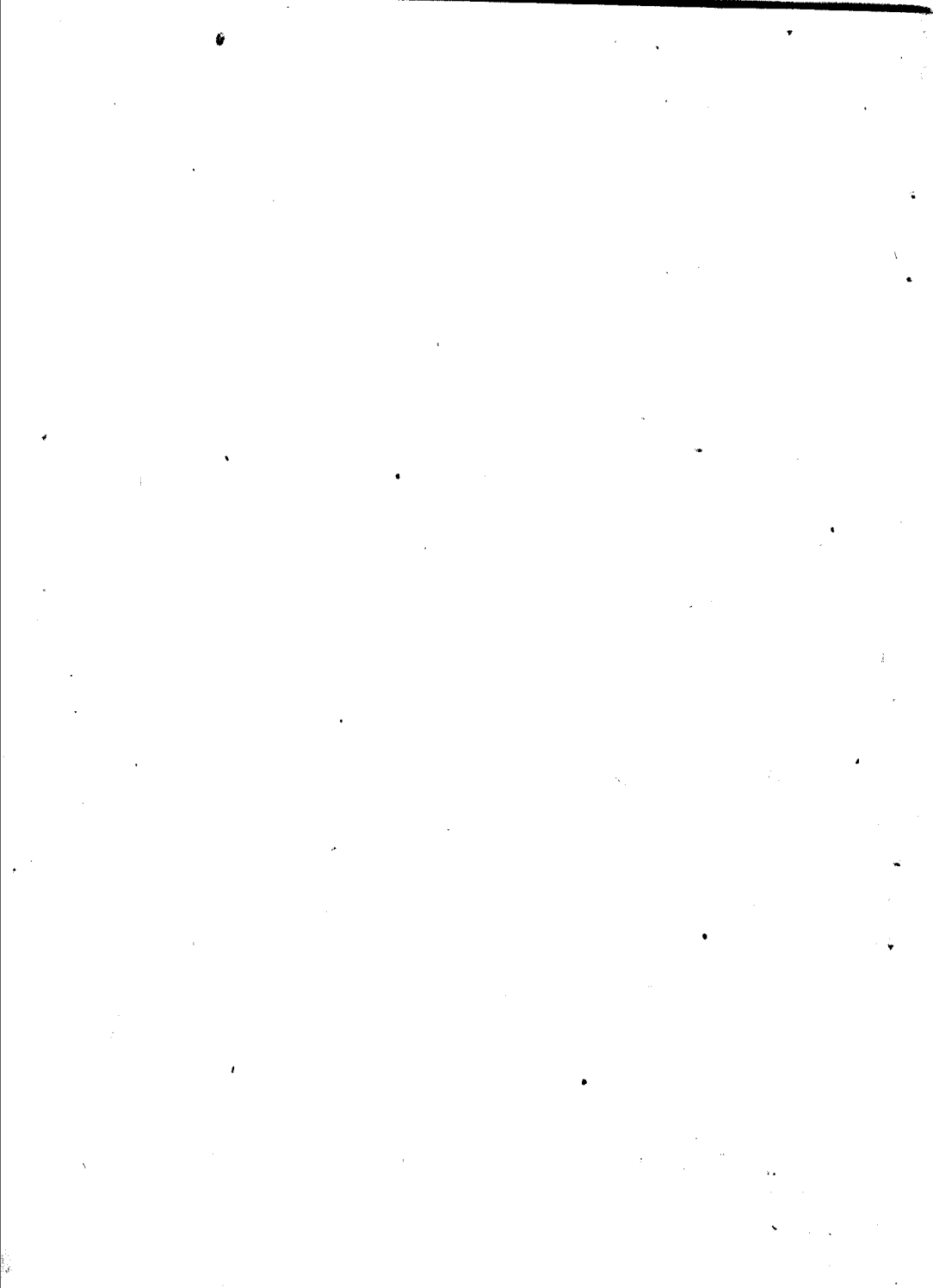
這些可憐的革命家底不幸，就在於他們中間連那些抱有世界上最高尚的動機而對於社會主義事業絕對忠誠的人們，都不能了解落後的國家，爲險惡的反動戰爭所毀壞的國家，遠在先進國以前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所應該經過的這個特別的和「特別不愜意的」狀況，都沒有毅力經受住困難過渡中的困難關頭。對我們黨持這種「正式」反對態度的，自然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集團代表人物和階級代表人物中，個人的例外，自然是有的，而且永遠會有的。可是社會的代表人物始終存在。在小私有者人口比純粹無產階級人口佔有莫大優勢的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家與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之間的差別，必然會顯露出來，而且有時會極端劇烈地顯露出來。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在事變底每一轉變關頭都動搖着、游移着，由一九一七年三月間的激烈革命態度，轉到五月間的頌揚「聯合政府」，轉到七月間的仇視布爾什維克（或者說，轉到嘆惜布爾什維克底「冒險主義」），又轉到十月末的竭力迴避布爾什維克，再轉到十二月間贊助布爾什維克，最後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和四月間，這種人物，最愛做出目中無人的樣子：說「我並不是歌頌「機構」工作、實際主義和漸進精神的人」。

這種人物底社會根源就是小業主，他們因戰爭慘禍、突然破產以及飢荒與破壞的空前痛苦而憤激發狂，他們瘋狂地東奔西竄，尋找出路和救星，動搖不定：一方面想信任和幫助無產階級，另一方面，又時而爆發絕望情緒。應該明確了解和牢實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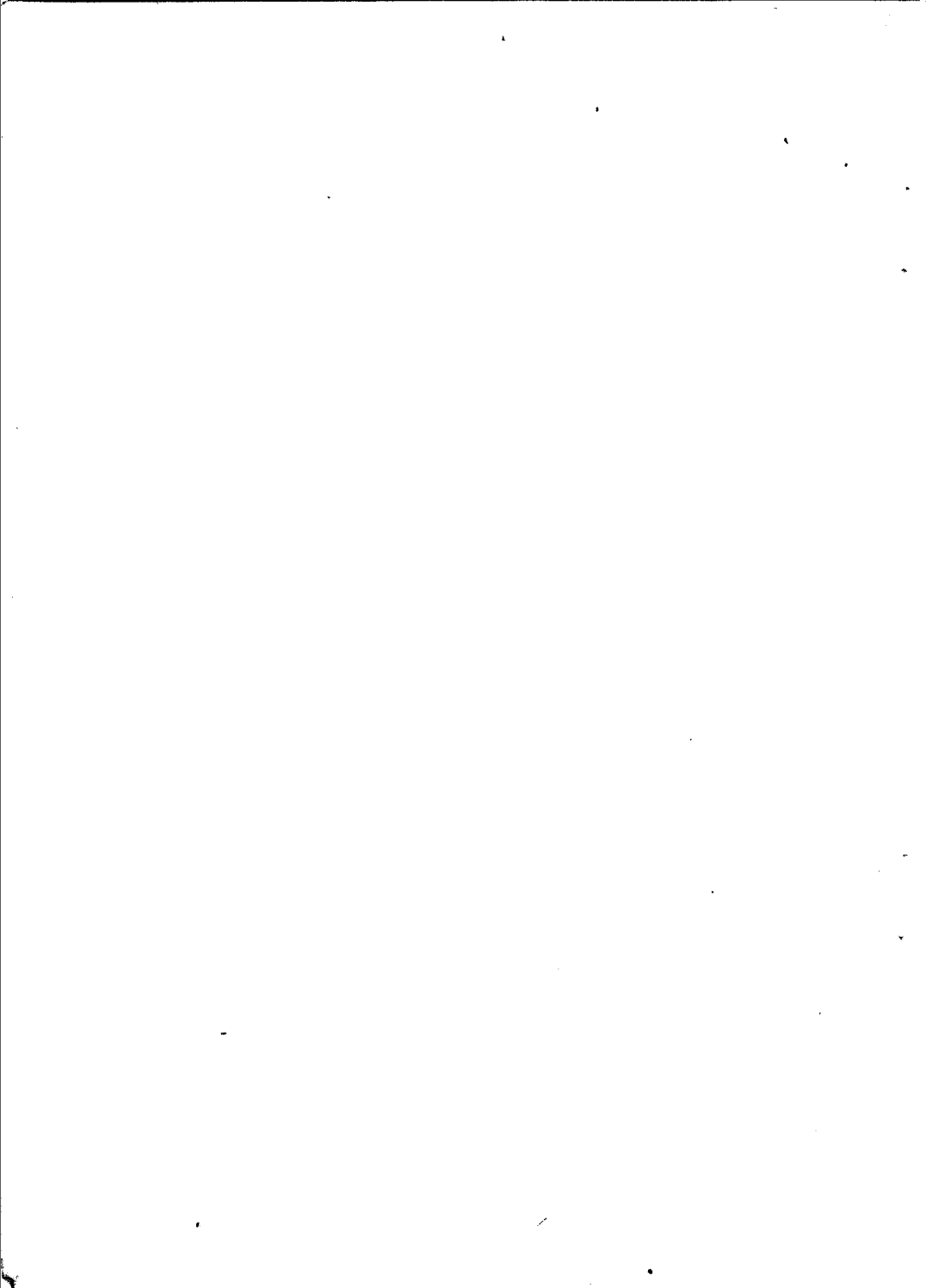
在這種社會基礎上面，任何社會主義都是建設不成功的。祇有毫不動搖地遵循自己道路前進，在最困難、最嚴重、最危險的過渡期間不灰心失望的階級，才能領導被剝削勞動羣衆。我們不需要瘋狂般的熱潮。我們需要有無產階級鐵軍底整齊步武。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刊載於蘇俄中央執
委新聞報第八十五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四三五至四六八頁



簡 要 註 釋



1 組委，即組織委員會，是孟什維克底領導中心。——（見正文第一一頁）。

2 統一報是由普列漢諾夫主編，於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該報採取極端沙文主義的立場，進行反波爾什維克的瘋狂鼓動，主要與自由君主派資產階級底政黨，即立憲民主黨聯合。——（見正文第一三頁）。

3 俄國意志報是一種極庸俗的日報，一九一六年在彼得格拉出版。該報會對波爾什維克橫施誹謗，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被封閉。——（見正文第一三頁）。

4 布朗基主義者是法國著名革命家布朗基（一八〇五——一八八一）底信徒。列寧說：布朗基主義者妄想「不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手段，而用一小羣智識份子陰謀手段來使人類擺脫僱傭奴隸制度」（列寧全集，俄文第三版，第九卷，第二三七頁）。——（見正文第一七頁）。

5 『血腥的』尼古拉，即羅曼諾夫、尼古拉第二（一八六八——一六一八）的綽號，他是被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所推翻的最後的一個俄皇。——（見正文第一九頁）。

6 『絞手』斯托雷平，即斯托雷平（一八六二——一九一一）曾任俄國內務總長和內閣總理。他的名字是與鑽歷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俄國第一次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最殘暴的政治反動時期，即所謂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相聯繫的。他這『絞手』的綽號，是因為他對工農橫施殘暴屠殺而獲得的。——（見正文第一九頁）。

7 在克雷洛夫著的有名寓言貓與廚子故事中，敘述貓兒吃鷄肉，廚子叨叨不休地訓誡貓底行為不規，而貓却一面聽，一面大啖其肉。——（見正文第二六頁）。

8 路易、布蘭主義是以法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路易、布蘭（一八一——一八八二）而得名。列寧認為『路易、布蘭主義』乃是離開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

對資產階級實行妥協政策，用小資產者的空想和軟弱願望來代替與階級敵人進行不調和的鬥爭。——（見正文第二九頁）。

9 馬尼洛夫精神，因艾果里所著長篇小說在靈魂中的一個人物馬尼洛夫得名，以一味癡心妄想為特色。——（見正文第三七頁）。

10 一九一五年九月在齊美爾瓦爾得召集的國際主義者第一次代表會議上，列寧成立了左派集團，即所謂『齊美爾瓦爾得左派』，該派團結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切革命份子。——（見正文第三九頁）。

11 昆塔爾宣言是一九一六年在昆塔爾城召集的國際主義者第二次代表會議上通過的宣言。——（見正文第四三頁）。

12 工人報是孟什維克黨的中央機關報，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一月在彼得格勒出版。——（見正文第四六頁）。

13 是指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為繼續帝國主義戰爭所發行的『自由公債』而言。——（見正文第四六頁）。

14 本決議是萊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所作報告通過的。——（見正文第五二頁）。

15 喀霍夫係俄國上校，一九〇六年因波斯發生革命，他被派去鎮壓當地的『騷動』。一九〇八年，在他領導下，把達弗里斯的革命運動撲滅下去了。——（見正文第六六頁）。

16 是指發護照給麥克唐納到斯托哥爾姆去參加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會議一事而言。——（見正文第六九頁）。

17 卡芬雅克是法國將軍、陸軍總長，一八四八年六月用殘暴手段屠殺過巴黎的起義工人。——（見正文第七六頁）。

18 真理報是波爾什維克公開出版的日報，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公曆五月五日）在彼得堡創刊，其組織者和領導人是列寧和斯大林。真理報常受沙皇政府取締，屢遭封閉，但接着又用工人真理報、無產階級真理報等新名稱繼續出版；一九一四年七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被政府封禁，直到一九一七年三月推翻專制制度之後，才以波爾什維克中央機關報資格復刊；一九一七年七月奪權後，轉入半秘密狀態，並用各種不同的名稱繼續刊行；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起，又用原

先的名稱出版；一九一八年三月移到莫斯科刊行。從此時起，真理報就以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和莫斯科委員會機關報名義出版了。——（見正文第七八頁）。

19 科爾尼洛夫暴動是指一九一七年八月間科爾尼洛夫將軍掀起的反革命暴動而言，其目的是要撲滅革命，推翻蘇維埃，成立武人專政的政府。由於波爾什維克黨積極領導武裝回擊反革命勢力之結果，科爾尼洛夫暴動被消滅下去了。——（見正文第九六頁）。

20 這是一九一七年九月間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召集的。出席這次所謂民主會議的有各社會黨、各蘇維埃、各職工會及其他組織底代表。該會議上推舉了所謂預備國會，即共和國臨時議院。召集這次民主會議乃是想把國家由蘇維埃革命道路轉到資產階級國會制道路，即阻止日益逼臨的革命而沒有成功的一種嘗試。——（見正文第一〇一頁）。

21 啟特、啟對奇是工商業界富豪之稱號，這人原是俄國戲劇家奧斯特羅夫斯基所著滑稽劇無端遺囑中的典型富商。——（見正文第一〇一頁）。

22 自由生活報是孟什維克的報紙，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彼得格勒出版。——（見正文第一二五頁）。

23 交易所公報是資產階級的日報，一八八〇至一九一八年在彼得堡出版。——（見正文第一二六頁）。

24 『煤炭銷售公司』，即『俄國頓涅茨煤區礦物燃料銷售公司』，成立於一九〇六年。（見正文一三一頁）

『五金銷售公司』，即『俄國五金冶煉廠產品銷售公司』，成立於一九〇一年。——（見正文第一三一頁）。

25 彼得格勒的亞歷山大戲院是民主會議開會的地方。彼得巴夫洛係是沙皇時代禁錮革命家的地方。——（見正文第一四七頁）。

26 對壘師是由高加索山民部隊所編成，科爾尼洛夫（參看註19）曾企圖利用這師人去過革命的彼得格勒。——（見正文第一四九頁）。

27 卡列金叛亂，是一九一七年末和一九一八年初頓河哥薩克上層份子，在卡列金將軍領導下掀起的反革命暴動。——（見正文第一五五頁）。

28 工人之路報是真理報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三日（公曆十六日）至十月二十六日

(公曆十一月八日)藉以出版的名稱。——(見正文第一六五頁)。

29這是指陸軍總長維爾合斯基因擊首俄國軍隊再不能繼續戰爭遂被臨時政府撤職一事而言。——(見正文第一六六頁)。

30斯賓塞(一八二〇——一九〇三)是英國社會學家。據他的學說，國家之產生，並不是由於階級出現與階級鬥爭的結果，而是由於『社會職能複雜化』的結果。

米海洛夫斯基(一八四二——一九〇四)是俄國社會政治運動中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民粹派思想家，即所謂『社會學主觀方法』底代表人物。——(見正文第一七五頁)。

31哥達綱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於一八七五年在哥達城舉行的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綱領。——(見正文第一八七頁)。

32愛爾福特綱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於一八九一年在愛爾福特城舉行的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綱領。——(見正文第二三〇頁)。

33反社會黨人的法令是一八七八年由德國首相俾斯麥建議施行，目的是要把德國社會民主黨消滅下去。經過長期鬥爭後，一八九〇年該法令被廢除了。——(見正文第二三二)。

34這裏恩格斯是指普魯士黨權派『自上』用武力把分裂的德意志各邦聯合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而言。普奧戰爭(一八六六年)結果，成立了北德意志聯盟；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後，便成立了以普魯士爲首的德意志帝國。——(見正文第二三五頁)。

35這是指一九〇三年七八月間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而言。代表大會在布魯塞爾開幕，但因警察追緝不得不移到倫敦繼續開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實際上這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的代表大會，在這裏通過了黨綱和黨章，建立了黨的中央領導機關。代表大會上展開了兩派(列寧領導的革命派和馬爾托夫領導的機會主義派)間主要是關於組織問題的鬥爭，使黨分裂成爲兩個集團：波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意思就是多數派和少數派，因爲在投票選舉黨中央機關時，列寧底擁護者獲得了多數，而他的敵人獲得了少數。——(見正文第二四四頁)。

36是指俄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杜干、巴爾諾夫斯基（一八六五——一九一九）而言。——（見正文第二五六頁）。

37施洛克是英國作家莎士比亞劇本威尼斯商人中所描寫的一個高利貸者。——（見正文第二五九頁）。

38是指俄國作家波米洛夫斯基所著中篇小說教會學生一書而言，其中揭露了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流行於俄國教會學校的荒謬教育制度和粗鄙習氣。——（見正文第二六〇頁）。

39斯底納是德國反動哲學家，無政府主義思想理論家史米特（一八〇六——一八五六）底假名。——（見正文第二六六頁）。

40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由考茨基提出而通過的決議容許（雖然是有條件地）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政府。——（見正文第二六九頁）。

41英國憲章運動，是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在英國發生的『第一次廣大的、真正羣衆的、政治上形成了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列寧語）。這次運動因一八三八年英國工人向國會呈遞載有政治要求的請願書（英語為憲章）而得名。——（見正文第二八九頁）。

42是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不久，由君主派普里什維奇所組織的反革命陰謀而言，其目的在於推翻蘇維埃政權。——（見正文第三〇七頁）。

43烏克蘭拉達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資產階級底反革命政府，曾於一九一八年二月與德國締結單獨和約，請奧德帝國主義在軍隊進駐烏克蘭境內來撲滅蘇維埃革命。——（見正文第三一四頁）。

44柏林斯基（一八一——一八四八）是俄國一位卓越的批評家、政論家和激烈揭露農奴制度的人。他在俄國革命社會思想發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見正文第三二四頁）。

45見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馬克思致布拉克的信（哥達黨領批評）。——（見正文第三二九頁）。

46這是尼德者的浮士德（第一幕）中米費斯托法圖所說的話。——（見正文第三二九頁）。

47這宣言草案是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初寫的。斯大林得到列寧底同意，在這

個草案中加上了幾點修正。本草案就以這樣的形式成爲全俄中央執委會宣言底基礎，宣言於一月五日在立憲會議上宣讀過。立憲會議中佔大多數的反革命派竟拒絕加以討論，一八一八年一月十一日舉行的第三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將這宣言批准了，後來包括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舉行的第五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之蘇俄憲法中，成爲其組成部份。——（見正文第三三三頁）。

48本草案寫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六日。斯大林同志參加了起草本草案的工作。全俄中央執委會當天就通過了這個法令。——（見正文第三三六頁）。

49甘尼巴爾（紀元前約二四七——一八三）是喀他基那的統帥。『甘尼巴爾已闖到門口了』一語是國難當頭的意思。——（見正文第三五九頁）。

50共產主義者報是『左派共產黨人』底派別機關報，一九一八年三月五日至十九日在彼得格拉出版。——（見正文第三六一頁）。

51這是指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至二十九日在彼得格拉召集的波爾什維克黨第七次全俄代表會議而言。代表會議確定了黨對戰爭與革命各基本問題的路綫，並指明黨爲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的道路。——（見正文第三六九頁）。

52拉斯普庭（一八七二——一九一六）是尼古拉第二朝廷中具有巨大影響的一個野心家。——（見正文第三八〇頁）。

53這是指國家杜馬代表被迫簽署誓面誓詞一事而言。——（見正文第三八二頁）。

54郭福曼（一八六九——一九二七）是德國將軍，一九一八年在布列斯特進行和平談判時，充當德國代表團底首席代表。（見正文第三八四頁）。

55這是指列寧所起草，而爲第四次全俄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關於批准布列斯特和約的決議案。在該決議案第四段上說：『代表大會向全體工人、兵士、農民、向全體勞動者和被壓迫羣衆，極堅決地提出目前最主要迫切和必需的任務：要提高勞動羣衆底積極性和自我紀律，到處建立起強固而嚴整的組織，使其儘可能包括一切產品之生產與分配事宜；要與各種混亂現象、搗亂組織現象和經濟破壞現象作無情的鬥爭，這些現象是痛苦戰爭遺留下來的歷史必然產物，同時也就是妨礙社會主義獲得最終勝利並鞏固社會主義社會基礎的主要障礙。』這個決議案發表於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六日的真理報上（參閱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四一〇頁）。
——（見正文第三九九頁）。

56博加也夫斯基（一八八一——一九一八）是頓河流域哥薩克反革命勢力的領導人之一。——（見正文第四〇二頁）。

57新生活報和前進報是孟什維克底報紙，人民事業報是社會革命黨底報紙，我們時代報是立憲民主黨底報紙。——（見正文第四二九頁）。